战争变为反苏战争，以致沒有作好对德作战的准备。

英美的动向

由于法国投降和意大利参战，英国不得不单独地和德意作战了。然而，英国的軍队几乎全部被赶出了欧洲大陆，英国本土也被德国从北欧到西欧的月牙形基地包圍起来了。英国所能倚靠的只有它在海洋上的优越地位。因此，在法国投降前后，英国最关心的，与其說是法国本身的命运，勿宁說是法国艦队的命运。如果在实力上仅次于英国的法国艦队完全落在德国手里，再和已經参战的意大利艦队联合起来，就足以使英国的海上霸权受到严重威胁。英国首相丘吉尔在6月6日甚至向法国总理雷諾提議：如果法国肯把艦队开到英国港口，英国就可以同意法国同德国停战。英国对法国艦队的这种关怀，也不能不反映在希特勒的态度上。希特勒在停战条件里并沒有要求法国移交它的艦队，而仅仅要求法国把艦队集結在本国各港并且解除武裝。希特勒的这种要求，在海軍力量处于劣势的德国来說，是非常宽大的，这里面含有后面即将談到的政治上的考虑。然而，英国并不以此为滿足。因为：誰也不敢保証德国究竟能遵守它的諾言多久。德法停战的当天，丘吉尔就发表演說提到："法国艦队的命运对于英国和英帝国的安全的影响，即使不是决定性的，也是极其严重的。"尤其是根据英法两国的协定，地中海西部从直布罗陀直到馬尔他島这段海面的防备是由法国海軍担任的。只是法国艦队停止在这段海面活动，对英国来說，就等于失去了地中海的安全。在亚历山大港，經过在当地的双方海軍当局的交涉，事情得到和平解决，法国艦队被解除了武裝。但是在欧兰和达喀尔港，法国艦队旣拒絕同英国合作又拒絕解除武裝。7月3日和7日，在欧兰和达喀尔，英国艦队向法国軍艦开了炮，并俘获了一大部分。其結果，英法两国的关系急剧恶化，投

降后的法国政府甚至宣布同英国断絕邦交。

这种情况，自然要严重地威胁英国在地中海的地位。由于德国的胜利而振作起来的意大利和西班牙都开始了积极的攻势。意大利开始了对北非和巴尔干的进攻；西班牙占領了北非的丹吉尔。在太平洋方面，已經不得不单独对德作战的英国，在对华政策上表示退縮，这就为日本向因宗主国的战敗而陷于无政府状态的东南亚殖民地进行扩張，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情况表明，太平洋方面和地中海方面的力量对比已經有了改变，战爭已經越出了欧洲大陆的范圍，而向世界范圍扩大了。1940年9月签訂的日德意三国軍事同盟，就是德意两国适应这种世界战爭的局面同日本划定势力范圍的一种表現。因此，他們不仅考虑了对英作战的問題，而且不能不把美国当作了对手。

这种情况使美国感到："美国虽想躲避战爭，而战爭却向美国逼近"。同时，陷于孤立的英国再三地、死求百賴地向美国請求援助。当时，在美国国內还有很大一部分势力不仅不願参战，甚至对援助英国也表示反对。（参看本书第三章，第一节）尽管如此，战爭已經发展到这种局面，美国的政策也不得不轉向积极。同年8月，美国首先和在法理上已經同德国处于交战状态的加拿大締結了共同防卫协定。9月間，美国又以英国提供西印度群島的殖民地为交换条件，把老旧的驅逐艦五十艘让給了英国，加强了对英援助。此外，美国还实行了以两洋艦队为目标的大規模的造艦計划，断然禁止了航空用汽油、碎鉄等物資的出口，使它同軸心国的关系紧張起来了。在美国，固然还沒有把参战問題提到日程上来，但是，以上这种趋势迟早要使美国面临参战的問題，是非常明显的。

第二节　苏德战争的爆发

德国放弃对英本土登陆作战

希特勒在法国投降后，紧接着在7月14日又一次向英国提出了和平建議，他說："自己本心并不想打倒或者損伤英帝国"。这一次和平建議决不是一种单純的策略。因为他搶在英国对法国艦队表示关心以前，就以寬大的条件和法国实行停战，并表明他无意同英国战斗到底。然而英国已經下定决心要和德国作战，因而这个建議遭到了拒絕。于是，德国就不能不面临进攻英国本土的問題了。

8月11日德国空軍对英国本土开始了大規模的进攻，在英国上空，两国空軍展开了殊死的战斗。德国空軍起初以飞机場、軍港等軍事設施为攻击目标，到8月28日，突然对倫敦施行了大轰炸。一般认为：这是对英国本土实行登陆作战的征兆。事实上，当时德軍最高指揮部已經决定要在9月21日开始所謂"海獅作战"的登陆作战。面对这个危机，英国首相丘吉尔作了抗战准备，并声称："无論付出多高的代价，我們也要堅守英倫三島"。在当时的情况下，很多人都对英国的前途抱着悲观的看法，例如："美国参謀本部就有五分之四的成員认为英国的局势是絕望的"。（戴維斯·林德利：《大战是怎样发生的？》）虽然如上所述，这时美国已經积极支援了英国的抗战，但是不能否认，这种对于英国前途的悲观的預測确使美国統治阶級中少数派的孤立主义、不干涉主义的活动有所加强。"波士頓出身的实业家、并且和华尔街关系很好"的美国駐英大使肯尼迪曾經不止一次地向本国报告說：遭到德国进攻以后，英国将要屈服。同时，由共和党議員們組成的"美国第一委員会"的活动也积极起来，他們向美国国民散布了孤立主义的思想。

但是，德国到底沒有对英国本土实行登陆作战。英本土登陆作战对于德国来說，并不等于"再越过一道河流，而是要渡过这样一个海洋，它是掌握在做好准备、决心战斗到底的敌人的手里"。(戈林)这样，德国在海洋上的劣势，也就暴露了它的致命的缺陷。也就是說，希特勒以英国的友好作为制訂海軍政策的基础这种作法的一个后果，就是它在英国本土登陆作战上面暴露了致命的缺陷。問題还不只是英国本土登陆作战成为不可能，而且希特勒想要早日結束战爭的希望也归于幻灭了。虽然长期战对于軍事潜力不足的德国显然不利，然而它也不得不下决心进行长期战了。不仅如此，法国投降以后的局势是：公然采取压制自由、夺取他国領土的政策的德意日三个主要法西斯国家同反法西斯各国（只要它們反对法西斯，就会受到維护民主和自由的国內輿論的支持）之間的斗爭扩大到全世界范圍；与此同时，美国也越来越趋向于参战了。

德軍侵入巴尔干

在上述情况下，希特勒不得不放弃了英国本土登陆作战。根据10月12日希特勒所发布的指令，英本土作战已經不是首要的問題，只是为了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对英国进行威吓，仍然保留有关这一作战的准备工作而已。德国选擇的另外一条道路是侵略东方，具体地說，就是打倒法国投降后在欧洲大陆上唯一可以和德国对抗的强国苏联，以便达到它統治欧洲大陆的目的。德国侵略东方的第一步，就是把巴尔干各国納入德国的完全控制之下，并且为了使其在对苏作战时成为可靠的前进基地，在政治上、軍事上对它們进行改組。

开战以来，巴尔干的农产品和矿产对于德国进行战爭起了重要作用。尽管英国对德国进行了封鎖，然而德国因为取得了多瑙

河流域的丰富粮食，所以在开战一年以后不仅沒有发生粮荒，而且它的粮食儲备也原封未动。其次，罗馬尼亚的石油資源对德国的生存有着严重意义，这是不用說的。因此，在开战以前，德国就致力于取得巴尔干的資源。战前，在巴尔干各国的貿易总額中，对德貿易竟占百分之四十到五十，通过貿易，巴尔干各国已經和德国密切地結合起来了。但是，巴尔干各国人民并不同情德国进行战爭。因此，巴尔干各国从开战以来一貫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并且还为結成这样的集团进行了活动。再者，德国的战时經济只是迫切需要吸取巴尔干的資源，而这些国家所需要的工业品却无力供应。这种貿易上的不平衡，事实上也不可能从在軍事上被德意两国所压倒的英法两国那里求得解决。于是，巴尔干各国为了維持自己的国民經济，就采取了同苏联建立密切的經济关系的方針。1940 年苏联和保加利亚締結了通商条約，同年 5 月又和南斯拉夫締結了同样条約。6 月間，苏軍进駐波罗的海三国，堵塞了这些地区变成反苏策源地的可能，并使罗馬尼亚归还了它夺去的原属旧俄領土比薩拉比亚和北布哥維納。其結果，苏联国境"向西方扩展了，达到了仅次于伏尔加河的欧洲最大河流、欧洲各国間交通要路之一的多瑙河河畔了"。（莫洛托夫語）

苏联在巴尔干的地位如此加强，自然刺激了德国。法国投降后，希特勒曾发表演說，向英国提議讲和，他說："我的外交政策的根本方針在于和意大利亲善、和英国合作"，而对于苏联則絲毫沒有表示好感，这一点結合当时德苏間的上述对立的情况，受到了各国的注意。因此，德国就是为了准备英国本土登陆作战，也必須在某种程度上对巴尔干采取外交和軍事措施，以便巩固自己的背方。特别是确保罗馬尼亚，对于德国說来，是一个在双重意义上必須解决的迫切問題。第一个問題当然是完全掌握罗馬尼亚石油資源的問題；另一个問題是，匈牙利和保加利亚正在頑强地要求罗馬尼亚

归还失地，为了拉攏这两国，德国必須迫使罗馬尼亚让步，使巴尔干各国之間的对立得到緩和。这两个問題在8月中大体上都解决了。罗馬尼亚正在担心苏联的“侵略”，德国便乘机向它施加压力，使其向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作了让步；同时又以“保卫罗馬尼亚的石油資源”为名，向那里派遣了十二师軍队。在德国的这种軍事外交压力之下，罗馬尼亚首相安特奈斯克和法西斯团体“鉄卫团”进行协商的結果，終于迫使亲英的国王退位，建立了亲德的整体主义体制。至此，罗馬尼亚便完全落入德国手中了。

然而，德国大举侵入巴尔干是在10月間放弃了对英国本土登陆作战以后。德国首先假借保卫油田区和訓练罗馬尼亚軍队的名义侵入了罗馬尼亚，并使由德国的从中策动而收复了失地的匈牙利与罗馬尼亚一同加入了三国同盟。在德軍进駐罗馬尼亚以前，德国就向罗馬尼亚派遣了一个軍事代表团。希特勒在給这个軍事代表团下的命令中附上了这样一条任务：为了适应对苏作战的需要，“必須为德国軍队从罗馬尼亚基地进軍作好准备”，在这里，明确地指出德軍进駐罗馬尼亚是以苏联为进攻目标的。面对这种紧急形势，苏联于11月要求保加利亚締結互助条約，对此，希特勒在12月18日下达了名为“巴尔巴罗薩作战”的对苏作战的命令。这一作战的目的是要占領苏联的欧洲部分，并預定罗馬尼亚和芬兰也积极地参加这一作战。

德国的对苏作战准备

1941年1月初，美国副国务卿薩姆納·威尔斯接到一份“絕对可靠的情报”說本年春季德国将要突然进攻苏联。他經过罗斯福总統的同意把这消息通知了苏联駐美国大使。在这期間，德国正在露骨地、迅速地进行对苏作战的准备。德国軍队开始大量地向东方調动，仅在罗馬尼亚就集結了六十八万人，其主力是具有最新

式装备的机械化部队。3 月間，德国空軍部队开始有組織地、大批地侵犯苏联国境，深入內地，进行偵察活动。与此同时，德軍又占領保加利亚，使保加利亚参加了三国同盟。

德軍侵入巴尔干，是在 1940 年秋季到 1941 年这段时間进行的。这件事，虽然进行得很快，但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在 1941 年中，尽管德意两国依然保持軍事上的优势，但是英国却在某种程度上轉入眞正的抵抗了。德国放弃了对英国本土登陆作战，使英国海軍有可能把一部分力量調往其他地方。意大利在法国投降以后，利用它在地中海方面有利于它的形势，侵入了北非和希腊。因此，控制苏伊士运河和保持对地中海的制海权，便成为英国急需解决的迫切問題了。因为不这样，大英帝国本身就无法維持下去了。由于这种原故，英国通过增援迅速地加强了它在地中海的海軍力量，在 2 月間，它竟然直接向意大利的軍港进行了襲击。英国在北非和希腊也开始了反攻，結果意大利軍陷于苦战状态。同时，得到英軍援助的希腊軍队也越过国境攻入阿尔巴尼亚。在北非，英軍不仅攻入意属利比亚，还击敗了占領埃塞俄比亚的意大利軍，使得埃塞俄比亚皇帝在离别五年之后重新回到祖国，发表了恢复独立的宣言。英軍在地中海上的这种优势，自然会影响到欧洲大陆方面：法国維希政府起了变化，它罢免了最积极主張亲德的賴伐尔，并策动接近美国等等。特别是和希腊、意大利接壤的南斯拉夫对德国的攻势进行了大規模的抵抗。希特勒在 3 月間曾要求南斯拉夫加入三国同盟，南斯拉夫政府，經过激烈的爭辯，曾經一度接受了这項要求，但人民群众坚不承认，在首都貝尔格萊德以及各大城市掀起了反德示威游行。在这种压力之下，南斯拉夫內閣垮台，产生了以西莫維奇将軍为首的新內閣，廢弃了它同德国的同盟。新內閣是亲英的，但在成立后不久就和苏联締結了互不侵犯条約，采取了正面拒絕德国要求的态度。

在这种形势下，德国在苏联和南斯拉夫締結互不侵犯条約后沒到几小时就侵入了南斯拉夫，很快地占領了这个国家；到4月末，它还派遣軍队在芬兰登陆。接着在5月間，德軍占領了希腊，从巴尔干驅逐了英国势力，并乘势夺取了东地中海的要冲克里特島。在非洲，由德国迅速地調去的机械化部队开始了反攻，埃及国境再一次被軸心国軍队冲破了。德意两国在东地中海方面进行的这次反攻虽然暫时取得了胜利，然而这种情況預示着德国在进行战爭上面的困难是愈来愈多了，表明了战爭結束的希望是更加渺茫了。为了对已經开始眞正抵抗的英国施加軍事压力，德国向当时来訪的日本外务相松岡提出要求，要日本进攻新加坡。为此，德国不得不約定把苏联軍队吸引在欧洲，并且对日本和苏联締結中立条約，双方保持远东国境的和平一事，也不得不加以默认了。然而，德国自然会預料到，日本硬要南进，必然会导致美国参加反对軸心国家的战爭。这一点使德国感到左右为难。无疑，德国是打算通过对苏开战来同英美改善关系。5月，阿道尔夫·赫斯飞往英国，就是这个企图。利用統治者的反苏反革命傾向使其放弃战爭的办法，虽然在法国身上得到成功；把它用在当时的英美两国，却是完全的估計錯誤。因为欧美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爭和强大的苏联的存在，已經不允許英美两国政府公然和希特勒携起手来。

如上所述，德国侵略苏联是有准备有計划的，但是这一侵略并沒有經过周密的計算而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实际上，希特勒越是进行准备，就越发感到最初計划的錯誤和破綻百出。而这种錯誤使希特勒騎虎难下，顾不得有无把握，竟盲目地投入了更大規模的战爭冒險。

德軍侵入苏联

1941年6月22日，德国軍队突然侵入了苏联領土。德国大

使在进攻前向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提出的一些对苏联的指責，諸如：国际共产主义对德国进行破坏活动；苏联对德国所企图建立的“欧洲新秩序”进行妨害；苏联的指导原理在于削弱非共产主义国家；等等，都是抽象的、站不住脚的。然而，德国所投入到这个战争中的兵力远远超过了西欧战場。只是第一批越过苏联国境的德軍就有一百二十一个师，其中約有三十个师是完全机械化部队。而且，为了进行这場战爭，德国不仅动員了将近欧洲全部的資源和生产力，并且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罗馬尼亚、芬兰等国也和德軍一起进攻了苏联。苏联紅軍在各个战場上迎击了軸心国軍队，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广大战綫上展开了曠古未有的激战。在战爭的第一阶段，对于作了充分准备的德軍是很有利的，尤其在平坦的南烏克兰平原上，德国的进攻更为迅速。在同年夏季，白俄罗斯、波罗的海三国、烏克兰的大部分和敖得薩、基輔等重要城市被德軍占領，北部的列宁格勒也陷入了德軍的重圍之中。到秋季，德軍进一步迫近了首都莫斯科的郊外，在莫斯科的各机关和外国使館都迁到了古比雪夫。

希特勒大言不慚地說要在六周以內征服苏联。单从第一阶段的战况看来，这似乎也有可能。然而，后来战爭开始进入了胶着状态。首先，德国軍队在苏联人民中間，沒有能够象在波兰和法国那样找到自己的朋友。在西欧各国，一遭到德軍进攻，民众就陷于恐怖和混乱之中而爭先涌向道路，以致妨碍了軍队的行动，并且影响了軍队的士气，然而在苏联，却沒有发生这种情况。当敌軍迫近的时候，集体农庄和城市的各种組織都充分地发揮了力量。特别是西部各地区的集体农庄，早已做好应付侵略的周密計划。集体农庄在生产上的各种組織直接地变成了抗敌的組織：一批人担任撤退老人和儿童的工作；另一批人把农产物和机器移往后方，以免落在德軍手里；又一批人担任实行焦土战术，不使占領者得到一草一

术；最后主要是青年的一批人隐藏在森林里或湖沼地带，用游击战术来打击敌人。特别是向后方撤运产品和生产資料的工作根据周密的計划进行得很快，有不少工厂整个撤到了东部地区。許多当时在莫斯科的外国人都用惊叹的心情描写了，滿載着机器和貨物的汽車源源不断地奔向东方的情景。而且，当时在莫斯科以东的烏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正进行建設新式工厂，苏联最新式工业設施的百分之七十五是在这些地方。因此，虽然在 1941 年圣誕节德国宣傳部长戈培尔吹嘘說：包括苏联重工业設施的二分之一在內的地区已經落到了德軍手里，实际上，虽然苏联所失去的地区的产値实际上超过了苏联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以上，但是苏联的全部工业生产还是有了上升，东部地区的工业設施供应了紅軍所需要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軍事物資。后来，虽然美国租給了苏联武器，但是这个租借的数量仅占苏联实际需要的百分之四，所以还是由苏联工业自己担任了支援卫国战爭的任务。

但是，在 1941 年年初的战斗中苏联的損失是重大的，德軍无疑得到了許多东西。虽然在开战前夕就任部长会議主席領导苏联內政和外交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等人坚决留在莫斯科指揮作战，但曾經有个时期，列宁格勒的情况非常危險，同时莫斯科的前途也使人不抱乐观。然而随着冬季的临近，苏軍的处境逐漸有了好轉。迫近莫斯科的德軍遭到紅軍的反击而不得不后退，南部地区的罗斯托夫也被紅軍收复了。列宁格勒虽然受到敌人的重重包圍，但一直是屹立不动，紅軍的士气絲毫也沒有低落。

英美同苏联合作

卫国战爭刚一开始，欧美各国的許多軍事专家都預言苏联将很快地被战敗。甚至有人抱着极端的看法，說苏联即使全力抵抗，也只能支持三个星期。因此，在开战那一天，英国首相丘吉尔立即

发表演說，說苏联是对付共同敌人希特勒的同盟者，表示信賴苏联人民的力量和勇气，并指出："俄国的危險就是我們的危險"一事，引起了深刻的反应，这是理所当然的。接着，美国副国务卿威尔斯也在新聞記者招待会上表明了支持苏联的态度，他說："希特勒的軍队今天已經成为美国的主要危險"，为了保卫美国的安全，必須联合一切反希特勒的力量（不論是任何力量），来打倒希特勒主义。当时，也有另外一些論調。美国参議院議員杜魯門（以后当上总統）在紐約时报上发表过这样意見："如果德国将要获胜，我們就应該援助苏联；如果苏联将要获胜，我們就应該援助德国。这样来尽可能地使他們互相殘杀。"另外，英国空軍大臣表示希望"德国和苏联两败俱伤"，也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在当时，就英美本身来說，打倒德国也已經成为目前当务之急，为此，它們必須首先考虑联合一切反軸心力量的問題。当时，英国的情况是，不仅从地中海到非洲和近东的"大英帝国的生命綫"，以及在亚洲的广泛权益直接受到軸心国軍队的威胁，而且本国的存在本身也陷于严重的危机；同时美国也面临着法西斯侵略在世界范圍內全面扩大的危險。因此，无論对英国說来，还是对美国說来，在反对日德意法西斯的战爭中取得胜利，还是保卫自己的帝国主义利益的必要条件。在这种形势下，反軸心陣营內部的相互对立虽然沒有消除，但总算暫时从国际政局的表面上消逝了。这个战爭逐漸明显地表現为法西斯主义各国和反法西斯国家之間的战爭，美国虽还沒有正式参战，但英美的战爭目的到这时才算明确起来，这就是反对法西斯。这种形势的变化是和英美两国工人阶級的努力分不开的。英国共产党最初是把英德战爭看成是帝国主义战爭而采取了反对的方針；到了德国对苏联宣战以后，它为了加强反法西斯的力量，改变了以往的方針，对战爭給予了积极的支持。另外，英国共产党还通过成立英苏两国工会委員会等組織来密切两国工人阶級的联系。美国共

产党和美国工会也支持总統趋向国际联合的政策，同策划与納粹妥协的共和党反动势力进行了斗爭。援助独力抗击納粹进攻的苏联——这就是当时各国工人阶級，包括在社会民主主义影响之下的工人的总意。

大西洋宪章和三国会談

1941 年 7 月，英国和苏联締結了互助同盟条約，約定不单独讲和；8 月，美国宣布中立法不适用于苏联，并且給予苏联以全面的援助。8 月 14 日美国总統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大西洋上举行会談，发表了一篇共同宣言，闡述了打倒德国的目的和有关战后維持和平的一些想法。这就是所謂"大西洋宪章"，在这个文件里，首先表明英美两国的目的不是为了侵略和扩大領土，接着写道："凡未經有关人民自由意志所同意的領土改变，两国不願其实現"；并表示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擇其所賴以生存的政府形式的权利；又說"各民族中主权和自治权横遭剝夺者，两国俱欲設法予以恢复，"表明了它們不承认軸心国家通过侵略所造成的結果的态度。特別是其中第五項規定，为了改善劳动条件、繁荣經济和确保社会安全，实行国际合作，这可以說是反映了反对法西斯、保卫民主的这次战爭的性质。在制訂这一宪章的过程中，英美两国間基本上沒有发生意見的分歧，只是在討論規定世界各国对世界貿易和原料具有平等权利的第四項时，英国举出在英联邦各国之間，已签有渥太华条約的事实，而主張加进尊重"現有的限制"这样一句話，和美国表現了某种程度上的对立。这件事反映了英美两国爭夺世界市場的矛盾，引起人們的注意。尽管这样，这次大西洋会談已經注定它必然要随即发展为包括苏联在內的三国会談。三国会談是于 5 月間，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談結果，美国約定全面供应苏联所需要的物資，并在 10 月向苏联提供了十亿美元的信用貸款。翌

年1月，英国与苏联同伊朗締結协定，保証了援苏物資可以通过伊朗境內。从这时起，伊朗成了援苏物資的主要运輸綫。另外还有一条危險得多、費用較大的經过北海的运輸綫。通过这两条路綫，到1944年为止，同盟国向苏联輸送的物資，包括坦克九千二百十四辆、飞机一万四千六百九十八架、大炮五千五百九十五門在內，总計有一亿一百万吨。

日美参战和同盟国宣言

迫近莫斯科的德軍的进攻受到阻止，苏联保卫莫斯科的战斗开始取得了胜利的时候，日本在太平洋发动了全面的战爭。但是，日本的参战也給軸心陣营带来了重大負担。因为美国在眞珠港受到襲击以后，立即向德意两国宣战，徹底地加入了反法西斯国家的联合陣营了。

1942年1月1日，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国四国发表了以大西洋宪章为基础的共同宣言，約定为打倒法西斯进行合作，并且不单独讲和。次日，又有二十二个国家在这个宣言上签了字，到战爭結束前后，共有五十二个国家参加了这个宣言。这个宣言称为同盟国宣言，它是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共同綱領，是維持战后和平的共同基础。

同盟国在欧洲方面急待解决的問題是加强对苏援助。苏德战爭表明：在欧洲，苏联是可以阻止德国侵略的唯一强国。从1942年1月起，經过数次外交談判之后，在5月間，苏联外交部长訪問了英国和美国，就軍事和經济合作問題进行了商談，和英国締結了軍事条約，和美国締結了經济协定。其結果，苏联获得了美国的两項諾言：把援苏信用貸款增加到三十亿美元，以及在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場。这样，同盟国的团結方面有了迅速的加强，但同时，1942年又是軸心国家的威胁最严重的一年。

1941 到 1942 年的这个冬天，对英国来說，是一个黯淡阴郁的冬天。英国人最为夸耀的、在不利的形势下最为倚重的海軍，也在这年冬季遭受了严重打击，以致它的实力降到了最低水平。仅在 1941 年 12 月一个月中間就损失了四艘战艦。在馬来亚海面，"驅逐"号和"威尔士亲王"号两艦被打沉后还不到十天，"瓦廉特"号和"伊丽沙白女王"号二艦又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沉入海底。因此，在地中海的英国艦队也只剩下几艘巡洋艦和若干驅逐艦的程度，在 2 月間，甚至发生了很多德国軍艦通过了英国本土跟前的英法海峽的事件。英国在地中海的要冲馬尔他島，在几乎沒有进行有力抵抗的情况下，連日遭到了德意空軍的轰炸。有时这个小島在一日之內遭到三百架飞机的襲击，結果島上居民只好过着完全的地下生活。英国不仅在地中海的制海权遭到了最严重的威胁，而在亚洲方面，由于日本軍队占領了馬来亚和緬甸，并且出現在孟加拉灣，因而被称为英帝国之宝庫的印度也直接受到进攻的威胁了。

在这英国危急存亡的关头，倫敦《泰晤士报》发表了如下的社論（1942 年 4 月 13 日）：

"在这个时机，有一个事实，比任何其他事实都更为有力地支配着英国人的心情。这就是苏維埃俄国在拯救我們。如果說俄国沒有从战敗中把我們拯救出来，至少可以說，它把可怕的空襲火焰从我們的头上和孩子們的臥床上面撥开了。并且，俄国……有着偉大的軍事力量，尤其是……表現了坚强的意志。一言以蔽之，俄国是非常受欢迎的。和它比起来，美国几乎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往最好处說，我們认为美国只是作了它应当作的事；如果往坏处說，英国人并不把美国人估价的比自己高。而且英国人一向是不把自己估价得怎样高的。"（卡罗尔編：《撰写中的历史》）

当时欧洲的战爭，似乎实际上只是軸心国家和苏联作战。欧洲的命运取决于苏联人民能否打垮希特勒。苏軍在冬季中显著地

扭轉了形势，并轉入进攻。德軍在所有战綫上都受到攻击。紅軍不但使用騎兵，而且軍队和大炮都采用了滑雪板，以及利用馬橇和狗橇冲向德軍。苏联的游击队到处襲击德軍的通信綫路和补給綫。苏軍收复了莫斯科附近的大片土地，并在結冰的拉多加湖上鋪設鉄軌，对于被德軍包圍的列宁格勒进行了补給。在冬季里被紅軍夺回的城市从南到北共有十个以上。此后，德軍在中部以北的战綫上几乎未能向前推进。希特勒在 1941 年秋季曾夸耀說：“为了消灭苏軍达到胜利，今后只剩下扫蕩战了。”然而到了这年冬季，德軍却不得不后撤，不得不面临紅軍的頑强反攻。

德軍的再度攻勢

1942 年春，冰雪的溶化，給德軍的机动作战提供了有利条件，希特勒又大举进攻了。在这次攻势中莫斯科已經不是德軍的目标了。德軍加强了对列宁格勒的包圍，但是它的主要进攻方向却是南方。坚守在塞瓦斯托波尔的苏联紅軍和群众虽然进行了英雄的抵抗，但是克里米亚半島終于被德軍攻陷。德軍进一步侵入北高加索的一角，并向巴庫油田进犯。然而德軍南方战綫的最大目标是斯大林格勒。攻下这座位于伏尔加河下游的城市，就意味着切断伏尔加河的大动脉，使高加索不能再向北部和东部地区供給石油、谷物、肉类、棉花、銅、錳等重要物資，給苏联的战时經济以沉重打击。此外，情况十分明显，如果德軍占領斯大林格勒，在伏尔加河畔站稳了脚步，它就能够对莫斯科和巴庫取得軍事上的有利地位。7 月，德勃克将軍率領的大軍攻陷了頓巴斯煤田，占領了北高加索的門戶罗斯托夫，8 月 25 日，到达了斯大林格勒郊外。于是，对德苏战爭的前途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会战宣告开始了。

1942 年夏季，战爭似乎到达了最高潮。北非的德軍重新得到本国的增援，在同年 6 月向埃及开始了全面进攻。6 月 25 日德軍

越过埃及边境，四天以后占领了同盟国軍在北非的最大軍事基地亚历山大港的前哨基地麦特魯，7 月 1 日又攻下艾莱門，距离亚历山大港只有大約一百公里了。于是，同盟国方面不仅要考虑亚历山大港的陷落問題，而且要认眞地考虑苏伊士运河落到德軍手中的問題了。

第二章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确立

第一节　近卫新体制运动

新党运动的初步方案

欧洲战争的爆发以及在战争初期希特勒"閃电战"的胜利，对掙扎在长期化的中日战爭的泥潭中的日本統治者来說，不啻是从天而降的救星。他們一向企图夺取南方地区，作为軍需物資的新的补給基地，由于納粹德国席卷了法国、荷兰这两个殖民帝国，英国陷于困境，这就給予日本帝国主义实現它的野心，提供了千載难逢的机会。于是，在整个日本統治阶級之中出現了一种論調，即：进一步加强和德国的勾結，和德国的建設"欧洲新秩序"相呼应，来建設一个包括南方地区在內的"大东亚新秩序"。他們的口号是："不要誤了公共汽車"。

在这种情况下，支持米內內閣的各个派系間的不稳定的均势崩潰了，中間內閣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近卫和軍部要清算中間內閣的呼声以形势的这种急轉直下为媒介結合起来，他們为了迎接即将产生的强有力的"行动內閣"准备条件，发起了一个"新体制运动"。当然，这一运动强烈地反映了当时对于德国五体投地的情緒。因此，新体制运动首先是从組織納粹式的新党的运动出发了。在这以前，新党运动者們只是常常談論以近卫为中心成立新党的問題而已。至此，組織新党的条件已經成熟了。

自从1940年2月发生了斋藤隆夫問題(参看第2卷，第5章，第3节)以来，老牌政党即陷于分裂和矛盾的漩渦中，并走到了最后瓦解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并和軍部保持联系的久原房之助、永井柳太郎、前田米藏、山崎达之輔等人，在5月間又

和近卫的亲信风見章、有馬賴宁取得联系，进行策划組織新党，并在5月下旬拟就了“新党綱領草案”。这个草案包括以下三个項目：(一)建設“国防”国家，(二)开展外交活动，(三)确立政治新体制。此外，还附有“諒解事項”，規定新党将不吸收民政党的主流以及久原派中一部分人参加等等。(矢部貞治：《近卫文麿》)关于不吸收民政党主流及其他人士参加一节，据风見章在他的《近卫内閣》一书中所說，是由于他主張“必須存在着有强有力的反对党”，并取得了近卫的同意。但是，当时报紙、广播都一致地宣傳說，德国胜利的源泉就在于希特勒对全国軍民的統一和掌握；而风見章等人的伙伴有馬賴宁也曾向新聞記者宣称，他們这一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仿照納粹的作法，实現国民的政治組織化”。(《东京朝日新聞》6月11日)在这种气氛中，如果被排除在新党以外，就等于立刻失掉政治生命。因此，諒解事項中“不理睬現有政党中不参加新党的人”一語，是意味着对于沒有赶上浪头的民政党主流和政友会鳩山派的一种恫吓。

进入6月，随着德国在欧洲的进攻，新体制运动又有了进展。由老牌政党中亲軍部的、主張成立新党的分子联合組成的“貫彻‘圣战’議員联盟”(同年3月25日組成)，在該盟6月3日的大会上通过并发表了“調整政治体制方案”，强調指出：为了“彻底消除国民的不安情緒，給国民指出前进方向，以便举国一致地貫彻国策”，必須成立“一个强有力的新党”。同月4日，有馬宣布近卫的出任已有百分之八十的确实性。同一天晚上，近卫本人也在記者招待会上說明了新体制的必要和自己对于新体制的关心。主張成立新党的分子已經一致表示了推举近卫为新党总裁。近卫出来的消息对促使政党的瓦解以及它們同新党的合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6月6日，主張成立新党的巨头久原会見米内首相，提出了三項建議：(一)清算追随英美的方針；(二)对援华的国家采取断然

措施；(三)确立高度"国防"国家体制。次日，米內拒絕了答复以上建議，于是，久原便立卽辞去了內閣参議的职务。这是主張成立新党一派不信任內閣的一种表示。各政党，包括民政党在內，都表示同意久原这一行动。这样，到法国对德投降时，各政党都爭先恐后地向政府提出强硬要求，敦促政府改变外交方針，这种情况簡直象是在进行政党的大拍卖。所有政党都挖空心思想尽一切办法，要比别的政党叫喊得更响，以便在卽将产生的新党中取得优越的地位。

其次，政府还遭到了"革新"的右派强硬主張的压力。包括大日本青年党、东方会、国民同盟等等具有代表性的革新右派团体在內的东亚建設国民同盟，对于新体制运动，一方面保持警惕，不使这一运动成为挽救老牌政党的一个运动，另一方面又认为这是实現自己主張的良机，企图建立对这一运动的領导权。中野正刚在給近卫的信里曾就成立新党問題写道："如果聘請安达、末次、桥本和我参加，也就能够得到其他人士的諒解"(矢部貞治著前书)，这表明他們对新党的領导权問題抱着多么幼稚的自負情緒。他們在6月23日和貫徹"圣战"議員联盟一道举行了国民时局恳談会发起人会，通过了一項充滿露骨的侵略野心的決議，要求：(一)坚决抛弃不参与世界大战的方針，共同建設新世界；(二)从整个亚洲驅逐維持現状国家的殘余势力；(三)由亚洲人掌握亚洲的全部資源(《同盟旬报》7月10日)，作为实行这种政策的前提，他們坚决要求"落伍的各种政治势力全部退出政治舞台"。

实現新体制的条件成熟了。近卫在6月24日辞去樞密院議长职务，发表了一項声明說："願为建立新体制竭尽棉薄。"在近卫声明以后，貫徹"圣战"議員联盟立卽通过了要求政党解散的決議，次日，这个联盟的委員訪問了各个政党。政友会久原、中島两派立卽对此表示贊同，而政友会中立派也决定和这两派采取同一步調。

同时，社会大众党也不甘落后，于24日发表宣言表明了解散的决心。另外，民政党也向来訪的貫徹"圣战"議員联盟的委員表示該党无意与新党对抗。于是，老牌政党的瓦解已經是时間問題了。

倒閣运动和近卫的心境

米內內閣本来是在統治阶級內部各派系間不稳定的均势和宫中势力的支持下勉强成立起来的，由于近卫出来搞新体制运动，使米內內閣的这两根支柱开始崩潰了。6月1日，一向和近卫研究成立新党問題的木戶幸一继湯淺之后就任內大臣。报紙用"革新气氛在抬头"的大字标題刊載了这条消息。此外，对于近卫辞樞密院議长后的继任人选問題，政府沒有起用被认为已經确定无疑的平沼，而把副議长原嘉道提升为議长。《东京朝日新聞》在6月24日的晚报上竟用穿通三栏的大标題"首相終未接受近卫公的推荐"，并报道了"政府和新重臣們之間有了隔閡"。不久，这种对立便在木戶的言論上明显地暴露出来了。7月5日，木戶听到神风队的余党前田虎雄等人阴謀采用恐怖手段暗杀米內、岡田、原田、湯淺、池田等人的案件被破获以后，曾就这个被破获了的案件向日皇报告說："他們的言行固属可恶，但是他們的动机却应該引起为政者深自反省。"(《木戶日記》7月5日，《远东国际軍事法庭审判記录》，第59号)暗暗地对政府表示了責难。在向日皇报告以后，木戶就和近卫討論了更换內閣时应采取的对策。

在这期間，因为近卫已被公认为新体制的中心人物，所以他的言行也就要发生深远的影响。只要新体制运动和內閣是互不相容的，那么就不难想象，近卫也不会希望內閣继續存在下去，据一般人估計，他辞去樞密院議长的职务，就是証明了这一点。参加新党运动的分子认为，近卫辞去樞密院議长是为他带着新体制上台开始准备工作，而表示欢迎。此外，当时还流傳着这样的消息：虽然

政府表示願同新体制合作，但近卫却坚决主張不要理睬。而据《西园寺公与政局》一书所載，当时米內曾气憤地說道："政变是經过近卫同意的"。这样，从第三者看来，近卫的行动分明是在要求內閣下台。

近卫本人的想法究竟是怎样的呢？关于这点还有討論的必要。因为战后发表的近卫手記以及其他有关近卫的大部分著作都异口同声地說：新体制运动同軍部的倒閣运动合流，是完全違反了近卫的意图；并强調說，近卫所要求于新体制运动的，毋宁說是想以强有力的国民組織为背景来約束軍部，想借此造成一种印象：近卫是一个在强大的軍部面前未能貫彻自己理想的"悲剧的政治家"。

然而，《木戶日記》中載有近卫、有馬、木戶三人如下的协議事項。（这是在近卫积极地表示要搞新体制的前夕5月26日，三人秘密协商决定的关于新党的初步方案，这个方案后来在近卫上台期間付諸实施了，虽然形式上稍微有了改变。）

（一）在奉到組閣命令以前，不积极策划完成新党。但由于政党方面自发的行动而产生建立新党的气氛时，可以考慮。

（二）接到組閣命令时应考虑事項：

1. 設置以陆海两軍参謀总长、內閣总理大臣和陆海軍大臣所組成的最高国防会議。

2. 听取陆海軍关于国防、外交和財政的要求。

3. 表明建立新党的决心，对各政党提出解散要求。

（三）只由总理大臣和陆海軍大臣組成內閣，其他各大臣暫定为兼职。但根据情况，可以选任閣員二三人（例如外务大臣等）。

（四）新党成立以后，由党員中选任其余全部閣員。新党成立前选任的閣員，必須加入新党。

一目了然，他們是想对軍部施加某种約束，然而决不是要压制

軍部的要求。这个文件表明：他們只是想組成一个全面体現軍部要求的納粹式的新党，把軍部也包括在內，并在这个基础上，要把政治放在軍事之上。近卫在6月4日的記者招待会上就新体制和軍部的关系表示："互相协調当然是必要的，然而也不应該一味地仰承軍部的鼻息，盲从軍部。我們也将吐露苦衷，而軍部也应該寬怀采納，……归根結底，应該向軍部进逆耳之言必須和軍部打成一片向前迈进。"(《东京朝日新聞》6月15日)这段話也包含了上述意图。

那么，近卫对新体制运动和倒閣的关系的看法怎样呢？当时，在近卫与米內內閣之間，虽有不可逾越的鴻沟，然而，据原田直接向近卫詢明的情况，新党派的宣傳和米內的憤慨都是沒有根据的，近卫在回答原田的問題时明确表示："自己不想倒閣，并且如果政府对于新体制采取合作的态度，我很高兴同政府进行商談。"(《西园寺公与政局》)另外，近卫在7月7日在輕井澤接見記者时也指出，有人认为要建立新体制必須有行政上的权力，然而他并不是这样想法。他說："虽然会多少有些不方便，我想对这点(指缺少行政权力)采取忍受的态度"，并且还暗示为了弥补这种不方便，他甚至希望政府方面予以协助。近卫在上述5月26日关于新党的初步方案中认为成立新党需要行政权力，并因此而就組閣的方式进行了种种协商。但是到了7月7日，他为什么又不能不表示少許不方便可以忍耐呢？首先可以想到的是，近卫是不是也想极力避免公开表示倒閣的意图从而对倒閣負責。然而这一点还不能全面地說明近卫的曖昧态度。此外，还应該考虑到近卫对反对新体制的势力的顾虑。5月26日拟定的要統一掌握国防国家体制的新党的初步方案，当然要以对官僚势力的某种限制为前提，新体制运动的进展，終于把这一极端困难的問題提到日程上来了。反对新体制的势力搬出"国体"来开始了进攻。担任这次进攻的急先鋒

是所謂的"观念右派"。他們虽然也同样地贊成取消旧政党，但是对于以一国一党为目标的新体制运动也大肆非难，认为这是策划"恢复幕府政治"。这种責难似乎給予了近卫的尊皇思想和八面玲瓏的性格以不小的打击。于是，近卫便在国体这面墙壁和搞新党运动之間感到左右为难了。近卫在上述7月7日的同一談話中說："根据宪法，日本政治要在权力均衡的基础上謀求稳定。而新体制却要求依据国策把一切力量統一地、全面地組織起来，这里似乎存在着問題。然而，新体制当然要以宪法为准則，并坚决依靠运用宪法来进行工作。"这段話可以証明，当时近卫确是在拚命要摆脫这种尴尬处境。也可能就是由于这种尴尬处境，近卫才不敢公开地表明他的倒閣意图。因此，近卫在临近組閣的时候所以表現了一些躊躇，絕不象近卫手記等所說的：因为新体制运动違反了近卫的"理想"，走上了和軍部的倒閣运动汇合的道路；而是由于使他成为独裁者的新体制的初步方案面前，还矗立着一面厚厚的"国体"的墙壁，在这面墙壁之前他表示畏縮了。

米內內閣的倒台

虽然这样，由于米內內閣已經被认为可能要"耽誤公共汽車"，所以不管近卫的主观願望如何，局势还是在向前发展。至此，已經不存在任何东西可阻止以統帅权独立为武器的軍部攻击米內內閣了。

近卫发表辞去樞府議长的声明的次日即6月25日，陆軍大臣畑俊六向次长以下部內全体軍官作了一次演說。在这次演讲中，他对新体制运动的进展表示祝賀，同时还說："不能陷于腐儒的空談而坐失千載难遇的良机"，表明了軍部对"建設大东亚新秩序"的强硬要求。(«同盟旬报»，7月10日)仅仅在半年以前，作为直接軍事責任者的軍部，还在焦虑怎样才能不失体面地从战爭的泥潭

中拔出腿来。正因为这样，他們无論如何也不能容許錯过了摆在面前的这似乎不仅可以解决侵华战爭，而且可以拿到整个南方龐大資源的“千載难逢的良机”。

另一方面，米內內閣已先后就荷印、法属印度支那等个别問題表明了“帝国的深切关心”，这时，它认为应該进一步表明它对整个南方地区的总的方針了。当时，报紙上报道政府已經准备好了“确立东亚自主的宣言”。这个宣言，在6月29日，由有田外务大臣以“国际形势和帝国的立場”为題通过广播加以发表了。（参看第2卷，第5章，第3节）有田在这次广播中把东亚和南方地区的关系說成是：这些地方“有着一种自然的命运，必須互相倚賴互相帮助，有无相通，实現共存共荣，以維持和平和促进繁荣”，企图把“东亚新秩序”的范圍进一步扩大到南方地区。据新聞报道，外国的反应都认为有田这次广播闡明了日本的新外交方針，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有田这次广播却出乎政府意料之外地招致了軍部的不滿。表面的理由是陆海外三省当局在事先就广播內容进行討論的情形被泄漏出去，而且歪曲了軍部的意图。因此，在30日外务省情报局长須磨受到了宪兵的傳訊，接着，有田、米內都受到了軍部的严重抗議，結果，使外务大臣有田不得不就发表的程序問題表示了道歉（7月3日）。据当时政界的观察，这个事件发生的原因是由于有田搶先发表了軍部想說的話，招致了軍部反感。因而攻击了政府。在这以前，軍部就认为米內內閣的方針和它一貫的对德国的态度是不能够积极地同德国进行合作，因而感到不滿，这种不滿情緒由于这次政府的态度而爆发了。軍部单純以程序問題为理由向政府进行攻击一事，也是軍部公然进行打倒內閣的前奏。

在同一时期，在参謀本部內，中坚层軍官向首脑部提出了意見說“以現政府的陣容，絕不可能应付最近的世界局势而有所作为”（《木戶日記》，7月8日），参謀总长閑院宮积极支持了这个意見。

据当时的参謀次长塚田攻在远东軍事法庭上的供詞，当塚田往訪陆軍次官阿南惟几傳达参謀总长的强硬意見时，获悉在陆軍省方面，自次官以下全部贊成更換內閣。听到这种情况以后，参謀总长便作出結論說，既然这样，就应該让陆軍大臣辞职。如上所述，畑俊六本人在发言中一貫积极地表达了軍部的意图，只因他在参加米內內閣时，日皇曾經要他支持这个內閣，因而不能公开地进行倒閣的活动。由于陆相的立場是这样，所以就利用参謀总长授意陆相辞职，借此来达到倒閣的目的。7月8日，阿南訪問木戶，傳达了以上情况，并說明了軍部的决心，他說："米內內閣的做法极不利于和德意进行协商，有誤事的危險。为适应目前重大时期的需要，也只好更換內閣。"(«木戶日記»，7月8日)11日，軍务局长武藤章又去見內閣书記官长石渡，要求政府考虑陆相的困难处境，自动辞职。石渡拒絕了这一要求，于是武藤便悻悻地說"那么，畑陆相可就要辞职了"，随即拂袖而去。米內得悉武藤的要求以后，在次日即12日特召見畑陆相詢問这件事。畑說："請把他們的意見看作他們私人的意見"，但接着又說这是我私人的意見，我认为："归根結底，內閣还是辞职为妙"。(«西园寺公和政局»)这件事說明了畑俊六的既要倒閣又不敢公开表示的尷尬处境。不久，陆相畑接到了参謀总长授意他辞职的信件。7月16日，他向米內提出辞呈，內称："近来內閣的方針和自己的信念不相容，长此以往，将无法統率全軍"云云。

第二次近卫內閣和基本国策綱要

新体制运动为"行动內閣"彻底扫清了道路。于是，近卫便打着确立新体制和"建設大东亚新秩序"这两块招牌登上了舞台。形势的发展已使提名近卫組閣成了定局，因而，討論內閣首相继任人选的重臣会議只开了三十分钟就結束了。因对近卫的前途感到不

安，西园寺在这次会議上竟然放弃了作为元老的特权，沒有提名近卫，然而西园寺的这种态度完全沒有受到木戶的理睬。7月17日，近卫接到了組閣命令。

近卫接到命令以后，立即着手組閣。他的組閣方式是打破前例的。近卫首先选定了陆、海、外三个大臣。19日在荻外庄邀請这三个人开了一个所謂荻洼会議。在这个会議上討論并确定了內閣的基本方針以后，这才进行决定其他閣員的人选。根据荻洼会議席确定的基本方針，后来制定了"基本国策綱要"和"适应世界形势处理时局綱要"，因此，在这个方針指导下組成的內閣中，保証了軍部的发言具有压倒一切的权威。7月22日正式成立了第二次近卫內閣，閣員名单如下：

內閣总理大臣　近卫文麿。外务兼拓务大臣　松岡洋右。內务兼厚生大臣　安井英二。大藏大臣　河田烈。陆軍大臣　东条英机。海軍大臣　吉田善吾。司法大臣　风見章。文部大臣　桥田邦彥。农林大臣　石黑忠篤。商工大臣　小林一三。递信兼鉄道大臣　村田省藏。不管部大臣兼企划院总裁　星野直树。內閣书記官长　富田健治。

新內閣在7月26日的內閣会議上决定了"基本国策綱要"，接着，又恢复了第一次近卫內閣下台后中断了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議，决定了"适应世界形势处理时局綱要"。在这两个綱要中所体現的第二次近卫內閣的基本方針如下。

首先在外交方面，不論在封鎖援蔣活动、結束侵华战爭的問题上，或者在控制南方地区、建設"大东亚共荣圈"——这个名詞是在8月1日松岡外相的談話中被第一次公开使用——的問題上，当然都要預料到英美两国的阻撓，因此要把同德意的关系（日德意防共协定）提高到軍事的結合，借以排除英美的阻撓。在这里，所謂南方，大体上包括"印度以东，澳洲、新西兰以北"地区。为了控制这

个地区，在結束了侵华战爭以后，固然要“寻求良机，行使武力”（处理时局綱要），即使在沒有結束侵华战爭以前，原則上“也要在不与第三国开战的限度內采取措施，而如果內外形势的发展特别有利，也可以使用武力。”（同上）在使用武力时，力求把对象限于英国一国，但同时“考虑到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可能必須同美国开战，所以要作好充分准备。”（同上）对于苏联，为了避免两面作战，要“大大調整日苏关系。”（同上）

內政的基本方針是适应外交方針的上述轉变完成“国防”国家的体制。为此，首先在国民中間“树立以效忠国家为第一义的国民道德。”（基本国策綱要）其次，要求“建立坚强的新政治体制，以謀求一切国政的集中統一。”（同上）很明显，內政的中心問題是用政府的力量来推动新体制运动向前发展，然后再利用新体制的政治力量来加强政府的法西斯权力。又次，在經济方面，大大加强1939年秋季以后陷于停滞的軍需生产，并采取各种措施为新近列入日程的战爭作好准备，把“建立一元的統制机构”作为中心任务。这就是說，为了配合国政的一元化，要求經济統制也实現一元化。

新体制的开始

这时，旧政党已經自动解散了。7月6日社会大众党首先宣告解散，7月16日政友会久原、中立两派召开解散大会，26日国民同盟，30日政友会中島派相继解散，到8月15日，最后余下的民政党也宣告解散了。他們組成了促进新体制同志会，一心期望近卫成立新党，并于8月17日以同志会名义发表了“新体制綱要”，再一次强調成立新党的必要。这一綱要清楚地反映了当时主張成立新党的分子对于新党的看法，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件。根据这个綱要，新体制将“彻底清算政治、經济、文化各个領域中的旧有的个人主义体制，而以一切归于天皇、万民輔弼的国体观念为

基础”,是“根据領导者原理，反对經济至上主义”的体制。其中，在政治上的新体制即“新政治体制”下，要建立起以政府和軍部的有机結合为前提的領导国民的力量,这就是新党。这个新党将“否定必須由当选議員組成的旧的政党观念，……而是一种革新运动領导者的同志式組織”，它将“和政府表里一体帮助政府对国民进行政治指导。”新党的任务是，“对于政府决定国策,通过議会或采取其他适当办法，献策建議；对于政府推行国策，要作好宣傳工作,使国民充分了解和积极支持”,也就是要起到“上意下达，下意上达的有机的桥梁作用”。为此,“必須成立居民組織,作为国民的基层組織,由新党担任这項指导工作,同时,青年运动、妇女运动以及經济团体和文化团体等也全部置于新党的領导之下。他們最害怕的是,新体制运动变为精神动員式的运动,只搞些加强官僚机构的工作。因为如果那样,不仅起不到新体制的作用,而且他們自己也将沒有立足之地了。

与此同时，政府本身也根据“基本国策綱要”为实現新体制而进行筹备，8月23日宣布成立新体制筹备委員会，由下列筹备委員二十六人、常任干事六人組成。

筹备委員:(貴族院)后藤文夫、有馬賴宁、大河內正敏、井田磐楠、堀切善次郎、太田耕造；(众議院)永井柳太郎、小川乡太郎、前田米藏、岡田忠彥、金光庸夫、麻生久、秋田清;(学界)平賀让;(經济界)井坂孝、八田嘉明;(外交界)白鳥敏夫;(右翼团体)末次信正、桥本欣五郎、中野正刚、葛生能久；(自治团体)岡崎勉；(言論界)古野伊之助、高石眞五郎、正力松太郎、緒方竹虎。

常任干事:內閣书記官长富田健治、內閣法制局长官村瀨直养、企划院次长小畑忠良、陆軍軍务局长武藤章、海軍軍务局长阿部胜雄、昭和研究会常任委員后藤隆之助(后来追加內务次官挾間茂和同盟通訊社編輯局长松本重治)。

第一次新体制筹备会是在8月28日召开的。非常有趣的是，这次总結新体制运动的第一次大会上，首先发表了暗示新体制运动已經改变方向的近卫声明。如前所述，近卫在已經腐朽僵化的“国体”面前表示了畏縮，而在这次声明中，他竟然把自己“理想”中的“国民組織”的政治力量限定在“国体”这个框框以內了。近卫声明中說:

“这样，这一运动虽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但决不是所謂政党运动。……勿宁說它应該成为使一切政治党派、經济团体、文化团体在公益优先的精神下統一起来的超越政党的国民运动。……身在庙堂之中，肩負輔弼重責的人，必須站在整体的立場上，不允許从事其在本质上属于这一部分同那一部分对立斗争的政党运动。……然而，我們也坚决反对采取所謂一国一党的制度。……不管这种制度在其他国家取得了多么卓越的成就，然而要把它搬运到日本来，那将違背我們一君万民的国体根本精神。在我国，万民都有‘翼贊’的責任，絕不允許某个人或一个政党利用权力壟断‘翼贊’的职責。”

这样，近卫所說的“高度政治性”，归根結底也不过是动听的空話而已。想利用国民組織的政治力量来推行国政的新体制的初步方案也終于落空了。因此，在8月26日最后一次討論即将发表的近卫声明的常任干事会上軍务局长武藤章曾主張从声明稿中把否定一国一党的“近卫总理的声辯”这一部分删去，也是很自然的。(《远东軍事法庭記录》第315号)

而且，筹备委員会的人选也具体反映了近卫避免“壟断翼贊”的意图，在委員会中广泛地包括了天皇制下的各个派閥的代表人物。因此，这一委員会也就成了两派人激烈爭吵的場所，其中，一派人是追求新体制原初目的的，另一派人則是要把新体制变为八面玲瓏的精神运动。在前后六次筹备会和在这期間召开的各种小

組会上，国民組織的核心是否应該具有政治力的問題成了爭論的焦点，圍繞着这一核心应称为“党”或至少称为“会”，还是只称为“运动本部”的問題，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圍繞着国民組織是否应該成为官僚的一个单純的輔助机关的問題，也就是这个組織的总裁由首相兼任，还是原則上由别人担任的問題，进行了爭辯。此外，地方支部长应由县知事兼任还是由民間人士充任，是决定国民組織的性质的問題，也引起了激烈的爭論。經历了这些过程以后不久，新体制运动的核心組織“大政翼贊会”宣告成立了。在10月12日翼贊会成立大会上，近卫的致辞又一次使主張成立新党的分子大吃一惊。近卫說运动的綱領以及宣言尽在“实踐大政翼贊的臣道”这句話中，无須另行发表。他还肯定地說：“只要我們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崗位上日日夜夜，竭誠为天皇服务”，就一切都解决了。对于近卫的这次讲話，据說只有属于“观念右派”的一小撮人鼓了掌。

近卫所以“改变方向”，不用說，是因为受到了宮廷勢力的牵制。日皇曾一再促使近卫注意：“新体制运动不要和宪法的精神相抵触。”这时，現实的木戶已經抛弃了搞新党的計划。財閥圍繞“經济新体制”进行的活动直接影响了宮廷勢力。

新体制組織被閹割

“基本国策綱要”中列举的“建立一元的統制机构”也是財閥从米內內閣时期就已經提出的要求。財閥企图通过这一步驟，把中日战爭以来急剧增多的各种統制法令和統制机关加以整理合并，以便适应掌握各个产业部門实权的財閥康采恩以及它所領导的卡特尔的組織形式，并尽量縮小当时已經迫近的經济危机的冲击。米內內閣倒台以后，他們很快地就在7月19日再一次强調这一問題的重要性，主張：“如果不能把經济新体制彻底組織起来，也就难

望实現政治新体制”(中央物价对策协力会議常任委員会决議，見《同盟旬报》7 月 30 日)，并且不等政府的“妥善处理”就自动地着手成立各个产业部門的卡特尔之間的横的联絡机关。財閥主張，統制工作应該交給財閥担任，政府只掌握原則就可以了。他們把这种形式称为“自治統制”，8 月 29 日成立的鋼鉄、煤炭、电气等六个产业部門的卡特尔組織的联絡机关“重要产业統制团体恳談会”就是这种“自治統制”的一个典型。

在同一时期，政府方面也以企划院为中心进行制訂关于“經济新体制”的方案，拟就了“确立經济新体制綱要”草案，并把它提交到 11 月 12 日召开的經济部門閣員恳談会上討論。这一綱要强調企业的公共性，規定統制机构必須以領导組織为基础，領导者可以由政府任命。財閥认为这种办法可能損害自己的“自治統制”。他們惟恐别人对自己的王国染一指，因而对这一方案表示了猛烈的反对。在政府內部，小林商相最反对这个方案。最初，小林的入閣是由于商工省次官岸信介的提議。岸信介主張:“加强統制，无論如何是不能依靠官僚来办。应該利用实业界人士。必須使人感到‘这是某人搞的，所以只好接受’”(矢部貞治:《近卫文麿》)但是岸信介的这个主意完全落空了。小林玩弄各种花招頑强地进行了斗爭，以致在第七十六次議会上引起了“泄漏机密問題”而受到攻击。小林毛全不擇手段，甚至造謠說这个方案的拟訂受到了共产党的操纵。各經济团体，为了声援以小林为中心的政府內部的反对派，也起来异口同声地对这个方案表示反对。这样一来，政府已經不可能不顾一切地坚持原案。如果那样，这最关紧要的“国防”国家的經济基础就要垮台。即使軍部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情况。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及川海相(9 月 5 日任命)在 11 月 29 日的內閣会議上代表陆海軍建議說:“施行各种經济措施，应該把重点放在处理时局的問題上，必須避免因为改革而造成哪怕是一时的生

产下降或人心不安。"（《同盟旬报》12月10日）这項建議意味着陆海軍已經承认企划院的草案必須修改。財閥对于企划院草案的这种反对必然会表現为对于翼贊会的不信任。当时，翼贊会的經費是仰賴住友銀行、三菱銀行等接济的。在圍繞"經济新体制"問題发生爭吵的前后，銀行方面借口翼贊会要搞赤化，而停止了对翼贊会的撥款。（矢部：近卫文麿；风見章：《近卫內閣》）于是，翼贊会首先在財政方面发生了破綻。翼贊会失去了財政基础以后，天皇制官僚还要进一步夺走它的政治力。

官僚，尤其是內务、司法部門的官僚，最怕新体制将会限制自己的权力。同时，假借新体制运动的名义对官僚进行的攻击也确是相当地猛烈。这里举一个例子，10月11日原田曾向近卫談过以下情况："新体制固然也好，但地方官和行政官却表示非常担心，不知新体制施行以后自己将落到什么地步。……目前在清水一带的桥本欣五郎的徒党，也就是那个大日本青年党的分子，向来就已經够討厌的，而喊出新体制以后，更不把县知事和警察放在眼里。当他們集合听众举行讲演的时候，簡直是在有意識地玩弄政府。实在糟糕得很。"（原田：《西园寺公和政局》）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同时原田說这話也可能有些夸張，但据此也可以看出官僚們是多么不安和反感。他們在新体制的筹备会上始終坚持国民組織的地方支部长应由县知事兼任，也正是由于这种关系。在筹备会还沒有就这一点作出决定以前，內务省为要造成既成事实，就在9月1日公布了充实加强村会組織、街道組織和邻里組織的法令，打算把这些东西作为新体制的基层組織。这就是說，內务省认为指导和建立国民組織的工作应該属于自己的权限。此外，在貴族院、樞密院方面也显然存在着不信任新体制的气氛。就在此时，財閥和政府在"經济新体制"問題上展开了爭辯。財閥作为反对企划院草案的理由，除指責这个方案阻碍生产，无視民間的創造性以外，

还説它是"背离国体观念和破坏家庭制度"。这些話是日本經济联盟会会长乡誠之助在12月4日向經济界代表发表演說时談到的(«男爵乡誠之助君傳»),可見对于資产阶級来說,只要稍許侵害他們的私人利益,就等于是破坏国体和家族制度。配合資产阶級的这种論調,內务和司法部門的官僚叫嚷要維护国体。这就是說,企图保持傳統的特权地位的內务、司法部門的官僚們借着这个机会想和利用統制經济的潮流在官場中不断扩張势力的商工、农林部門官僚相抗衡,来討取財閥的欢心。

翼贊会改头換面

圍繞翼贊会的斗爭的趋向已經很明显了。在上述11月29日軍部向閣議建議中,一方面有些气势汹汹地說:"要断然扫除一切不純的政治策动和迷惑民心的流言蜚語",对当时一部分人发起的倒閣运动表示了反对,另一方面說到"必須从速完成体制,使官民一体都能朝着实践臣道的方向勇往迈进"的时候,紧接着就說必須避免"因为改革而造成生产下降"。由此可見,軍部也同样地不得不避免由于政治改組使統治体制继續动蕩下去。12月6日,內务、司法部門官僚的首領平沼就任国务大臣。这位一向主張翼贊会"在政策問題上和政府处于平行地位是違反臣道"的平沼的入閣,就是为了剝夺翼贊会的政治力。(«东京朝日新聞»,12月7日)至此,第二次近卫內閣可以說是已經变质,成为近卫、平沼联合內閣了。恰好就在平沼入閣的第二天——12月7日,"經济新体制确立綱要"以充分采納了財閥要求的形式,通过了閣議,这决不是偶然的。

因为內閣的变质,由于主張成立新党而当上了內务大臣和司法大臣的安井和风見被罢免了,在12月21日,平沼和他的党徒柳川平助坐上了这两把交椅。和企划院串通一气領导"經济新体制"

工作的岸信介也丢了商工省次官的职务，参加起草企划院方案的企划院調查官稻叶秀三、正木千冬、佐多忠隆等人于12月末以“赤色分子”嫌疑而被捕了。必須指出，“經济新体制”的爭論，决沒有触动資产阶級的根本利益。企划院次长小畑忠良也說过，这番爭論，只不过是圍繞“怎样使建設高度‘国防’国家的力量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揮”，(在翼贊会中央协力会議上的讲話，見《同盟旬报》12月30日)的方法問題展开的。这个企划院的草案，如果适逢其时，也可能象德国納粹党的綱領一样为資产阶級所采納。

內閣的变质，也給內閣一手培植的翼贊会的性质，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同时，在对于新党的投机上失敗了的旧政党分子，逐漸对于置身翼贊会議会局中无事可作的情况感到不滿，而紛紛离开了議会局。他們指責議会局“作为大政翼贊会的一个組成部分，站在帝国議会和政府中間担負联絡結合的任务”(在議会局負責人員第一次碰头会上局长前田米藏的致詞)，认为这是干預宪法保証下的議会的輔弼职能。为了离开翼贊会的立場而参加第七十六次議会，他們組成了議員俱乐部。这样，翼贊会最初規定的各种职能一个个被剝夺掉，到1941年2月22日平沼在众議院預算委員会上宣布“翼贊会不是政治結社而是公众团体”以后，便完全結束了生命。在第七十六次議会上，翼贊会被指責違反宪法而受到猛烈的攻击，結果，在議会閉幕后的2月26日，有馬賴宁以下全体負責人員提出辞呈，中間經过設置副总裁和柳川平助就任副总裁，于4月2日，翼贊会的办公机构被縮小，只剩下总务局、組織局、东亚局和中央訓练所几个部分。改組后的翼贊会完全变为官僚的輔助机关，每年由政府撥給八百万日元經費，并完全处于內务官僚挾間茂(組織局长)和熊谷宪一(总务局长)的領导之下。

在这以后，財閥仍继續要求政府在法律上承认自治統制。近卫为了消除政府和財閥之間由于有关“經济新体制”的爭論而造

成的隔閡以及尊重財閥的意思，在4月初再次改組了內閣。住友財閥的小仓正恒曾表示："以往的战时革新政策完全流于概念游戏，不切合并脱离当前的实际情况，因而挫伤了'企业心'"。(在記者招待会上的談話，見《东京朝日新聞》4月5日)近卫为了根据鼓舞"企业心"的原則来修改以往的政策，聘請小仓担任国务大臣兼首相有关經济問題的最高顾問。另外，爭論的当事人小林和星野一同下野，分别由丰田貞次郎和鈴木貞一继任。

产业报国运动的产生

随着中日战爭的进行，政府对于工人运动的压迫日益严峻，因而工人阶級的抵抗逐漸失去了組織性。(参看第2册，第2章，第3节和第4章，第2节)然而，就是这样的抵抗，对于必須准备更大規模的战爭的統治集团来說，也是不能允許的，甚至表現为缺勤率、移动率增长等消极抵抗，只要对生产起消极作用，在他們看来，都是很大的威胁和障碍。針对这些情况，他們一方面采取了就业时間統制令、工資統制令、工厂企业管理令等法律措施；另方面策划开展了所謂产业报国会运动。

1938年2月2日，"协調会"設置了时局对策委員会，在委員长松岡均平的領导下，研究了战时和战后的社会政策，并由其第二专門委員会制定了一項"劳資关系調整办法綱要"。产业报国运动就是这一綱要的具体化，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这一运动的方針是：在各种企业单位中成立产业报国会組織，作为全国性的組織成立产业报国联盟，根据产业报国的精神，劳資打成一片，共同为国家服务。

"协調会"为了实行这一方案，向全国主要工业城市的企业主和工人进行活动，一方面宣傳他們的方針，另一方面着手建立产业报国联盟，并于7月15日，推举河原田稼吉、成田一郎、长岡保太

郎、松本勇平、町田辰次郎、膳桂之助、三輪寿壮等人为筹备委員，7月30日举行了成立大会。这一运动，迎合时代潮流，在全国范圍內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同年年底，已經有一千一百五十八个企业单位（五十人以上）成立了产业报国会的組織。

产报会成立情况

（1938年12月末）

业别	企业单位数目（A）	成立数目（B）	B/A %
工业	7,875	1,027	13.0
矿业	661	80	12.0
运輸通信	625	17	2.5
土建业	765	15	2.0
其他合計	10,437	1,158	11.0

产报运动标榜"劳資一体"、"企业一家"、"产业报国"的"理想"，排斥阶級斗爭的思想，主張企业主对于从业員应該象父亲对待子女一样，对于从业員的經济和文化生活加以維护和指导；它的組織形式是以經理、厂长或企业主为会长，把企业主、职員和工人統統包括在內；运动的重点是在培养产业报国精神的同时，提高效率，提高技术水平以及办理福利工作。产报运动毕竟是一种单純的精神运动，劳資双方都对此表示消极态度，只有想利用这个組織的天皇制官僚和想借此謀求个人地位的旧工会組織的干部們表示积极。例如：社会大众党就对产业报国会采取了支持的态度并决定了如下的方針："重視这一运动发展为产业部門中的国民协力組織的可能性。我党願和支持它的工会組織合作，积极参加这一运动，并坚决以我們的努力促使它向好的方向发展，以便进一步确立起国民組織。"另外，工会会議也在1938年7月10日的扩大执行委員会上发表声明說："我們虽然认为在产业报国会的組織的运用方面存在着二、三缺点，然而我們要参加这一运动，同大家齐心

协力尽可能克服这些缺点，为实現产业报国会本来的目的——眞正的产业报国和劳資协調而努力。”

然而，随着时局压力的加重，工会会議的陣营内部发生了分裂。船員的唯一組織、拥有十一万会員（1937年）并与日本船主协会締結了集体合同，具有左右船員力量的日本海員工会，当产业报国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迅速地把海員协会和日本船主协会合并組成的海事协同会改名为皇国海上同盟，并强調海上劳动者团体的特殊性而退出工会会議，于1938年10月成立了皇国海員同盟。此外，日本鋼鉄工业从业員工会也强調八幡制鉄所的特殊性而在11月6日退出了工会会議。接着，东京电气从业員工会也在12月25日退出了工会会議。

工会会議不仅由于海員工会和其他有力工会的退出而大为削弱，而且构成工会会議的核心力量全日本劳动总同盟内部也在产业报国运动的問題上发生了意見的分歧。松岡駒吉、西尾末广等属于原总同盟一派人主張在坚持工人的“自主組織”的条件下参加产报运动的脚踏两只船的方針；而河野密等属于原日本工会会議的一派人則主張全面响应政府的国策，解散工会，与产业报国会合并来全面地支持国策。两派各执己見，互不退让，結果在1939年10月全日本劳动总同盟发生分裂。属于原全日本工会会議的一派发表一項声明說：“我們打算运用多年的經驗，发揚爱国精神，全力支持政府，来服从重大时局下国家的至上命令”，退出了总同盟并立即組成“产业报国俱乐部”，力图在产业报国运动中爭取地位。属于原总同盟的一派重又改回日本劳动总同盟的旧称，继續作为工会的領导干部力求在产报运动中保持自己的地位。

大日本产业报国会的成立

世界形势和战爭进入新的阶段，迫切地要求生产的飞跃发展。

为了把“只有軀壳而无灵魂的鳥合之众”的产业报国会变为“建立新产业劳动体制，发揮全体产业人員一切力量”（金光厚生大臣語）的組織和运动，于 1939 年 4 月，政府推开了以往的协調会，亲自出馬，作为这个运动的主体，負責領导工作。由于这种行政权力的推动，产业报国运动总算在組織工作方面有了迅速的发展。

1940 年 7 月成立的第二次近卫内閣，集中全力来充实天皇制法西斯机构。政府大力开展以建設高度“国防”国家为目标的“近卫新体制”运动，打算对政治、經济、文化各个方面的机构进行改組，以便建立法西斯的統治体制。在这种情况下，产业报国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深入到全国各地，到1940 年 9 月間，产业报国会組織的总数达到七万左右，参加的企业单位超过二十四万六千个以上、会員人数超过了四百一十八万人。政府的方針是只发展产业报国会組織，而不让工会存在，在 1940 年 2 月 16 日的議会上，政府表明“它的方針是希望工会实行‘发展的’解散，并且通过产业报国运动的普及和发展来消除工会运动的必要性。”由于这种統治者的大力推动和一时潮流的影响，再加上“警察方面的‘献身’努力”，产业报国会的組織日益扩大，而工会組織却陆續解散了。

在日本工会运动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劳动总同盟，由于属于原全日本劳动总同盟的一派人的退出，内部出現了解散論和外部法西斯压力的加强，終于 1940 年 7 月 8 日召开中央委員会，自行解散，結束了它的历史。另外，日本海員工会虽曾很快地迎合了产业报国运动組成了海軍协同会，但为期不久，又出現了建立海上劳动新体制的趋势，决定把海运业的所有組織統一起来，建立一个以递信大臣为总长的由官劳資共同組成的日本海运报国团。为了适应这种形势，海員工会在 9 月 30 日召开临时大会，宣布解散。其他海員协会、皇国海員同盟、海事协同会也都宣布解散，在 1940 年 11 月 22 日从新成立了实現海上劳动新体制的日本海运报国团。

作为“合法左翼工会”进行了长时期活动的东京交通工会（东交）也无力抵抗当时的潮流，在7月7日决定并入产业报国会，同时大阪市电車工会、大阪汽車工会也宣告解散了。此外，逓信从业員会同盟（2月22日）、逓信从业員会联合会（4月30日）、“东京煤气工会”（5月2日）、“东京电車职員同志会”（6月21日）、“大阪市从业員工会”（7月10日）、“日本港灣从业員工会”（9月18日）等也先后宣告解散。日本工会会議也在7月19日决定解散。

在1940年2月2日的第七十五次議会上（米内内閣时期），由于民政党議員斋藤隆夫发表批評中日战爭的演說而引起了撤銷他的議員資格的問題。圍繞着这个問題，社会大众党內部的属于旧日本工会会議的一派和属于旧社会民众党的一派之間发生了严重的对立，結果反对开除斋藤的安部磯雄、片山哲、水谷长三郎、西尾末广等八名議員被开除了。被开除的八名立即要另組新党，但是遭到了政府当局的禁止。而落到旧日本工会会議一派手里的社会大众党，一面歌頌政治新体制，一面根据官方和軍部的要求主动地宣告解散了（7月6日）。

农民运动也在中日战爭以后改变了方針。全国农民协会虽然改为大日本农民协会重新出发（1938年），但是在經不起时局的严重压力，終于在1940年9月宣告解散了。另外，作为最后一个农民运动組織于1939年11月29日成立的农地制度改革同盟（山谷义治、平野力三、三宅正一、野沟胜、須永好），也在1942年被政府勒令解散了。

然而，产业报国运动虽然在組織上取得了以上的进展，但是它并沒有能够越出精神运动的范圍，实际上，它的組織并沒有起到統治者所設想的那样作用，因此統治阶級的期待大大落空了。于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不得不一再进行改組，第二次近卫內閣为了建立强迫劳动和灌輸侵略思想的統一体制以便加强战力，終于在

1940年11月决定了一項"确立勤劳新体制綱要"，內称："鉴于要完成高度'国防'国家体制和提高国家生产力，必須大大加强国民的劳动，因此在促使全体劳动者最大限度地发揮創造性和能力的同时，采取措施对劳动者进行教育、培养和适当的安排，以便确立起可以充分动員劳动力的劳动新体制。为此，特就树立劳动精神、建立資本、經營、劳务三者有机結合的整体——企业单位的劳动組織及其联合組織，以及充实行政机构，指示如下。"根据这一綱要，作为国內新体制的一环，对产业报国会进行了改組，把它改組为一个"上意下达"的一貫到底的权力組織——"大日本产业报国会"。这样，在全国八万四千工場中建立了包括四百五十万工人的，由內务省和厚生省掌握領导权、从中央指导部以至所有重要職位都为官僚所占据的，庞大的压迫工人的官僚組織。产业报国会的組織工作，是在中央的內务省警保局和厚生省劳政局、地方的警察和县劳政部的督促下进行的。它是一个官僚統制机关，这从它的人事上就可以看出。例如，中央产业报国会的人事配备是这样：会长是平生釟三郎，理事长是湯澤三千男(前內相)。在部长級干部中，总务和常务都是县知事出身；組織部长一职最初打算从警察方面遴选，后来由于这样作有困难，于是就让总务局长君島淸吉兼任了。此外，担任組織部副部长的是一个原任特务科长。厚生局长三輪寿壮、文化部长坂本胜(剧本《資本論》的著者)、同副部长菊川忠雄(劳动总同盟)、技能部副部长高山久藏(同上)都是和工会运动有关的人物。另外一部分干部来自財閥方面，这就是炼成部长深川正男(三井)以及三菱、住友、川崎、中島、爱知钟表公司担任劳务管理方面的一些人。这个組織是和警察緊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可以从东京产业报国会最初設在警視厅內一事，得到証明。地方組織的联合組織，一般是按照警察的管轄区域来决定的。因此，产业报国会的中央机构与各基层单位进行联系，一定要通过警察，这是值得注意的。

产业报国会成立情况

年　次	成立这个組織的企业单位	会員数	参加这个組織的比率(%)
1939	26,963	2,989,976	43
1940	102,799	4,815,478	66
1941	164,377	5,465,558	70
1942	163,740	5,514,320	69

如上所述，一切工会組織——即使由右派社会民主主义者所把持的，都从1940年起迅速地被消灭。在1940年6月間，工会組織共有四百二十八个，会員十八万四千人，到这年12月，只剩下四十九个工会組織和九千四百五十五个会員，几乎等于零了。而且就在这种情况下，于1941年12月，工会組織又鹵莽地进行了一次严重的冒險活动。

三国軍事同盟

近卫內閣不但完成了新体制組織，从而建立了天皇制法西斯体制，而且在外交方面，又締結了三国同盟，为日美战爭开辟了道路。

德国最初通过日本駐德武官大島浩向日本方面提議日德意三国締結广泛的軍事同盟，是在1938年夏季。同年2月希特勒直接掌握了軍权，3月并吞奥地利，开始积极地侵略东欧。作为加强战时体制的一个环节，德国决定就締結三国軍事同盟开始交涉。

日本方面对德国外交当局的探詢工作是以軍部为中心通过大島駐德武官进行的。由里宾特洛甫外交部长提示的德国方案也是由日本参謀本部駐德国的专員带回东京。这个德国方案曾經提交第一次近卫內閣的五相会議进行討論，政府当局也同意了开始这項交涉。第一次近卫內閣倒台以后，这項交涉移交給继任的平沼

內閣，但是由于日本方面意見不能取得一致，因而交涉迟迟不能进展。第一次近卫內閣以来，由于日本叫嚷要建設"东亚新秩序"以及声明否认九国公約，由于茫无头緒的中日战爭的继續扩大，使日本和英美在远东方面的对立日益加剧，在国內，以"革新派"与反对"革新"派为代表的两大势力分成亲英美和亲德两派进行了激烈的斗爭和傾軋。因此，平沼內閣开了七十余次五相会議，意見也不能取得一致，从而未能作出任何决定。然而这种意見的分歧，归根到底只是由于对于各国軍事力量評价的不同，以及根据这种評价应該在多大程度上避免和英美两国相对立的問題上看法不同，而对于和德意两国締結侵略性的軍事同盟这一点，并沒有从根本上反对的意見。就在意見的这种分歧的情况下，形势不断向前发展，后来在1939年8月，由于德国突然"背信"，和苏联締結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約"，使日本陆軍所建立起来的"防共軸心"的根本观念遭到彻底破产，而逐漸衰落下去的亲英美派又得势了。平沼內閣由于国际局势的"复杂奇怪"的演变而辞职以后，稳健派的阿部信行內閣誕生了。为了改善日美关系，新內閣刚一上台，它的外相野村就同美国駐日大使格魯之間，在东京开始了会談。

1939年9月1日，納粹軍队大举侵入波兰，掀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40年春季，德軍以破竹之势席卷了西欧，到5月底，英法軍队全面地被击潰，法国并且向德国无条件投降了。德国在欧洲的胜利，削弱了英法在远东的地位，于是，締結三国同盟的主張重又出現了。在这个問題上，德国方面的意图是：以容許日本在东亚的扩張为条件，使日本牵制英国以及越来越靠攏英法的美国。因此，这次三国軍事同盟和过去的三国軍事同盟有所不同，过去的是以苏联为对手，而这次則是以英美为对手了。

以上是在第一卷中也曾叙述过的有关这个問題的大致經过情形。第二次近卫內閣上台后，它把加强日德意三国軸心作为了对

外政策的首要任务。当时，日方签訂以前的防共协定的主謀者和加强軸心論者前任駐德大使大島和外务省顾問白鳥都在东京，本着陆軍方面从速締結軍事同盟的意图而大肆活跃；外相松岡洋右也是个狂热的軸心論者，他建議政府立即締結同盟。

締結三国軍事同盟的基本原則，已在近卫組閣当时所召开的所謂荻窪会議上取得了意見的一致。出席那次会議的是近卫、松岡、东条(陆相)、吉田(海相)四人。因为平沼內閣时期米內海相曾对三国同盟表示坚决反对，一般认为海軍方面恐怕不能輕易贊同。在第二次近卫內閣上台的初期，海相吉田善吾也曾深感苦悶，并于9月上旬托病辞职。继任海相是及川古志郎大将。当时，日德意三国締結同盟的談判已經有了很大进展，近卫非常担心海軍的态度，然而及川上任后却立即表示了贊同。不过，海軍的态度曖昧，他們表示"贊成是基于政治上的理由，而从軍事上看来，尙无对美作战的信心。"

德国在席卷欧洲以后，对于向英国本土登陆的問題則保持了引而不发的姿势，这种局面一直持續到第二年，当时正是德国需要在外交方面展开攻势的时期。同时美国也正在大力加强对英援助，对德国說来，在太平洋方面和日本携起手来，就会成为牵制美国的很大力量。外相松岡就任伊始即訓令駐德大使来栖向外长里宾特洛甫探詢德国对締結三国同盟的条件。里宾特洛甫看到在这个問題上日本方面已經酝酿成熟，随即派遣特使斯塔瑪前往东京。斯塔瑪于9月9日和10日这两天里同松岡举行会談，双方明确了同盟的具体目标，松岡—斯塔瑪会談的內容如下：

(一) 德国在对英美本国作战方面不要求日本的軍事援助。

(二) 德国要求日本采取一切措施牵制美国，防止美国参战。

(三) 德国相信，日德两国間达成諒解或締結协定，为应付可能发生的危險随时作好完全而有效的准备，是对两国有利的。只

有这样，才能够防止美国参加目前的战爭或在将来向日本寻衅。

（四）只有使美国及全世界都知道日德意三国坚持毅然的态度——一种鮮明而不致被誤解的态度，才能够有力和有效地抑制美国。反之，采取軟弱或不坚决的态度以及发表此类声明，只能招致侮蔑与危險。

（五）首先締結日德意三国协定，然后立即同苏联改善关系。对于日苏的友好，德国願作“忠实的中介人”。

（六）軸心国家（包括日本）为应付最坏的危險局面，当然要作充分的准备，但另一方面，德国不仅願竭尽全力防止日美間发生冲突，只要可能，并願为改善两国国交进行努力。

（七）斯塔瑪的諾言，可以被认作外长里宾特洛甫的諾言。

这样，締結日德意三国軍事同盟的工作，經过松岡外相和德国駐日大使奥托、特使斯塔瑪之間的交涉已經告一段落，于9月2日，在柏林的总統官邸，由日本駐德大使来栖、德外长里宾特洛甫和意外相齐亚諾分別代表三国在軍事同盟上签了字。

三国同盟条約共有六条。第一条和第六条規定，三国互相承认彼此在欧洲和亚洲的“領导地位”；第三条規定，在受到第三国——未参加中日战爭及欧洲战爭的国家——的攻击时，进行互相援助。第五条規定这个条約不以苏联为对手，所以它显然是針对着美国。

由于三国同盟的締結，日本便徹底地站到了和英美法对立的立場。

第二节　战爭經济和掠夺殖民地

战时通貨膨脹的发展

1937年7月开始的中日战爭，一方面加强了日本天皇制法西斯势力，另一方面給壟断資本带来了巨額利潤和主要由于軍需生

产的大量資本积累。战时經济通过对日本国内、殖民地、占領地区的工人和小生产者的掠夺发展了軍需生产，借此为壟断資本保証了“最大限度的利潤”。然而日本的战爭經济，从1939年春季起遇到了重重困难。

中日战爭的长期化使軍費支出逐年增加，此外，为建立战时經济体制而对整个經济进行的改組工作和动員工作所需要的財政支出，即所謂“扩充生产力”和“經济統制”的开支也在直綫上升，以致造成了財政預算的显著膨胀。（参看第2卷，第4章，第2节）另一方面，为扩大軍需生产而投下的产业資金也累增不已，金融机关每年信用貸款的純增額也逐年增加，1937年为十五亿九千六百万日元，1939年为五十五亿六百万日元，1940年为五十二亿九千万日元。同时，为扩充軍需生产而对“滿洲”和中国的投資也有了显著增加，由此引起的日本对日元区（“滿洲”、中国占領地区等日元流通的地区）的出超額，1937年为三亿五千二百万日元；1939年为十二亿六千万日元，而1940年1至8月期間，这项出超就达到了九亿一千三百万日元。

以上这种軍費开支的增加和随之而来的經济轉向軍事生产的范圍的逐步扩大，給壟断資本带来了巨額的利潤，然而同时也相应地在国民經济中造成了再生产以外的消耗（产品不是用于生活或生产上面，而是白白浪費掉）。这种情况，从根本上破坏了資本积累較少、尤其重工业基础和資源基础非常薄弱的日本資本主义的生产力，經济危机逐漸表面化了。在产业构成上以輕工业为中心的日本資本主义經济，要想实行軍事化，就必須把輕工业改为重工业。这样，日本資本主义經济一方面要負担不断膨胀的軍事消耗，另一方面又必須把有限的資金和重要資材全部用来扩充軍事工业。建立在基础薄弱的日本經济上面的战爭經济的矛盾，由于第二次欧洲大战的扩展及其向世界战爭发展的危險性的增大，迅

速地尖銳化了。随着第二次欧洲大战的扩大，特别是战局向西欧的扩展，向来以消費品奢侈品为主的日本出口貿易由于各国限制进口而大大减少，同时，日本对重要工业原料、机械类等的进口，也由于欧洲各国限制出口以及运輸船只受限制等原因而逐漸减少了。此外，由于美国实行国防物資輸出限制法、廢弃日美通商条約、实行禁止对日輸出工作母机及其他軍需物資的謝泼德·梅法案，使日本更加感到从美国进口这些物資的困难。三国結成同盟以后，各国都采取了禁止出口的措施，这就使得日本进口原材料和机器类的工作陷于极端困难。这样，由于重要物資的不足，使日本的战爭經济遭受了严重的限制和打击，其結果，日本战爭經济的矛盾也就不能不急剧地尖銳化了。

这种矛盾首先表現为战时通貨膨脹的不断加剧。軍事預算的急剧膨脹主要是依靠发行公債和增发不兌現紙币来解决的。政府对民間企业的支付款的超支額，1936 年是十五亿日元，1939 年是五十三亿日元，1940 年是四十七亿日元，1941 年是七十八亿日元，五年間膨脹到五倍以上。公債从 1939 年初到 1941 年年底，由一百零四亿日元增加到三百七十二亿日元，竟增加了二百七十亿日元，这些，都直接間接地构成了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同时，城市金融机关也因为軍需生产資金的急速增加而扩大了信用貸款，这种信貸扩大的淨增額，1936 年为十五亿五千一百万日元，1940 年为五十九亿六千二百万日元，1941 年为五十二亿九千万日元，这和財政开支的超額共同构成了通貨膨脹的重要因素。这样，日銀券[①]每月平均发行額也遞增无已，1937 年为十五亿三千四百万日元，1939 年达到了二十三亿七千四百万日元（比前一年度增加百分之二十二点二），到 1940 年竟达到了三十三亿四千五百万日元

① 日本銀行所发行的紙币。——譯者

（比前一年度增加百分之四十点二）。与此同时，重要基本物資和消費品的供求关系也陷于极端不平衡状态，尽管政府发布了九·一八物价停止令对物价进行了强力統制，而物价仍然不断上漲，据日本銀行的調查，物資批发价格指数上升的情况是这样：1937 年为二三八点二，1939 年为二七七点五，1940 年竟高达三一一点三。

临时軍事費項下对民間企业支付額

（单位：千日元）

	1940 年	%	1941 年	%
运輸业	84,877	5	276,386	10
商业	308,120	16	338,825	14
机械工业	1,150,604	61	1,626,981	60
紡織染色工业	77,264	4	85,260	3
化学工业	19,740	1	28,234	1
石油业及矿业	46,101	3	61,460	2
皮革橡胶业	38,535	2	43,197	2
食品工业	28,414	2	23,635	1
土木建筑业	36,012	2	46,802	2
各地农会和組合及其他	—	—	—	—
个体經营的商店及其他	—	—	—	—
其他	78,994	4	136,050	5
計	1,868,661	100	2,706,830	100

（日本銀行調查，见井上、宇佐美所著《危机中的日本資本主义的結构》）

通貨膨脹的不断加剧的直接后果是軍需品和重要基本物資的漲价。这就使得軍事开支和扩充軍需生产資金进一步增加，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通貨膨脹。而这种通貨膨脹的恶性循环的不断加剧本身就意味着战爭經济在走向崩潰，所以当局不得不采取抑制通貨膨脹的办法以便阻止这一趋势。因此，尽管資金还在不断地向壟断資本集中，而由于生产資金的周轉不灵和物价統制的加强，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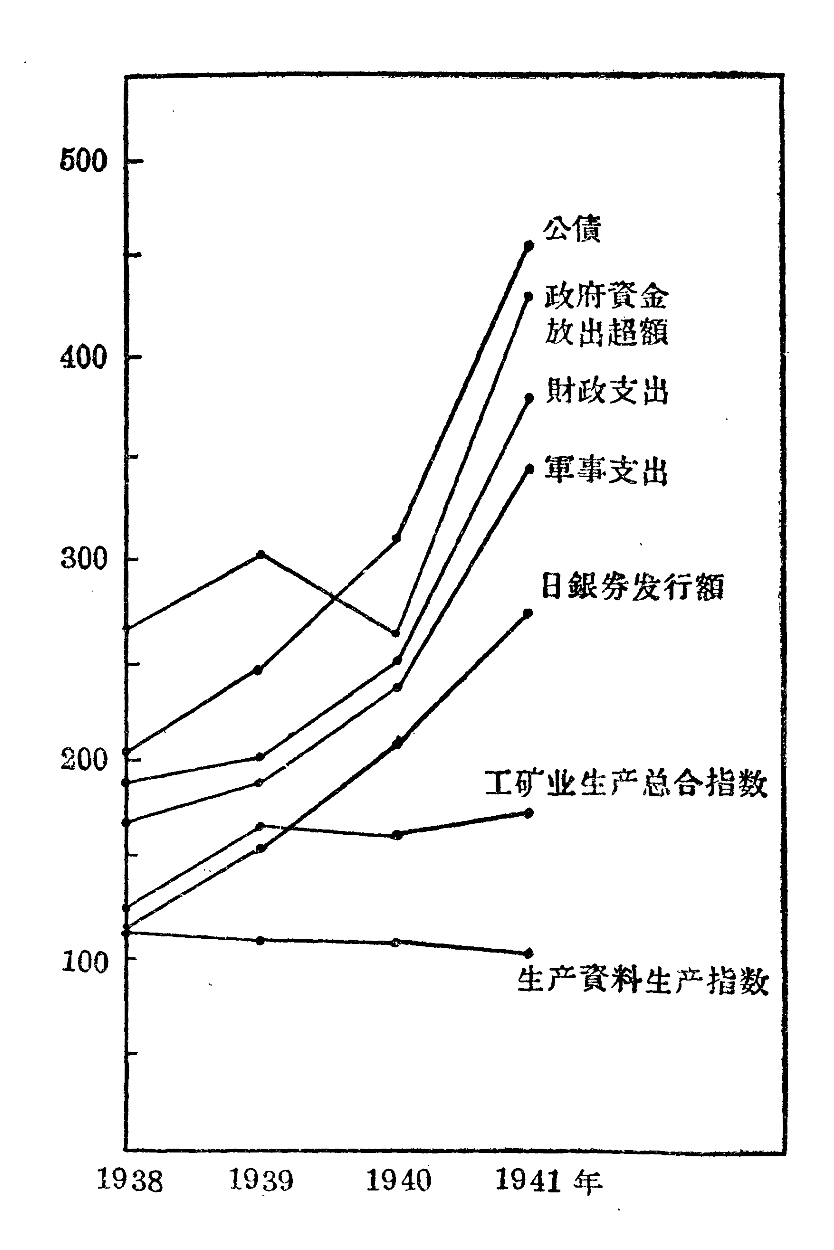
潤率反而下降了。特別是为了保証順利采购軍需品而施行了严厉的物价統制，根据九·一八物价停止令所体現的低物价政策，政府規定了四万七千多个公定价格（1941 年 4 月底）；另外，还不得不施行陆軍提出的“适当利潤率核定綱要”和根据总动員法制定的“企业会計业务統制令”、“工矿业成本計算綱要”等等，至少在形式上对成本和利潤进行了統制。这些措施，虽然引起了追求最大利潤的壟断資本家激烈的反对与非难，但这不过是統治阶級內部的摩擦，这些統制措施并不是要否定追求利潤的生产，其目的勿宁說为了阻止給壟断資本提供巨額利潤的战时經济的崩潰，保証壟断資本家可以得到稳定的利潤，从而，是有利于壟断資本的通貨膨脹对策。这样，一向是直綫上升的壟断資本进行軍事生产的利潤由于通貨膨脹的加剧以及抑制通貨膨脹对策的施行，使得利潤的增长率有了下降，利潤率开始停頓和下降了。原料价格的高涨与成品价格被压制之間的矛盾，不能不阻碍了作为以追求利潤为目的的私营企业生产的战争經济。在这种情况下，壟断資本悍然提出了“有利于增产的价格提高論”，并要求政府发給財政补助金。于是，政府就把有关煤炭、电力、石油等基本物資的各种补助金加以提高，其結果是：1937 年为三亿一千万日元，1940 年为六亿七千万日元，1941 年增至七亿六千万日元，而这項增加又造成了財政膨脹的原因，同时，这种补助金政策当然是以国家的財政負担来保証和提高壟断資本利潤的。其他，和物价統制并行，政府还采取了在通貨膨脹情况下保証壟断資本利潤不断增长的强有力措施，这就是：制訂固定資产折旧的例外規定，廢止統一的成本統制，实行承认差別利潤率的个别統制，等等。这些，当然也都成了加剧通貨膨脹的原因。尽管有了这些增加利潤的措施，但仍然未能避免利潤率的下降、产业資金的不足和股票行市的跌落。为了应付由于軍事开支和軍需生产递增引起的通貨膨脹所造成的矛盾并追求最大限

度的利潤，壟断資本不得不对本身机构进行加强和改組，以便成为更加有力的掠夺体制。

随着战时經济的进行而发生的矛盾，表現为战时生产力的直接停頓和減退。日本經济向进行軍事生产的重工业的迅速改組，使直接生产武器的企业部門以及其他重工业壟断資本的資本积累

軍事开支、日銀券发行額、生产指数增長的对比

指数（1937 年为 100）



（財政支出为一般会計与临时軍事費的合計凈額，軍事支出为一般会計的陆海軍費、征兵費和临时軍事費的合計。生产指数系根据国民經济研究协会的調查。）

战时資本积累和战时利潤的增長

（制造工业）（単位：百万日元）

年次	企业数	名义資本額或实收資本額	公积金	純益
1936	87,511	23,959	3,987	1,683
1937	85,042	26,912	4,305	2,009
1938	83,042	30,250	4,823	2,415
1939	85,122	34,026	5,477	2,889
1940	85,836	36,164	6,370	3,364
1941	90,775	39,353	7,279	3,763
1942	92,948	42,801	7,689	3,905

（根据商工省的《企业統計》）

工矿企业收益状况

（单位：百万日元）

年次	上半年			下半年		
	实收資本	利潤	利潤率%	实收資本	利潤	利潤率%
1937	1,535	189	26.0	1,693	207	25.4
1938	1,785	216	24.6	1,897	255	24.3
1939	2,005	255	24.3	2,207	259	24.2
1940	2,364	259	22.4	2,581	281	2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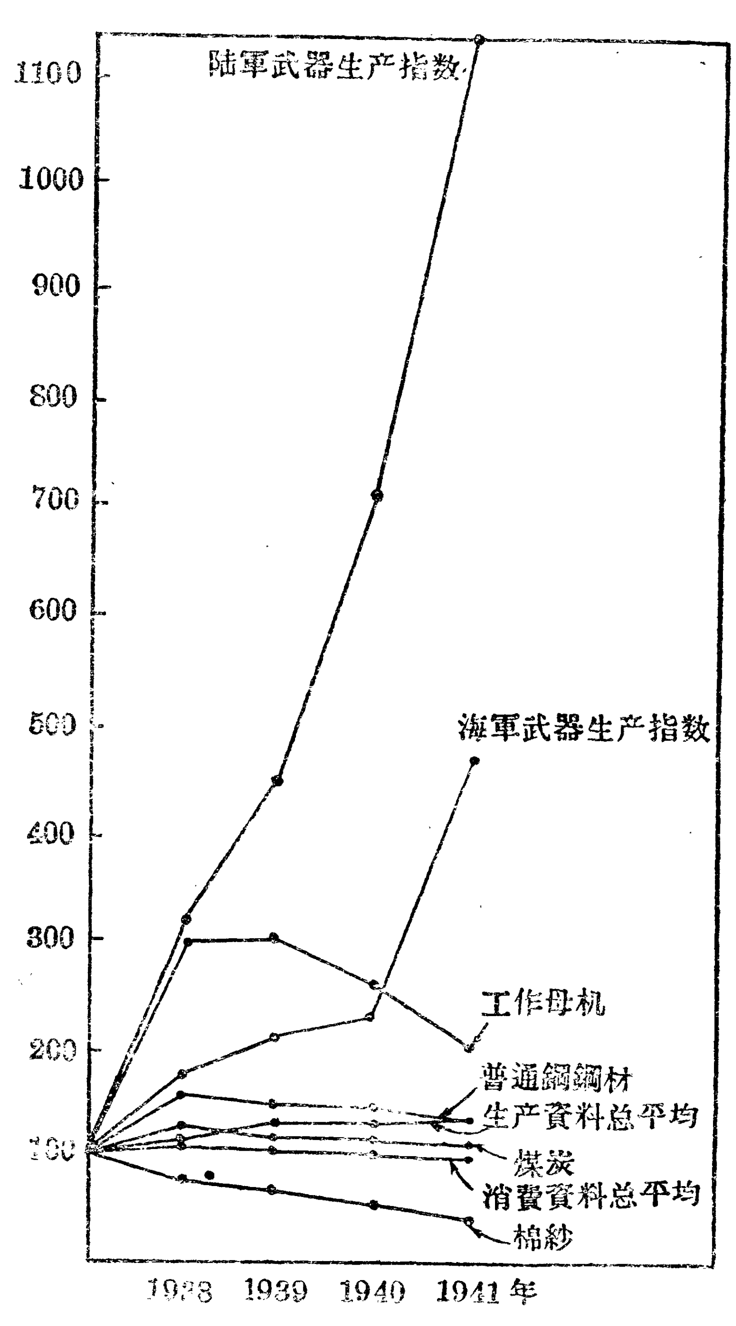
（朝日新聞社就主要工矿企业五十三家所作調查結果，利潤金額系按折旧前数字。）

进行得很快。这种情况，在資本积累少、資源基础薄弱的資本主义日本，只有在严重破坏和牺牲和平产业消費品制造业的条件下，也只有在从先进資本主义各国进口各种基本物資和工作母机等机器設备的基础上，才能实現。因此，尽管直接武器生产有了发展，但作为重工业基础的鉄、煤炭、电力、輕金属以及工作母机等企业的发展却极为緩慢；而随着这些物資輸入的減少和断絕，日本战爭經

济的重工业基础开始崩潰了。这样，通貨膨脹的加剧和抑制通貨膨脹对策之間的矛盾，軍事需要的逐漸扩大和重工业基础薄弱之間的矛盾，如上图所示，使重工业的基本产业部門的生产陷于停頓，給壟断資本保証最大利潤的战爭經济从它的重工业基础上开始崩潰了。

生 产 的 不 平 衡

生产指数（1935—1937 年为 100）



（以上指数见国民經济研究协会:《关于实际国民所得的統計》）

战时經济的矛盾

如上所述，日本資本主义的再生产遭到了危机的冲击，而且这种危机发展得很快。于是，把战时經济当作追求最大利潤的手段的壟断資本，为了应付上述战时經济的矛盾的加剧，便不得不在建立强有力的对內掠夺体制的同时，再一次加强和扩大对殖民地的帝国主义統治。米內內閣的总辞职和第二次近卫內閣的成立，就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天皇制法西斯主义，以便在这一基础上扩大和加强独霸远东各地区的殖民統治，并建立起壟断資本实行战时掠夺的統治体制——“新經济体制”。作为近卫內閣政策的基础的“基本国策綱要”(参看前节)，就是要把战争經济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建立以日‘满’华为主要环节并包括东亚各地区的‘协同’經济区”，也就是說，建立起以对“滿洲国”、中国以及南方各地区独占的殖民統治为基础的那种自給自足体制。所謂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即指此而言。对于“滿洲”、中国以及南方各地区，日本統治阶級垂涎已久。现在，由于締結了三国同盟以及各国因此而采取的对日紧急措施，更使日本坚定了这种侵略野心。然而，日本統治阶級的这种动向，必然地要和一向統治远东各地的势力——以英美为首的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于是，在太平洋区域双方帝国主义的对立进一步尖銳化了。因此，日本統治阶級作为在中国进行战争的經济基础企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这件事本身就意味着走向太平洋战争。从而，日本建立“共荣圈”經济的活动也就必然会成为对英美开战的准备。

在加强殖民統治的同时，在国内，为了加强作为战时的掠夺体制的战争經济，进行了建立壟断資本的統治体系——“經济新体制”。如前所述，由于战争經济的进行而引起的通貨膨脹以及从事軍需生产的重工业需要的基本物資的缺乏，妨碍了壟断資本借以

追求最大利潤的战爭經济的发展。为了一面应付战时經济所引起的这种矛盾的加深，一面維持并扩大軍需生产，并由此而取得庞大的利潤，壟断資本需要实行更加有力的經济“計划化”和“經济統制”，换言之，它必須首先直接或間接地掠夺民众，由国民經济中搜刮递增无已的庞大战費和軍需生产資金。为此目的，它必須加强对整个国民經济的統制，直接地进一步加强財政金融的計划化和金融統制。另外随着战爭經济的矛盾的加劇，壟断資本愈发强烈地要求加强对所有經济部門的“統制”和“計划化”，其中包括：在基本物資漲价的情况下，保証壟断資本利潤的价格統制，在基本物資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保証壟断資本获得其重要原料的对物資分配的統制及其“計划化”，以及对劳动力、粮食的“統制”和“計划化”，等等。这样，从1939年第三、四季度，战爭經济的矛盾以电力和煤炭的不足为开端而表面化以后，壟断資本不仅对于以往由官僚包办的經济統制日益感到不滿而加以責难，而且主張国家机关进一步从属于壟断資本，并直接参加在这个基础上实行的严厉的經济統制。这个主张以其建立在壟断資本加强战时卡特尔和扩大这种卡特尔权限的形式逐步实現了。

首先，壟断資本的团体日本經济联盟在1940年4月召开大会，实行改組，不仅加强了理事会的权限和灵活性，而且通过网罗和选任各卡特尔（以統制市場为直接目的的企业联合組織）的首脑充任理事，使这个联盟成为卡特尔的实际上的代表机关，并将这个組織的任务由单純的建議献策改为眞正的“自治統制”，同时还决定采取措施有組織地开展对鉄、煤炭、电力、纖維及其他各种重要物資的統制工作，壟断資本亲自搞起統制来了。同年5月，联盟又向政府提出建議，要求让壟断資本实行自治的統制并授与权力。这項建議里說：“为了消除官僚統制的缺点，必須合并現有的民間經济团体，使其变为各主要产业部門的强有力的卡特尔。为了鼓

励民間企业发揮創造性，并使其各自負責实行自治的統制，必須賦与卡特尔以广泛的統制权"。以这种主要由壟断資本策划的企图加强經济統制的活动为背景而成立的第二次近卫內閣，聘請了池田成彬、小林一三、乡誠之助等財閥的代表以及町田忠治（民政党）、前田米藏（政友会）等財閥的代言人担任閣員或內閣参議。政府方面的"經济新体制"草案是由企划院总裁星野草拟的，名为"星野方案"。这一方案的基本內容也是以壟断資本的战时統制卡特尔化为基础来加强統制的。只因为它主張企业經营者的公共性，主張卡特尔的理事应由政府任命等等，意味着官僚統制的政府对卡特尔的干涉，所以遭到了壟断資本的猛烈反对，結果，政府还是根据强調資本自主性的民間方案，在 1940 年 12 月 7 日，作为經济統制大綱决定和公布了"建立經济新体制綱要"。（参照前节）这一綱要一开始就强調保証私营企业和适当利潤，强調提高折旧以加强各种重要产业，借以貫彻了保証壟断資本在战争經济中追求最大限度利潤的原則。同时，这个綱要还規定了有关企业的开設、整理的限制措施，亦即确定了有关加强統制以便进一步加强战爭經济，以及整頓扩充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权限的原則。此外，綱要还規定了卡特尔将成为在战时拥有权力的卡特尔，它具有事实上的統制机关的性质与职能。可以說，以上几点表明了以下原則，即：在战爭經济条件下加强壟断資本的地位；通过使政府机关服从壟断資本的指揮来加强壟断資本的統治，并在这个基础上加强壟断資本对經济的統制。根据这一綱要，壟断資本家的許多团体提出了許多方案，在壟断資本的主导之下进行了对战时統制机关的加强工作。

統制会的任务

配合战爭經济加强壟断資本統治体系的工作，是根据 1940 年

12月7日公布的“建立經济新体制綱要”进行的，这首先是把壟断資本的統治机构卡特尔加以改組，使之具有“战时形态”，也就是把它改組成为“統制机关”，并賦与强大的权力，以加强其統治力量。政府根据壟断資本的卡特尔的联合会——日本經济联盟的方案，于1941年8月31日公布了“重要产业团体令”，并分别将各个重要产业部門的卡特尔和旧有的“工业組合”加以合并，設立了一元化的統制机构“統制会”。“統制会”对于生产的分担，資金、物資的分配，工人的动員，企业的解散与合并，以至价格和利潤的决定等等具有决定性的权限。至此，战爭經济矛盾的发展所必然引起的“經济統制”已完全被壟断資本掌握起来，他們把战爭經济当作追求最高利潤的手段而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了。

在“重要产业团体令”公布以前的4月26日首先成立了一个类似統制会的雛形——“鋼鉄統制会”。政府在公布团体令的同时，即筹备成立煤炭、金属、石油、机械工业、化学工业、水泥、羊毛等重要产业部門的統制会。到12月28日，政府第一次对鋼鉄、煤炭、矿山、水泥、电气机械、产业机械、精密机械、汽車、車辆、金属工业、貿易、造船等十二个部門发出了关于成立統制会的指示。这些統制会的具体設立日期是这样，除上述鋼鉄統制会以外，煤炭統制会是11月26日，矿山統制会、水泥統制会是12月18日，其余，都是在1942年以后，以上所有的这些統制会都是在“財閥”的巨大資本的主导下設立起来的。鋼鉄統制会的会长是由三菱康采恩（由多数企业共同出資成立的联合組織）的重工业部門的代表、半国营性质的托辣斯（企业的联合体）“日鉄”的总經理平生釟三郎担任，煤炭統制会的会长是由三井康采恩的代表、煤炭新迪加（煤炭企业的共同販卖組織）——日本煤炭公司的总經理松本健次郎担任，統制会的权力完全由壟断資本的代表直接掌握，他們通过对生产任务、資金、物資和劳动力的分配，使生产集中到壟断資本，并

压迫了中小企业。在統制会主持下，对作为战时新迫加組織的“統制会社”和“統制組合”进行了整理，同时还新設了一批这类組織。壟断資本的这种战时的統治体系，为私人資本的壟断資本积极地强制干涉各个康采恩資本，尤其是中小資本以及工人，提供了“合法的”基础。这样便保証和不断扩大了从事軍事生产的利潤，并使其逐渐集中到了壟断資本的手里。

“經济新体制”就是以这种壟断資本的战时統治形式的“統制会”为中心而建立起来了。这是壟断資本在自己进行統制的名义下，有效地驅使国家机关以便加强掠夺的一套办法。总之，“經济新体制”是昭和危机以来就开始的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进一步的加强和完成，是法西斯統治体制在經济机构中的确立。利用这种統治机构，壟断資本执行了它的战时方針——“有重点的增产方針”，这就是使資金和物資集中到壟断資本手里，使和平工业轉向軍需工业，“整頓”中小企业，以及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强制动員和剝削。其中，使生产和資本集中到壟断資本手里，以及由此而使壟断資本获得巨額的利潤和資本积累，这就是統制会所干出的“成績”。

对金融的統制

与此同时，政府为了保証筹集日益膨脹的战費和軍需工业資金的工作，还进行了在資金方面建立战时体制，即建立財政金融方面的“新体制”的工作。战争經济的进行和第二次大战的扩大所造成的“新事态”，表現为通貨膨脹的发展。为了制止通貨膨脹并确保战費和軍需企业資金，需要在財政金融方面建立起更加有力的“統制体制”。这就是說，自从进入 1940 年以后，通貨逐月在膨脹，到同年 12 月，貨币发行額終于突破了四十亿日元，最高发行額竟达到四十九亿三千万日元。而且公債的消化状况日益恶化，公債消化率从前一年的百分之八十九点二下降到百分之七十八点五。同

时，尽管儲蓄增加額在下降，而軍需企业資金的貸款却不断增加。面对这种情况，政府进一步加强了金融統制，也就是政府有必要加强“消化公債第一的原則”和对产业資金进行統制。金融上的这种重点主义是推行战争經济的重要基础，因而，政府于1940年10月20日根据“国家总动員法”公布了“銀行等資金运用令”，借此实現运用資金的計划化，也就是使資金集中到壟断資本手里和公債消化的状况趋于順利。此外，由于三国同盟的締結，組織金融机关的工作也有了迅速的发展，在此以前的1940年9月21日，政府已經动員日本銀行、全国票据交换所联合会、全国地方銀行协会、全国儲蓄銀行协会、生命保險协会、信托协会等所有金融机关，成立了“全国金融协議会”。这个組織根据其成立大会上的决議，分别設立了有关消化公債、各种金融机关的整頓合并等項工作的特别委員会，担任战争經济的基础的金融动員工作。这是对統治机构的一次整頓和加强，其目的在于动員和集中国民經济中的全部資金，用以消化公債，拼凑战费，并为壟断資本解决进行軍需生产的資金問題。接着在1941年7月11日，政府公布了“財政金融基本措施綱要”，进一步組織了和整理合并了全部金融机关，以便貫徹重点使用資金的方針。这一綱要可以說是在运用資金方面的“經济新体制”的基础，其內容分为“制定国民資金动員計划”，“修改財政政策”和“修改金融政策”三項。其中，第一項“制定国民資金动員計划”是怎样在削减人民大众消費的基础上来拼凑战費和軍需企业資金的“国民經济的資金計划化”。第二項“修改財政政策”是以增加税收和加强銷售公債工作以便拼凑不断膨脹的战費为主要內容的財政的軍事化。第三項“修改金融政策”規定：加强战时金融的心脏日本銀行作为发行和承担公債的机关、作为用通貨膨脹的方法筹集軍需企业資金的机关的机能；必須調整其职能；改革加强金融机关并使之“組織化”；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加强重点使用資金的

政策。所有这些都是把战爭經济的基础即战爭資金的負担强加于人民大众头上的措施，是为此目的而加强金融資本統治体系的措施。以上改革加强金融机构的决定在走向太平洋战爭的过程中都逐步实現了。而在这以前的1941年8月4日，为了实行軍需資金的重点分配，已經由兴业銀行等十家主要銀行組成了"战时共同通融資金团"担任消化公債和筹集軍需企业資金的工作。这个通融資金团以后进一步改为全国金融統制会，这个統制会实际上是一种金融新迪加（由銀行等金融資本組成的共同通融資金的組織），它作为在战費日益膨脹的情况下筹集战費的机关，构成了"金融新体制"的核心。

对劳动的統制

"經济新体制"的第三个內容是旨在加强对劳动力的强制动員和剝削的"劳动統制"。"劳动統制"的目的是配合軍事动員，强迫工人参加軍需企业，幷采取延长劳动时間和降低实际工資的办法加重剝削，以便确保和扩大壟断資本的利潤。当时，由于軍事动員的不断扩大和軍需工业的迅速膨脹，劳动力不足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1940年11月成立"大日本产业报国会"，以及把它改为"大政翼贊会"的从属机关，就是为实行这种"劳动統制"創造条件，由于这个組織和"統制会"以及"厚生省"的活动，进一步加强了对劳动力的强制动員。1940年11月8日，政府制定了"建立勤劳新体制綱要"，决定加强"劳动力統制"，幷建立有关組織。另一方面，政府还在同年3月修改"从业員雇佣限制令"，11月公布"从业員移动防止令"，同月又修改"国民征用令"，扩大了該令的适用范圍，幷实行"青壯年国民登記"办法，在次年（1941年）3月实行"国民劳务手册法"，由于采取了这一系列的措施，逐步完成了对劳动力进行战时統制和强制动員的体制。对已往的国民职业能力申报令加以

修改扩充而制定的这项"青壮年国民登記"办法規定，所有滿十六岁以上四十岁以下的男子以及滿十六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的未婚女子都必須登記。根据这項办法在全国范圍內进行登記的人数，到1940年10月底共計为一千三百万人左右。这項办法的实施和"国民劳务手册制"的实施互相結合起来，就为劳动力的动員奠定了基础。根据这些"劳动統制"办法而被动員的工人，特别是"征用者"，經常处在"寄宿舍制度"的管理下，在法定的罰款与体罰的威胁下，不得不在壟断資本的工厂里以极低的工資从事长时間的劳动。1941年11月，政府又成立了"国民勤劳报国协力会"，使学生和中小工商业者的"勤劳动員"具备了法律根据，加强了这方面的統制体系。这一系列的"劳动統制"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为滿足壟断軍需企业資本对劳动力的日益增长的需要，給他們提供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其次是对于工資的統制。1940年10月，政府根据总动員法公布了新"工資統制令"，进一步加强了工資統制。新"工資統制令"除規定工資的最高額、最低額以外，还按照不同企业分别規定了每小时的最高工資率，企图在熟练劳动力不足和工資上漲的情况下压低工資。工資率是由厚生大臣或地方長官根据性别、年龄、职业、工龄、地区和企业的重要性等条件而規定的。同时，还根据每一企业的每小时最高工資率，規定了各該企业每月的工資基金額，企业主不得使工資超过这个金額。这种办法由于压低工資的支付总額而提高了剩余价值率（資本对于劳动的剝削程度）；同时，資本家也可以在工資基金的限額以內，为了"增加生产"和"加强劳动"而任意地、有利地掌握工資的开支。这种"劳动統制"的加强限制了劳动力供求关系不平衡所引起的工資上漲的趋势，在通貨膨脹和生活物資不足的情况下，使名义工資提高得很少，从而实际工資逐漸下降。另外，工資上漲的趋势与工資統制之間的矛盾加劇了工資的不平衡状态，其結果，造成了不熟练工人、征

用工的实际工資的显著下降。

实际工資变动状况

年　　次	名义工資（元）	同　指　数	物价指数	实际工資指数
1937	1.96	100.00	100	100
1938	2.04	104.10	106	95
1939	2.03	103.60	122	84
1940	2.28	116.30	143	81
1941	2.56	130.60	155	84

（名义工資指工厂工人每日平均工資，〔据总理府統計局的調查〕。物价指数是根据冲中恒幸的計算，包括公定价格和黑市价格在内的实际物价指数。）

如上所述，所謂"經济新体制"，就是壟断資本对財政、金融、生产、劳动等一切經济領域的綜合的战时統制体系。它是壟断資本为了追求最大利潤而使用强权掠夺群众，借以推行战爭經济的組織形式。

战时粮食政策

在产业实行战时改組、农业劳动力急剧轉入軍队和城市的情况下，建立在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个体經营基础上的日本农业，于 1939 年秋收时集中地暴露了它的矛盾，引起了"粮食問題"（粮荒）。由于这种情况，政府不得不对于同年春季开始实行的战时粮食政策从根本上加以修改，而从 1940 年粮食年度起迅速地公布了一系列有关的統制法規。特别是造成粮食問題的一些根本原因（劳动力不足、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个体經营等）和統治阶級拒絕对此进行根本改革的方針，經常对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并加剧了劳动力的浪費，使对于粮食的流通和消費的統制更加严苛起来，造成了日本战时粮食政策的特点。政府对"粮食問題"

采取的最初的措施是冻結米价(每石四十三日元)，和实行对稻谷的强制征购。政府在1939年10月到次年4月末强制征购了一千零五十万石稻谷的这段时間里，除先后頒布稻谷配給統制法和基于稻谷統制法的农林省令(1939年11月6日公布实行)以外，又对稻谷应急措施法进行了第一次修改(1940年3月23日公布施行)，并公布了"稻谷强制征购措施"(1940年5月)，到1940年8月，又公布了"临时稻谷配給統制规則"，将稻谷的征购机构改为"市鎮村农会——販卖組合——政府"的单一系統，然后公布了"稻谷管理规則"(1940年10月24日公布，11月1日实行)，完成了国家管理稻谷的体制。这样，全国的稻谷，除生产者按一定标准保留的口粮而外，其余部分都被規定为管理米，其中絕大部分都要被政府征购去。

政府对稻谷进行以上統制的同时，从1940年春季起对于麦类及其他主要农产物也逐步实行了統制。在1940年的大歉收以后，1941年3月，政府对"稻谷应急措施法"进行了第二次修改，把国家征购的范圍由"稻谷以及稻谷以外的谷物和谷粉"扩大到"稻谷和稻谷以外的粮食及其加工品"，到6月間，完成了国家对麦类管理体制。这样，到太平洋战爭的前夕为止，政府迅速地完成了对全部农产品的国家管理体制。

另一方面，自从中日战爭开始以来，以强迫劳动、共同作业和集体轉移劳动等形式为主的粮食增产运动，由于有意識地迴避最根本的土地問題的解决，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方面遭到失敗，加上农业器材的缺乏和农产品价格与工业产品价格之間的剪刀差的增大，因而从1940年粮食年度起，农业生产力显示了由停滞轉入低落的必然趋势。1937年秋收时，被强制"狂热地"开展的强迫劳动运动，由于是在旧有的分散經营的基础上加上了无計划的动員，也只是造成了劳动力的严重浪費。对于以后的农村劳动力的急剧

外流，虽然从1939年起，采取了使工矿业工人和休假士兵的“支援农业”，或用学生、儿童这种未成年劳动力进行代替等措施，但是未能克服本质上存在的矛盾，无法消除浪費劳动力的基本趋向。另外，自1938年春季开始、并逐年加强的“共同作业”运动，也由于經常和地主土地所有制、个体生产之間发生矛盾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不但如此，育秧、耕耘、种植和收割等基本生产过程的共同劳动，还往往受到妨碍，甚至显示了减退的趋势。

共同作业組合的数目，如以1933年为100，則1938年的数目如下。(括弧内为实数)其中，有关打谷、調整、防治病虫害的实数和增加率都多于有关育秧、种植等基本生产过程的实数，而前者大大地超过后者。

共同选种	71.1(39,119)	共同收割 共同打谷 共同揚晒	951.7(67,051)
共同育秧	155.9(12,473)	共同防治病虫害	329.3(57,300)
共同插秧	225.4(32,739)		
共同翻整土地	285.9(14,981)		
共同灌溉除草	321.73(22,905)		

(根据山下粛郎:《战时农村劳动力对策》，第101頁的統計)

新泻县共同作业組織数目轉变状况

	1933年	1938年		1933年	1938年
共同育秧	520	345	共同防治病虫害	1,631	2,711
共同耕耘	475	160	共同养蚕	167	521
共同插秧	404	271	共同选种	2,117	2,728
共同除草	376	336	共同制粉(下略)	12	107
共同收割	517	201			

(引自前书第102頁)

大体上利用封建的习慣而組織起来的“共同作业”，几乎不考虑工資核算，不仅造成了劳动力較多的貧农負担过重，促使他們离开农业，而且因为一般地增加劳动强度，再加上自家劳动，这就造成了劳动时間的延长，进一步助长了劳动力流入城市的趋向，也加速了剩下的农业劳动力的减弱。旨在减輕妇女劳动的集体炊爨、托儿所等，也自1939年起逐漸被用来促使妇女劳动力集中于农业

生产，反而导致了进一步增加妇女劳动强度的結果。

根据野尻重雄就1937年4月到1940年4月期間神奈川、山梨、琦玉、福島、新潟、岩手、青森等七县农村劳动力移动状况所作的調查报告，从拥有土地状况和經营規模的角度得出的劳动力移动率如下表：

基于經营規模的农民离村率

（1939年4月～1940年4月琦玉、新潟、福島、岩手四县专业农戶四千八百八十一戶的平均数字）

	現有家属人数 A	因求职而离村者 B	求职离村率 B/A+B
不滿5段①	2,363	337	12.5
5段～1町②	7,191	779	9.5
1町～2町	14,549	1,018	6.5
2町～3町	5,527	329	5.5
3町以上	2,147	87	3.9
計	31,777	2,550	7.4

（野尻重雄：《关于农民离村的实証研究》，第138頁）

从拥有土地状况阶級得出的离村率

（同上专业农戶5,157戶的平均数字）

	現有家属人数 A	因求职而离村者 B	求职离村率 B/A+B
地主	876	46	5.0
自耕农	10,379	597	5.4
自耕兼佃农	10,760	808	7.0
佃农	10,638	1,145	9.7
雇农	577	134	18.8
計	33,230	2,730	7.6

（前书第156頁）

① 面积单位，約合991.7平方公尺。——譯者

② 面积单位，一町等于10段，約合9917平方公尺。——譯者

劳动力流入城市的情况，自1939年下半年起更加严重了。这项人数在1937年7月至1939年8月之間約为八十六万，而在1939年8月至1941年2月之間竟达到一百一十五万，其中，男子約七十五万人，三十五岁以下的青壮年約为九十五万人。这一事实无疑地使剩下的农业劳动力的质量有了显著的下降。

农村中的疾病、負伤及死亡率的增長情况如下：

（就爱知县碧海郡八町村的中农七百四十四戶、人口四千三百零二人所作的調查，見《医疗組合》杂志第4卷，第3期。引自山下肃郎：《战时农村劳动力对策》）

戶历年平均患病次数

年次＼类别	十天以内	二十天以内	一个月以内	一个月以上	合計
昭和11年(1936)	2.625	0.387	0.228	0.232	3.473
昭和12年(1937)	2.947	0.463	0.251	0.226	3.888
昭和13年(1938)	3.218	0.434	0.253	0.320	4.125

戶历年平均負伤次数

年次＼类别	十天以内	二十天以内	一个月以内	一个月以上	合計
昭和11年(1936)	0.264	0.036	0.017	0.017	0.337
昭和12年(1937)	0.293	0.036	0.029	0.023	0.382
昭和13年(1938)	0.332	0.052	0.040	0.032	0.457

出生和死亡相抵后人口增加情况

年次＼类别	被調查戶出生人数	同上死亡人数	同上相抵后增加人数	同上人口增加率	同上对于总人口的增加率
昭和11年(1936)	137	51	86	11.50	2.00
昭和12年(1937)	124	66	58	7.80	1.35
昭和13年(1938)	127	89	38	5.12	0.88

除以上农村劳动力的质量和数量降低的情况以外，还发生了农业器材缺乏及其漲价的問題。农业用鋼材和普通鉄的分配量在1940年已降低到平时的百分之四十二。（劝业銀行：«从战时到战后农村經济的轉变»）在化学肥料中，鉀盐由于欧战的爆发而断絕来源；硫銨、氮肥由于电力和煤炭的供应减少，从1939年开始減少；而原料輸入情况比較順利的过磷酸石灰，也从1941年以后有了显著的减少。以上这些情况，一部分从1940年起，一般地是从1941年起，不仅不可避兔地造成了掠夺性生产（在不被供給肥料等生产資料的情况下进行的农业生产）的趋向；而且还和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农业生产关系中的各种矛盾結合起来，促成了农业生产力的全面下降趋向。生产力的下降首先表現在1940年稻米的产量上。同年米的产量为六千零八十七万四千石，比計划指标（七千一百万石）少一千万石以上，比前五年的平均产量减产四百三十一万五千石。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收成不佳的情况，并不限于北海道、九州、四国等遭受稻热病、浮尘子虫害和暴风雨的灾害較大的地区，而是已經广泛地发展到了全国范圍。

农产品及农家購进物品的价格上漲率

（全国农业学会：«农村物价調查概要»）

	农林产品	农业用品	生活用品
昭和12年（1937）	100	100	100
昭和13年（1938）	108.9	116.8	120
昭和14年（1939）	137.5	138.5	145.8
昭和15年（1940）	164.2	186.4	190.2
昭和16年（1941）	162.0	180.8	200.7
昭和17年（1942）	173.8	189.4	217.2
昭和18年（1943）	184.5	194.4	244.0
昭和19年（1944）	212.8	201.4	295.7
昭和20年（1945）	408.5	241.1	420.9

然而，在不改变原有的农业生产关系的条件下，专門靠加强农业劳动来解决矛盾的这种增产运动，要想眞正达到增产的目的，就不可避免地要加以某些改变。从 1940 年下半年起盛行的"日本农业改組"論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这一論調本身虽然在一部人中間引起了对寄生地主的反对，但結局还是被模仿納粹德国的"全国世襲农場法"的、要求維持"日本民族的血的源泉"的新"适当規模論"所压倒了。但是，为了貫徹执行以增加农业生产和維持低米价政策为內容的战爭經济的最高命令，是不可能长期容許战时粮食政策絲毫不过問土地問題的。在肥料、农业器材供应不足和价格上漲（特別是黑市价格）的情况下，将米价冻結在每石四十三日元的低米价政策，到 1940 年年初，已經在部分地区引起了用稻米充作馬料的現象，到了 1940 年秋季实行稻谷管理法时，又与該法背道而馳地助长了自然經济化的趋向，給增产政策造成了严重困难。作为解决这种矛盾的唯一办法，当局采取了对每石稻谷发給生产奖励金五日元的办法（1941 年 8 月），这种办法，实际上使生产者的出售价格同佃租价格分离开来，从而降低了地租，客观上导致了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角落崩潰的結果。

据四宮恭二所著《战爭、粮食、农业》一书，当时（1940 年初）《大阪朝日新聞》上曾刊載过如下的讀者来信：

"在提倡增产和节約稻米声中，农家浪費米的現象却非常严重，这是令人不胜寒心的。在一般农戶向来用豆餅充作牛馬的飼料。去年以来，豆餅的价格虽然根据九·一八物价停止令而冻結为每块四元三角，但实际上豆餅价格在不断上漲，到去年 11 月竟然漲到每块五元三角五分，而目前則为每块五元八角，并且一次只能买到一块。……已經买不到了。如能买到麦子，还是比較便宜，但目前沒有麦子。于是，只好用米充作飼料。这样，比較花六元买一块豆餅还算便宜。因此，最近由于农戶用作牛馬的飼料而被浪費掉的稻米的数量是很大的。"

"我們村里从 1 月到 7 月每一段田地分到的肥料数量是硫銨七百

匁①，过磷酸鈣六百匁，氮肥三百匁左右。而今天为了实現肥料自給自足，在制造速成堆肥也必需有硫銨和氮肥，試問当局，在这种情况下，还可能力行稻米的增产嗎？有机肥料完全要倚靠黑市，这种黑市价格将近公定价格的一倍，并且不易买到。目前，米一袋重十八貫②价十七元多一点，一袋十貫的豆餅面，黑市价格是十元以上。这样，与其用难以买到的豆餅作牛馬的飼料，就不如将自产的稻米煮熟后喂牲畜反而大为經济。当局既然断言絕不提高米价，那么就应負責对农戶供給足够的肥料。”

另一方面，政府对农业劳动的統制也越发加强了。政府在1940年春季就已經表明了对农业劳动加强統制的方針，这就是通过修改农会法改組村落农业团体和进一步加强共同作业。1941年9月，政府又根据修改后的农会法发布了統制令，决定通过村落农业团体加强了对共同作业和集体轉移劳动的統制，严格地統制耕种，强制共同使用农具、役畜。紧接着在10月間又公布施行了“耕种統制規則”，这項法令規定不仅要保持粮食作物的原有种植面积，而且还要在种植“限制作物”（桑、茶、薄荷、烟草、果树、花卉）的土地上改种粮食作物。国家对于直接生产过程的这种統制的总汇，就是在太平洋战争前夕召开的国家总动員审議会第二十次全体会議上通过的“关于农业生产統制的敕令案綱要”，它以“农业生产統制令”的形式在同年年末公布，而自次年1月起实行。其次，前述1940年稻米生产計划的未能完成和外米輸入量减少的趋势，使当局在1940年秋季感到必須制定正式的粮食增产計划和粮食自給自足体制。結果在同年年底，由农林当局制定了在以后十年中开荒五十万町步的“米麦增产十年計划”，并于次年2月頒布了“开垦耕地法”，5月間根据該法成立了“开垦耕地团”。

在这种情况下所展开的1941年的增产运动是这样：作为十年計划的第一年度，政府将主要农产物的生产目标規定如下表所示。

① 日本重量单位，合3.75公分。——譯者

② 日本重量单位，合3.75公斤。——譯者

1941 年度主要农产物生产指标

（单位：米麦——千石；薯类——千貫）

种　　类	生产基数	增产計划	生产指标
稻米	63,465	7,980	71,445
小麦	9,500	1,978	11,478
大麦，裸麦	12,915	2,871	15,783
甘薯	980,000	455,500	1,435,500
馬鈴薯	490,000	178,000	688,000

（根据《朝日經济年史》，1941 年版）

为了大大加强共同作业还强迫学生、儿童参加集体劳动，并利用地方长官和道府县經济部长的直接督促，尤其是“农业报国推进队”的玄虛的精神运动的鞭策，对农民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然而，尽管当局作了这种种努力，但同年的生产計划还是完全失败了。同年的稻谷产量只有五千五百零八万八千石，和前年比較减产五百七十八万六千石，距生产指标竟然相差一千六百三十三万三千石之多。麦类比前一年約减产三百万石，比指标少四百八十万石。这就是增产运动的凄慘結果。

根据工作种类划分的村落农业团体数目

（见帝国农会：《农业年鉴》昭和十八（1943）年版，第 244 頁）

工作种类	昭和 13 年度（1938）	昭和 15 年度（1940）	昭和 16 年度（1941）
共同育秧	12,473	25,043	33,189
共同插秧	32,739	77,609	80,630
共同除草	22,905	34,465	37,978
共同收割	19,036	32,082	71,132
共同打谷揚晒	33,515	85,271	175,943
共同播麦	不詳	19,800	67,946
共同收麦	不詳	31,814	35,146
共同炊爨	210	3,508	18,364
托儿所	3,045	21,393	30,949
計		330,990	551,277

于是，政府在 9 月 15 日公布“国家管理稻谷实施綱要”，指令

征购全部"管理米"的同时发表了对粮食产量的第一次估計。接着又在5月26日的內閣会議上决定了"紧急粮食对策",制訂并下达了有关限制作物的改种,增产麦类和馬鈴薯,以至于准备对美开战的粮食儲备等等广泛的紧急对策。

1941年度学生、儿童被迫参加劳动情况

(见同上《农业年鉴》,第246頁)

	(春季)实际人数	参加人次	(秋季)实际人数	参加人次
国民学校	2,990,006	21,957,861	2,868,073	14,418,652
男子中学	616,258	2,453,838	665,871	2,632,674
女子中学	345,430	1,539,860	369,074	1,725,589
大学高等学校	15,908	53,916	25,613	89,329

根据美国战略轰炸調查团的报告,"1941年全日本的粮食供应水平是:仅仅超过最低生活所必需的热量百分之六点四。"(正木千冬譯:《日本战爭經济的崩潰》)在这一时期,作为生产力担当者的自耕农、佃农和中农这个阶层开始分化,在他們中間,和政府开垦荒地的政策相反,放弃边际耕地的趋向逐漸增长了。日本农业就是在这种日益尖鋭化的生产关系的矛盾之中,以其脆弱的生产力担負着严重的粮食問題,而且受到国家强力統制的束縛,就在这种情况下,被投入了太平洋战爭这一前所未有的严重消耗时期。

耕地扩展及荒廢面积

(第22次农林統計)

	扩展面积(町)	荒废面积(町)	增减
昭和12年(1937)	38,130.3	23,874.5	14,255.8
昭和13年(1938)	32,345.9	46,977.6	−14.631.7
昭和14年(1939)	31,721.2	30.951.8	769.4
昭和15年(1940)	30,666.6	34,468.3	− 3.801.7
昭和16年(1941)	26,730.4	45,742.1	−19.011.7
昭和17年(1942)	28,834.4	57,808.4	−28.973.5
昭和18年(1943)	21,747.9	66,781.2	−45,033.3
昭和19年(1944)	16,014.6	94,572.2	78.557.6
昭和20年(1945)	28.164.7	101,457.2	−73,292.5

历年耕地表

（第22次农林統計）

	总数		水田		旱田	
	实数（町）	指数	实数（町）	指数	实数（町）	指数
昭和12年（1937）	6,098,453.3	100.00	3,217,928.6	100.00	2,880,506.7	100.00
昭和13年（1938）	6,078,282.5	99.67	3,208,254.3	99.70	2,870,082.2	99.64
昭和14年（1939）	6,079,246.6	99.69	3,209,298.0	99.73	2,869,948.6	99.63
昭和15年（1940）	6,077,502.5	99.66	3,206,575.6	99.65	2,870,926.9	99.67
昭和16年（1941）	5,860,679.0	96.10	3,172,184.5	98.58	2,688,494.5	93.33
昭和17年（1942）	5,812,392.8	95.31	3,163,863.8	98.32	2,648,529.0	91.95
昭和18年（1943）	5,717,856.4	93.76	3,121,659.8	97.01	2,596,196.6	90.13
昭和19年（1944）	5,513,897.2	90.41	3,059,963.5	95.09	2,453,933.7	85.19
昭和20年（1945）	5,287,874.0	86.71	2,964,487.7	92.12	2,323,3[illegible]6.3	80.66

“大东亚共荣圈”的实质

战时經济的矛盾必然地使对于殖民地的掠夺加剧和扩大，以“滿洲”、中国为核心，并包括南方各地区在內，所謂“确立自給自足体系”成了不可或缺的要求，这一点，已如前述。具有半封建因素的日本資本主义由于基础脆弱，为了維持战爭經济，不得不依靠不断地加强对于殖民地的統治，因而，就更加露骨地进行了掠夺和侵占。朝鮮和台灣的大米；朝鮮的电力、輕金属、鉄合金；“滿洲”的鉄矿砂、煤、大豆；华北的原煤、矾土、棉花、食盐；南洋的磷酸盐以及荷属东印度的石油、矾土；馬来亚的橡胶，以及这些广闊地区的丰富的劳动力，如果沒有这些，几乎不可能推行战时經济。

1940年11月5日，日本政府制定“日‘滿’华經济建設綱要”，确定了在产业、劳务、金融、貿易和交通等部門实行战时动員的方針。在殖民地和占領区也設立了实行“战时統制”的机构，进行“开

发”重要資源和发展軍需工业，但是这种軍需动員实际上已經碰到了許多障碍和达到了极限。就是說，对于这些殖民地的“开发”上所需要的資金必須由日本帝国主义自己来筹措，但是由于战争經济的进行而开始出現“破綻”的日本国內經济却无力負担。因此，来自日本国內的資金器材的供給計划不得不受到压縮，而从日軍統治地区以外的地区进口器材，也由于其他国家的对日禁运措施而陷于断絕，于是殖民地的軍事动員很快就遇到了困难。“滿洲”方面，由于受到日本金融市場紧迫的影响，不得不把1940年度的事业計划急忙加以縮小。同年年初制定的总額达二十六亿五千万日元的一百零五家主要公司的事业資金計划，尽管在通貨膨脹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仍然不得不縮减到十五亿日元。这是因为在同年內，日本的对“滿”投資縮减到十亿一千余万日元，比前一年縮减了九千三百万日元的原故。华北和华中也是一样，同年內日本通过购买“中国公債”及股票对华投資九千五百四十一万六千日元，不及前一年的一亿一千一百三十三万日元，这种“开发”事业的資金困难造成了事业計划的縮减。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这种脆弱性所产生的矛盾及其扩大，也表現为殖民地和占領区通貨膨脹的加剧。在民族資本的积累极为貧乏的“滿洲”，与这种資本积累不相适应的巨大的軍事負担和重工业的建設，都必需仰賴日本的資本輸出；一旦日本的資本輸出发生困难，那就只有采取增发紙币的办法来筹措資金了。由于不断增加的軍事开支和产业投資而迅速膨脹起来的“滿洲国”政府的財政預算，1940年度为：一般会計和特別会計岁出总額为十六亿四千万日元，将近1938年度的两倍。这一預算是靠增税和发行赤字公債来弥补的。因此，政府开支的超支額，1939年底为二亿二千二百万日元，到1940年底，增加到六亿二千四百万日元。同时，产业資金的筹措，也采取了增发紙币的办法，所以“滿洲中央銀行”对一般銀行貸款的递增額，也

从1939年底的二亿二百万日元增加一倍以上，达到了四亿六千三百万日元。这种民間信用(对民間的貸款)的膨脹，是通过增加向"满洲兴业銀行"的貸款来实现的。这样，"满洲中央銀行"的紙币发行額，到1940年底达到了九亿四千七百万日元，比1938年底增多了百分之一百一十。在仅仅两年間通貨膨脹就有了这样惊人的发展，这件事清楚地說明了殖民地"满洲"軍事和軍需工业的动員是依靠通貨膨脹的办法来进行的。这种情况由于重要物資和生活必需品的被掠夺运往日本国内而加倍地发展下去，招致了生活必需品的上漲，不言而喻，这就造成了向当地中国人民的无止境的掠夺。这样，也就进一步迫使中国工人紛紛逃亡和迁移，到了1940年下半年，中国工人的离"满"人数，从上半年的八万六千人一跃而激增到三十七万人。对此采取的措施是，建立依靠宪兵和警察武装力量来强迫施行的囚徒式的劳动制度。1941年9月，"满洲国"政府制定了"确立劳务新体制綱要"；10月22日又公布設立可以称为"产业报国会"的在"满洲"的翻版——"劳务兴国会"。这个組織是以雇用者为会員組成的，在这种对中国工人施行的"囚徒式劳动"和依靠通貨膨脹掠夺到的資本积累的基础上，"满洲"的重工业，尤其是鋼鉄、煤炭和輕工业等軍需产业发展起来，从而，經营殖民地的新兴財閥的財富也趋于集中了。满洲經济的这种投向軍事生产，使輕金属、鋁、鋅和鋼等一部分重要資材的生产有了增加，1940年和前一年对比，增产百分之二百到百分之三百；但是在另一方面，生鉄、鋼块、鋼材、煤炭、液体燃料和电力等重要資材的生产，却完全陷于迟滞的状态，远远达不到"动員計划"的指标。由于資金和資材的不足，这种殖民地的軍事动員已經暴露了明显的极限。例如，根据1937年制定的五年計划，原定在1940年生产一百万吨的鋼鉄，实际上只生产了二分之一左右的五十五万吨；原計划生产五百万吨的生鉄，则仅仅生产了一百四十万吨。

华北和华中的重要資源的軍需动員情况也与此相类似。从事“开发”这些占領区的重要資源的产业，統統交由政府投資一半的“国策公司”——“华北开发公司”、“华中振兴公司”以及日本資本和当地資本“合办”的企业組織。日本对“华北开发公司”的投資，到1940年底，总額达到二亿三千九百三十四万日元，仅1940年一年中的投資額就增加了一亿三千四百六十三万余日元。新設立了大同煤矿、华北电业、井陘煤矿、华北煤炭販卖和蒙疆矿产販卖等五家公司；同时，对于中兴、大汶口、磁县、焦作和山西等煤矿，以及石景山和山西两座炼鉄厂，則与日本国内的有关协会成立联合組織，进行共同經营，这样，“华北开发公司”通过經营二十一个公司和八个联合組織等下属企业，进行了“資源开发”的工作。“华中振兴公司”1940年的投資額为五千一百五十二万六千余日元，向十三个有关公司和联合組織等下属企业进行了投資。然而，为“开发华北”的投資中，百分之七十三投到运輸、通訊和港灣的建設上，对矿业的投資只占百分之九，对电力事业的投資只占百分之三。“华中振兴公司”的投資也几乎是集中到日軍破坏的各項事业的恢复工作和扩充对軍事行动起輔助作用的通訊及运輸設施上面，以及經营原有的事业和开发原有的資源，这些都不是把全部投資用于积极地“开发”重要資源，而是把大批資金投到为“开发”重要資源創造前提条件——恢复通訊和运輸机关方面。因此，不能期待对这些地区的“开发”工作，很快地就可以提供足够的重要資源，以弥补日軍在来自其他地区的供給已經断絕的条件下进行的龐大数量的战争消耗。事实上，成为日本鋼鉄工业原料的华北及“蒙疆”的原煤产量，1938年为一千万吨，而到1941年則增加到二千四百万吨，其供应日本的数量，至1941年也增加到四百一十二万吨，占日本煤炭进口額的百分之六十三点八；同时，华北供应日本鉄矿砂的数量，也占日本进口总額的百分之四十。但是，这些重要原料的提

供，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尤其是对于它的战争經济的庞大数量的軍事消耗来說，幷不是充足的。特别是"滿洲"、华北和华中，缺乏石油、矾土、錫、橡胶和鎳等战时經济所不可缺少的資源。因此，为了完成作为壟断資本追求最大限度利潤的手段，和作为推行战爭經济的基础的"大东亚共荣圈"，必須对南方各地区实行帝国主义的兼幷。日本帝国主义的爪牙們认为"在南方的权益对于今日的日本是有关死活的問題"（1941年2月27日外务次官大桥在众議院預算委員会上的答辯），帝国主义老爷們的这种主張，清楚地反映在下面的說明中。"我国（日本）1936年的石油产量，只达到全部需要量的百分之十，我們需要量的百分之九十依靠进口，其中百分之六十六来自美国。若将政府直接向美国购买的部分也計算在內，則从美国进口的进口額也可能超过百分之八十。可否考慮从'大东亚共荣圈'內各地进口，以代替来自美国的供应呢。荷属东印度在1937年和1939年分别生产了石油七百二十六万二千吨和七百九十四万九千吨，其中百分之九十运往宗主国荷兰以及美国和日本。日本如果采取适当的手段与之接洽成功，則每年輸入其产量的三分之一卽大約二百七十万吨，将是容易作到的。一旦'大东亚共荣圈'确立起来，就可以保証把荷印出产的全部石油运来日本。"（山田文雄：《統制經济》，1940年10月号）对于荷印的石油的这种要求，同时也表現为对于法属印度支那的錫的要求，以及对于馬来亚的橡胶、鉄矿砂和鎳的要求。这些物資都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战爭經济的基础，能否取得这些物資，将对于以后战爭經济的发展趋向起决定作用。日本甘冒同美英开战的危險而向南方进行扩張，可以說是壟断資本通过战爭經济、掠夺殖民地来追求最大限度利潤这一运动規律所产生的必然結果。

殖民地企业在日本总生产資本中所占的比重

产业别	年次	单位	日本国内	殖民地　半殖民地						总計	$\frac{A}{B}$
				朝鮮	台灣	樺太	“滿洲”	中国	計(A)	B	(%)
煤	1940	千吨	57,309	6,117	2,827	6,435	21,132	—	36,511	93,820	39.1
鉄矿砂	1940	千吨	1,042	1,258	—	—	3,367	—	4,625	5,667	81.6
生鉄	1940	千吨	3,512	246	1	—	1,069	—	1,316	4,825	27.3
鋼、鋼材	1940	千吨	4,522	76	—	—	404	—	480	5,002	9.6
紙浆	1941	千吨	754	47	48	408	78	—	581	1,335	43.5
水泥	1940	千吨	5,980	1,142	226	—	1,017	—	2,385	8,365	28.5
硫[illegible]	1941	千吨	1,240	448	—	—	137	—	585	1,825	32.1
紡織	1940	千吨	12,190	153	—	—	207	3,482	3,842	15,672	41.0
水力发电	1943	千瓩	5,605	1,241	267	—	605	—	2,158	7,763	27.8

（引自井上、宇佐美合著:《危机中的日本資本主义的結构》）

对殖民地农业的掠夺

由于日本国內对农业生产的不利条件的积累和对农产品需要量的增長，由于維持殖民地“治安”的必要和准备对美开战等原因，使日本把关于主要农产品的增产、配給統制等“长期的”政策推广到朝鮮、台灣以至于“滿洲”和华北。（关于日本占領“滿洲”以后，日軍后勤部特殊机关等所进行的最露骨的直接掠夺的情况，参看井上晴丸，宇佐美誠次郎合著:《危机中的日本資本主义的結构》）

1938年8月，在农林省的主持下召开了由“日本內外地、‘滿洲’、华北、华中、‘蒙疆’有关官員”参加的东亚农林协議会，就稻米問題等十四項問題进行了討論，并由农林省指令各地区实行对主要农产品的統制及其某种程度的增产。后来，由于1939年发生粮食危机，又迅速加强了对殖民地农业的动員措施，相继召开了

日"滿"农政研究会(1939年9月在长春第一次会議)、日"滿""华"經济协商会(1939年10月在日本企画院)和关于日"滿""华"粮食供求的会議(1939年底在企画院),决定了"日滿华"全区的粮食增产計划和供求調整措施。就这样,在旧的殖民地朝鮮和台灣,从1939年起实行了稻米增产計划,預定朝鮮增产一百二十万石,台灣增产五十万石;同时相继頒布实施"朝鮮米谷市場会社令"(1939年9月)、"米谷配給調整令"(1939年12月)和"台灣米外运管理法"(1939年5月)等法令对米粮的流通开始了統制。在"滿洲",从經过修改了的五年計划实行期中的1939年6月就实行了"米谷管理法",同年10月公布实行了規定对大豆进行专卖管理的"重要特产品专管法",同年11月公布实行了限制高粱、谷子和玉米向第三国出口及加强其收购、配售机构的"主要粮谷統制法",12月公布实行了"小麦粉及制粉业統制法";到1940年春又进一步制定实施了"十年增产計划"。而在华北,也从1939年春开始实行以棉花为中心的增产計划,同年四月,又把收购机构統一起来設立了"华北棉产协会"。在对农产品的統购及流通統制工作中占主要地位的是"东洋拓殖"、"滿洲拓殖"等臭名昭著的殖民地公司,"朝鮮米谷市場"、"滿洲粮谷"和"軍粮城精谷"等新設的特殊公司,以及"滿洲"、华北和华中的合作社、"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等壟断資本的分支机构。这些机构以其灭絕人性的掠夺手段和規模的庞大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性;但是它們甚至要排除当地資本而实行直接掠夺的貪婪作法,不断受到当地資本沉重的还击,其結果,反而导致了自己統制政策的失敗。

这种情况,在原有的商业高利貸資本拥有土地和深入而牢固地生根在地方产业中,形成独特的地方經济单位的"滿洲",表現得最为突出,对于"日滿华粮食供求計划"給予了极大的威胁。最初的反击表現为1939年年底各种統制法公布以后,大豆、高粱、小米和

玉米等被統制农产品統购量的銳减，日本企图利用"南滿鉄路"掌握农产品的政策，也由于当地資本采取利用大車从生产地直接运往消費地，或以接力方式越过长城运往华北的作法而遭到彻底的失敗。(横山敏男:《滿洲国农业政策》)同时，利用农事合作社(后改称兴农合作社)企图直接掌握农产品交易市場而排斥"粮棧"势力的政策，以及利用"定錢制"，通过預付农业生产資金等方式企图直接掌握农民的政策，也都因为受到强烈反抗而始終沒有成功。根据各种統制法而发出的指令，其通行范圍只能通过省而到达县城，这一点也是殖民統治的必然結果。

自耕农佃农戶数

<table>
<tr><th colspan="2"></th><th>地　主</th><th>自耕农</th><th>自耕佃农</th><th>佃　农</th></tr>
<tr><td colspan="2">朝　鮮</td><td>3.7%</td><td>17.8%</td><td>23.8%</td><td>52.3%</td></tr>
<tr><td colspan="2">台　灣</td><td colspan="2">33.0%</td><td>31.0%</td><td>36.0%</td></tr>
<tr><td rowspan="3">东三省</td><td>北部</td><td>14.7</td><td>52.3%</td><td>8.9%</td><td>24.1%</td></tr>
<tr><td>中部</td><td>19.3</td><td>39.0%</td><td>13.1%</td><td>28.6%</td></tr>
<tr><td>南部</td><td>11.8</td><td>58.7%</td><td>19.8%</td><td>9.7%</td></tr>
<tr><td rowspan="3">中　国</td><td>北部</td><td colspan="2">64.0%</td><td>21.0%</td><td>15.0%</td></tr>
<tr><td>中部</td><td colspan="2">31.0%</td><td>26.0%</td><td>43.0%</td></tr>
<tr><td>南部</td><td colspan="2">27.0%</td><td>30.0%</td><td>43.0%</td></tr>
</table>

朝鮮的情况根据《朝鮮經济年报》1941年和1942年版(1939年調查)。台灣的情况根据《台灣經济年报》1941年版(1939年調查)。

东三省的情况是根据日"滿"农政研究会編:《滿洲农业要覽》1940年版編制(調查年份:"北滿"为1934年,"中滿"为1935年,"南滿"为1936年)。中国的情况引自威尔曼斯:《中国农业經济論》。

拥有土地状况（东三省）

	南部		中部		北部		
	戶数	拥有面积	戶数	拥有面积	拥有土地面积别	戶数	拥有面积
大土地所有者	4.2%	40.4%	0.2%	3.0%	100 晌以上	2.9%	50.0%
中土地所有者	14.7%	35.8%	16.7%	65.8%	50 晌以上	3.1%	16.6%
小土地所有者	15.4%	13.7%	17.5%	22.6%	20 晌以上	8.1%	21.3%
零碎土地所有者	33.0%	9.7%	16.7%	6.3%	5 晌以上	10.5%	10.0%
无地者	32.5%	—	48.7%	2.3%	5 晌以下	12.5%	2.1%
					无地者	63.2%	—

（据近藤康男：《满洲农业經济論》）

拥有耕地状况（中国）

	戶数	拥有耕地面积
5 亩以下	35.61%	6.21%
5——9.9 亩	23.99%	11.42%
10——14.9 亩	13.17%	10.63%
15——19.9 亩	7.99%	9.17%
20——29.9 亩	8.22%	13.17%
30——49.9 亩	6.20%	15.54%
50——69.9 亩	2.17%	8.38%
70——99.9 亩	1.31%	7.16%
100——149.9 亩	0.72%	5.71%
150——199.9 亩	0.24%	2.76%
200——299.9 亩	0.20%	3.17%
300——499.9 亩	0.11%	2.63%
500——999.9 亩	0.05%	2.30%
1000 亩以上	0.02%	1.75%
合計	100.00%	100.00%

（民国38年8月全国經济委員会調查，引自田边胜正：《中国的农业經济》）

东三省主要农产品产量

	大豆	其他豆类	高粱	小米	玉米	小麦	米	其他杂粮
1932	4,267.8	277.6	3,729.3	2,615.3	1,541.8	1,133.0	247.1	1,550.3
1933	4,610.0	304.2	4,021.8	3,184.4	1,758.8	863.4	309.1	1,803.6
1934	3,398.3	277.4	3,469.5	2,123.4	1,502.5	643.1	325.9	1,046.0
1935	3,859.0	326.5	4,103.4	2,967.7	1,902.6	1,015.4	443.3	1,106.3
1936	4,147.2	430.7	4,240.7	3,187.3	2,072.0	959.0	597.6	1,093.1
1937	4,352.4	326.7	4,314.6	3,226.1	2,239.6	1,125.9	689.3	1,069.4
1938	4,624.9	365.3	4,803.0	3,726.5	2,602.5	904.1	723.0	1,410.9
1939	3,955.9	343.5	4,618.7	3,526.5	2,463.6	949.0	790.9	1,294.1
1940	3,799.2	377.5	4,739.3	3,897.5	3,070.7	870.6	647.6	1,370.0

（引自东亚經济悬談会:《东亚經济要覽》,单位　千吨）

东三省主要农产品出口量

	大豆	其他豆类	高粱	玉米	小米	其他杂粮	豆餅	豆油
1932	2,572.5	96.8	374.1	70.3	231.3	38.0	1,422.3	125.6
1933	2,365.4	92.5	155.1	71.3	169.5	35.2	1,075.8	78.7
1934	2,493.3	130.7	201.5	124.3	242.2	53.4	1,232.5	95.1
1935	1,766.2	160.1	71.7	33.2	105.3	28.8	1,023.6	89.4
1936	1,968.0	143.2	186.0	118.7	160.9	30.4	848.3	67.1
1937	1,974.2	112.6	126.9	111.9	127.3	32.9	803.4	70.2
1938	2,164.8	139.3	216.1	222.3	163.3	27.3	869.2	57.2
1939	1,711.8	164.0	223.2	263.3	215.6	14.3	1,219.8	72.5
1940	451.2	73.3	37.6	44.1	43.9	—	400.3	18.3

（引自日"满"农政研究会:《满洲农业要覽》，1940年12月版.单位:千吨，年度为历年度，但1940年則截至3月为止。）

朝鮮米、台灣米的产量和出境(口)量

五年平均	朝鮮米		台灣米	
	产量	出境(口)量	产量	出境(口)量
1912—1916	12,302	1,389	4,643	0,808
1917—1921	14,101	2,443	4,841	968
1922—1926	14,501	4,376	5,809	1,700
1927—1931	15,799	6,617	7,005	2,433
1932—1936	17,003	8,735	9,016	4,378
1937	26,799		9,233	4,842
1938	24,138		9,816	4,877
1939	14,355	5,991	9,151	4,106
1940	21,527		7,901	2,956
1941	19,413		8,393	1,993
1942	24,886	5,775	8,198	1,927
1943	15,688	—	—	1,840

（朝鮮的情况是根据井上晴丸：《朝鮮米外运量的基础研究》編制的；
台灣的情况是根据松野孝：《日台粮食史》編制的；单位：千吨）

农产品的各种增产計划，未曾开始就存在着重大障碍。这种障碍就是，帝国主义侵略者一向有意識地加以保存下来的极其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分散經营方式，以及寄生在这上面的当地商业高利貸资本。（台灣的"土垄間"和东三省的"粮棧"就是典型，他們通过掌握谷物的流通过程和加工过程〔輾米、制粉、榨油和制酒等〕和放高利貸，剝削奴役农民。朝鮮的"舍音"本来是住在城市的地主的管事人，但是通过收取租粮和从中勒索剋扣，逐漸具备了同样性质。）这些障碍，把农业技术和生产力死死地压在极低的水平上，同时，遇有天气不佳，便很容易造成歉收，往往使增产計划成为泡影。造成"粮食問題"直接原因的朝鮮严重歉收（1939年），可以說是这种矛盾的集中表現。由于历来政策不重視增加生产力，而主要通过地主机构进行掠夺，加上农

民又极度貧困(百分之五十的农民都是所謂“春穷”农民)，致使水利設施得不到彻底整修，这就必然要引起旱灾。专靠雨水灌溉的水田和水利設施不完备的水田，到 1935 年，达到了全部水田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五。(《朝鮮經济年报》，1940 年版)在这种情况下，以增产一百二十万石为目标的 1935 年度产米計划，竟然以减产一千万石的“成績”而告終了。

在新殖民地的“滿洲”，还存在不同的情况。在这里，在高达收获量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六十的实物地租和殖民地統治的双重重压之下不断趋于下降的土地生产力，一向是依靠大豆、高粱和谷子的輪种制来勉强維持的。由于增产計划所規定的强制种植和价格統制所造成的种植上的混乱，首先对这种再生产的方式給予了打击，再加上所謂“滿洲通貨膨脹”所引起的剪刀差的扩大和农业資材的缺乏，进一步加重了对农业生产力的破坏。同时，由于各种統制法令的施行，严重地抑制了当地資本作为商业資本的活动，并堵塞了它轉化为工业資本的道路，因而加强了土地集中的趋向，結果加重了对农民的压迫。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拚命推行增产政策，但农业生产力低落和自然經济化的趋向却是无法掩盖的。

所有新旧殖民地的这种情况，加上工业化的进展所引起的当地需要量的增加，不可避免地使农产品运往日本的数量有了减少，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就已經破坏了它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

第三节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到处碰壁

天皇制法西斯統治体系的矛盾和日本垄断資本主义战争經济的矛盾，产生了爆发太平洋战争的必然性。而为了挽救天皇制法西斯和垄断資本的危机而加强和扩大对外侵略所引起的矛盾的尖銳

化，也使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下面将分析太平洋战争前夕的中国局势，以便說明日本帝国主义在这方面的危机的实质。

国民党政府的动搖

汪精卫脫离重庆(1938年12月)以后，日本一方面对汪的"和平运动"进行帮助和推动，一方面直接向国民党內的投降派进行工作，企图分裂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建立汪蔣合作的亲日政权，以便消灭抗日力量，特別是中国共产党，来达到統治全中国的目的。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这种梦想似乎也存在着实現的可能性。

从七·七事变(芦沟桥事件)到武汉三鎮陷落这段时間內，国民党軍队的主力受到了严重打击。虽然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使这个損耗很快就得到了补充，但是，到1940年为止，即使作最低的估計，这种損失也相当于最初战斗部队的百分之一百即二百万軍队。并且，由于天津、北京、上海、武汉等地的失陷，中国的工业丧失了百分之九十。

国民党政府发表的正規軍的損失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三鎮陷落期間，但不包括被俘虏和失踪者)

年次	死亡	負伤	計
1937	124,130	243,232	267,362
1938	249,613	485,804	735,417
1939	169,652	176,891	346,543
1940	339,530	333,838	673.368
合計	882,925	1,239,765	2,122.690

国民党政府发表的同上期間日軍的損失

（«中国手册» 1937—1945 年，第 300 頁）

年 次	死 亡	負 傷	被 俘	計
1937	85,350	170,750	1,480	257,580
1938	148,134	296,756	2,859	447,749
1939	136,245	273,550	5,920	415,715
1940	114,426	229,191	3,070	346,687
合 計	484,155	970,247	13,329	1,467,731

迁移到重庆以后，国民党政府以恢复抗战力量为目的，加强了經济統制。但其結果，只是实現了官僚垄断資本的集中和加强，并通过这种集中和加强，养肥了国民党統治集团的四大家族（蔣、宋、孔、陈），中小企业家和农民始終受到压迫，阻碍了通过占中国工业絕大部分的中小企业的发展来实現抗战潜力的发揚。（参看本书第 2 卷，第 4 章，第 1 节）1938 年 3 月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議，內称"为适当調节产业活动，必須統制銀行业务"和"禁止奸商的垄断、投机，实施价格統制"。但是抗战期間重庆市銀行（不論国营或民营，完全掌握在四大家族及其他国民党要人手里）投資的情况是：非生产性的商业投資对农矿工业的投資占压倒优势。商业投資和农矿工业投資的比例是：1939 年为百分之八十九比百分之零点一，1940 年为百分之九十六比百分之三，1941 年为百分之八十九比百分之七，这說明，国民党統治集团本身就是在明目張胆地違背上述决議，瘋狂地进行投机和垄断。并且这一时期，在"自由中国"（国民党統治区），土地投机之风盛行，例如在政府的所在地四川省，据說往往"一块土地在一个月之中要更换八个主人"。（«新华日报» 1942 年 2 月 2 日）因此，在这个地方，农民失去土地和土地向地主、尤其是国民党要人手里集中，成

了一般的現象,“以四川为例:在1937年到1941年五年中,該省地主的地产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九至百分之七十,……和这种土地集中加速的过程相反映的,是地租数目的大大加多。”(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同时,成为国民党政府主要財源的土地稅,在四川省,竟高达平均土地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九点五,再加上将軍們以“抗战”为名肆意进行的征发,必然地破坏了农民的生活。所以,即使在完全免于战火的“自由中国”,农业生产在1941年以后也降低到战前水平以下。(«中国手册»1937年—1945年),重庆政府,就是这样以牺牲农民为条件,換取外援,作为进行抗战的凭借。例如,国民党政府貿易委員会,为了增加出口,获得外汇,以便增强軍事力量,强行征购各种出口物資,后来,还对食盐、糖、燃料及其他多种物資实行了专卖制度。其中,秋茧的一般价格和政府征购价格的每吨差額,1938年为三百元,1939年为一千五百八十元,1940年为二千零五十元,茶叶和棉布等的征购价格也低于成本。在这样牺牲农民及其他生产者的基础上,工业部門依靠外国、特别是美国的經济和技术援助,得到了若干恢复。如以1938年的工业产量指数为一百,1939年为一百三十,1940年达到了一百八十六。(«中国手册»)但是,由于人民群众的生活每况愈下,群众对于抗战的积极性受到挫伤,因此,国民党政府就不得不更加依靠外国了。

然而,国民党的首脑們賴以賡續活命的外国援助,前途也并不乐观。英国慌于德国的迅速进攻,在亚洲一味对日退让,1939年7月,根据有田—克莱琪协定发表了“承认在中国发生的事态”的声明,并“贊成中日两国間达成某种和解”。(赫伯特·費思;«太平洋战争前史»上卷)(参照本书第2卷,第5章,第1节)这簡直是从側面援助日本的“和平”工作。次年7月,英国更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同意对滇緬公路实行有限期的封鎖。在当时,通过滇緬公路,每月平均用汽車运輸物資一千吨,用牲畜馱运九千吨,1939

年运輸物資的价額，达到三千一百零九万二千三百三十八卢布。同年9月，日本趁着法国对德投降的机会侵入法領印度支那，封鎖了滇越公路。在沿海各港口失陷以后，中国的軍需品及工业上的必需品的百分之九十八是通过滇緬公路、滇越公路及滇印公路輸入的，所以以上两条公路的被封鎖，給重庆政府抗战力量带来的影响，决不是微小的。同时，蔣介石的最大靠山美国統治阶級，害怕由于日本对华侵略的扩大，将使其在华权益遭到損失，从而加深了和日本的对立。因此，在1940年7月，美国宣布廢除日美通商条約，接着在9月間又宣布禁止廢鉄对日輸出，并积极地对重庆提供援助貸款。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依然打算保持日本成为"在亚洲对付共产主义的有效堡垒"(費思:《太平洋战爭前史》上卷)，也就是期待日本进攻苏联以及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美国的这种期待，露骨地表現在1941年春季举行的野村—赫尔会談上面。当时，美国想要承认"滿洲国"和日本在华駐軍，并强使重庆政府对日妥协。这就是說，美国避免实行"可能引起日美冲突的制裁"(費思:《太平洋战爭前史》上卷)，并在条約廢除后，除了扩大对航空武器的禁运适用范圍以外，保留了和条約失效以前大致相同的对日貿易。1939到1940年，美国对日石油和廢鉄的出口額創造了新記录，1940年的对日出口总額达到了二亿零六十三万八千美元。这个数字超过了1937到1941年期間美国对华貸款的一亿七千万美元。在这种內外两方面的困难形势下，重庆政府內部的和平論即投降論不可避免地抬头了。日本駐南京大使館情报部的报告也提到，1940年7月滇緬公路被封鎖时重庆政府內部主和气氛趋于濃厚；在同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五届七中全会上就和战問題进行了热烈的討論。国民党的这种动搖，表現为从1939年底到1940年秋国民党軍队对华北和华中的解放区(边区)发动的武装进攻，重庆政府对反共限共政策的加强和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危机。但是，日

本帝国主义并沒有能够成功地利用这次抗日統一战綫的危机。蔣介石虽然不肯积极抗战，而不断加强其反共限共政策，然而，仍然表示要继續抗战。日本在拉攏蔣介石工作上所以失敗的原因有：日本的要求过高(参看附录：«日汪基本关系条約»)；日本和美英未能充分达成妥协，未能打动由亲美派所操纵的整个国民党；苏联对华援助的加强；从同年10月起，滇緬公路的再次开放等等。但是，使蔣介石不敢脫离抗日陣营的决定性原因是，以中共为主体的抗日力量坚强的发展。武汉失陷以后，蔣介石把嫡系軍队撤到四川、云南和貴州等大后方，避免和日軍交战，专門进行整編和加强。他的政策是："經常利用共軍和杂牌軍（地方軍閥)充当抗日的先鋒，借以打击日軍，同时也解决他們(削弱他們的实力)，并保存自己的实力。"(«重庆近况»)

避免內战的危机

这样一来，八路軍(华北)、新四軍(华中)及其他中共部队便逐漸代替国民党軍掌握了抗日战爭的領导权。在华北地区，到1938年年底，日軍消灭了几乎所有的国民党系正規軍。国民党軍的主力有的退到黄河以南，有的孤立在日軍的后方，其中大多数后来都被伪軍吸收了。此后在这个地区从事抗日的主要是，1937年9月在朱德总司令指揮之下从山西省黄土地带以西跨过黄河，逐漸深入到日軍占領区后方的第一一五师(向山西、察哈尔和河北三省交界挺进)、第一二〇师(向山西省北部挺进）和第一二九师(向山西南部进軍）等三万八路軍。他們为了抗击十万日軍，避免主力部队的大規模作战，把兵力分散开来，广泛地联系在各地由工人、农民、学生和自由主义者成立的各种分散的抗日組織，把它們培养成为强有力的游击队，对分散在广大地区的日本駐軍及其漫长的补給綫，展开了不断的襲击。起初，日本陆軍藐視了这种游击战。根据

日軍战术的常識，不能設想处在敌人后方連补給基地都沒有的小小游击队会成长壮大起来。在和蔣介石进行的多年战爭中受到鍛练的八路軍，利用日軍的这种藐視，运用巧妙的战术，同人民紧密結合和动員群众，成功地在各地建立了根据地，并以此为基点不断地发展起来。1939 年以后，共軍运用游击战术連續粉碎了日軍山下奉文和桑木师团长所制定的"封鎖"、"分割"、"扫蕩"三者并用的战术，在华北、华中建立了許多解放区。到 1940 年秋季，八路軍由几万人发展到四十万，解放人口近四千万。新四軍由一万二千人发展至十万，解放人口一千三百万。（朱德：«論解放区战場»，1945 年 4 月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軍事报告）共軍掌握的地区（边区和解放区）的总人口达到四千余万人①，在与伪政权华北政务委員会統治下的三百三十九县相匹敌的三百三十四县中，經过人民普选建立了县政府。因此，在这个时期，日軍被压縮在从北到南貫穿华北的三条鉄路和从东到西的一条鉄路所构成的丁字形沿綫的各个城市之中了。在 1940 年 8 月开始的所謂百团大战中，八路軍动員了一百十五个团四十万兵力从五十个地点一齐展开了攻势。这次战斗历时約三个半月，其結果，日軍死伤了約計二万，伪軍死伤約五千，被俘人数分別为二百八十名和一万八千名；正太鉄路（石家庄至太原）和平汉鉄路的一千里綫路和公路三千里遭到了破坏。八路軍方面也死伤了二万二千名，这是中日战爭开始以来最大的一次激战，給予了日本軍队以沉重的打击。1941 年 1 月，东条陆相在貴众两院作了如下的发言："昭和十五年（1940年）重庆方面敌人抗战的特色是作战非常消极，一直到現在，沒有作主力反攻。只有'共匪'去年 8 月在华北地区向我展开了大規模的攻击。与此相反，蔣介石的嫡系和旁系軍队总是采取守势。"这样，一

① 原文中以上各项数字略有出入，根据有关文件作了修改。——譯者

貫輕視八路軍的日軍，由于这次大战也“开始知道八路軍的厉害了”。(«华北中共軍現状»)次年，日本駐华北軍最高司令官多田駿被撤职，由岡村宁次接替，从此，日軍把主力投入了对八路軍的作战。在华中，以长征时期留在江西和福建继續和国民党作战的項英麾下的五千名共軍官兵为核心，加上由各淪陷区前来参加的工人、学生以及携带着生銹的长枪、斧头和手榴弹的旧农民自卫队員等所組成的一万五千名新四軍，成了抗日的主力。汉口失陷以后，国民党軍队从华中地区的大部分地区撤退；日軍占領了主要城市、公路和鉄路，在各地建立起地主阶級的亲日地方政权，借以保持占領区。华中地区是帝国主义权益所集中的一个中心地区，同时也是四大家族势力最强大的地盘。因此，即便在国共合作实現以后，蔣介石仍然害怕中共势力进入这个地区，而一直沒有停止过对它的压迫。但是，由于日軍的迅速进攻和国民党軍的潰敗，到 1938 年 4 月，蔣介石为了“以毒攻毒”才把旧中共軍改編为新四軍幷允許他們在长江南北被限定的地区以內进行游击战。从那时起，他們运用小規模的、但是不間断的游击战，經常威脅分散在各地的日本駐軍及其补給綫。根据爱德加·斯諾的«亚洲的解放»，新四軍“无論在哪一周和哪一天，每天都平均杀伤三十名日本兵”。因此，在新四軍进入这一地区以前，日軍用三个团兵力就統治了这个地区，但是到了 1940 年，就不得不把駐軍增加到三个师了。而且到同年年底，新四軍在江苏和安徽两省，还收复了相当于这两省的三分之一、約有一千三百万人口的地区，兵力扩大到了十万人。因此，当时即使在南京近郊，日本軍民如果沒有警卫队的森严保护，也是寸步难行，仅南京一地，就需要七千名警卫部队。这就是說，日軍沒有能够把它在战争第一阶段中所获得的軍事胜利，在政治和經济上加以巩固，它向中国內地的进攻被阻止了。

由于以八路軍、新四軍为中心的抗日力量的这种发展，在另一

方面也加深了企图全面統治中国的国民党統治阶层的恐惧，国民党內亲日派則积极进行阴謀活动，企图和日本勾結起来，变抗战为反共的內战。特别是在华中地区新四軍的发展，更使得蔣介石胆战心惊。随着新四軍的不断发展，蔣介石逐漸削減以至停止对新四軍的补給，限制了新四軍的募兵区域，甚至对于展开游击战所不可缺少的(为了获得人民的支持的)政治改革和經济改革，也进行妨害。每当新四軍收复了一个县城，国民党立即恢复其原来的通过党部和行政机构实行的一党专政，妨碍成立經过普选产生的人民委員会和人民政权，并压制減租运动。面对蔣介石集团的这种压迫，項英等一部分新四軍領导者，担心国共分裂，不便放手发动群众和扩大解放区。乘着这个机会，国民党軍在李宗仁等的指揮下，从1940年春季起，在安徽省屡次对新四軍举行大規模的武装进攻。到1940年10月，重庆軍事委員会，借口新四軍不听命令，企图在宁、沪、杭三角地带(当时在日軍占領下)建立根据地，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全部开往黄河以北。当安徽省南部的新四軍九千余人依照命令开始向該省北部移动时，国民党政府的何应欽竟然誣蔑这支队伍举行"叛乱"，而在1941年1月出动大軍进行了襲击。这就是所謂"新四軍事件"(皖南事变)，在这次事变中，新四軍軍长叶挺被俘，副軍长項英以下几乎全部牺牲。于是，从反共斗爭发展为反共內战的危险达到了頂点。这种把局部的內战扩大为全国性的內战，正是符合于日本"和平"工作的最終目的。当时，日軍提出"完成安徽省南部討共"的口号，大举进攻宣城和金坛附近的新四軍；而汪精卫也在南京举行庆祝大会，对蔣介石的"討"共加以贊揚。这一事件发生后，中共方面揭发了为制造这次事件，日軍間諜曾經在暗地里直接进行了策动(《毛澤东选集》)，《木戶日記》1941年6月28日的如下記述，可以說在某种程度上証实了这一揭发，日記写道"东条陆相参見天皇以后来室，就下列各点进行了

說明……。一、对閻錫山工作，对李宗仁、白崇禧工作后来的情况”，当时，閻在华北，李、白在华中已經开始了反共攻势。但是日本的这种企图并未完全得逞，中国內战扩大的危險終于克服了。因为八路軍、新四軍的英勇抗战及其发展，鼓舞了在抗战初期受到挫折的中国人民的信心和勇气，这时已經把他們的意志集中到抗日上来了。所以，新四軍事件一发生，全国各地就掀起了譴責国民党政府的浪潮，国民党內的宋庆龄、何香凝和彭澤民等也向蔣介石提出了书面抗議；自由知識分子和实业家組織“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来的民主同盟），严厉地批判了国民党的領导人。在这种情况下，蔣介石如果继續举行反共攻势，放弃抗日，他势必愈益陷于孤立，因此，在这个事件后的一个时期反共攻势有所緩和，蔣介石对日屈服、发动全面內战的危險完全被阻止了。

日軍占領区的經济危机

如上所述，迅速解决中日战爭的希望已經破灭，日本不得不長期地把庞大的物力和人力資源投入战爭，必須确立新的战爭体制。在欧洲德軍的閃电式进攻和英法的敗退，决定了日本的新政策的方向。如上所述，第二次近卫內閣制定的“基本国策綱要”和“适当世界形势演变处理时局綱要”，确定了南进政策和相应的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針（参看本章第1节），在那以后，就力图掌握中国作为南进的軍事和經济基地。为此，日本必須一方面在軍事上对于已經发展成为抗日力量核心的八路軍、新四軍加以集中攻击，另一方面，还必須采取政治措施，来緩和一般中国人对于日本侵略中国大陆的强烈憎恨，并使其支持日本南进即向英美帝国主义的挑战。

1940年11月，日本承认伪南京政府和发表“日‘滿’‘华’共同宣言”（11月30日签字），就是这个企图的具体表现。这个宣言表

明:“根据在东亚建立基于道义的新秩序这一共同理想，(三国)作为善邻互相密切合作，以形成东亚持久和平的軸心”，为此目的，“实行基于互相尊重主权、領土和互惠精神的全面合作，特别是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經济合作。”作为“大东亚共荣圈”的理想被大肆宣傳，并企图为日本的战争目的提供理論根据的这一“宣言”的眞正意图，无非是要用譴責英美帝国主义的恣态来掩飾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和南方各地区的侵略，而把亚洲各民族驅入这一侵略战爭的火坑。在决定承认伪南京政府的11月3日举行的御前会議上，近卫首相吐露了眞情，他說:“必須采取措施大力培养南京政府的政治力量，使其协助我方解决‘事变’，以彻底达成‘事变’的目的”。因此，和“日‘滿’‘华’共同宣言”同时签訂的“日‘华’基本条約”規定，伪南京政府承认“滿洲国”，承认日本有权在“蒙疆”及华北三省駐兵，在海南島及华南沿海指定地点停泊艦队，以及在以上地区开发和利用軍事資源等等，这就完全違背了共同宣言中的“尊重領土主权”，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要把中国作为南进基地半永久地加以掌握和統治的意图，反而招致了中国人民愈益强烈的憤慨。另外，日本为了配合南进而签訂了三国軍事同盟和承认伪南京政府，也使日本和英美的矛盾更加尖銳化，从而，对蔣介石集团进行工作就更为困难，总的說来，此后重庆政府內部的投降派、亲日派的势力削弱了。这就是說，由于采取了以南进为目标的新政策，日本反而面临南进的前提——迅速解决中日战爭变得更为困难这样一种窘境。这样一来，日本就把主力集中到通过加强南京傀儡政权来掌握占領区，开发和掠夺資源；为了削弱国民党統治区和解放区抗战力量而实行經济封鎖；并在兴亚院的管轄下設立各种統制公司；为了有效地掠夺軍事資源，加强对占領区的經济統制。但是，由于日本和伪南京政府的統治地区只有消費性很强的大城市及其周圍，由于日本对中国实行了近于掠夺的低价强制收

购和高价出售的所謂“統制”，使占領区的生产迅速下降，淪陷区的重要物資越过严密的封鎖綫流入国民党統治区和解放区，日本要在內地购买粮食和原料反而受到层层封鎖綫妨碍的現象日益显著，这就加剧了占領区的經济危机。因此，就連伪南京政府特使褚民誼在1943年6月会見东条首相时也不得不說：“条約的規定被无視，統一受到阻碍，无益的压迫和剝削仍然存在，这并不是同甘共苦，而是使中国方面独自受苦。”同年9月間，陈公博、周佛海也分别向平沼、有田两特使訴苦說：“上海的經济将在一年內破产！”“据估計，不出半年，經济就要总崩潰了。”和日本及伪南京政府的这种政治失敗相反，以中共为中心的抗日力量，通过抗日，不断地发展壮大，积极准备举行反攻。

八路軍和解放区的壮大

确定了南进政策以后，日軍为了全面把持因八路軍的进展而遭受威胁的华北地区，把大軍集中到华北，用主力开始了大規模的“扫蕩战”。从1940年起，日本的华北派遣軍最高司令官岡村宁次，为迫使中国民众放弃抵抗意志，彻底摧毁八路軍存在的基础，采用了多种殘暴的新战术。这就是所謂“鉄环包圍”、“监獄战术”、“竹篦清扫”、“馬蹄形包抄綫”和“魚鱗形包圍陣”等新战术，关于这些的特点，美国記者杰克·貝耳登曾經作了如下的描述：

“监獄战术是这样一种战术：日軍把中国軍队追逐到狹小的地区以后，把队伍編成十字队形，随心所欲地打进去，然后把陷入包圍圈中的中国軍队加以杀光。日軍把城市当作这种战术上的监獄的鑰匙，沿着鉄路和公路，挖掘寬二十英尺，深度和战壕相等的联絡沟，在准备进攻的地区的周圍，横穿公路和农田筑起土墻。这种土墻延伸得既长，为数又多。据估計，这些土墻如果联接起来，可以圍繞地球一周半。如果有人认为这話是夸大，我可以根据亲

眼看到的情况提出証据。我在穿过平原时，亲眼看到了許許多多碉堡、濠沟和土墙，就在这中間，中国能够存在，这眞是不可想象的事。日軍筑起土墙以后，接着就沿鉄路綫修筑公路，并沿着所有公路修筑碉堡。然后，他們象切豆腐一样把这座监獄完全切成碎块，最后使中国軍队丧失可以行动的十英尺見方的地段。”（杰克·貝尔登：«中国震撼着世界»上册）

日軍为实行这种战术而使用的兵力，1941 年到 1942 年期間，等于前二年的二倍，达八十三万四千人，用一千人以上的兵力进攻的次数，将近以前两年間的二倍，共达一百七十四次，往往一次就动員将近十万大軍，一次进攻持續三、四个月。并且在进行这种扫蕩战的同时，在“加强治安运动”的口号之下，把华北分为三类地区，即“治安区”（日軍占领区）、“准治安区”（双方争夺的游击区）和“非治安区”（八路軍所掌握的解放区）。在第一类地区，日軍以地主和富农为支柱組織維持会，加强鎮压反日因素的特务政策，同时对中小学生施行日本語教育，通过“建設大东亚新秩序”的思想宣傳推行“良民化”工作。对于“准治安区”，日軍采取了高压和怀柔相結合的手段，主要是通过迫使人民提供劳役和粮食，来考驗居民是否“忠誠”，并且常常强迫居民迁往治安区，把这一地区变成无人区，使游击队无法活动。对于“非治安区”（解放区），日軍在进行扫蕩战时不仅执行慘无人道的燒光、杀光、搶光的所謂三光政策，甚至还使用毒瓦斯和細菌，来企图摧毁中国居民的抗战意志。日本軍队这样加强对共軍的进攻，起初是收到了很大效果。特别是从 1941 年到 1942 年期間，华北全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和饥饉，仅在河南一省，就餓死了二百万至三百万人，八路軍和农民都“不得不吃树叶草根，继續战斗”（朱德：«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軍事报告»），困难是加重了。加上德国侵苏战争的爆发和接踵而来的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以及战争初期德日軍队的快速进攻，使重庆政府

內部又一次“对抗战前途的悲观情緒增长起来”（«重庆近况»），蔣介石只顾保存自己的中央軍，不給中共以任何軍事上和經济上的支援，反而加强了对解放区的包圍和封鎖。在这期間，国民党軍相继丢失了紹兴、宁波、奉化、福州、衢州和溫州等要冲，到 1941 年 7 月，把浙江江西两省之間的整个战綫交給了日軍，高級将領率領的大批軍队投降日軍，結果加强了汪精卫的伪軍。于是，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中共部队，不得不抗击这个时期在华日軍总数三十六个师半，共一百十六万八千人的百分之六十和伪軍的百分之九十，面临抗战史上的“最大困难”，到 1942 年年底“解放区人口縮小至五千万以下，八路軍減員至三十万。”（朱德：同上报告）但是在这期間，八路軍依靠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即軍民打成一片，战胜了困难。在“好共产党員就是好生产者”的口号下，广泛地开展了“生产自給运动”，用精兵主义来弥补軍队数量的縮小，提高了軍队的质量；开展了“精兵簡政运动”簡化了行政机构，提高了工作效率，为減輕人民負担而进行了斗爭。例如：国民党山西省政府財政厅的职員有二百五十人，而晋冀魯豫边区（包括山西、河北、山东和河南的华北最大边区）的財政厅却只有十六个职員。他們騎着騾子背着行李走遍农村，他們的待遇，在这期間，不論党員或士兵一律降低了一半，每天只領二十五盎司粮食和三仙半的副食費，每月只領三仙的津貼，据說“干部吃的东西比最穷的农民还要坏”（貝尔登的前书）。在減輕人民負担的同时，还开展了一系列运动，諸如：通过組織群众，搞互助运动来发展农业生产，由暫时离开軍队和政府机关的士兵和干部所領导的大規模的灭蝗运动，以及引河掘井抗旱救灾运动，等等。

在解放区，为了团結广大人民进行抗战，还彻底实行了減租減息运动，在这个基础上，在各地建立和加强了团結一切抗日力量的統一战綫政府。这样，在这一困难时期，中共和八路軍的威信反而

提高，受到了人民空前的热烈支持。例如，在1941年6月德国侵苏战争爆发，德軍大举进攻和日軍进行扫蕩战的情况下，北京的燕京大学毕业生，十分之七投奔了解放区，十分之二到了重庆，下余最无能的十分之一留在淪陷区（«华北共軍現状»，1942年5月），这一事实清楚地說明了上述情况。

由于中共、八路軍在政治上取得了以上的成功，也就为軍事上采取新的、有效的战术創造了条件。这个时期，虽然八路軍正規部队有所减少，而民兵却有了显著的增加，这就表明全民武装化有了进展。在这种情况下，八路軍又創造了新的战术，即在日軍进攻的同时，实行迂迴作战，深入到日軍刚刚开拔的地点，襲击鉄路和兵营。他們扫蕩战一开始，能够立即得到情报。因为在这里，"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是'情报員'，……例如，利用农民耕种时掄起鐝头的方向和高度，……利用钟声、标志或火光，正确而迅速地傳递了日軍兵力和行动方向的情报。"（«华北共軍現状»）同时，成为日軍进攻对象的地区的居民，采取有名的"坚壁清野"的自卫战术，在日軍进攻之前就把水井、家具、谷物及其他一切重要物质掩埋起来，村民也全部隐蔽起来，使日軍无法在当地进行征发。例如，日軍占領晋平这座一万人口的城市时，据說一个居民也看不到（同上书），在較小的村庄里，这个办法是容易而且彻底地被实行了。此外，农民还在公路和田地里埋設了无数的自造地雷。对于在挖空的南瓜和石头里装滿火药而制成的这种原始地雷，电磁探雷器也不起作用。用猎枪和从日本兵手里繳获的三八式步枪武装起来的民兵狙击队，埋伏在山上和地道里。他們用挖空的粗木料箍上金属和纏上电綫制成土炮，然后装上用破壶罐、破鍋、碎玻璃和石块等配制成的火药进行射击。八路軍正規部队通常以隐蔽分散的办法，迂迴深入到解放区的日軍的侧后，等待他們在进攻根据地的过程中由于疲憊而分散的时候，就集中优势兵力加以痛击。在

日軍的后方，还針对其“加强治安运动”組織了“武装工作队”，打击日軍小部队，在秘密中发展抗日政权和抗日組織，往往把力量甚且发展到伪政权的干部中間。因此，即使在“治安地区”，日軍也由于鉄路和公路不断遭到破坏而大伤脑筋。农民在自己住宅的地下挖掘地道，和邻村的地道銜接起来。这种地道，往往把几百座村庄連在一起，并在各个村庄周圍，向四面八方挖掘了和战壕一样深、馬車可以通行那样寬的壕沟，阻碍了日軍运用騎兵、汽車和装甲車等的快速部队进行机动战。最大单位分成营的游击队，掩蔽在地道里襲击日軍。因此，在1941年的冀中作战中駐华北的日軍包圍夺取了平原根据地以后，据說“竟有几乎看不到一名共軍的惊人事例，因为共軍都从地道逃往别处了”。(《华北共軍現状》)这种情况表明，日軍的“討伐”已逐漸失去威力，他們由于和“无形的軍队”作无止境的战斗而疲于奔命。

就这样，由于以八路軍、新四軍为中心的中国人民的坚强抵抗，日本不得不在无法“解决”中日战爭的情况下发动了太平洋战爭。日本企图“完成大东亚战爭兵站基地”(进攻共軍的口号)的工作失败了，相反地，它不得不把更多的兵力和物力投入中国战綫，在对英美作战上被拖住了后腿。这样到了1942年年底，統治阶級中头脑比較清醒的人們，对中日战爭的前途可能导致最可怕的結局，开始表明了如下的恐惧：“如果按照現状这样搞下去，則不仅与中国民族的妥协

中国方面发表的在华日軍兵力

年　度	师团数	兵員(人)
1937	26	832,000
1938	30½	976,000
1939	35	1,120,000
1940	35	1,120,000
1941	36½	1,163,000
1942	42½	1,360,000
1943	57½	1,840,000
1944	58	1,856,000

(引自《中国手册》1937—1945年)

成为不可能，而且中国人反日仇日的感情将趋向极端，中国經济結构的全面崩溃自不待言，而‘共匪’終将控制中国的大部分国土。这意味着日本在中国受到最大的打击，如果在这种状态下結束了战争，则‘中日事变’頗有轉为严重局面的危险。”

第三章 日美矛盾的尖銳化

第一节 圍繞中国問題美日两国的斗爭

軍火租借法和美国經济的軍事化

罗斯福的"新政"，虽然和二十年代的共和党政府的方針有所不同，但是它的眞正目的还是救济和加强壟断資本，因此，它并不能彻底解决資本主义的矛盾。由于这种原故，工业生产虽在1937年达到了1929年的水平，然而到同年9月，紐約的股票行市又暴跌了，到11月間，若干工业部門的产量，降低到1932—1933年的最低水平，直到1938年，危机还是不見緩和。面对这种危机，罗斯福政府采取了怎样的政策呢？

美国工业生产指数（1929年为100）

年次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指数	83	68	53	63	68	75	94	103	81	98	114

在股票暴跌以后不久的1937年10月5日，罗斯福在芝加哥就"隔离"侵略者的問題发表了演說。这次演說被认为是表明美国放弃了傳統的中立政策，在各方面引起了反应。当然，共和党系的《紐約太阳报》、《紐約先驅論坛报》、《芝加哥論坛报》等报紙对此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但是当时进步的《民族》周刊却支持罗斯福的政策，强調保障集体安全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会导致战爭。另外，当时的美国共产党总书記白劳德也在《新群众》杂志上著文欢迎罗斯福的反对中立，并向他保証"共产党給予百分之百的无条件的支持"。的确，如果这种"隔离"不仅仅是一种单純道义的姿态，那末就必然

要采取具体措施，来制止法西斯各国的侵略。

但是，当时美国无論对于給世界投上了阴影的西班牙內战或者日本的侵略中国，都沒有作出任何具体的政策上的改变。1937年1月，罗斯福虽然使議会通过了一項特別法案，授权总統对“內乱”援用“禁运武器条款”，但罗斯福总統仍旧和倫敦的不干涉委員会采取同一步調，对于向法西斯作战的西班牙共和国軍队，継續禁运武器，到了1939年，当佛朗哥进入馬德里以后，就在4月1日承认了佛朗哥政权。另外，尽管1937年5月通过的中立法，已授权总統当他认为国外存在“战争状态”时，可以实行禁运，但是他并沒把这个条款适用于中日战争上面。这种对于应該受到“隔离”的侵略者不仅不“隔离”起来，反而把他們置于便于其病毒繁殖的溫室之中的一貫政策，在慕尼黑会談时也沒有改变。在慕尼黑会談开始前夕的1938年9月26日，罗斯福向英、法两国总理、捷克斯洛伐克总統貝奈斯及希特勒发出了同样內容的电报，极力呼吁避免冲突，并要求墨索里尼努力使会談获致成功。罗斯福的这种干涉，对于英法德意締結犧牲捷克斯洛伐克来廻避战爭的慕尼黑协定，起了有利作用。（参閱本书第2卷，第5章，第2节）

那篇有名的“隔离”演說并沒有兌現。它所起的作用是：向美国国民宣傳了国外战爭爆发的危險，并帮助美国利用軍需生产来摆脫經济危机。罗斯福在1938年初的国会咨文中說：

“美国政府一貫致力于裁減軍备。但是当前国际局势出現了极度紧張和无秩序的状态，各国政府都有責任保証遵守和平解决国际

美国預算內容的变动

年　次	国　防　費	救　济　費
1934	7.4%	27.3%
1935	9.7%	34.7%
1936	10.3%	27.6%
1937	11.1%	30.8%
1938	12.9%	23.8%
1939	14.4%	18.4%

糾紛的各項原則。今天，美国政府願意尊重别国的权利，而为使别国尊重美国的权利，必須保持充分强大的軍备。”

这段話在編制預算上面体現出来了。在新的預算中，救济費所占的比重較前减少，而国防費所占比重却有了增加。这种依靠軍事生产来摆脱經济危机的政策还体現在1938年5月制訂的《新文森扩充海軍方案》上面。在此以前的1934年5月通过的德拉梅尔-法案，目的是在海軍条約的限度内大量建造輔助性舰只；而这次新文森方案的目的，是建造以战艦、航空母艦等大型艦只为中心的举世无双的无敌艦队，所需經費巨大，估計总額达十亿五千万美元。

但是，美国的这种依靠軍事生产摆脱危机的办法，只是到了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由于实行对英援助及扩張軍备才开始实行。这种情况，可以由下表得到說明。

美国产业别生产指数

（1935－1937年为100）

年季		生产手段生产部門						消費資料生产部門				
		鋼鉄	机器	飞机	鉄路	造船	非鉄金属	不耐用物品	纖維	皮革	汽車	家俱
1938	第1	53	88	103	96	103	75	89	69	85	62	81
	第2	51	77	98	61	95	67	89	73	87	51	80
	第3	72	78	94	61	96	73	98	96	97	52	91
	第4	98	86	101	68	97	100	102	103	102	88	96
1939	第1	93	93	121	83	112	95	104	106	105	102	99
	第2	85	96	153	74	122	94	104	106	100	84	101
	第3	114	104	189	75	133	114	108	113	104	84	107
	第4	163	121	239	121	141	152	116	124	106	103	118
1940	第1	124	124	290	154	152	143	110	109	97	126	114
	第2	124	125	331	119	163	127	110	104	89	103	113
	第3	159	139	455	133	207	145	112	114	95	91	117
	第4	171	154	587	167	240	170	119	132	104	132	125

1939年年底，美国对英国的投資額达到一百一十三亿六千五百万美元，占美国全部对外投資額的百分之四十二。美国的銀行家和資本家在英国拥有这样巨額权益的事实，自然要反映到美国的对英外交政策上面来。在1939年9月3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同时，美国就对英国开始了援助。同年11月4日，美国国会修改了中立法，使盟国可以在“支付現金和用本国船运輸”（Cash and Carry）的条件下，向美国购买武器。1940年4月，美国和盟国武器购入委員会签訂了出售价値十亿美元飞机的合同。同年9月，又和英国締結了有关驅逐艦、海軍基地的协定，把五十艘驅逐艦貸給了英国。这样，在同年內，美国向英国輸出了大約八亿美元的物資，到次年1月，英国从美国的进口額，竟占美国出口总額的百分之六十五左右。

但是，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所欠美国債务中有五十六亿美元以上沒有償还，根据禁止向不履行債务的国家撥款及貸款的約翰逊法（1934年4月13日实施），禁止向英国撥款和貸款。而根据禁止向交战国撥款及貸款的中立法（1939年11月4日实施），也禁止向英国撥款和貸款。但是由于1940年6月法国战敗所引起的英国的危机，进一步加深了美国援助英国的必要。罗斯福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于1940年12月制訂了一項法案，規定撥款給美国国內的軍火生产部門，然后把生产出来的成品貸給英国。他在把这項法案提交議会以前，就向英国的采购代表宣布，为此目的将撥款三十亿美元。这一法案在1941年1月10日提交到議会，于3月11日战胜了众議院一百六十五票的反对和参議院三十一票的反对而获得通过，这就是所謂“軍火租借法”。

美国方面通过这种对外援助来扩大国外市場，另一方面，在国內的軍事生产随着战爭的发展而有了显著的发展，1940年第七十六屆国会期間，又通过了建立两洋艦队法案和加强中立法法案，总

計約一百七十七亿美元的"国防費"获得了国会的批准。这个数字虽然也包括后来使用的部分,然而实际上,到 1941 年 6 月 30 日截止的年度預算中,陆軍方面的經費約达八十七亿美元,海軍方面的約达三十三亿七千万美元。

以上的扩大軍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从危机中維护壟断資本的利益,这一点,可以从在这个时期参加政府而实际担任执行政策的一批人物的名单,进一步得到証明。1940 年夏,史汀生和諾克斯分别就任陆軍部长和海軍部长。史汀生是摩根家族的亲戚邦布萊特的外甥,是在胡佛总統手下担任过国务卿的共和党內的干涉論者。諾克斯是《芝加哥日报》的社长,也是共和党內的干涉論者,他在 1932 年大选时,曾和竞选总統的兰頓一道竞选过副总統,并在竞选演說中說过:"任何人寿保險政策都不可靠,任何存款都不安全"。在这同一时期被聘任为国防諮詢委員会产业物資委員的斯退丁紐斯是当时美国鋼鉄公司的董事。而这个委員会另一成員克奴得生是通用汽車公司的董事。

美国的反战运动

美国并沒有实行"隔离"政策而是向侵略者实行了綏靖政策,1939 年 8 月德苏互不侵犯条約签訂以后,执行这样政策的美国的干与战争的作法,也就变成了同德国和苏联相敌对的純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因此,根据盖洛普民意测驗,从 1939 年 9 月到 1940 年 5 月之間,美国人民有百分之九十六以上反对干与战争。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和进步的工会、青年团等一起,高举着"美国人不願参战"("The Yanks are not Coming")的标語,在 1940 年 4 月 6 日举行了反战游行。8 月間,組成了"停止干預战爭保卫美国委員会",从 8 月 31 日到 9 月 2 日,在芝加哥召开了"紧急和平动員"大会,由此开展了"美国和平动員"(A. P. M)运动,到

了11月11日停战紀念日，在三十多个城市举行盛大集会，并且把这一天定名为"美国和平动員日"。1941年1月到2月期間，許多代表汇集华盛頓，就軍火租借法和备战政策向政府提出抗議。这一反战运动分别在各地展开斗争，例如在依利瑙州威尔地方，支持了农民反对官方以杜邦財团建設軍火工厂为理由而征用土地的斗爭，在南卡罗里納州还支持了抗議不准雇用黑人参加軍事生产的运动。1941年4月5日到6日，"美国和平动員"运动在紐約市召开了美国人民大会，通过了七条綱領，这七条綱領（尤其是第四、第六两条）可以很好地帮助人們了解这一系列反战运动的性质。七条綱領要旨如下：

一　停止干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反对包括向海外派遣美国軍队在內的一切干与战爭的措施。停止和英国的軍事同盟。

二　維护并提高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　夺回并加强宪法上規定的自由。保卫罢工权，反对限制教育自由。保卫遭到希特勒式迫害的受难者。根絕种族偏見。

四　反对让貧民負担战爭費用。沒收兵役稅和战时利得。反对对于貧民的不公正的征稅。

五　征兵时，拥护市民的正当权利。

六　建立和平外交。廢除美国壟断資本对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剝削，建立和他們之間的友好关系。不要援助中国的內外敌人，切实援助全中国爭取自由的斗爭。給予波多黎各和菲律宾以眞正的独立。为防止战爭扩大，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

七　爭取人民的和平。爭取建立在各殖民地人民自决权基础上的无賠償、无兼并的和平。

决心要用扩大軍事生产来摆脫危机的美国政府，对于这种人民群众的反战运动，自然要加以鎮压。罗斯福政府以德苏締結互不侵犯条約为借口，声称要对抗"整体主义"的威胁，而交給了联邦

調查局以秘密政治警察的任务，开始了鎭压共产党的勾当。1940年6月，美国政府利用“外人登記法”来統制人民群众的思想。1940年9月5日，“美国和平运动”組織在华盛頓举行了大規模的反战示威游行，遭到了警察殘暴的鎭压。参加这次反民主的暴力鎭压的有，慕尼黑会談以前成立的第茲委員会。这个委員会的眞正目标，可以从这个組織成立伊始被雇用担任調查主任的沙利文的言行上面看得出来。沙利文是反苏宣傳的“专家”，在参加这个委員会以前，曾和美国的反苏烏克兰民族运动有联系，和法西斯团体“銀衫党”、“德系美国人同盟”，也有密切关系。这个反苏委員会为“檢举赤色分子”的勾当大卖力气。罗斯福政府对于“赤色分子”的恐怖，不但使它纵容了納粹的第五纵队，以及策划炸毁美国的重要工厂以使战局向有利于德国方向发展的各法西斯团体，而且利用它們作为推行反共政策的工具。

1941年6月希特勒侵入苏联以后，局势有了巨大变化。以工会为首的进步力量，表示支持反法西斯战争，他們在保持民主权利（罢工权等）的情况下，努力生产軍事資材；但是美国壟断資本的反动势力却由于反苏战爭的爆发而感到高兴。这种情况清楚地表現在开战后不久参議院議員哈利·杜魯門的言論中。（参閱本书第1章，第1节）美国壟断資本的政策，首先是适当地援助交战双方各国来解决国內的經济危机，并使它們两敗俱伤，然后，再迫使它們接受由美国統治世界情况下的“和平”。罗斯福政权是代表壟断資本利益的政权。但是它并不是和支持納粹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最反动的大壟断資本（例如杜邦、洛克菲勒、福特等）完全一致。罗斯福旣然和最反动的华尔街势力有着一定程度的矛盾，所以，他就要在某种程度上爭取人民群众的支持，其援助盟国的政策，在輸出武器方面，固然也保障了壟断資本的利益，而在朝着反軸心的方向前进这一点上，特别是当德国侵苏战爭爆发以后，盟国

方面具有了反法西斯联合陣綫的性质以后，他受到了美国人民的鼓励，有了一定的进步意义。罗斯福政权是具有这样幅度的一个政权。让我們看看这个罗斯福政权在远东采取了怎样的行动？

中日战争和美国的立場

对于日本在1937年发动的侵华战争，美国是不能袖手旁观的。因为第一，这次侵略战爭打击美国一向怀抱着的中国是資本主义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場的信念；第二，这次战爭也意味着日本将夺去美国的一个很有希望的投資对象；第三，如果日本“开发”了中国这个丰富的市場，就意味着美国大量的棉花和廢鉄的对日出口将告結束，使美国失去日本这块重要的市場；第四，日本控制了中国，它将占居有利地位，便于夺取美国一向取得橡胶、錫、金鸡納霜和亚麻等战略物資的东南亚，并进而加深美国完全丧失太平洋区域市場的危险。

日本发动侵华战爭以后不久的7月14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了关于維护国际条約神圣的声明，接着又要求中日两国停止战斗。10月5日，罗斯福作了“隔离”侵略者的演說，暗中譴責了日本的行动；6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項声明，指責日本的行动違犯九国公約及凱洛格非战条約。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停留在“口头威吓”，并沒有采取阻止日本侵略的具体措施。同年11月在布魯塞尔召开了九国公約参加国会議，出席这次会議的美国代表戴維斯，正如罗斯福总統所表示的，“是在美国政府对于其他各国政府不負有任何义务的情况下参加会議的。”这次会議本来应由美国起带头作用，可是它沒有这样作，因此，会議沒有取得成果而結束了。（参閱本书第2卷，第3章，第2节）

美国方面所以采取这种曖昧的态度，是因为耽心击敗日本的侵略而取得解放和独立的中国将不再成为美国的市場，因为考虑

为了和日本适当地瓜分中国市場，利用日本对付苏联，不应該过份地刺激日本。

但是，美国的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和赫尔的“哪怕是最微小的干涉也要避免”的“强硬”政策，使日本大大地感到放心，于是，日本便按照預定計划，在同年12月把战火扩大到了华南。美国对于1937年12月的“巴納号事件”①和1938年5月底日軍空襲广州，虽然也分别提出了抗議，但是对于前者，美国政府幷沒有象美国人民由于激憤而实行抵制日貨那样，采取具体行动。

不錯，美国也的确对中国进行了物质援助。由1936年到1939年四年之間，中国共有价值七亿三千四十万八千元的白銀流出国外，其中大半，根据中美白銀协定，为美国国庫所收买，作为中国的抗战資金。1938年12月蔣介石政府派代表到华盛頓要求貸款，結果美国通过进出口銀行給予了二千五百万美元的貸款。而当1939年日軍占領海南島及南沙群島时，于同年3月間，美国再次給予国民党政府以一千二百八十万美元的材料貸款；此外，美国还在1940年3月通过进出口銀行，給予了二千万美元的貸款。

但是，当时美国幷不是只向中国进行輸出，对于正在侵略中国的日本，也在继續进行輸出。誠然，美国政府曾經在1938年6月向制造和出口飞机、飞机零件、发动机、武器、空軍用炸彈和魚雷等的厂商提出要求，不要向用这些武器杀害一般平民的国家輸出这些东西。但是这种办法，只是訴諸厂商的良心，不出所謂“道义禁运”的范圍，而不具有强制力量。到了1939年，日本南进的意图已隐約可見，美国政府这才感到有必要采取某些具体措施来制止日本。同年5月間，平沼首相在采取轰炸重庆的恐吓手段的同时，向美国提議，要求美国根据日本的方案，同日本合作来維持欧洲和平。

---

① 1937年12月12日，日本飞机轰炸幷击沉了停泊在南京附近的美国炮艇“巴納号”。——譯者

然而，平沼的提案，期待“富有国家”向“貧困国家”让步，是完全符合軸心国方面意图的。对此，赫尔只答称，在解决全世界性质的問題以前，日本应首先把自己在东亚所造成的混乱局面收拾起来，而并未采取任何箝制日本的具体措施。同年5月20日，英国駐美大使罗西安往訪美国副国务卿威尔斯就共同对日采取报复措施的可能性問題进行了商談，这时，威尔斯表示：美国政府不希望和别国建立复杂的联系，而願走自己的道路。美国对日本采取的这种綏靖政策，便利了7月23日日本外务相有田和英国駐日大使克萊琪之間进行的“远东慕尼黑会議”的成功。（参閱本书第2卷，第5章，第3节）7月11日，美国国会把美国参議院外交委員会主席皮特曼所提出的关于授权总統决定禁止对日貿易的决議案，推迟到下届議会召开期間的1940年1月进行审議，而反对党共和党領袖范登堡在7月18日提出的美国政府应通告日本美国有意廢除日美通商条約，但在实际上决不意味着对日禁运的决議案，却受到罗斯福和赫尔的欢迎，并根据它，于26日向日本发出了通告。美国这样作的目的无非是促使日本方面考虑“肆意蹂躪美国在中国的权利和权益，将把自己置于何种地步”，以便扩大被认为日本內部存在的“稳健派”的势力，并离間日德关系，使日本的侵略矛头指向苏联。欧洲战争的爆发，給美国政府提供了禁运战略物資的理由，9月26日，总統对一切有关的私营企业提出了停止出口十一种原材料的要求。然而，这是和日本当时所实施的統制大致相同的，是沒有实效的措施，因而也不曾引起日方的抗議。

这种表面上似乎“强硬”而在实际上却十分軟弱的綏靖政策的实际情况是这样：1937年日本进口总額的百分之三十三点七、1938年的百分之三十四点四、1939年的百分之三十四点三，是来自美国的。而且，如下表所示，在日本的进口物資中，廢鉄、工作母机、生产設备和石油等軍需生产上所必需的物資所占比重，与1928

年相比，有了显著的增长。同时，美国的以上对日出口額，比起对华出口来，要多得无可比拟。例如1937年，美国对日出口額是二亿八千八百五十八万八千美元，而对华出口額只有四千九百七十万零三千美元；1938年，前者是二亿三千九百五十七万七千美元，而后者只有三千四百七十七万二千美元。

日本由美国的进口額

（单位：千美元）

	1928 年	1939 年
棉花	109,399	42,488
木材	15,636	2,858
肥料	6,205	2,137
石油制品	21,717	45,290
废鉄	3,090	32,593
銅	2,358	27,567
机器及設备	.862	24,578

美国旣不希望日本作为战胜者称霸远东，同时，也不想把日本彻底击潰。美国的意图，在于适当地給予日本和中国双方以軍事援助，使双方都疲憊到一定程度以后，在远东建立它自己的霸权。另外，美国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日本帝国主义得到一定的滿足，使其象在1938年侵犯張鼓峰，1939年侵犯諾門坎那样，把侵略的矛头指向“北方”。

日本的南进及其同美国的矛盾

日美通商条約的廢弃是从1940年1月26日生效。然而，这只是条約被取消了，并不意味着两国通商已經結束。美国的資源，特别是石油和廢鉄，通过私人企业的手，继續被运往日本，支援它在远东进行罪恶勾当。

尽管日美通商条約的廢弃本质上是这样，但是在日本看来，和以往供給自己軍需品的主要国家美国之間的通商旣已变为不稳定，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就不能置若罔聞。日本从諾門坎进攻苏联的失敗和德苏互不侵犯条約的签訂，使它深深感到北进的困难；而

如果同美国进行較量，力量又过于弱小。因此，日本在阿部、米內两內閣执政期間只好集中力量解决中国問題和逐步向南方扩張。

拉攏蔣介石政权的工作宣告失败，从而陷入长期战的日本(参閱本书第2卷，第5章，第3节，本书第2章，第3节)，为了应付长期战，就注意到了南方的資源。1940年1月，日本通告荷兰政府，廢除日荷司法、仲裁和調停审判条約，2月間，又向荷兰政府提出了一項要求，其主要內容是：放寬貿易限制，扩大日本人在荷印經营企业的便利，放寬对于在荷印日本商人雇佣人員和工人入境的限制，以及"互惠地"管理报紙等。日本的南方政策所以更加强硬起来，是由于在欧洲战場上德軍取得了优势地位。在德軍侵入丹麦和挪威以后的4月15日，有田外相就发表了一項强調維持荷印現状的声明，內称"日本同南洋各地区、尤其是同荷印之間，在經济上存在着互通有无的密切关系"，暗示日本要求取得在上述地区的特殊权益。

在这期間，美国政府虽在口头上对日本向南方的新的侵略行为表示反对，但是并未采取实际行动。赫尔不但不同意財政部提出的关于扩大"道义的禁运"的适用范圍的提案，而且一再拒絕参議院議員皮特曼的要求：为使他提出的决議案得到通过，需要赫尔的支持。不仅如此，即使在1940年5月10日德国开始侵入荷兰、比利时和法国以后，这些国家在东南亚的各殖民地失去宗主国，从而落到日本手中的可能性增大了以后，罗斯福仍然"考虑"不予日本以侵略的口实，要求就保护荷領西印度群島問題受到荷兰政府委托的英国政府发表声明，正式宣布英国政府不干涉荷印，荷兰政府不需要英国的援助，以及宣布英法軍队立即撤出西印度群島。但是，美国政府这样做的結果，只是使得日本侵略者更加得意妄行而已。5月16日，日本总領事向荷印經济局长范·莫克"几乎一口气陈述了吊詞、要求与暗含的威胁"(費思：«太平洋战争前史»)；到18

日，日本又向荷印当局提出了一项书面要求，规定着日本要求荷印供給它包括比以往它从荷印进口的数量多得多的鉄矾土、石油在內的十三种原料、資材的最低限額。从同月30日起，美国駐日大使格魯与日本外务相有田举行会談，在会談中，格魯强調：第一，德国的胜利不会給日本带来安全和繁荣；第二，和美国合作，扩大貿易，通过和平途径增进福利，将有助于改善日本的情况。但是，这次会談只是空費唇舌，并未取得任何成果。事实胜于雄辯，6月18日法国向德国投降以后，有田拒絕了美国政府就日美双方交換备忘录，互相确认除和平轉变外，两国政府希望保持太平洋地区的現状一事提出的建議，并通过广播发表了关于"大东亚新秩序"的演說。（参閱本卷第2章，第1节）

日本，不只是有田发表了广播演說，而是确实在想利用这个机会侵入南方。日本政府对于同年4月間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卡特魯所作的关于停止一切运往中国的軍需品及軍用器材通过法属印度支那的諾言，仍旧不能滿意，而在法国向德国請求停战的次日，东京举行了四相会議，决定以最后通牒的形式要求法国同意：不仅法国作出上述諾言，而且为了保証这一諾言的切实执行，日本可以派駐軍事监視团。因为6月6日德軍突破了魏刚防綫而大举侵入法国境內，荷印当局于6月6日对于它一向置之不理的日本方面的要求，作了妥协性的答复。但是，有田对于这个答复并不滿意，而逼問荷兰政府是否准备在任何情况下都向日本輸出日本所指定的物資的指定数量。这次逼問也是用类似最后通牒的語气結尾的。日本政府对英国政府，則提出了撤出上海駐軍，并封鎖香港边境和滇緬公路。

对日"禁运"措施

当时，尽管在敦克尔克吃了敗仗，可是已經抱定决心要继續和

德国作战的英国政府，认为为了防止日本的侵略，可以采取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对日本实行全面禁运，向新加坡派遣軍艦，以便对日本施加压力；另一种办法是向日本提示解决远东問題的优越条件，把日本拉到英美一边。然而美国却不願采取以上这样"强硬的"和"綏靖"的两种政策中的任何一种。因为这时对日本开战，就意味着美国将永远失去在战爭結束时把它的"和平"强加于世界各国的机会；另一方面，如果远东变成了日本的勢力范圍，則意味着美国将永远失去其現有的和未来的市場。因此，美国采取了以上两者之間的中間政策。6月底，美英联合委員会为了阻止日德两国对西南太平洋的要求，发表了一項宣言，把子午綫以东的英法領地划归門罗主义适用范圍以內。7月2日，罗斯福根据"加强国防法"，对于下列三項物資实行了輸出許可制，这就是：第一，一切武器、軍需品和軍事器材；第二，当时被认为是"非常时期战略物資"的包括鋁和鎂在內的一切原料資材；第三，飞机零件、裝置、附件、光学仪器和金属制造設备。美国尽管表面上对日本采取了这种强硬政策，可是其所謂門罗主义云云也只是空談，并沒有实际派遣軍队，而在禁运的三項物資中，也并沒有包括日本最迫切需要的两种物資——石油和廢鉄。同时，这一措施也只是許可制，而不是禁运。决定給予許可和发給許可証的工作，由国务院負責，国务院內特設监督部，专門掌管这項工作。被任命担任这个监督部部长的是約瑟夫·格林，他在西班牙內战时期，"因为害怕預定运往希腊的二十七架飞机落到西班牙共和国的手里，而对这批飞机采取了禁止出口措施"。(本迪納：《国务院之謎》；洛多夫：《圍繞太平洋的美日財閥》)因此，1941年3月，美国向日本出口了价値达一百万美元以上的工作母机，而在1941年第一季度里，又向日本和"滿洲"出口了比前一年同期更多的銅。美国对日本采取这种实际上的綏靖政策，也导致了英国的綏靖政策，这就是英国答应日本的要求，封

鎖了滇緬公路。

德国对于法国的胜利，显然使日本向德国靠攏了。1940 年 7 月上旬，在日本参謀本部內，企图利用德国来解决中日战爭的意見占了优势，結果使日本統治集团不得不撤換了反对利用德国的米內內閣。7 月 16 日，畑陸相提出辞呈，米內內閣宣告垮台，正在从事"新体制"运动的近卫接受了組閣命令。近卫在同月 19 日邀請东条、吉田和松岡等"候补閣員"到荻外庄举行了所謂"荻洼会議"，根据这次会談，决定了"基本国策綱要"和"适应世界局势演变处理时局綱要"。（参閱本书第 2 章，第 1 节）第二次近卫內閣的外交政策就是根据了这条路綫。8 月 1 日，日本政府向法屬印度支那提出最后通牒，29 日，日法之間締結了一項关于向日本提供其所要求的軍事上的便利条件的协定。法国的維希政权以日本尊重法国在印度支那的主权为交换条件，承认了"日本在远东的經济上和政治上的优越权益"。而日本对于荷印，也在 8 月中旬派去了以三井物产会长向井忠晴等为首的七名民間交涉員，并于同月 27 日任命商工大臣小林一三为日本派往荷印的特使。英国政府通过罗西安爵士要求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一向支持荷兰政府以及在荷印的各石油公司那样，支持它們。对此，赫尔表示大致同意。然而，当在这次会談中"受到支持"的范·莫克要求把荷印在这以前在美国购买的武器急速运来时，赫尔却于 9 月 11 日作了如下的回答：（一）美国政府为了根据既定方針妥善考慮共同有关的問題，希望继續接到全面的报告；（二）关于石油問題，在荷印营业的美国公司充分了解美国的意图；（三）美国政府不願干与糾紛，如果不发生援助外国的必要，美国不願自动地登上舞台。美国政府的这种态度完全符合了日本政府的心願。日軍終于在 9 月 23 日侵入了越南北部。

在同年 9 月 4 日的四相会議上由外务相松岡提出了另一个严

重步驟——締結日德意三国同盟問題。同月7日，德国特使斯塔瑪到达东京以后，談判就进入了討論具体問題的阶段。此后，在14日的联席会議上，軍令部次长表示对于对美开战缺乏信心；在19日召开的御前会議上，一些人在預料日美开战的情况下提出了反对意見，例如軍令部总长伏見就从取得战略物資的角度表示了不安。这种預料确实是有根据的。1936年11月間签訂的日德防共协定，由于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約的締結，已經失去了原来的反苏性质。为了进一步加强这个已經明显地变成反对美英的协定而签訂三国同盟，对于日本来說，显然是要把美国作为敌国。虽然如此，最后还是因为多数人同意近卫的主張："德国已和苏联締結了互不侵犯条約，德国不仅要为調停日苏糾紛出力，而且还一定要力促中日'和平'的实現，认为日美关系的恶化可以避免的論調占了上风，因此，决定締結三国同盟，而于同月27日在东京签了字。

美国对日鋼鉄輸出

（单位：千磅）

	1940年	1941年
废鉄	47,000	227,000
鉄及鋼板	1,487	5,614

日本政府的这种两面政策，虽然目的在于获得南方的資源，和苏联保持暫时的和解，爭取时間，以便伺机向苏联发动进攻，但是日本在三国同盟的基础上向南方扩張的作法，显然刺激了美国政府。美国政府作为报复手段，在9月25日决定追加对中国的貸款，次日又发表了对日"禁止出口"廢鉄和鋼鉄的声明。不用說，还沒有面临你死我活关头的美国政府，依然象英国那样希望日本北进，实际上，美国只是对日本采取了对鉄和廢鉄的出口許可制而已。这一点，从上表中也可以看出。

不管怎样，美国采取了这个措施，显然使日本在获得其最需要

的一項物資方面，感到了不安。1940年10月8日，英国政府发出通告，决定重新开放滇緬公路，同时，丘吉尔首相也发表了攻击日本的演說。英国政府曾經通过駐美大使罗西安再三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具体的对日共同防御方案，可是从美国政府那里得到的回答总是：避免采取具体的行动。罗斯福总統在大选前夕，为了争取美国国民的好感，宣称他将遵守民主党的这样一項政綱："我們不参加外国的战爭。除非遭到攻击，我們决不派遣我們的陆海軍到美国以外的外国領土上作战。"他虽然强調欧洲及亚洲独裁国家的侵略行为，但又不采取制止侵略的具体对策；他虽然从文字上和口头上加剧了侵略国的反感，然而在物质上却又援助了这种侵略。

第二节 日美交涉

日美交涉的开始

1940年秋冬之間，日本政府根据7月27日决定的"适应世界局势演变处理时局綱要"，为准备对美开战而大力进行掌握南方资源的工作。小林一三曾为实現日本和荷印在政治上的合作而作努力，但是沒有成功。10月16日，日本、荷印双方代表发表了一共同声明，只說："三国同盟并不妨碍日本荷印間的友好关系"，后，小林便把后事重又交給民間代表向井忠晴，而首途归国了。然荷印向日本出口的战略物資为数相当庞大，但是并不能滿足本的要求。10月25日，日本政府又决定了"发展'日本对荷印济'的措施"，开始直接奔向获得油田的本来目的。日本代表在月29日的通牒中不仅要求对婆罗洲、苏拉威西、荷属新几內亚阿洛群島及斯豪頓群島等广大地区的开发权，而且要求荷印局承认上述地区为日本的势力范圍，并支援日本在这一地区的动。荷印当局感到，日本选定了这个地区，并不是单純为了寻找

油，它把这項要求交給矿业部去研究，而拒絕了急速对这个問題进行研討。

日本的这种南进，深深刺激了美国，但是美国政府却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来加以解决，尽量避免軍事冲突；如其可能，它并希望使日本的侵略矛头作一百八十度的轉向。日本政府也因为本来的侵略目标是苏联，夺取南方資源只是为达到这一目的的准备工作，如果可能，也不想和美国发生武装冲突。日美交涉成为可能的客观条件就在这里。

1940年11月9日，为了开始这个交涉，日本政府任命和罗斯福本人有交情的海軍大将野村吉三郎为駐美大使。他在1941年2月11日到达华盛頓，2月14日向美国总統递交国书，3月8日会晤赫尔，表示“日本对荷印的要求，基本上是在經济方面”，接着日美談判就开始了。3月14日，野村在第二次会晤罗斯福时指出：“英德之間的战争很可能成为长期战；这样，如果战争从欧洲扩大到太平洋而成为更加长期的战争，那么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經驗，不論战胜国或战敗国都要发生社会革命或类似情况”，企图迫使美国让步。（野村吉三郎：《出使美国》）

在日美两国政府进行这种正式交涉的同时，还在暗中进行了所謂“私人交涉”。1940年11月29日，日本产业組合中央金庫理事井川忠雄收到了天主教神甫德劳特的一封信，内容是为了改善日美关系要求同井川会晤。信中附有庫恩·婁布公司最高董事之一、曾任胡佛总統秘书的斯特劳斯的介紹信。井川秘密地和軍务局长武藤章及軍事課长岩畔豪雄进行联系商談之后和德劳特見了面。当时，德劳特补充他对井川的談話而提出了一份书面建議。这份建議在12月14日送給了近卫，“全文充滿着与神職人士不相称的知識用語”，“不难推想它可能具有相当背景”。（矢部貞雄：《近卫文麿》）德劳特的建議是站在一个日本人的立場上写成的，它的

标题是:《特别結合日美关系就日本在远东的地位和政策作具体分析》。这份文件利用"远东門罗主义"这样一个概念,主張把欧洲势力从远东排除,使远东成为日美两国的壟断品,强調存在着加强对苏地位的可能性,建議及早开始日美会談。这正是远东慕尼黑会談的基本精神。同德劳特一起参加这次会談的,还有一个名为华尔希的天主教神甫。他在美国是个相当有名的人物,和总統也很密切,因此就决定,在美国由华尔希和总統联系,在日本由井川和近卫联系,以便交換双方的意見。这两个神甫又曾經策划使日本外相在12月19日日美协会在东京举行欢送野村大使的宴会上发表的演說中,向美国国民表示調整日美邦交的可能性。二人在肯定了日美交涉的可能性以后,于12月28日首途归国。次年1月23日,两神甫会晤总統和国务卿,作了詳細汇报,当时,邮政部长天主教徒沃克也在座。25日,接到这两个神甫由美国拍来的电报,內容是:"往訪总統的結果,頗有希望,工作在顺利进行,可能进一步开展",于是,井川和岩畔二人决定前往美国。井川是和野村大使大致同时动身的,岩畔是在3月6日出发的。到达美国以后,井川曾和华尔希、德劳特、沃克等人多次联系,徹底了解了美国政府首脑部的意图,并不断向野村大使和近卫报告了交涉进展的情况。

这样,在完成了准备工作以后从4月2日起,井川、岩畔、德劳特三人就着手起草日美諒解方案。4月5日写成了第一个方案,交日美双方当局进行研究,并采納了双方的意見,于16日又写成了第二个方案。在这期間,14、16两日,赫尔和野村就这一問題进行了会談。赫尔对第一方案表示不滿,他提出了所謂"四原則"(尊重一切国家的領土和主权,不干涉别国內政,遵守平等原則,放弃用武力改变太平洋地区的現状),但是由于后述的4月13日的日苏中立条約的签字,他看到利用苏联牵制日本的可能性已經消失,而把以往由民間进行的談判改为由国务卿和大使进行非正式会

談，并表明可以以第二方案作为談判的基础，要求日本方面首先取得本国政府的訓令。这个日美諒解案內容共分为以下七項：（一）日美两国所怀抱的国际观念及国家观念；（二）两国政府对于欧洲战爭的态度；（三）两国政府在中日战爭問題上的关系；（四）太平洋上的海軍兵力和空軍兵力以及海运关系；（五）两国間的通商及財政合作；（六）两国在西南太平洋方面的經济活动；（七）两国政府关于实現太平洋地区政治稳定的方針。这个方案，对美国来說，包括了許多对于日本政府的让步，这就是：在第（一）項里，美国沒有把民主主义强加于日本；在第（三）項里，美国約定努力促使“蔣政权和汪政权的合流”，并承认“滿洲国”；在第（五）項里，虽然日美通商条約已不存在，而美国却暗示了締結新条約的可能性，并約定給予日本以大量的信用貸款；在第（六）項里包括美国保証日方获得石油、橡胶、錫、鎳等重要軍需物資，保証意味着美国放弃菲律宾的菲律宾独立。不仅如此，在这次交涉中德劳特还作了一个重大的提議（实际上虽未写进方案中），那就是加进这样一条：如果日本退出三国同盟，一旦爆发日苏战爭，美国将援助日本。（野村吉三郎：«出使美国»）

4月18日，日本內閣正在举行会議当中，接到了有关这个諒解方案的报告，近卫立即离开会場，当夜就召集了政府統帅部联席会議。在这次会議上，虽然对于这个方案是否要和三国同盟有所抵触的問題有些顾虑，但是近卫首相、平沼內相、东条陆相、及川海相、杉山参謀总长、永野軍令部长等都表示贊同进行这一交涉，并立即发出訓令，让正在欧洲的松岡外相急速归国。

日苏中立条約

日美交涉正在象上述那样向前进展的同时，締結苏日互不侵犯条約的交涉也在进行，这是根据“处理时局綱要”，作为日本締結

三国同盟条約的一个目的。1940 年 10 月，日本政府通过駐苏大使建川美次向苏联提出关于締結苏日互不侵犯条約的建議，与此同时，它还要求德国进行斡旋。德国拟訂了“里宾特洛甫方案”，在 11 月間把它交給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莫洛托夫表示原則上贊成，但考虑到将来和日德意法西斯各国的根本对立，因而表明，如果以加强苏联的軍事力量作为条件，苏联也可以加入或支援三国同盟。对此，希特勒大发雷霆，他甚至在 12 月 18 日命令政府首脑，要在击破英国之前，首先击破苏联。但是日本却一心要在三国同盟的基础上稳定北方，因此，在 1941 年 2 月 3 日的大本营內閣联席会議上决定了松岡所提出的“对德意苏交涉綱要”，并拟定了和苏联締結条約的具体方案。根据这个方案，松岡于 3 月 12 日首途赴欧。他在 24 日途經莫斯科时，向苏联提出締結苏日互不侵犯条約的問題，——对此，莫洛托夫暗示应締結中立条約，——而于 26 日到达柏林，和希特勒、里宾特洛甫进行了会談。

这时候，德国把打倒英国作为紧急任务，要求日本进攻新加坡。当时在德国看来，既然美国在援助英国，那么，即使把美国变为敌人也在所不辞，因此，德国就更加坚决地要求日本参战。松岡沒有充分认識到，进攻新加坡必然引起和美国的冲突，而答应了德国的要求。然而，在松岡出国之前，日本統帅部曾一再囑咐他，不要就进攻新加坡之类的軍事行动作出諾言。但是，根据“德国方面的了解，至少松岡外务相个人曾經向德国方面作出了进攻新加坡的諾言”。(«昭和的动乱»)松岡的打算是坚决避免和美国冲突，他甚至在莫斯科，就日美交涉問題，和美国大使斯坦哈特进行了談話。由于日德間的这种意見分歧，使得松岡尽管从德国方面获悉德苏战争的不可避免，但是为了稳定日本的北方，在归途經过莫斯科时，于 4 月 13 日，还是签訂了“日苏中立条約”。因为当时德国大批軍队集結在整个苏“德”边境，所以斯大林簡单地同意了签訂

这項条約。就这样，松岡作为一个“紅人”，在“日美諒解方案”已經到达了日本的4月22日回到了东京。

苏德开战和日美交涉的擱淺

在4月22日松岡回到东京的同时，“三国同盟”和“日美諒解方案”之間的矛盾重又尖銳化了。松岡不同意就“日美諒解方案”拍发回电，并托辞感冒，一直到5月1日沒有露面。他认为“这次交涉是在自己沒有参預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感到不滿（据松岡在远东軍事法庭上的供詞）。他研究了美国的原案和陆海軍当局所作的修正方案后，大加修改，而于5月3日提交联席会議討論，結果，松岡的修正方案大体上获得了通过。松岡修改的主要部分是：(1)进一步明确了三国同盟的性质。关于这一点，加上了这样一句："表明日德意三国条約所規定的有关軍事援助的义务，在該条約第三条（締約国之一未曾挑衅卽遭到締約国以外的第三国进攻时，其他締約国立卽就提供軍事援助問題进行协商。）中提到的情况发生时，当然要加以履行”；(2)关于中日战爭部分，統統取消列举媾和条件，而由日本保留决定媾和条件的权利；(3)表明在日本向西南太平洋方面“发展”的过程中，万一遇有外部的“挑衅”，它将不得不訴諸武力。但是，松岡并不立卽提出这个修正方案，而是在那以前，把一份强調堅信德意必胜、旨在威胁美国的口头声明交給了美方，同时，还命令野村大使向美方提出締結中立条約的建議。野村在同月7日会見赫尔，就締結中立条約問題探詢了美方的意向，但是赫尔对此未加理睬。于是，野村又在5月12日把上述修正方案交給了赫尔，日美談判重又开始了。赫尔感到“从这个提案中几乎看不到一綫曙光”。据赫尔說：“实际上，这个方案企图将太平洋地区置于日美两国共同統治之下，使日本成为一个占这个地区人口和財富十分之九的区域的統治者，在这里，几乎沒有考虑到别国

的权益”；尽管如此，他仍然同意以此为基础来进行談判，是为了避免“失掉从根本上討論日美双方提案的唯一机会。”（赫尔：《回忆录》）但事实上，促使赫尔决定这样作的眞正原因，是欧洲战局的开展。

罗斯福总統宣称，美国艦艇正在为运輸支援英国武器的运輸船只担任“巡邏”，而海軍上将斯塔克却分明写着：“护航”。总統在5月27日发表了关于非常状态的声明，并把竞选时提出的政綱中“只要不受到攻击”，就不打仗一語，作了新的解釋，宣称：在采取閃电战的現代的情况下，“只要足以威胁我們連带的基地（不論南方的或北方的）被人占据，那就是对我进攻的开始”；美国决定把“巡邏”的范圍扩大到大西洋以北和以南，并使用更多的舰艇和飞机。6月9日《华盛頓邮报》登載了在这种“巡邏”中击沉了德国潜水艇的消息，掀起了紧張气氛。这时，美国海軍在大西洋方面事实上已經进入了战争状态。美德之間的这种紧張局面，使日本陷入了进退維谷的地步。

这样一来，日本要想一方面和德国締結三国同盟，另方面和美国进行交涉，就更为困难了。松岡强調对德国遵守信义，在設想美国不致对日宣战的前提下，主張进攻新加坡，并試图进一步对美国施加压力。对美国方面来說，和德国的关系越是紧張，那么，从軍事上看来，就越发需要拉攏日本，但是从美国的立場說来，它又不可能乖乖接受日本的压迫性的提案。赫尔和野村之間进行过多次会談，到5月31日，赫尔才把美国的方案遞交野村。这是非正式的提案，可說是美国方案和日本方案之間的折中方案。但是野村不肯把美国的原案立即轉达本国政府，建議双方指派起草委員，进行修改提案內容，但未能达到目的，乃于6月8日将美方提案轉达日本政府。日本在11、12两日召开政府、大本营联席会議，对这一提案进行了討論，由于松岡表示坚决反对，結果只决定給予野村

“希望在公正的基础上达成协議”的指示。赫尔通过格魯得知松岡一派人阻撓日美达成协議，因此对5月21日的提案多少作些修改，于6月21日把这一修正案和另外一項暗中强烈譴責松岡一派人的口头声明，一并交給了野村。这些在24日轉达东京政府，而在22日，日本政府已經接到了苏德开战的紧急报告。

关于苏德开战一事，日本政府当局尽管在这年春天就已經知道，可是一旦成为事实，它的外交方針立即陷于混乱了。关于当时日本的困境，格魯作了如下的分析：“(一)日本对付德国的双手被軸心国协定束縛住；(二)日本对付苏联的双手被中立条約束縛住；(三)日本和中国的冲突絲毫沒有解决的希望；(四)日本和荷印的談判，沒有取得由于政府的宣傳而被人們期待已久的成果；(五)日本的对美关系，从根本上，而且一步步地恶化了。”(《在日本的十年》)日本政府匆匆地对三国同盟重新进行了研究。这是因为，根据近卫等人的意图，締結三国同盟有两个目的，其一是調整日苏关系，其二是防止美国参战；而由于苏德开战和英法表明要援助苏联，日本締結三国同盟的大部分目的已經落空了。因此，近卫要求松岡外务相和陆海二相从新研討三国同盟，并作为理論上的結論，提出了廢弃三国同盟的問題，要他們加以考慮。

但是，相信德国必胜，在脑子里甚至梦想和德国瓜分西伯利亚的松岡，对此未加考慮；而軍部大臣也估計德国侵苏战爭大約“算不上名符其实的战爭，将不过是一种警察措施而已”，因此也沒有考慮廢弃三国同盟的問題。

在这种紧迫状态之下，近卫为了决定一个明确的态度，連日召开联席会議，終于在7月2日的御前会議上决定了“适应局势演变帝国国策綱要”，大体上明确了日本的态度。于是，受到德国支持的松岡的猖狂的立即对苏开战論遭到否决，而决定“暫时不参加德苏战爭，暗中进行对苏作战的准备”，“一旦苏德战局变为对日

本有利”,立即向北方使用武力。同时,关于南方問題,决定“为了达到目的,不辞对美英开战”,并根据“对印度支那、泰国措施綱要”(以軍部的提案为基础,內容規定:与法属印度支那、泰国締結軍事、政治和經济协定,特別是对于法属印度支那,即使訴諸武力也要迫使它向日本提供軍事上的种种便利,例如同意日軍設立軍事設施等。本綱要是經过1月30日的联席会議和2月1日的內閣会議的討論及同日天皇批准而决定的。)和“关于促使对南方措施实現事項”(內容是进一步加强对法属印度支那、泰国的措施,并規定,一旦遭到美英荷兰的妨碍而“忍无可忍”时,即不辞对美英开战。这是在6月12日的联席会議上决定的。),决定进一步加强南方政策。这次会議是决定了以“不辞对美英一战”的态度堅持南进(进駐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一次划时代的会議。在这次会議上,“虽然控制了立即对苏开战的强硬論,但是作为一种交換条件,却不得不作出进駐法属印度支那的决定。”(近卫:《和平的意志》)尽管如此,近卫却因为暂时避免了对苏开战而感到滿意,并想借此机会促使日美交涉达成协議。但是,“正在举行談判之中,随便决定这样重大的国策的作法,不是进行恐吓,就在发瘋,这等于把用左手作好的工作,用右手毁掉。”(重光葵:《昭和的动乱》)果然,日本政府这一极端秘密的决定很快就被美国方面所偵悉,美国感到日本沒有促使談判成功的誠意,从而对日态度迅速地恶化了。

不过,在美国方面,也从新发生了一种不便立即中断日美交涉的情况。因为美国在苏德开战以后就考虑到,如果日本和德国携起手来对苏开战,或向南进攻新加坡,会对于使德国在侵苏战争中彻底消耗的企图不利。罗斯福于7月4日通过格魯大使寄給近卫首相一封信,表示为了維持太平洋地区的和平,願意开始談判,并要求日本不要进攻苏联。近卫非常重視这一信件,当即征求松岡的意見。然而,松岡对此却并不重視,8日,他交給格魯一封复函,

反而要求美国澄清是否有意参加欧洲战争。17日，美国答复說，对德国行使自卫权是理所当然的，并立即加紧进行参战的准备。美国于7日宣布进駐冰島，就是一种具体表現。

7月8日，野村大使再次請求日本政府对于6月21日的美国提案的答复。美国提案在10日的联席会議上受到了审議，当时松岡特别要求让他的心腹斋藤良卫（外务省顾問）出席，全面地陈述了反对談判的意見。当天晚上，近卫与陆、海、內三相进行了秘密商談，結果在12日的联席会議上，作为海陆軍的共同意見，提出了如下的主張：(1)日本对于欧洲战争的态度，取决于条約規定的义务和自卫的需要；(2)对于中国問題，应以近卫三原则为依据，美国可以提出停战議和的劝告，但不許干預和平条件；(3)日本保留必要时在太平洋地区使用武力的权利。只要把上述三点肯定下来，其余不妨根据美国方案的精神进行談判。松岡虽然最后也表示同意以上意見，但对于12日的联席会議以后制成的最后方案，则托病不予审閱，并在这期間会見了德国大使。尽管这样，还是吸取了松岡的意見，并且在14日才制成了最后方案。但是，松岡并沒有把这个方案立即通知美国方面，而主張首先发出一份訓令，拒絕前述赫尔的口头声明，經过二、三日后再把日方的反建議通告美方。近卫等人鉴于拒絕赫尔声明的訓令中把这份声明說成是"不礼貌、而且沒有道理的"，并含有"美国若不先行撤回該項声明，日本就无法对諒解方案进行研究"这样激烈的詞句，恐怕这将引起对方的反感，于是，坚持停止发出这一訓令，或对其內容詞句加以緩和，至少，应与日方反建議同时发出。为了促成这件事，外务省美洲局长寺崎、陆軍省軍务局长武藤、海軍省軍务局长岡和內閣书記官长富田等曾于7月14日奔走了一整天；而斋藤良卫作为松岡的代表往訪近卫时，近卫并曾要求他轉告外相把訓令和反建議同时发出。尽管这样，外务省还是沒有通过美洲局长寺崎，而以其顾問斋藤的命令只

发出了拒絕接受赫尔口头声明的回电。不仅如此，松岡还命令欧亚局长坂本在把日本的反建議通告美国以前，先秘密通知德国。于是，美洲局长寺崎不得不急忙采取非常手段——在次日（15日）等待次官大桥一上班便立即取得他的批准，沒有經过松岡，就把关于通告美方日方反建議的电报发出去了。（这个回电，因为野村期待第三次近卫內閣会有新的訓令而沒有提交美方。）

赫尔看到日本方面对于他的口头声明作这样解釋，而感到震惊，并于7月17日撤回了这份声明，于是，野村大使立即向松岡表示辞职。这样一来，近卫也感到无計可施，在15日与內、陆、海三相进行了商談，并且說："或者是更換外务相，或者是內閣实行总辞职，二者必居其一"。在会議上，大体上一致认为，如果罢免松岡，由于松岡正在憤慨美国干涉日本內政，恐怕会引起严重后果，因而决定实行內閣总辞职。天皇和木戶也曾試图說服近卫是否只让松岡一人辞职，但是近卫考虑当初自己认为只有松岡才能制服軍部，所以不顾反对意見而起用他担任外务相，要是罢免松岡，当然自己也要負責任，因此沒有听从天皇和木戶的意見，而另行推荐平沼为继任首相，于16日向天皇提出了全体閣員的辞呈。

第三次近卫內閣和日軍进駐法属印度支那南部

7月17日，根据天皇的命令，召开了重臣会議，討論继任內閣的問題，結果全体一致同意近卫連任，因此近卫再次接到了組閣的命令。他立即着手組閣，并于18日举行就任式，第三次近卫內閣就此成立了。新內閣人选上的最大特点是丰田貞次郎担任外相。丰田也是主張极力避免同美国冲突的一个人。据近卫表示，当时他曾抱定决心采取丰田——野村的外交路綫，并表白自己的心願說"作殊死努力，使日美談判达成协議，以符合陛下的旨意"。即使他所說的是眞情实話，但是实际情况却无情地与此背道而馳。陆海两

軍統帅部的态度是不贊成丰田担任外务相，但是支持近卫內閣，它們于7月21日向近卫提出了以下三項建議，并受到采納，即：（1）根据7月2日御前会議的决定貫徹国策的基本方針，特别是按照既定方針对法属印度支那采取軍事措施；（2）加紧进行对南方及北方的备战工作；（3）在不違背三国同盟的限度內，进行日美交涉。这时，日本已經在北方和南方开始了严重的軍事行动。

在这以前，于同年5月6日，日本和法属印度支那之間签訂了經济协定；此外，由于日本的策动，在5月9日，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之間还签訂了和平条約。但是，1941年1月間继小林特使、向井代表之后被任命为特使的芳澤謙吉与荷印当局进行的談判却沒有取得积极成果。在1月16日，日本的总領事石澤向荷印当局递交了一份关于放寬对日本人入境的限制，扩大日本人在荷印的企业經营和确保荷印对日供应石油、橡胶、錫等的提案，但是荷印当局唯恐被納入日本的"共荣圈"內，因而迟迟不作答复。于是，在同年2月間，把談判的范圍局限于經济問題而重新开始了会談，并于5月14日，由芳澤使节提出了第二次提案。对此，荷印当局在6月6日的复文中，拒絕了日本的要求，最后在6月18日，双方发表了一份联合公报，会談即宣告中断，芳澤使节也在27日归国了。公报內称："日荷双方代表团对于这次有关經济問題的談判不幸未能取得圓滿結果感到遺憾。但是，这次談判的中断，并不意味着日本和荷印之間的正常关系因此而有所改变，这是不待言的。"在25日的联席会議上，重新研究了"关于推行南方对策的方案"，并附上一份由大本营陆海軍部所編写的以A B C D（美、英、中、荷）对日包圍陣势为論据的說明，奏請天皇批准进軍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經过这样一个过程，产生了前述7月2日御前会議的决定。

当时，从7月下旬起，陆軍以"关东軍特别演习"的名义，在"滿洲"动員了十六个师三十万兵力。但是这一行动还不是下定决心要

对苏联开战，而是等待德国侵苏战争的发展变为对日本有利，后来又經过陆海軍之間多次商談的結果，在8月6日的联席会議上作出了对苏严加防御但极力避免日苏开战的决定，由此，陆海軍双方都专心致力于向南方扩張。这样，从7月14日起，日本政府同法属印度支那之間就日軍进駐問題开始了談判，并于同月23日簽訂了日本法属印度支那共同防卫协定。日本政府于26日公布了这个协定，从29日起，日軍开始向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进駐。正是由于这一軍事行动，才把日美交涉推到了决裂的阶段。

法属印度支那的問題，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异常关心，当时，赫尔虽然在病中，还是于15日和21日分别通过司长汉密尔頓、参事巴兰坦和副国务卿威尔斯向野村大使探詢眞相。当24日野村通过斯塔克作战部长的联系拜会罗斯福的时候，罗斯福曾表示美国所以推迟对日禁运石油，就是为了防止这种事态的发生；他还說，現在还不算晚，若能締結一項协定，使法属印度支那变成瑞士那种情况，則日美关系将不致恶化。这一建議并沒有获得日本政府的贊同，当26日日本法属印度支那共同防卫协定一公布，美英两国立即冻結了日本資产，把菲律宾軍队置于美軍的指揮之下，并向中国派遣了美国的軍事顾問团。到8月1日，美国宣布禁止除棉花和粮食以外包括石油在內的一切物資的对日出口。

当美国宣布全面地对日禁运石油以后，日本海軍方面的意見也逐漸傾向于与其坐待着石油的"日就涸竭"，倒不如先发制人了。据估計，如果得不到石油的供应，不出二年，日本海軍将完全陷于癱瘓状态。当时，坐等一天，就要消耗大約一万二千吨的石油。經济絕交带来的打击是相当大的。日本为了打开已經感到絕望的日美談判的僵局，試作了努力，这就是利用7月24日罗斯福所提出的关于"法属印度支那中立化"的提案。近卫几乎連日召开联席会議，并对右派也进行了工作，最后在8月4日的联絡会議上决定了

向美国提出的照会。但是在这份照会中沒有保証法属印度支那中立化的詞句，大意是日本方面不向法属印度支那以外的西南太平洋地区扩張，要求美国方面也停止其在南太平洋地区的軍事措施。所以，在8月6日野村把这份照会递交給赫尔以后，赫尔表示冷淡，他說："只要日本不停止武力征服，就沒有談判的余地"。8日，赫尔把美国的复文交給了野村，大意是說日本的答复完全是文不对題。井川、岩畔担心談判将会决裂，乃于7月31日乘飞机离开华盛頓回国。他們回到日本以后曾前往各地积极地宣傳了愼重論，但是沒有发生作用，不久，岩畔被"提升"为駐法属印度支那部队的团长了。

8月初，在陷于絕境的近卫的脑海里，又浮現了一个可以說是最后手段的想法，这就是和罗斯福举行直接会談。8月4日，近卫把这件事告知陆海两相，二人当場都未能表明态度，海相在当天以內表示贊成，而陆相則用书面表明了在近卫接受下列两个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贊成，这就是：(一)不同意与赫尔国务卿以下的人物会談；(二)即使会談的結果失敗，近卫也不辞职，而积极站到对美作战的前列。近卫于6日召开了联席会議以后，即上奏天皇，得到天皇的批准和"从速举行"的指示，于是，他就下定决心，在会談中，关于陆軍所反对的撤兵問題，必要时将从会談地点直接用电报請示天皇批准，"即使丧失生命"也要使会談达成协議，在7日将此事通知了野村大使。当野村接到这份訓令的时候，罗斯福正在大西洋上与丘吉尔举行会談，因此，野村便于8日委托赫尔加以轉达。

罗斯福結束了同丘吉尔的会談回到华盛頓以后，立即于17日接見野村，在赫尔国务卿的陪同下，当面交給野村一份堅决譴責日本在南方地区使用武力的备忘录（这是在发表了大西洋宪章的罗丘会談中罗斯福向丘吉尔約定的），同时，对举行两国首脑会談虽

表示贊成，但又要求日本"发表一項最清楚地說明日本政府当前的态度和計划的声明"。日本政府在8月26日举行了联席会議，决定了对于美国总統在17日提出的照会的复文，并通过了"近卫致罗斯福书"。这两个文件，于28日由野村大使直接交給了美国总統。美国总統对近卫的信表示贊揚，似乎抱有举行会談的意向。(野村:《出使美国》)但是，到9月3日，美国总統秘书厄尔利却正式否认了近卫曾經向总統建議在太平洋上举行会談的事实；同一天，总統秘密接見野村，遞交了对于近卫来信的回信和美国政府的备忘录。当时，总統表明，由于国内輿論不容許改变一向的政策，因此处境十分困难，对于举行两国首脑会談，沒有表示象上次那样大的兴趣。备忘录指出，美国在6月21日提出的建議一直沒有討論，并希望以此为基础重新开始談判。它还认为，为了近卫和罗斯福的会談得以順利举行，必須提供某种保証，因此建議首先举行預备会談。次日(4日)当野村往訪赫尔时，赫尔的态度更加强硬，他把必須遵守"四原則"作为談判的前提条件。在野村从罗斯福那里接到了二个文件的9月3日召开的联席会議上，日本政府又决定了新的提案，这个提案在9月4日通过双重方式，即同时由外相丰田交給格魯和駐美大使野村交給赫尔，向美国提出了。对于这个提案，美国方面认为它比較8月28日的声明討論范圍更加縮小而断然拒絕了。

"帝国国策实施綱要"

这一談判在极端秘密中断断續續地进行期間，有关談判的消息在日本方面逐漸泄漏出去，特别是陆軍方面出現了反对意見，进入8月以后，在参謀本部里，甚至包括首脑部在內都大致认为談判无用而主張对美开战了。因此，在9月6日，根据統帅部的要求和提案，在御前会議上作出了一項重大决定：通过了"貫徹帝国国

策綱要”。这个重大决定的內容如下：

帝国鉴于当前的紧張局势，特别是美、英、荷等国所进行的对日攻势，苏联的情况及帝国国力的机动性，决定对于“适应局势演变帝国国策綱要”中有关对南方的对策按照下列各項原則加以执行：

一、帝国为了确保生存和进行自卫，并以不辞对美（英、荷）开战的决心，大体上以10月下旬为期，完成战爭准备。

二、帝国在进行前项准备的同时，对美、英采取一切外交手段，力求貫徹帝国的要求。

在对美、英交涉中，帝国必須实現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事項及与此有关的帝国可以承諾的限度詳見附件。

三、通过前項外交談判，到10月上旬如果仍然沒有希望实現我方要求时，立即决心对美（英、荷）开战。

对南方以外的其他地区的对策，則根据既定的国策加以执行，特别要积极努力不使美苏結成对日联合陣綫。

附件的內容如下：

第一，在同美（英）的談判中，帝国必須实現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事項：

一、美、英不得干涉或妨碍帝国处理“中国事变”。

二、美、英不得在远东采取威胁帝国国防的行动。

三、美、英必須协助帝国获得所需的物資。

第二，帝国可以承諾的限度：

一、帝国不以法属印度支那为基地，向除中国以外的邻近地区实行武装侵入。

二、帝国准备在公正的远东和平确立以后，从法屬印度支那撤兵。

三、帝国准备保障菲律宾的中立。

为了迫使美国接受这种显然和美国利益不相容的条件，日本政府終于給談判規定了期限。对于石油等战略物資的儲备日益減少的日本来說，交涉的时間拖得越长，就越发不利，因此，給交涉規定期限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样就等于規定为10月上旬实行宣战。

据說在这次御前会議的前一日，天皇在听取陆海軍統帅部长的报告时，曾着重指示說“在目前，主要应該以外交作为重点”，并在御前会議上口誦明治天皇的短歌：“当今四海皆兄弟，世界何事起风波！”，重述了“爱好和平”的意願。（近卫：《和平的意志》）但是，即使在口头上指出了以外交为主，其次再考虑战爭的問題，然而对于在規定了开战期限情况下进行的战爭准备越来越使外交談判无法进行，并造成了战爭必然爆发的局势，并沒有采取任何負責的措施。

近卫下台

在9月6日的御前会議上給日美談判規定了限期以后，近卫对形势的发展感到焦虑，因而就把最后希望寄托在举行日美首脑会談上了。近卫认为日美談判所以竟兜圈子而不能取得进展，关于举行首脑会談的提案所以未能付諸实施，是因为仅靠野村根据并利用东京和华盛頓之間的电报联系进行工作不能充分轉达日本的眞意，于是在决定了“貫彻帝国国策綱要”的9月6日晚上，在极密中会見了格魯。这次会見，事先曾經获得陆、海、外三相的同意，会見时在座的还有近卫的秘书牛場友彥和美国大使館参贊道尔曼。

在这次会見中，近卫着重指出，由他的內閣进行談判，是日美之間取得妥协的最后机会；日方代表人选已經大致决定；以及他和美国总統早日举行会談的必要。格魯答应把当日会談的內容向本

国政府报告，并感慨地說:"这个报告将成为自己开始外交官生活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报告。"(格魯:«旅日十年»)

接着在10日，丰田外相又接見格魯，暗示近卫和罗斯福会談的必要，他在27日再次会見格魯，同时訓令野村为实現首脑会談进行努力。

近卫內閣为实現首脑会談而作的这种最后努力，竟使格魯在9月27日发出了主張继續会談的长篇报告。这个报告一方面承认对于日本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必然带有危險性，另一方面又指出，鉴于近卫內閣最近的认眞努力，存在着充分的希望，举行两国首脑的会談将把远东形势的恶化限制在最小限度，并可能取得眞正建設性的成果。(格魯:«旅日十年»)

但是，日美談判无論在华盛頓或东京，都依然是困难重重。9月10日，格魯提出了一項质問，这是对于9月4日日方提出的方案的答复，他对日本方案把討論的范圍加以无理的局限避而不談中国問題，进行了严厉的譴責。因此，日本方面也采納了陆海統帅部的意見，于9月20日召开联席会議，就对于美方质問的答复和中国問題进行討論，决定了最后的綜合方案。这个綜合方案，恢复了以往的日美諒解方案的形式，是針对6月21日的美国方案的一个修正案。日美談判的难点，至此已經大致趋于明确，在原則方面，是4月16日以来赫尔一貫坚持的四原則;在具体問題方面，是三国同盟、中国駐兵和机会均等三个問題。在手記中«关于日美交涉»里記載的近卫的想法是这样。对于其中的三个原則，近卫在与格魯会談时也曾表示"在原則上"沒有异議，所以他本人沒有問題，但是陆軍和外务省方面的一部分人对于原則上同意这一点也表示反对。然而对于这个問題，如果再来从正面加以否定，日美交涉卽将陷于无法进行，因此如何处理这个問題，实在使他煞費苦心。其次，关于經济原則的問題，日本准备承认对中国的机会均等原

則，并认为日本和中国在地理上的特殊关系，美国也能予以諒解。关于三国同盟的問題，考慮到日本和德国的关系，不便用书面表达意图，但是日方估計，只要能够举行首脑会談，就可以充分进行商討。最后是駐兵問題，因为陆軍方面坚决地反对撤兵，所以他甚至认为只有这个問題最为棘手。由于美国方面所考慮的与其說是駐兵的实质問題，勿宁說是想使日本暫时先撤兵，然后締結新的协定来規定駐兵的形式問題，因此近卫考慮，必要时可以采取非常手段，即从会談地点直接用电报請求天皇批准，并立即在协定上签字。

但是，大本营的陆海軍部却在日美談判停滞不前期間，都以10月下旬为期，紧張地进行了对美、英、荷的作战准备。大本营海軍部于9月1日命令全軍完成战时編制，大本营陆軍部也在9月18日，作为决心开战的准备，命令适应局势变化随时作好作战准备。海軍继去年11月間在实行准备开战的动員的同时对艦队作了重新編組和征用了約計六十三万吨船舶之后，又决定追加征用船只四十九万吨，共計二百六十五艘。陆軍則以关东軍特別演习的名义，开始把駐在"滿洲"的第五十一师团以及在"滿"空軍和地上部队、內地动員部队調往华南、台灣和法属印度支那北部。

在9月25日的联席会議上，陆海軍統帅部长要求政府，根据"貫徹帝国国策綱要"，最迟也要在10月15日以前就和战問題作出决定。据他們表示，为了在10月底以前完成作战准备，至少需要在二周以前下定开战的决心。近卫着慌了。联席会議散会以后，近卫邀請閣員到首相官邸，詢問上述要求是否是坚决的。对此，东条陆相答称："他的要求是坚决的。不过，与其說是要求，不如說仅仅是重申了9月6日的决定而已。"东条接着又于27日会晤海相及川，詢問海軍方面对于9月6日决定的态度，并表明了陆軍的强硬态度。

10月2日，美国方面交給了野村一份照会。这个照会根本不理睬日本方面在9月27日提出的最后的綜合性方案，而以对9月4日方案答复的形式要求日方确认四原則、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撤退一切駐軍，內称："美国政府鉴于日本政府以往就其目的所作的表示，并根据日本政府在这些原則的具体适用上設立限制和例外的情况，得到了这样的印象，即：日本政府是否在考虑双方討論的問題必須受到严格規定。如果这个印象沒有錯誤，那么，日本政府是否能够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举行两国首脑会談，对于两国所怀抱的崇高目的的实現，能够作出貢献。"同时，赫尔还对野村說：美国政府认为，在举行会談以前双方若不預先在原則上取得一致，則两国首脑的会談就沒有把握取得成就；为了維持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不能仅仅依靠应付一时的諒解，希望締結一項明确的协定。野村表示："这个答复，将使东京感到失望，但是我一定轉达。"（野村吉三郎：«出使美国»）

这样一来，近卫对于首脑会談的期待完全落空了。关于日美之間的紛歧，如果按照木戶的說法，就是这样：情况好比日本劝美国登楼观賞美景，美国說你先說說是怎样的景致，而日本偏不告訴，只說你上来一看就知道了。就这样，終于未能达成协議。（«木戶日記»）从9月27日起一直蹲在鎌仓苦思焦虑的近卫，一接到上述照会后，立即在10月4日謁見日皇，然后召开了只有首相、陆、海、外务三相、陆海軍統帅部长和外务省美洲司长参加的联席会議。会上，由丰田外相宣讀了对于美方照会的复照草案，因认为有仔細研究的必要，所以未加审議就散会了。在这次会議席上以及10月5日在荻外庄和东条陆相的会談中，近卫都极力表明继續談判的决心，陆海軍、政府和大本营等都对美国的照会进行了认真的討論，各方面的态度逐漸明确了。陆軍在10月6日召集首脑会議，决定了以下的方針：(一)陆軍认为日美交涉沒有取得妥协的希望，

因此，开战是无法避免的；(二)关于駐軍問題，包括其表現方式，不能改变既定的条件；(三)如果外交当局认为有取得妥协的希望，則不妨以10月15日为限期，继續进行交涉。

10月7日深夜，以上述强硬决心为背景的东条陆相前往首相官邸会晤近卫，表明了陆軍坚决的态度，他說："关于駐兵問題，陆軍方面絕不能接受美方所主張的原則上暫时先撤退全部兵力然后再重新进駐的方式"。这一天，內閣书記官长富田报告內大臣木戶說，陆軍认为交涉沒有希望，海軍則希望继續交涉，但是陆海軍的中坚层却一致要求政府首脑部下坚定的决心。在同一天，据說杉山、永野两統帅部长举行会談，并就陆海的意見取得了完全一致。次日(8日)，陆軍次官木村兵太郎向东久邇宮报告說，因为美国的条件无法接受，陆軍已經决心停止交涉，对美开战，海軍还对談判抱着希望，所以目前正在和海軍进行商談。根据永野的手記，海軍的态度是这样：(一)如果交涉拖长了，对于作战不利；(二)如果继續談判，就需要有必成的信心。10日，东条再次会晤近卫，扼要陈述了大本营的以下三点意見，促使近卫下决心，这就是：(一)鉴于美国沒有表現互让的态度，对美交涉沒有取得妥协的希望；(二)不同意无条件接受美方所主張的四原則和日本在中国駐兵的条件以及对此让步；(三)无意改变9月6日御前会議的决定。

近卫和丰田仍旧期望通过外交手段打开局面，在10月10日举行了两次晤談，就日美继續交涉的方法进行了研究。7日和10日，丰田会見了格魯，9日，野村往晤赫尔，探詢美方的意图，美方表示坚持6月20日方案和10月2日照会的主張，寸步不让；如果日方同意以这两个文件为基础，美方同意继續进行交涉。至此，近卫已經面临必須就继續交涉还是停止交涉，是战是和的問題作出决定的最后关头了。近卫在他的五十誕辰——10月12日，还在荻外庄召开了最后一次五相会議。出席者除近卫本人外，有陆相东

条、海相及川、外相丰田和企划院总裁鈴木。在这次会議上，展开了剧烈的爭辯，由于意見紛歧，沒有得出結論，最后，根据东条的建議，一致同意就下列事項进行討論。

关于日美交涉，必須对于在保証：

一、不改变就駐兵問題的主張以及与此有关的各項政策；

二、不触动“中国事变”的成果；

这两个前提条件下可能获得外交上成功一事，大体上在統帅部所要求的限期內取得充分把握。

在取得这种把握的基础上，可以采取通过外交談判取得妥协的方针。

在进行上述交涉期間，可以停止作战上的各种准备工作。

关于以上問題，請外相研究有无可能。

这些条件和美国的态度是完全对立的，只要陆軍坚持这些条件，显然是不可能取得妥协的。这时，海軍方面据說內心是不願意开战的，但是又不肯說出口来，只好表示关于和战的問題完全委諸首相作决定。海軍在发言中还强調：如果决心开战，就及早决定；如果打算继續交涉，就要本着坚决取得妥协的精神来进行。陆相东条抓住此点，一方面着重指出駐兵問題是陆軍的生命所系，一步不能退让，同时又詰問首相和外相，究竟交涉能否取得妥协。东条还主張为使陆軍能够控制部下，唯一方法就是由海軍正式宣布不願开战，但是海軍为了保持面子却不肯这样作。这样一来，对于东条停止交涉的主張，首相和外、海两相全都束手无策了。在 14 日的內閣会議上，由于东条不同意从中国撤兵，并主張停止日美交涉，內閣的意見紛歧終于表面化了。在同一天，东条还通过鈴木貞一向近卫表示謝絕会面，并建議內閣实行总辞职。鈴木还在 15 日和 16 日分别向木戶和东久邇宮傳达了东条的这一意图。总之，这无非是表明陆軍对內閣的不信任和进一步发起倒閣运动。东条在

向近卫的建議中还提到继任內閣的首脑問題，主張能够控制陆海軍的只有皇族，幷举出东久邇宫最为适任。天皇和木戶接到近卫有关以上情况的报告后，在16日正式表示了不同意。理由是在和平时期尚可，但在有爆发战爭危險的时期，为皇室着想不应該这样作，也就是說，要避免使皇室担負战爭責任。

至此，近卫也終于决定总辞职，而在16日傍晚提出了辞呈。这个內閣从成立起仅仅三个月，它的原初目的是要通过交涉来同美国取得妥协，但是在这期間，它不仅沒有达到目的，反而把事态推到必須就和战問題进行抉擇的最后阶段而被迫下台了。

第四章　太平洋战爭的爆发

第一节　东条內閣的成立和开战

东条內閣的产生

第三次近卫內閣总辞职以后，在 10 月 17 日举行了决定继任首相人选的重臣会議，出席者有清浦、若槻、岡田、林、广田、阿部和米內等前首相，以及樞密院議長原和內大臣木戶等。近卫因不願出席，托詞患了急病，而用书面作了到发生政变为止的經过报告。在这次会議上，若槻提名宇垣，林提議由皇族成員出来組閣，然而这些都遭到了木戶的反对，他推举了东条英机。理由是"使充分了解这一事态(日美交涉)的經过情形幷对日美妥协实現的困难最有深切体会的东条組閣，幷使其力求陆海軍的眞正合作和重新研究御前会議的决定，将是收拾时局的最为实际的办法。"(«木戶日記»)內心认为軍部推翻了近卫內閣的重臣們对于木戶的这种意見虽然感到惊异，但也提不出积极的反对理由，在广田、阿部和原等表示贊成的情况下，他們虽然对前途心怀不安，但也只好表示同意了。岡田說这次会議簡直象是木戶和阿部在演"对口相声"；若槻也說他覚得这意味着以毒攻毒，也未尝不可，也就默不作声了。(矢部貞治:«近卫文麿»)

当日下午，日皇下令东条組閣，接着，又召見了海相及川，吩咐二人要遵守宪法的規定，实行陆海軍密切合作。二人退出以后，木戶对他們說这是天皇的指示而讲了以下这段話:"关于陆海軍合作一节，我想陛下适才已經說过，此外，在决定国策的大綱上面，不必拘泥于 9 月 6 日御前会議的决定，必須对国內外局势进行更深刻更广泛的研討，然后加以愼重的考慮。"(«木戶日記»，10 月 17 日

条）

这样，就在 10 月 18 日成立了包括下列成員的东条內閣。

內閣总理大臣兼陆軍大臣、內务大臣	东条英机
外务大臣兼拓务大臣	东乡茂德
海軍大臣	嶋田繁太郎
大藏大臣	賀屋兴宣
司法大臣	岩村通世
文部大臣	桥田邦彦
商工大臣	岸信介
递信大臣兼鉄道大臣	寺島健
厚生大臣	小泉亲彦
（企划院总裁）	鈴木貞一
农林大臣	井野碩哉
国务大臣	安藤紀三郎
內閣书記官长	星野直树

东条为了集中权力和加强統制，在这个內閣中糾集了了解以往情况的官僚，他自己則兼任陆相和內相，起用他在“滿洲”时期的熟人星野担任书記官长，并把他的心腹爪牙安置在陆軍的重要位置上，通过这种任用私人的办法，完全把这个官僚內閣变为自己的“事务机构”。东条“独裁”体制，从此迈出了第一步。

本来，陆海軍統帅部认为在当时的局势之下，任何內閣上台，在采取对策上面都将达到日美开战不可避免的結論，而正在忧虑如果出現主張和平的內閣，将要造成完全无視軍事上的要求的情况。由于組閣的命令“意外”地落到东条手里，这虽然还不是肯定了日美开战論，但軍部的强硬論却受到了很大的鼓励。然而，后来东条在东京的远东国际軍事法庭上却供述說，若非日皇指示他“一切从头作起”，也許不会接受組閣的命令，自己也认为有“一切从头

作起"的必要，并决心准备这样作，同时在邀請别人入閣，被問到对美交涉的方針时，也都表示要"一切从头作起"。(«东条供詞»)关于这点，似乎近卫也很放心，他在給美国駐日大使格魯的信中写道，他的辞职，并不一定是由于已經决定对美开战的結果，他认为继任內閣也一定会尽最大努力继續交涉，直到取得圓滿結果。他还接着說:"深望您和貴国政府不要由于內閣的变更，或仅仅根据新內閣的外表和印象而过分失望。"(格魯:«旅日十年») 但是美国政府却由于东条內閣的成立而完全失去了对于交涉成功的期望。美国的报紙和广播都异口同声地把这次政变說成是导致日美冲突的前奏，国务卿赫尔也感到:"我們对于近卫內閣并沒有抱多大期待；而对于10月17日成立的东条內閣，則更不能抱期待了。"(赫尔:«回忆录»)就連最初期待东条內閣由于首相是現役軍人，可以比前任更好地控制軍部內过激分子的格魯，也在11月3日电告本国政府开战危机已經迫近，他說:"必須指出，低估和平談判宣告失败以后日本所进行的明显的准备，是一种近視的看法。同时还要指出，美国在决定政策上面，如果把日本的准备仅仅看成是为其高压外交提供精神支持的一种武力威胁，那也是非常近視的。日本很可能采取危險的戏剧性的突然行动，造成美日之間的軍事冲突。"(格魯:«旅日十年»)

另外，10月20日，木戶在日記上作了如下的記載:"皇上对于我在內閣的更替上所作的工作給予了很大的嘉奖，使我感到惶恐。我詳細地奏禀皇上，此次內閣的更替，真是只要走錯一步，就有意外地引起战爭的危險。經过熟虑之后，深信这是打开局面的唯一办法，所以才奏請批准。皇上深表同意，并且說道，这就是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至为感激。"木戶的工作是否得到了日皇所說的"虎子"了呢？后来的局势很快地就作了答复。

决心开战

东条內閣首先在10月21日由东乡外相訓令駐美大使野村通知美国政府，这个內閣和前任內閣一样具有改善日美关系的誠意，并使野村催促美方对日方9月25日的提案(参看本书第3章，第2节)提出反建議；与此同时，于10月23日召开了第一次內閣大本营联席会議，决定就欧洲战局、日美交涉的前途、以及对开战后作战和經济的估計等各方面的問題，进行认眞的討論，以后直到30日为止，几乎每天都召开了这种联席会議。这就是东条所謂的为了“一切从头作起”而进行的“对国策重新研討”。到10月29日，关于对美交涉的前途已經肯定，根据旣定的条件，不可能在短期間內取得妥协，决定了日本对10月2日美方照会的反建議案(甲案)。接着在11月1日的联席会議上，就貫彻以上述方案为基础的国策的方法，討論了以下三种方案：

1. 根据甲案继續进行日美交涉，纵使最后宣告决裂，日本政府也忍耐不动。

2. 就此終止交涉，立即开战。

3. 一面继續进行交涉，力求达成协議；一面下定开战的决心，进行作战准备。

在以上三种方案中，选擇哪一种方案呢？关于这个問題，进行了激烈的反复的爭論。在这場爭論中，統帅部从其开战不可避免的判断出发，认为外交談判的目标应当放在取得开战的名义并隐蔽作战的企图上；同时还考虑到雨季等气象上的条件，为了不逸失作战时机，主張从速下定开战的决心。对此，外相曾經力图加以阻止，但是他的努力，也只限于尽可能地把停止外交談判的日期向后推迟而已。最后的結論是采用第三方案，并决定以12月1日午前零时为停止外交談判的限期。外相从国际形势出发，认为日美战

争将要长期化而抱着悲观的估計，关于根据上述第三方案进行交涉的条件，除已經决定的甲案以外，又提出了一个乙案。乙案是甲案不能通过时提出的，目的在于只就为防止战爭爆发所必需的项目达成协議，使两国关系回复到日軍侵入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和美国冻結日本資产以前的状态，以使局面得到暂时的稳定。这个方案是由前任外相币原所草拟并經过东乡作了某些修改。陆軍方面认为这个方案把解决中日战爭的問題撇开不談，而只是希求“姑息的和平”，表示反对，但由于外相不惜以个人去留来坚持这一方案，結果，經过若干修改后得到了通过。这样，好不容易才得出了国策方案，并提交到 11 月 5 日的“御前会議”上討論。这一方案內容如下：

貫徹帝国国策綱要

一、帝国为了打开目前的危險局面以达到生存和自卫的目的，并建設“大东亚新秩序”，現在决心对英美荷开战，并采取如下措施：

（一）发动武装进攻的时期定为 12 月初，陆海軍应作好作战准备。

（二）对美交涉按另項綱要进行之。

（三）加强和德意两国的合作。

（四）在发动武装进攻以前，和泰国建立密切的軍事联系。

二、对美交涉如在 12 月 1 日零时获得成功，即取消使用武力。

对美交涉根据部分內容有所緩和了的方案，即将一直成为悬案的重要事項的表現方式加以緩和和修改而成的另項甲案或乙案来进行，并力求达成协議。

甲案

9 月 25 日日方提案作如下修改，以緩和其表現方式。

一、通商上无差别的問題:

如果根据 9 月 25 日方案絕无达成协議的可能时,可将这一方案作如下修改:“如果无差別原則在全世界得到实行的話,日本国政府即同意这一原則可以适用于整个太平洋地区,包括中国在內。”

二、三国条約的解釋及履行問題:

在进一步表明日方无意随便扩大对自卫权的解釋的同时,幷以这样說法应付对方:关于三国条約的解釋及履行,正如屢次所表明,帝国政府根据自己的决定采取行动。此点,諒已得到美方的諒解。

三、撤兵問題:

对这个問題作如下修改以緩和其表現方式:

(A)日本在中国的駐兵及撤兵。

在“中国事变”中派往中国的日本軍队,于中日間和平实現后的必要期間內,仍然继續留駐在华北及“蒙疆”的一定地区和海南島。其余軍队,在和平实現的同时,根据中日两国另行締結的协定,开始撤退,随着治安的确立,于两年以內撤退完毕。

(注)如果美方关于必要期間提出质問,可答称估計为二十五年。

(B)日本在法属印度支那的駐兵及撤兵。

日本政府尊重法属印度支那的領土主权。目前派往法属印度支那的日本軍队,在“中日事变”获得解决,或在远东确立起公正的和平时,立即撤退。

此外,对于四原則,应极力避免将其包括在日美間的正式协議事項(諒解方案或其他声明)中。

乙案

一、日美两国政府明确約定不向法属印度支那以外的东南亚及南太平洋地区实行軍事扩張。

二、日美两国政府进行合作，以保証各自从荷印获得其所必需的物資。

三、日美两国政府将其相互間的通商关系恢复到日方資产被冻結以前的状态。美国政府保証供应日本所需要的石油。

四、美国政府不得采取任何行动来妨碍为恢复中日两国間和平所作的努力。

备考

一、必要时，可以約定，在本协定成立时，日本准备把目前駐在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地区的日本軍队移駐北部地区；而在中日两国間实現和平或在太平洋地区确立起公正的和平时，即将撤退上述日本軍队。

二、必要时，可将甲案中所包括的有关通商上无差别原則的規定，以及有关三国条約的解釋及履行的規定加进本案中。

11 月 2 日晚間，东条首相偕同参謀总长和軍令部总长将以上决定密奏日皇，并为"愼重"起見，在 4 日召开了沒有前例的陆海軍軍事参議官联席会議，就"貫徹帝国国策綱要中有关国防用兵問題"作出决議說："統帅部为应付最坏情况加紧战爭准备而采取的措施是适当的。"因此，在 11 月 5 日的御前会議上，上述議案便原案通过了。就是說，这次会議决定，一面交涉，一面准备战爭，而交涉期間还不到一个月，同时統帅部提出条件，不能由于外交談判而妨害作战。这次御前会議，可以說是事实上决定要开战的一次会議。因为，在这次会議上，外相东乡关于交涉的前途曾报告說："遺憾的很，交涉圓滿成功的希望很小"，于是作出决定，一旦这一几乎沒有希望的交涉宣告决裂，便立即开战。而在这以前，日軍已經为了开战的目的加紧进行了战爭准备。海軍方面早在 9 月底已将联

合艦队的主力集中到九州的佐伯灣作好出动准备，并于11月1日发布了“联合艦队机密命令第一号”，內容为“大日本帝国向美国、英国与荷兰宣战，宣战将在X日正式公布，本令将在Y日实施。”5日，又发出同样命令第二号，內称Y日为11月23日；8日又发出第三号命令，規定X日为12月8日。（朝日新聞法庭記者团：《东京审判》第二輯）陆軍方面也在11月6日下令南方軍与南海支队完成作战編制并作好攻取南方要地的准备，同时又任命了大将寺內寿一及其他将領为南方軍总司令官以及各路軍司令官。（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一卷）

就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了这一阶段的日美交涉。日本政府已于4日把上述甲案和乙案通知了野村，这两个方案在5日的御前会議获得通过以后，立即訓令野村根据甲案开始交涉。日本政府在4日給野村的电报中指出：“这是最后的一次尝試，須知这次我方提出的方案无論在形式上或实际上都是最后方案”；同时还指出，11月25日为进行交涉的限期，希望从速进行。另外，日本政府又接受野村的請求，特派来栖三郎輔助他进行这項工作，来栖于11月6日急忙由东京启程，經香港飞往华盛頓。

野村于11月7日把甲案交給了赫尔。这时，美国政府已經暗中获得了日本政府11月4日拍給野村的訓电，得悉交涉的限期定为11月25日，从而估計到了日本方面备战的企图。而且来栖也并未带来任何新的解决方案，这就进一步使得美国方面大失所望。赫尔对于日本政府派遣来栖到华盛頓的目的作了如下的估計：第一、施用一切压力与說服手段迫使美方接受日本的条件；第二、如果上述办法达不到目的，即用会談拖住美方，直到日本完成其进攻准备。（赫尔：《回忆录》）因此，在7日以及10日的会談中，赫尔与罗斯福对待野村的态度是非常形式的；而在15日的会見中，当野村催促赫尔进行談判时，赫尔竟說“岂有此理”而表示很不

高兴。(野村吉三郎:«出使美国»)在战后的远东国际軍事法庭上,这份 11 月 4 日的訓电成了問題。檢察員方面将这一訓电列为說明日本政府并无交涉誠意的証据之一。对此,东乡却申辯說,由于野村的交涉方式在政府內部已經引起不滿,于是"使用了稍微过于强硬的詞句";同时,美方暗中获得了日方电报后所作的英譯也不够完善,例如原文为"本案……为經过修正的最后的让步方案",竟被譯为"本案……为經过修正的最后通牒"等情况也对于交涉的决裂产生了重大影响。(东乡:«时代的一面»)

这且不談,反正美国方面相信日本政府已經决心开战的情报,并判断日美战爭不可避免。在此基础之上,它力求避免給予"日本以停止交涉的口实",換言之,即让日方开头一枪,以使美国获得参战的充分理由,并为此举行了高級官員会議。美国政府之所以这样作,是出于以下的考虑,即:使当时在国会中仍占有相当势力的孤立主义者也同意对日战爭,以及为充实軍备"爭取时間"。(赫尔:«回忆录»)因为这时美国軍部尚未完成作战准备,不贊成立即开战。11 月 5 日美国作战部长斯塔克和参謀总长馬歇尔向罗斯福提出劝告:目前为了打倒德国,不要举行无限度攻击的对日战爭,而应愼重从事,美国在远东方面的防卫力量得到充实以前应該避免对日作战。于是,罗斯福总統也考虑为了爭取时間实行日美"休战"和締結"暂时协定"的問題。而在 11 月 7 日的国务例会上,赫尔着重指出战爭危險逐漸逼近,他說:"形势极为严重,我們无法預測将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受到日本的武装进攻,因而必須經常保持戒备。"会議还通过了一項决定,使政府高級官員举行演說,强調形势的严重性,以使全国人民的思想能够适应形势的急剧轉变。同一天,斯塔克也宣称:"海軍已处在大西洋战爭之中,但国民并未理会这一点。……无論国民知道或不知道,反正我們是处在战爭之中。"(查尔斯比尔德:«罗斯福总統和战爭的来临»,1941年版)

美国政府由于9月4日发生的驅逐艦"格里尔号"事件和10月17日发生的"卡涅号"事件而向国会提出的美国中立法修改法案于11月17日宣告成立，它同时宣布要对商船施行武装化并准許其进入大西洋交战区域。上述两事件据美国官方公布的材料，都是由于美国驅逐艦受到了德国潜水艇的攻击而造成的，为采取对抗手段，总統才提出了关于修改中立法的要求。但事实上攻击的主动方面毋宁說是美国。(C.C.詹西耳:《从后門溜进战争》)罗斯福違背了自己在1940年竞选时提出的"不受到攻击决不进行战争"的諾言，这时，美国已經开始摘下它"中立国"的假面具了。刚好在这时即11月17日，格魯又从东京拍来一份电报，提請本国政府注意必須严重警惕日本陆海軍突然奇襲尚未被卷入中日战争的地区；格魯还认为，日本可能采取一切于它有利的战术，包括突然襲击和先发制人等手段。(美国国务院:《和平与战争》)

因此，尽管来栖在15日到达华盛頓，并于17日与野村一同会見了罗斯福，然而美方既然怀疑来栖的任务在于掩飾日本的作战准备，因此，这一交涉也就絲毫未能取得实质的进展。于是，为了打开交涉的僵局，野村于18日提出了一个建議，并力图說服赫尔国务卿。他的方案是：有关三国同盟的問題暫且不談，首先实現日本由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撤兵和美国解除对日本資产的冻結，然后在此基础上重新开始交涉。据野村收到的情报表明，这一交涉的前途是有希望的。然而日本政府在接到野村的这項报告以后，于20日发出一道訓令，全面地否定了把交涉范圍比乙案更加縮小了的野村个人的这一建議。訓令指出："仅仅保証恢复資产冻結前的情况，无論如何是不可能解决目前的紧迫局面，……目前已絕无任何先采取緩和局势的措施然后再进行談判的余裕，命令野村下次提出乙案，并且断然指出："如果以上这样作不能获得美方的同意，那么，即使交涉决裂也沒有办法。"这是一项"十分严厉、近乎叱責

的訓令。”（来栖三郎：《日本外交秘录》）当时，日本国內的政治情况实际上已經使外交談判陷于无法进行了。在17日召开的第七十七次臨时議会上，东条首相指出，美英荷冻結日本的資产，是一种“不次于武裝进攻的敌对行为”；他在演說中还表明，日本政府有关交涉的坚持不变的基础条件是：第三国不仅不得妨碍帝国解决“中日事变”的工作，不得向日本进行軍事威胁，而且还要取消經济封鎖之类的敌对行为，等等。对此，貴族院和众議院全体一致作了鼓励政府的决議，众議院議員島田俊雄并在就其提案精神进行說明时强調停止交涉，他說：“打鉄必須趁热，在此意义上，我們希望政府全力以赴地貫彻战争目的，而停止踏步不前的作法。”这种一味强調采取强硬方針的公开叫嚣，一方面使野村来栖的交涉工作陷于僵化状态，同时也使美国政府的态度更加强硬起来了。

赫尔备忘录

11月20日，野村来栖根据日本政府的訓令再次向赫尔提出了乙案。赫尔对其中第四項“美国政府不得采取任何行动来妨碍为恢复中日两国間和平所作的努力”的要求，頗有难色，他說，如果日本不澄清它与三国条約的关系，并明确表示采取和平政策，美国很难停止其援蔣行为。在日本方面規定为結束交涉的限期的11月25日的次日，赫尔作为对乙案的答复向日本大使面交了两份备忘录。这就是所謂《赫尔备忘录》。这是把6月21日的美国方案与9月25日的日本方案合并而成的，主要內容是：如果日本眞地对于解决問題具有誠意，它就应該接受4月16日赫尔提案中关于履行四原則的要求，一言以蔽之，它就应該把一切恢复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这个文件第一，提議締結中、美、英、苏、日、荷、泰間多边的互不侵犯协定(一)；第二，提議有关各国就法屬印度支那問題进

行談判(二);第三,要求日本从中国及法属印度支那撤退全部陆海空軍和警察力量(三);第四,規定对于中国,除重庆政府以外不承认任何其他政府或政权,而要求不承认“滿洲国”政府及伪南京政权(四);第五,要求在实质上廢弃三国同盟或者使它变成廢紙(九)。对此,来栖說:“如果接受这些条件,日本政府只有举手投降了”,而日本政府也认为这項备忘录簡直等于“最后通牒”,特别是对于急于要发动战爭的“軍部提供了良好的口实”。(《展望》1950年3月号,山本熊一的发言)

实际上,在美国方面,也是在决心对日开战以后才提出了这項《赫尔备忘录》。如前所述,美国政府首脑已經預計到对日开战,而正在考虑开战的时机。然而与此同时,在美国政府內部还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一种要推迟战爭爆发的动向。11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的专家曾向赫尔提出建議,主張有必要同日本締結某种形式的暫定的或临时的协定,到19日,远东司的高級官員又建議为了避免进行和德国与日本的两面作战,应該締結既非“日美协定基础方案”亦非单純的休战方案性质的“太平洋协定”。赫尔虽认为日本在20日提出的乙案是一种“最后通牒”,但根据远东司以上的意見,仍然与总統、軍部首脑以至中、英、澳、荷各国进行洽商的結果,制定了一項旨在“爭取时間”的“休战三个月”的暫时协定方案。赫尔于20日向各国代表提示了这項协定的草案,除中国代表外,其他都无异議,并向本国作了請示。24日,有关各国的外交官員又举行了一次会議,在会上,除荷兰表示支持休战以外,其余尙未接到本国的答复。在这中間,以中国駐美大使胡适为首的中国外交官員和蔣介石本人分别向美国政府当局和輿論界积极地展开了反对休战和阻止美日妥协的运动。因此,形势又向战爭的方向急轉直下了。在11月25日举行的美国国务院会議上,討論的中心已經不是休战或者和平的問題,而是对日开战,尤其是“怎样作我

們自己就能够在不遭受过大危險的情况下使对方陷入先放第一枪的状态”的問題了。(比尔德:«罗斯福总統和战爭的来临»)

因此,美方26日的回答即«赫尔备忘录»是“考慮到輿論反对坐視不救中国的危亡以及日本要人的非和平論調等”情况而草拟的。(赫尔:«回忆录»)27日,赫尔对陆軍部长史汀生說:“現在問題已經掌握在您和諾克斯,即陆海軍的手里了。”当天,陆海軍部即向前綫司令官們发出了“战爭警告”。28日罗斯福又向史汀生提示了三个方案,即:(一)不采取任何行动;(二)再次采取类似最后通牒的措施;(三)立即开战,对此,史汀生选擇了第三項办法,而且主張不事先給予警告即开始进攻。(«史汀生日記»)然而,这种办法旣違反25日决定的方針(使日本放头一枪),又違反民主党的諾言,因而在这一天的国务会議上,总統提出了向日皇发出警告文书的方案。同时,也决定向美国国会和人民发出警告。就这样,企图站在“被动”立場的美国方面在这期間也积极地进行了战爭准备。

然而,日本軍部放弃对于外交談判的希望比这更早,它早就开始在暗中进行实际的軍事行动。箭已經离开弓弦了。就在赫尔备忘录交給了日方的26日,日本海軍机动部队由千島的单冠灣向夏威夷出击了,虽然在日本方面也准备了万一交涉达成协議即行返航。而对陆軍方面,也在15日发出了关于“摧毁美国、英国以及荷兰在东亚的主要根据地”的命令,日本的南方軍和南海支队已經在分別向法属印度支那、海南島、华南、台灣、澎湖島、奄美大島、帛琉島和小笠原群島等地集結。

日本政府接到赫尔备忘录以后,于11月27日和大本营举行了联席会議,这时,已經不是选擇“和与战”的問題,而是在必然开战的气氛中进行了討論。这次会議认为,赫尔备忘录是最后通牒,日本方面无論如何不能接受,从而得出这样的結論:根据11月5日决定的以“貫徹帝国国策綱要”而进行的对美交涉已經失敗,因

而只有采取軍事行动了。这个結論經过29日的重臣恳談会和联席会議討論后，在12月1日的御前会議上，終于作出了最后的决定，卽对美、英、荷开战。开战日期定为12月8日。这是由于考虑到以下几点：(1)日美海軍的力量对比关系到1942年3月以后，将对日方不利；(2)为了准备北方作战，希望在1942年春季以前，基本完成在南方的第一阶段作战；(3)推迟开战日期，将給予同盟国方面以加强备战活动的时間；(4)馬来亚地区1月和2月的气象状况不利于登陆作战；(5)主要从月令的关系上认为8日前后对于登陆作战最适宜。由11月上旬起，就以12月8日为期而进行了开战的准备，而在这次御前会議的次日，卽12月2日，把这一点正式地确定下来了。

11月28日东乡外相給野村大使拍了一封电报，略謂日本方面将于两三天內电告对赫尔备忘录的意見，这样一来，日美交涉势必要陷于完全停頓，但必須注意避免給美方以交涉卽将决裂的印象。赫尔暗中获得了这份密碼电报，知道了危机的迫近。12月1日，罗斯福下令远东艦队司令官对日軍在中国南海及暹罗灣的活动进行"防卫性的牒报戒备"，而在5日，他又透露說："在四、五天以內，就要发生美日之間的武装冲突了。"(比尔德：«罗斯福总統和战爭的来临»)

事态在不断地走向决裂。12月2日罗斯福写信給日方，詢問在向法属印度支那增加兵力的理由。日本駐美大使館答称这是为了防备在中越边境附近的中国軍队。6日，日本政府把一封长文电报分成十四段，一連串地把它拍給了野村，并指示說在接到另外有关提出时間的指示以前，不得提出。这一天，美方收到一份关于日本大使館焚毁了密碼的情报，为了阻止这种"可能成为悲剧"的事态的发展，罗斯福总統以个人的名义直接打电报給日皇，希望日本由法属印度支那撤退陆海軍。这封信在当天午后九时(华盛頓

时間)以“最特急件”发給了駐日大使格魯。当时，罗斯福总統指示，这封电报可以使用灰色密碼(秘密程度最低的一种)，并且說，即使被暗中获得也无妨碍。这样作，据說是为了节省譯出密碼的时間，以便尽快递交；同时也有相反的解釋，即认为这样做是为了制造美国是被迫进行战爭的印象而采取的最后的姿态。这封电报虽在一小时以后（日本时間是7日正午)即由华盛頓到达了东京，然而送到格魯手里的时間已經是午后10时30分，因此，格魯亲手交給东乡的时間是在深夜，确切地說，是在次日(8日)午前零时15分，已經不发生任何作用了。电报投递延迟的原因何在呢？根据远东軍事法庭上檢察方面的証言，是由于当时日本参謀本部的一个軍官的要求而被压下了。

日美断絕邦交

日本政府对赫尔备忘录的复照是分为十四段即作为十四封电报拍給了野村。电文的譯解是在从6日夜晚到7日（华盛頓时間)，及譯到“应于7日午后1时尽可能交給赫尔国务卿本人”的时候，已接近7日正午，全文的英譯和打字又費去一段时間，結果，野村和来栖到了国务卿办公室的时候已經是2时20分了。这时是日本海軍开始进攻夏威夷珍珠港的一小时以后，是陆軍在哥打巴魯登陆的二小时半以后。当时，赫尔已經暗中获得了日本政府复照的电报，获悉了它的內容，并接到了未經証实的日軍空襲夏威夷的情报。赫尔粗略地看过了野村交来的复照以后說道：“我在五十年的公职生活中从未見过这样厚顏无耻、充滿虛伪与狡辯的文件”，(赫尔：《回忆录》）然后用下顎指了一下門。两大使默然无語地和赫尔握手告别。他二人这时还不知道发生了珍珠港事件。

那么，是否日方故意地把复照的提交推迟到开始进攻以后呢？在远东軍事法庭上，这个問題也成了辯論的焦点之一。根据东乡

的辯解，大致情况是这样(《时代的一面》)：在12月1日的御前会議上以及次日的联席会議上曾經討論了开战的程序問題，这时，海軍方面为了保証奇襲作战的成功，要求在战斗开始以前不終止外交談判。外相表示反对这个意見，主張无論如何必須作关于終止交涉的通告，因此在4日的会議席上，海軍也同意了这一点，并作出决定，于华盛頓时間7日午后零时半发出通告。5日，陆海軍方面又向东乡提出：上次会議所决定的时間有必要再向后推迟三十分钟。这样，到7日午前4时为止，全部完成了复照电的拍发工作。但由于駐美使館人員的“怠慢与失誤”，竟使递交的时間出乎意料地比原定的午后一时又延迟了一小时以上。东乡似乎沒有被告訴开始进攻的准确时間。但是从他引用了，只要在一分钟以前发出通告就不算是違反海牙条約的論点的情况(前书)可以推想，他已經了解到統帅部是把发出通告的时間紧紧地挨近开战的时間。并且据当时大本营陆軍作战科长服部卓四郎的断言，在就复照問題进行討論并作出决定的联席会議上，“并未討論这份复照必須具有国际法上所規定的开战通告的性质这一問題。”(《大东亚战争史》第一卷)而在远东軍事法庭上，当时的外务省美洲司长山本熊一也作証說：在联絡会議上，关于复照的递交时間，只是原封接受了統帅部的要求，“并沒有进行任何討論”。这些事实表明，无論軍部或外务省，都沒有对預先通告的問題給予充分的注意。而且，日方的照会是用这样一句話結尾的：“帝国政府鉴于合众国的态度，只能认为今后即使继續交涉也不可能达成协議，特此通知并表示遺憾。”这个文件的性质是不明确的。东乡认为这个文件实质上就是宣战书，但野村与来栖却沒有这样认为。(《东条备忘录》，来栖：《日美外交秘录》)不难推想，这种情况对于造成在极其短促的时間內从事譯解与英譯电报工作的駐美使館人員的“怠慢”，是发生了影响的。

不过，对美国方面而言，日本进攻夏威夷实质上并不完全是“偷襲”。当美方从旁收到日方复照以后，在11时25分，有关官員集中到馬歇尔参謀总长办公室內进行了閱讀。馬歇尔把这件事用电話通知了海軍作战部长斯塔克，并且向前哨基地发出了警告。給夏威夷的电报是在12时17分发出的，內称：“午后1时日本在提出实质上等于最后通牒的文件。”这封电报在日本开始进攻的二十二分钟以前到达了檀香山的C无綫电信公司。（比尔德：《罗斯福总統和战爭的来临》；日本外交学会編：《論太平洋战爭的原因》）

即使这样，无疑对美通告的这种推迟使得日本对夏威夷的“奇襲”得到了成功。同时，这件事实也使罗斯福政府的参战变得容易了。“但是，”史汀生在日記里写道：“現在由于日本人在夏威夷直接对我們进攻，一切問題都解决了。……我的第一个感覚是‘得救了’，优柔寡断就此完結了。危机以使我全国人民团結起来的方式到来了。”次日即12月8日，罗斯福总統发表演說要求国会发表关于“战爭状态”的宣言。他在演說中着重指出以下几点：美国还处在和日本进行和平談判之中；他曾給日皇写了信，为和平已經尽到了一切可能的努力；日本的回答是在它开始进攻珍珠港的一小时以后交来；日本的进攻是从几天乃至几周前經过周密計划的純粹的“奇襲”和“偷襲”等等。这样，“不要忘記珍珠港”的口号对于动員全体美国国民团結一致投入和坚持对日战爭起了巨大的作用。

第二节　开战初期的胜利和失利

日本对美宣战

日本陆海軍的对英美作战計划是在从9月到10月初这段时間里制訂的。海軍方面从9月10日到13日，陆軍方面从11月1日到5日，分別进行了“图上演习”。策划用空軍偷襲夏威夷的是

联合艦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他的这項計划是在8月間提交給軍令部的。对此，最初在海軍內部曾經有过强硬的反对意見。反对的理由是：若把即使全部用于南方战綫尚感不足的空軍力量抽出一部分来搞投机性极大的进攻夏威夷的作战，很可能陷于追逐二兎不得一兎的危險結局。然而，到10月20日，还是作出了进攻夏威夷的决定，幷且在11月3日发出指示：出动当时可能使用的全部六艘航空母艦投入这次进攻。

偷襲夏威夷計划确是一場孤注一擲的大賭博。首先，是否能够完成这次偷襲而不被美軍发現？其次，即使偷襲成功，美国主力艦队是否停泊在那里？作战的成功与否，完全决定这种"投机"是否得中。既然如此，为什么統帅部竟下定决心要把全部机动部队投入这次战斗呢？原来，統帅部虽然希望速战速决，但又不能不估計到战爭长期化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当时，对形势发展的估計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开战后的二年以內是有把握的，而进入第三年以后，就看不透了。因此，为了在第三年以后能够继續确保南方占領地区，有必要在战爭的一开始就給美国海軍以尽可能大的打击。尤其是和对方相比处于劣势的日本海軍，除了在开战伊始采取"出奇制胜"的战术，更无其他办法。开战当时日美海軍可能用于作战的艦艇比数，美国是十，日本是七点五，航空兵力则双方大致相等。但到1942年以后，在海空軍兵力的增加方面，美国显然要占极大的优势。針对这种情况，海軍的作战計划就需要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爭取在开战之初取得胜利，及早举行海上决战，以免形成彼我兵力的悬殊。（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爭史»第一卷）

陆軍作战的焦点是对馬来亚半島的奇襲登陆作战。为了在短时期內实現突破美国、英国、荷兰的对日經济封鎖，攻下富有資源的南方地区的目的，对这里也必須在开战伊始采取"奇襲"的方式。

12月2日，日本大本营陆海軍部向联合艦队司令长官和南方軍总司令下达了开战的命令和开战的日期。南云忠一率領的担任空襲夏威夷的部队，在11月26日由擇捉島单冠灣出发向东航行；担任攻取馬来半島的由山下奉文統帶的第二十五軍所搭乘的运輸船队在12月4日由海南島三亚出发向馬来半島的东岸进发。

1941年12月8日午前7时，广播电台突然用紧張的声調播送了这样一条“临时新聞”：“据大本营陆海軍部宣布，帝国陆海軍在今天8日凌晨在西太平洋方面和美英軍进入了战斗状态。”

在令人窒息般的紧張气氛中經过了几个小时后的11时40分，电台广播了日皇用沉重的語調宣讀的宣战詔书，詔书的第一句是：“仰承天佑、继承万世一系皇統之大日本帝国天皇昭示忠誠勇武之尔等庶众曰”。接着，东条首相以“恭奉大詔”为题发表了广播演說，强調“胜利永远在皇威之下”。这一天里，电台一直在播送着充滿兴奋情緒的节目，街道上不断地响着报贩叫卖号外的鈴声，午后8时45分空襲夏威夷的战果发表了，这件事鼓舞了日本国民的斗志，就在这种气氛中，开战的第一天过去了。初战的胜利，对于战爭的发动者来說，确实是“理想的”成功，他們一定会感到那是“天佑”。

胜利的幻想——第一阶段

战爭是以日本海軍对夏威夷軍港实行的偷襲而开始的。夏威夷时間的12月7日星期日的早晨7时50分（日本时間是8日午前3时20分），首先由机动部队起飞的以轰炸机和战斗机一百三十八架組成的日軍大編队对停泊在珍珠港內的美軍战艦和陆上基地举行了猛烈的襲击；接着在一小时以后，日軍又派出第二批一百七十一架飞机进行了攻击。日軍的偷襲完全取得了成功，結果，击沉了美方战艦六艘、重巡洋艦一艘、油艦二艘，炸毀和炸伤战艦二

艘、重巡洋艦一艘、乙級巡洋艦六艘、驅逐艦三艘、輔助性艦只三艘，炸毁飞机約三百架；此外还給予了地上設施以相当大的損失。日方的損失是飞机二十八架和参加这次偷襲的特别攻击队所屬的大型潜水艇一艘、特殊潜水艇五艘。日方机动部队认为大体上已經取得了預期的战果，因此沒有举行第三次攻击就开始退避并返航了。

陆軍南方軍把作战計划的重点放在馬来半島和菲律宾上面，并且准备随着战局的进展，再进攻緬甸和荷印。为此，陆軍派第二十五軍和第三航空集团担任进攻馬来半島；派第十四軍和第五航空集团担任进攻菲律宾；派第十五軍担任进攻泰国、緬甸方面；派第十六軍担任进攻荷印。海軍派遣第二艦队、第三艦队、南遣艦队和第十一航空艦队参加这方面的作战。对馬来半島的作战計划是空軍轰炸和登陆作战同时并进，而于12月8日拂曉以前，日軍第二十五軍先遣兵团开始在馬来半島东岸的宋卡和哥打巴魯登陆。10日，由新加坡出动的英国远东艦队的主力“威尔斯亲王”号和“却敌”号两艘受到日本海軍航空部队的攻击而悲惨地沉沒了。由于这次馬来亚海面的战役和半年前英海軍航空队击沉德国战艦“俾斯麦”号的战斗，引起了对于空軍威力的重新估价，从那时起，世界各国的海軍战略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由于这次海战的結果，对日軍来說，馬来亚作战的危險性已不复存在，第二十五軍的主力得到安全登陆，并指向新加坡开始了迅速的进攻，从馬来半島登陆地点一直向南推进。日軍在12月31日占領了关丹，1月31日占領柔佛，2月8日24时，对新加坡島的登陆获得成功，11日又占領了武极智瑪(Bukit Timah)高地。至此，英軍已力竭計穷，2月15日，山下奉文与英国远东軍司令珀西瓦耳举行会談，会談結果，这个地区的英軍終于无条件投降了。

日軍对于菲律宾，采取了从正面进攻的战术，即先用航空部队

进行轰炸然后实行登陆作战。由12月8日至15日之間，陆軍航空队連日进行了轰炸。由本間雅晴率領的第十四軍的先遣部队在第三艦队掩护之下，于12月10日在呂宋島的部分地区登陆成功，20日，三浦支队又在民答那峨島登陆，并占領了达窩，接着，第十四軍的主力于22日在呂宋島的林加恩灣举行登陆，登陆后，并沒受到多大抵抗，继續前进，而在次年1月2日占領了馬尼拉。美国远东軍司令官麦克阿瑟已于12月24日轉移到柯勒吉多尔要塞，美国軍队也陆續向八打雁半島和柯勒吉多尔島集結，准备在这里进行长期抵抗。将美軍赶进八打雁半島密林地带的第十四軍得到增援后，于4月3日开始进攻，9日攻占了整个半島，5月7日占領了柯勒吉多尔要塞。在这以前，麦克阿瑟曾宣称"我将要回来"而逃往澳洲方面去了。

另外，日軍在开战的同时，对中部和南部太平洋方面也展开了进攻。从12月8日起海軍航空队攻击并制压了关島、威克島、和魯島等的空軍基地。12月4日由小笠原島出发的南海支队于10日清晨在关島登陆，傍晚以前占領該島，駐守該島的美軍三百三十名投降了。在同一天，日軍还占領了吉尔貝特群島的馬金島、托拉威(Tarawa)島。对于威克島，日軍在連日举行空袭以后，于10日企图奇袭登陆，但遭到反击，結果損失了驅逐艦二艘而敗退了。尔后，空軍再度对該島施行連日轰炸，并且在由夏威夷归还的机动部队的一部参加的情况下，于12月22日又举行了第二次登陆作战。这次，日軍也陷入了极端的苦战，經过激战之后，好不容易才占領了該島。占領关島的南海支队于1942年1月4日接到进攻俾斯麦群島的命令，于1月23日占領拉包尔，不久即占領了整个新不列顛島，建立了空軍的前进基地。

日軍南方作战的最終目的是攫取荷印的資源，尤其是石油。因此，在馬来亚、菲律宾等地的作战得到順利的进展以后，大本营

和南方軍就决定比原定計划提前一个月实行进攻爪哇作战。这次作战計划是：調遣从馬来亚攻入苏門答腊的部队和已經在12月間占領了婆罗洲、西里伯斯方面的部队，由东西两面夹攻爪哇。2月14日陸軍空降部队突然在苏門答腊島的巴邻旁降落，今村均率領的第十六軍立即与此进行配合，而于17日占領了該地。在这期間，日軍进行了爪哇海海战（2月4日）、空襲达尔文港（2月19日）、巴厘海海战（2月20日）、苏拉巴亚海面的战役（2月27日）、巴达維亚海面的战役（3月1日）等数次战役，通过这些战役，把同盟国艦队击潰了。第十六軍在3月1日开始在爪哇本島登陸，5日占領了巴达維亚，7日占領了苏拉巴亚，9日荷兰軍宣告投降，至此，日軍在这方面的作战也告一段落了。

日軍对緬甸作战具有切断滇緬路和促使印度反英的意义。担当这方面作战的由飯田祥二郎率領的第十五軍首先集結在泰国，然后在1月4日突破緬泰国境，于31日占領了毛淡棉。2月9日，日軍接到进攻仰光的命令，11日渡过薩尔溫江，3月3日渡过錫唐河，直薄仰光，而于3月8日攻陷了这个城市。接着，第十五軍便轉入对緬甸中部和北部的作战。至5月1日占領曼德勒以后，日軍已全部夺取了緬甸的重要地区，至此，緬甸作战宣告結束了。

轉折点——第二阶段

日軍第一阶段进攻作战的胜利超过了統帅部最初的估計。这样一来，一向认为"为了坚持长期战争，在战略上只能采取守势的情况有了变化，已經产生了在战略上采取攻势的形势"，并提出了攻取和制压占領地区外圍的战略据点的問題。（关于联席会議对于初期作战实績的判断，参看服部所著前书第二卷）这样，海軍进攻澳洲的主張和陸軍的反对意見取得了妥协，制定了遮断美澳联

系的作战計划；实行了对新几內亚的战略要冲莫尔兹比港的进攻作战；并拟定了进攻薩摩阿，菲吉和新喀里多尼亚等地的作战計划。

由南海支队的一部和第四艦队編成的陆海軍协同进攻部队，以拉包尔为基地，在3月8日首先占領了东部新几內亚北岸的拉埃·塞拉摩阿。不久，根据大本营决定在5月10日左右进攻莫尔兹比的指示（4月18日）已經准备就緒的南海支队，于5月4日由拉包尔出动了。然而运輸船队的速度每小时平均只有六浬半，迅即被敌机发現，到7日又开始退避。这一天，日美两軍机动部队互相进行了猛攻，日本方面战果极小，反而使航空母艦“祥风”号受到集中攻击而沉沒了。翌(8)日，双方的攻防战仍在继續，由航空母艦“翔鶴”号起飞的六十九架日本飞机攻击美国机动部队，給予了航空母艦二艘以致命的損害（“累克辛頓”号沉沒，“約克”号重創）。同时，日本艦队也受到攻击，“翔鶴”号起火，飞机起落发生困难，但沒被魚雷击中，仅免于沉沒。面对这种情况，日本艦队只好撤离战場，并且发出命令将进攻莫尔兹比改为无限期延期了。虽然联合艦队司令部和大本营海軍部下令进行追击，但美国艦队已經离开战場无处可寻了。与此次珊瑚海海战同时，5月3日虽然未經流血占領了图拉基，但次日即受到美方艦上机的攻击，約有半数艦艇受到損失（驅逐艦一艘、扫海艇二艘、驅潜艇一艘沉沒）。作为第二阶段开始的这次作战，蒙受了开战以来第一次大型艦艇的損失，結果不得不停止下来。在海战上虽然占了一点便宜，但就作战目的而言，还是失敗了。这一事实构成了太平洋战争中双方攻守战的一个轉机，紧接着日本又遇到命运上的另一个更大的轉折点，那就是在中途島的失敗。

日本进攻中途島的作战是在3月間关于第二阶段作战的討論中由联合艦队提出来的。山本五十六主張：在航空母艦方面比較

占优势的現阶段,向美国艦队进行挑战,并借此誘致它进行决战。然而,大本营海軍部和陆軍方面则以占領后补給上的困难为理由一直表示反对。經过激烈的爭論的結果,原則上决定了实行这个作战,但未决定日期。4月18日,日本本土初次受到多里特尔率領的美方航空队的襲击,暴露了日本对太平洋方面的防卫有漏洞,于是山本又主張为了推进并加强东方前哨,必須及早实行对中途島的进攻作战。由于他的强硬主張,并以同时实行进攻阿留申群島为条件,陆軍也表示同意,于是,便确定实行这一作战。

5月5日,大本营发出进攻中途島和阿留申群島的命令。在这次进攻中途島的作战中,联合艦队的主力全部出动了。参加艦艇有三百五十艘共計一百五十万吨,飞机一千架,官兵十万人,是一次規模空前巨大的作战。美国方面譯解了日本联合艦队的密碼,事先察覚了日本的企图,因而在一个月以前就昼夜不停地作好准备,集中力量在中途島等待日軍进攻。由于这种原故再加上日本方面作战上的一些失誤,使得日本海軍遭受了致命的打击。

日本艦队是在5月27日日本海軍紀念日那天出发的,它一直駛向中途島,并于6月5日黎明前派出了第一批攻击部队。当时,日方判断沒有被敌人发現,但实际上已經和美軍巡邏机相遇了。美方已作好周密的准备等待日軍。日軍第一批起飞的艦上机一百零八架进攻了陆上基地以后,又决定作第二次进攻。正当准备应付美国机动部队的日方歼击机卸下魚雷改裝用以进攻地上的炸弹时,突然接到"发現敌人机动部队"的情报。于是,又急忙改回攻击艦队的装备,在完成这一工作将要起飞的一刹那,受到了美軍艦上机三十架的俯冲轰炸,引起了自己的炸弹和魚雷相继爆炸。其結果,被視为日本艦队的法宝的航空母艦"赤城"号、"加賀"号和"蒼龙"号沉沒,而剩下的"飞龙"号也未能幸免。至此,联合艦队司令長官山本也承认战况失利,只好下令停止作战,立即返航。

日本丧失了航空母艦四艘和大部分优秀的艦上机的搭乘人員，致使海上的主动权被掌握到美国手里，整个太平洋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后，日本几乎不再可能展开积极的作战，而由攻势轉为守势了。与此相反，美国方面則在一举而获得优势的机动部队的維护下，迅速地展开了反攻。当时，日本大本营一味隐瞞战败的眞相，仅仅发表"丧失航空母艦一艘，另一艘重創，巡洋艦一艘重創"；与此同时，大吹大擂地公布了同时实行的进攻阿留申群島的作战和占領阿土和基斯卡两島的消息，企图蒙混国民的眼睛。

同盟軍开始反攻—— 第三阶段

8 月 7 日美国海軍陆战队在图拉基和瓜达耳卡納耳島的奇襲登陆，不仅是針对日本进攻东部新几內亚的一項措施，也是同盟軍在太平洋战綫上展开正面反攻的开始。然而日本大本營根据珍珠港的战果，估計美国的反攻要到 1943 年中期以后才能开始，因此对于美軍这次对瓜島的登陆錯誤地判断为偵察性的登陆，而于 8 月 13 日下令在夺回瓜島的同时继續完成既定的攻占莫尔兹比的作战計划。

自从在珊瑚海海战中企图消灭图拉基方面的美国航空母艦主力的作战失敗以后（5 月 7 日），由海上攻占莫尔兹比已經变为非常困难，于是又計划由陆上进攻。第十七軍于 7 月 21 日派横山先遣工作队在巴薩卜亚登陆，接着又于 8 月 18 日派南海支队的主力，21 日派步兵第四十一团先后登陆，开始向莫尔兹比进攻。这支部队穿过了密林，在 9 月 5 日进至欧文斯坦利山脉的分水岭綫上，16 日进而占領了莫尔兹比东面大約五十公里的地点。但与此同时进行的攻占拉比·薩瑪来的作战已經完全失敗，而于 9 月 5 日停止进攻；另外，后述川口支队企图夺回瓜島的作战也遭到失敗，从而瓜島战局日趋严重，結果南海支队終于不得不奉命开始

撤退了。

日本海軍在5月間占領图拉基以后便开始在瓜达耳卡納耳島上建筑飞机場，当飞机場基本建成的时候，美軍在这个島上登陆并占領了它。第八艦队立即由拉包尔出动，于8日夜間向美国艦队进行了攻击，但对于正在那里卸貨的数十只运輸船队并未加以攻击就回来了(第一次所罗門海战)。另方面，第十一航空艦队开往拉包尔，联合艦队为了將其主力向所罗門方面集結，也开出瀨戶內海南下。以前为进攻中途島而編成的一木支队的主力于18日在瓜島登陆，20日夜間开始了企图夺回飞机場的攻击，但次日即遭到美方大举反攻，受到歼灭性的打击。美国空軍从21日起开始向这个飞机場进駐。24日，双方的机动部队又在瓜島东北海面上进行了战斗(第二次所罗門海战)，日方航空母艦“龙驤”号被击沉，增援部队的运輸船队也受到很大損失。这場战斗形成了飞机的消耗战。其結果，到26日日軍在拉包尔基地上可能使用的空軍兵力只剩下五十二架飞机了。

至此，大本营才覚察到夺回瓜島的重要性，而于8月底改变作战方針，將夺回瓜島放在首位，將攻占莫尔兹比列为次要，但为时已經太晚了。由于制空权和制海权既已掌握在美軍手里，船队輸送极感困难，因此日方只好采取用高速艦艇乘黑夜进行所謂“老鼠运送”(按即夜間偷运之意——譯者)的办法，并且利用被称为“东京快車”的从水雷艇队和潜水艇的炮击来弥补空軍兵力的不足。然而，既然失去了制海权，那么战斗的結局也就可想而知了。經“老鼠运送”而登陆的川口支队和青叶支队在9月12日开始了第二次总攻，但于14日遭到美方大举反攻而被迫退却了。从8月13日到9月下旬之間参加战斗的全部兵力大約六千人之中，已經伤亡了一千二百名。于是，大本营为了取得胜利又計划在10月中旬实行第三次总攻，而从10月上旬起派第十七軍陆續在瓜島登陆

进行准备。在这期間，于10月11日夜在薩波島附近的海战中，美軍第一次使用雷达打中了第一发炮彈。日軍經过連夜进行艦炮射击以后，于10月24日开始总攻，結果伤亡人数竟然达到二千二百名，因而在26日即被迫放弃了进攻。协助进攻的联合艦队在26日又一次与美軍机动部队交战，虽然給予美軍一些損失，但未能挽回战局。

第三次进攻失敗以后，由于补給的困难，瓜島上的日軍开始出現了餓死者。由于饥餓、营养失調、瓜島炎燒症、瘧疾等而死亡的人数日漸增多。11月10日，虽然第三十八师团开到瓜島，但补給船十一艘全部被击沉，困难程度更加严重了。在此期間又进行了第三次所罗門海战（11月12、13、14日），日本方面被击沉战艦二艘和重巡洋艦一艘，損失很重。因此，大本营于11月15日向第十七軍发出維持現状的命令。翌16日，日方新編第八方面軍企图挽回頹势，但在沒有掌握制空和制海权的情况下，仍是一筹莫展；而在新几內亚方面向后退却的南海支队，也在敌人追击之下开始崩潰了。

中国战綫

开战初期，日本在中国方面的进攻目标是英国在远东的根据地之一的香港。日本侵华軍自1940年起就已經制定了攻占香港計划；第二十三軍在开战同时即越过国境进入九龙半島，并于12月14日将該半島全部占領。接着在18日夜間，日軍在香港实行登陆，到25日英軍便挂起白旗投降了。与此同时，日軍为了策应南方作战，于12月24日开始了牽制国民党軍的作战（第二次长沙战役），而于1月中旬达到了目的。

第一阶段作战取得成果以后，日本方面即开始考慮利用这个成果迫使蔣介石政权屈服的策略。1942年4月上旬，日本大本营

制定了关于处理中日战爭的初步方案，并将其下达給侵华軍总司令畑俊六。这一方案总的方針：是利用南方作战的成果謀求解決，或者继續維持現状，而由緬甸方面施加压力，迫使国民党政府屈服；其重点則在于摧毁中国抗战的軍事力量，瓦解中国的抗战意志。并具体規定在1943年春季实行进攻重庆的作战（第五号作战）。根据这一方案，日本大本营和侵华軍立即着手制訂作战計划。

然而此后不久，作为美軍反攻的先驅，上述多里特尔率領一支空軍部队在4月18日空襲了日本本土，事实表明，这次空襲是有計划地利用了华中方面的飞机場。大本营认为如不占領和消灭这些空軍基地，就不能根絕这类空襲，于是在4月下旬向侵华軍总司令发出命令，使其尽早开始进攻，以便主要击潰浙江省方面的国民党軍，消灭其主要空軍基地，并根絕美方利用这些基地空襲日本本土的企图。同时，参謀总长又下令用地上部队攻占丽水、衢州、玉山等地的对方飞机場。这次作战称为浙贛作战，計划是用第十三軍（司令部在上海）主力和第十一軍（司令部在汉口）的一部由东西两側夹击浙贛鉄路（杭州—长沙）沿綫地区，并且占領金华、玉山、丽水等地的飞机場。

5月15日第十三軍主力由杭州方面发动总攻，而于28日攻下金华，于6月7日攻下衢州，12日攻下玉山，13日攻下广丰，24日攻占丽水。另方面，第十一軍的一部于5月31日由南昌附近开始进攻，于6月2日占領进賢，4日占撫州，12日占建昌，16日占領了貴溪。这样，遙相呼应的东西两軍的先鋒部队便于7月1日在横峰会师，完成了打通浙贛綫的目的。大本营于7月28日命令侵华軍总司令在浙江省方面的作战終了以后要继續确保金华附近的要地，直到8月20日前后再撤回原駐地。攻占上述地区的各部队在占領地区停留了約两个月以后，于8月19日开始撤退；而于8月下旬各自返回了原駐地。在浙贛作战結束的同时，大本营关

于作为悬案的进攻重庆作战的考虑也成熟了，于是在9月3日下令侵华軍开始作战准备。它的內容是：从9月起着手进行部分的作战准备，至于这一作战計划的实行，还有待于秋季对于全局有了明确了解以后再作最后决定。根据4月上旬大本营訂出的作战綱要，这次作战預定在1943年春季开始，以約計十个师为基干的一个方面軍由山西南部，以約計六个师为基干的另一路軍由宜昌方面开始进攻，攻占重庆、成都及四川省的其他要地，作战期間估計需要五个月。

然而如上所述，美軍在瓜达耳卡納耳的反攻愈来愈趋于熾烈，太平洋战爭的焦点已轉移到南太平洋。大本营认識到瓜島爭夺的成敗具有决定整个战局的重大意义，这才迫不得已地于12月10日向侵华軍发出了停止进行进攻重庆作战准备的命令。

陆海两軍战略上的矛盾

在发动太平洋战爭时，日本政府和大本营对于战爭的結局作了如下的預測：

一、迅速粉碎英美荷在远东的根据地，从而确保日本的生存和安全，同时采取积极措施促使国民党政府屈服；和德意两国合作，首先制服英国，并迫使美国失去继續作战的意志。

二、极力防止作战对象的扩大，爭取第三国向有利于战局方面发展（"关于結束对英美荷蔣战爭的初步方案"，1941年11月决定）。

根据上述預測，可見日本对于美国并无有效手段可以迫使其停止战爭，只是使日本长期处于不敗之地，以及迫使中国和英国屈服，以使美国丧失继續作战的意志而已。而且日本在它所重視的制服英国的問題上，又完全依靠德意两国的力量，这就暴露了它对当时欧洲战局的发展下了錯誤的判断。

日本在开战后立即和德意两国約定不单独同敌方讲和。然而，在談判締結有关共同作战的新軍事协定时，德意两国却拒絕实行对英本土进攻和协助日本进行太平洋战爭，这样，关于共同作战問題的談判从一开始便擱淺了。当日本进攻新加坡时曾經流傳英国提出和談建議的消息，而这只不过是一种謠言而已。（东乡茂德：《时代的一面》）就在这时，日本民間一部分人主張，日本应出面斡旋使苏德两国单独讲和，以使德国专力从事对英作战。这当然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而当同年3月駐苏大使佐藤尙武赴任时，陆軍省軍事科长佐藤就曾經說道："絕不希望对于苏德和談問題有所干預；也不希望除例行的外交事务以外，为謀求日苏关系新的开展进行工作。"（守島五郎：《苦悶的駐苏大使館》）由此可見，特别是陆軍統帅部方面对德軍的夏季攻势是抱有期待的，他們梦想借此来解决北方問題。再根据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以迫使其屈服的强硬方針等等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作战計划是根据对于第一阶段战果的过高估价而制訂的。尤其陆軍方面，竟然主張在对南方第一阶段作战終了以后，在南方只保留少数兵力，——陆軍省主張留二十一个連，但大本营认为太少而表示反对，——其他全部撤离，另一方面，計划对侵华日軍增加五个师并充实关东軍，以便策应德軍进攻苏联和伺机进攻重庆。

对此，在对美决战中承担主力的海軍自然要表示异議。过去海軍的作战計划是保卫日本領土；但是在太平洋战爭中，它的作战任务則扩大为确保"大东亚共荣圈"的各个占領地，而处于劣势的日本海軍完成这个任务并非容易。日本在进攻珍珠港的战役中虽說得到了莫大的战果，但是在生产力方面美国占絕对优势，随着时間的推移，双方的兵力日趋悬殊，而由于防卫綫过于漫长，日本海軍的消耗也日益增大。根据这种情况，海軍首脑部认为必須速战速决，采用攻势使盟軍疲于奔命。因此，海軍在完成第一阶段的任

务以后，主張进攻澳大利亚和夏威夷。但是，对于这种大規模的向外进攻作战，抱有上述意图的陆軍当然要表示反对。当时日本并沒有足以調整和統一这种战略思想对立的統帅机构，其結果在实际作战中，陆海两軍的問題只有随时妥协而不能得到彻底解决。例如进攻澳大利亚和夏威夷的作战計划，不得不改为以切断美澳間的联系为目的的攻占莫尔兹比和中途島的作战。然而，如上所述，前一作战由于珊瑚海海战的失败而遭到挫折，而在6月底进攻中途島的海战中，日方又失掉新銳航空母艦的主力，这就构成了把战争的主动权让給美方的开端。日本統帅部当初預測美軍的反攻将在1943年以后，但是很快地在同年8月，美軍就对所罗門群島的瓜达耳卡納耳島开始反攻了。

另一方面，陆軍所期待的德軍对苏攻势也未能获得預期的进展。1942年6月底德軍开始进攻，到7、8月間虽然很快地包圍了斯大林格勒，然而苏軍堅守不移，結果在11月中反而把德軍包圍起来了。7月，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曾通过日本駐德大使大島要求日本对苏开战，但遭到日方拒絕，仅仅同意在东方牵制苏軍。翌年，即1943年2月2日，进攻斯大林格勒的由巴罗士元帅指揮的德軍三十个师向苏軍投降，苏德战局完全改观了。而1942年10月，英美两軍在法属北非开始举行登陆作战，这也使得欧洲战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参看本书第4卷，第1章）

其次，为了建立长期不败的体系，必須确保船舶的运輸力，以便向日本国內运輸重要物資，扩大軍需生产。但是在船只数量有限的情况下，作战和运輸的要求发生矛盾，因此，解雇征用船只和重新征用船只这两个問題就成了企划院、陆海軍省、統帅部之間发生对立的焦点。原定完成第一阶段作战計划以后，即解雇軍部征用的船舶，使其运輸重要物資，但是继第一阶段的作战以后，又要发动上述进攻作战，因此不能按原定計划实行解雇；更由于盟軍反

攻瓜达耳卡納耳島的結果，又不得不实行大批征用。此外，由于遭到美方潜水艇的攻击，船只的損失也不在少数，而在瓜島战役中一次損失了大批船只，从而使得充分利用南洋資源进行軍需生产发生了困难。在如何使用船舶問題上的这种意見分歧，也同样沒有适当的机构加以圓滿解决，这就越发加深了陆海軍之間、以及企划院、陆海軍省、統帅部之間的矛盾。

如上所述，在1942年中，在期待德意胜利的問題上，在运回南洋物資以增强战力的問題上、在盟軍反攻的进度及其他問題上，日本方面的估計全部落空了。

第三节 东条独裁和翼贊政治体制

东条独裁的性质

发动和推行太平洋战爭的权力，即所謂的"东条独裁"，究竟性质如何？它又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本来这种权力无非是在战爭已經不可避免的局势下，作为現役軍人的东条陆相接任了首相和內相的职务，从而形成了以軍部势力为基础通过天皇制官僚机构发号施令的独裁体制。这种独裁体制排斥軍部以外的政治势力，或者使其从属于自己，以便保証一元化的推行战爭的体制。因此，东条內閣是一个由唯东条首相之命是听的一批官僚构成的"事务官內閣"；对于天皇，則在与內大臣木戶合作下，不許除統帅府、政府等的負責官員以外任何人与之接近，防止軍部以外的政治势力的发展，即使皇族重臣也不例外。

开战以后，东条內閣立即以"間諜"嫌疑的名义把宮本百合子等左翼及反战思想家同时加以逮捕；接着，又从12月16日起召开第七十八次临时議会，制定了"对言論、出版、集会、結社等的临时取締法"。这个法律不仅将原来仅仅需要申报的集会、結社改为批

准制，而且，把已經成立的結社也改为必須重新呈請批准；关于言論、出版不仅禁止发售，还可以勒令完全停止发行。根据这个法令提出申請的五百多个社团中，有立宪养正会等大約半数遭到了禁止。当时旣有政党、工会、农会等已被解散，所以除平野力三等領导的农地制度改革同盟稍有不同而外，一般取締的对象当然都是右翼团体。就連右翼团体也被认为是扰乱以軍部为中心的进行战爭体制的步驟的存在而受到取締，这一点表现了这个时期的特点。

这种东条独裁，完全是以軍部为背景利用战爭初期的胜利气氛，借口进行战爭的必要而肆行暴力的宪兵統治。因此，即使在表面上，它也未能获得人民的自发的支持，从而它的基础也就不能不是脆弱的。由于这种情况，对于东条独裁所依靠的軍部內部、特别是陆海軍之間以及統帅部和軍政部門相互間的矛盾，"东条独裁"也是束手无策。对于資材及其他陆海軍平分秋色的不合理現象已經习以为常；对此試图从政治上加以解决的措施，反而把这种矛盾集中到了东条个人身上。

"翼贊"选举

1942年4月，东条內閣利用开战初期的有利形势举行了"翼贊选举"。但在这次选举中明显地暴露出"东条独裁"的种种弱点。諷刺的是，这个时期的議員是在1937年以社会大众党取得大量議席为特征的大选中选出来的，他們在前一年任期已滿，因为新体制运动变质以后（参看本书第2章，第一节），政府恐怕举行大选会发生摩擦，所以把任期延长了一年。东条內閣在举行选举时为了避免引起"摩擦"，不仅加强了监督，而且还采取推荐候选人制度，召集了貴众两院、翼贊会、实业界、在乡軍人会、言論界等代表，委托他們筹組推荐候选人的組織。其結果，組成了以前首相、陆軍大将

阿部信行为会长的翼賛政治体制协議会；通过协議会及其支部的活动，推荐了四百六十六名候选人。但是，这个推荐制度是不彻底的，政府不得不一再表明，根据明治宪法的精神并不一定要选民投推荐候选人的票。这是沒有政治势力基础的官僚独裁的悲喜剧。协議会通告各支部作为推荐条件，各个支部至少要在候选人名单中增加一名新人；被推荐的候选人应具有当选的可能性。这一点反映出这个政府的这样一种进退两难的处境：一方面要利用与既有政党不同的"嶄新"的人选来收攬民心；同时为使推荐的候选人能以多数当选，又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利用旧政党的势力。

在投票两周以前，《朝日新聞》举办了現地特派員座談会，标題是："热情尙未高漲——不知如何体現翼賛理念"（《朝日新聞》1942年4月16日），人民的毫无热情暴露了"翼賛选举"的实质。由于"当局事先和候选人以及支持者举行会談，提出当局所希望的发言范圍，使其"自肃自戒"从而加强了监督（《日本政治青年》第1輯），以致候选人只能主張积极支持政府的政策，把战爭进行到底，使得論爭无从展开，候选者也都感到会場的寂寞无聊，报紙上刊載了許多近乎諷刺的竞选演讲会流产的消息。尽管如此，由于各地利用小学生、街道組織及其他各种各样手段强拉选民投票，結果使弃权者显然减少，全国投票率平均达到百分之八十三强。对于官方推荐的候选人，除行政官厅及新近按照中央集权原则实行改組的翼賛壮年团积极予以支持外，政府还挪用临时軍事費作为选举經費，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另一方面，未經推荐的候选人，特別是所謂自由主义者，遭到了殘酷的压迫。选举的結果，被推荐候选人当选三百八十二名，未經推荐者当选八十四名（包括斋藤隆夫）；被推荐者占当选人数的百分之八十强。其次，从新旧人的区別来看，新当选者一百九十九名，連选連任者二百四十七名，曾任議員者二十名。新人虽占相当多数，但其結果仍和过去大同小异，

他們幷沒有在旧政党的地方势力以外发展新的势力。如果說有何变化，那就仅仅是："历来在选举中作为骨干分子进行活动的一些人，当时都被动員起来作为骨干分子从事于翼贊会或壮年团的所謂启蒙运动，以致不能再进行旧政党式的活动了。"(《朝日新聞》4月19日所載上述座談会記录)換句話說，翼贊会和壮年团无非是寄生在属于旧政党势力范圍的反动組織之中而已。

翼贊政治会和对国民的統制

大选以后，为了代替翼贊政治体制协議会，同样由政府邀請各界人士召开翼贊政治集結筹备会，幷于5月20日正式成立了以阿部信行为会长的翼贊政治会。翼贊会是以貴族众議两院各十二名、各界人士五名共計二十九名总务通过会議制来进行工作的，但事实上是由前田米藏、大麻唯男等人主持的。关于創設翼贊政治会的目的，会长阿部曾在成立当时发表的广播演說中說道："今后的議会必須与政府表里一体，积极努力，协助政府推行国政"，即与大政翼贊会一同形成政府的两翼，推行战时政策。所以，翼贊会包括了未被推荐的議員在內的貴众两院全部議員（受刑事起訴者除外），加上实业界、言論界代表，一共拥有会員一千三百人，从此，在議会中不再允許組織其他政治团体了。議会权力虽然集中在翼贊会里，但它不能設立地方支部，可以說是无根之木。随后在5月27日召开的議会，正如它的日程表——27日是开幕式，由首相、大藏相、外务相发表施政演說，陆海軍作战况报告；28日举行有关預算的全体会議和特别委員会，29日即举行閉幕式——所表明的，是一次議員們只是鼓掌贊成的"翼贊議会"而已，甚至一个被推荐議員也評論說："虽然充滿着同心协力的精神和決意"，但是"在翼贊政治会院內机构的运用上，未免过于高明，……以致議事进行的情况令人感到电鈕按得太快，机器轉动得太快了。"（蜡山政道在5

月 31 日《朝日新聞》上发表的談話）

在議会力量进行改編的同时，大政翼贊会也进行了改組。作为新体制运动的核心組織而成立的大政翼贊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違背了一般人期待的官方御用机关。經过以后的历次改組，越来越加重了官僚色彩，在东条內閣成立后曾任“滿洲国”协和会領导人的安藤紀三郎中将就任副总裁之后，这种傾向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致成了专門驅使人民为战爭服务的启蒙机关了。改組翼贊会的目的是为了沿着上述路綫更进一步地加强領导。一向作为翼贊会地方支部的外围团体，具有濃厚的革新分子自由結合性质的翼贊壮年团，在翼贊选举以前就被改組，并統一为翼贊会总裁領导下的中央集权的組織，在“翼贊选举”中起了行动队的作用。但是，它越是从事这种强有力的活动，就越发令人感到“壮年团既不是教育团体，也不是政治团体，而是个非驢非馬的組織”。（前述座談会，《朝日新聞》4 月 19 日）翼贊会于 6 月实行改組，过去由內务省、文部省、农林省、商工省等領导的国民組織及国民运动統統被置于翼贊会的領导之下。这就是說，产业报国会、商业报国会、农业报国联盟、海运报国会、大日本妇女会、大日本青少年团等組織都被統一到翼贊会的領导之下，而对村会和街道組織等，翼贊会也要派上工作人員，掌握它們的領导权；同时，改革选举、奖励儲蓄、节約物資、回收物資、推銷公債等运动也都由翼贊会来推动。这样，翼贊会在表面上已經成了統制人民的核心机关；但是实际上，它只是官僚、特别是听凭軍部任意摆布的不能自主的組織，只是給官僚統制起了掩护作用而已。

翼贊会的基层組織街道会、村会和街道小組为了有效地实施对国民的統制而采取的手段，是把这些組織充当生活必需品的配售机构，从而将每一个家庭紧密地束縛在它們的組織里。只要回忆一下当时編制配給卡片以及申請迁移等的許多繁杂手續就可以了

解到，政府是利用街道和自然村的反动組織，使其和基层組織結合起来，弥补了官僚統制的弱点。因此，在改組翼賛会来加强統一的官僚統制时，政府决定"在加强村会、街道会的'自治'能力的同时，使其成为大政翼賛会領导下的組織，并考虑对它們进行必要的調整"（情报局：《大政翼賛会机能的革新》），依然保持着作为行政輔助机关的机能。这些統制机构虽然对人民生活的各个細节都进行了严密的控制和监視，企图动員人民的全部力量来协助进行战争，但是并未能得到人民的积极协助。当时群众对街道小組和街道会怨声載道，就是最好的証明。并且也发生过小組长以停止配售来威胁群众一类的刑事案件。当时，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群众来信提到，小組实行配售应該根据人数計算，但是有不少小組根据戶数計算，因而发生了不公平的現象。群众虽然感到不滿，而又有所顾忌不便直言，因此要求公布詳細的配售准則，并建立起对街道小組及街道会的会計檢查制度。（《朝日新聞》6月5日，《鉄帚栏》）在开战一周年的国民运动中虽然提出了改正配售的运动，然而由于这种統制机构虽为人民所不滿，但同时又因为它是反动統治的有力支柱，所以解决这样問題是十分困难的。

組成翼賛政治会和加强大政翼賛会以后，翼政会为了尽量发展政治力量，采取了設立政务調查会以便通过与翼賛会打成一片来确保地方势力等許多措施。反之，翼賛会的情况，正如9月間召开的中央协力会議所作的决定——（一）振作精神，（二）增加生产，（三）实踐战争生活，（四）加强国內体制——所表明的，越来越加深了作为行政輔助机关的性质。

大东亚省的成立

当东条內閣通过設立翼賛政治会、改組大政翼賛会来确立翼賛政治体制的时候，也正是日軍經过珊瑚海海战、中途島海战，在

作战上开始失利的时候。作为这种情况的一种反映，“东条独裁”也开始暴露出动搖的征兆。在这以前，陆軍軍务局长武藤于1942年1月曾訪晤东乡外相和岡田启介大将，表示为了結束战爭希望更換东条首相。4月間，佐藤賢了少将接替武藤担任軍务局长，从而东条派在陆軍中央的地位被巩固了。这时，参謀本部的部分人員也有过希望任命专任陆相的呼声，但是所有这些都沒有在政局上面表現出来。然而，在战爭第一阶段結束以后，发生了解雇船只的問題时，在联席会議上，文官方面特别是东乡外务相主張为了增加生产应按原議实行解雇，并提議利用当前时机謀求苏德讲和和解决中国問題等意見，而与主張利用开战初期的胜利进一步扩大战爭的軍部开始发生了对立。在这一方面，首先成为政治問題而表面化了的是設立大东亚省的問題。設立大东亚省是从5、6月間开始計划的，內容是将日本駐在“大东亚”地区（日本及其領土除外）的各个机关全部划归大东亚省統一指揮监督；对于“滿洲国”、中国、泰国、法属印度支那等地的問題，除“純外交”事务以外，一切划归大东亚省管轄。这个計划的目的是动員“大东亚”地区的全部力量来进行战爭，同时，对日本駐在中国的各个机构加以整頓裁并，特别是陆軍主張大使司令官两位一体制，以便攫取实权。但是最后这一点，由于海軍反对，决定仍以文官充任大公使。

外务相东乡认为这种措施将打乱外交上的統一并有伤东亚各国的自尊心，不但一再引証“兴亚院”失敗的先例而加以反对，并且拒絕单独辞职，企图迫使东条內閣下台；但結果还是他本人于9月1日辞职了。樞密院也认为这个方案是把大东亚各国作为附属国看待而坚决加以反对，并要求将“純外交”——指外交礼节及签訂条約的形式上的手續等——三字修改为“外交”，經过种种曲折以后，結果为了避免引起政变，終于批准了原案，大东亚省于11月1日宣告成立了。

对华新政策

在这期間，瓜达耳卡納耳島的攻守战激烈地展开，从11月起，日軍的运輸陷于十分困难，以至只能用潛水艇和驅逐艦继續运輸汽油。12月31日，大本营会議决定派在瓜島的部队实行“轉进”（应讀作“撤退”），并由2月1日至7日撤离，这样，日軍終于敗北了。和日方的預計相反，由于盟軍的迅速反攻很快地扭轉了战局。于是，以根据开战初期的胜利而决定的东条內閣的对內外政策也不得不加以修改了。

在对外政策上，首先是表現在設立大东亚省問題上的以軍部为中心的高压政策，不待大东亚省成立即开始修改，其第一个表現就是对华新政策。日本的对华政策，在太平洋战爭爆发后不久，就从以往的誘和政策进而采取了迫使中国屈服的强硬政策，并拟定了进攻重庆的計划，但实际上并沒有早日解决中国問題的把握。面对上述美軍的反攻，把六十万以上的兵力被牽制在中国战場上的陸軍方面，要求修改对华政策的呼声日漸高漲，这也是必然的趋势。

另一个原因就是要求汪伪政权参加太平洋战爭。这个要求是根据以下判断提出来的，即认为：“中国的民心日益反对日本，‘国民政府’（指汪伪政权——作者）日益削弱，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設想”。日本政府从以下的角度：(1)为了爭取战爭的胜利，加强对进行战爭的协助，以便增强两国的綜合战力（坚决不放弃从中国攫取鉄、棉花等重要物資的方針）；(2)彻底加强“国民政府”，（指汪伪政权），加强“国民政府”的政治力，使其能够充分把握民心（12月17日大东亚相青木在联絡会議上的发言），对上述要求进行研究，并于12月下旬的御前会議上决定了“为完成大东亚战爭的对华根本方針”。根据这个方針，日方应极力避免对汪伪政权进行干涉，

并用交还租界、廢除治外法权等措施来加强其政治力，以便“消除重庆抗日的理由”，但实际上，正如“当前对华經济政策是以更多地取得完成战爭所必需的物資为主要目的”一語所表明的，这个方針的目的只是在“对进行战爭的协助”的名义下进一步加强經济掠夺而已。汪伪政权于次年——1943年1月9日，在与日本签訂关于交还租界及廢除治外法权的协定的同时，发表声明参加太平洋战爭。值得注意的是，几乎与此同时的1月11日及1月14日，美英两国和国民党政府之間也签訂了廢除治外法权的条約。继这一对华新政策之后，日本又采取了对“大东亚”新政策，它的具体表現是1943年1月决定了容許緬甸“独立”的方針，以及5月末决定了“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綱”。

独裁制的加强

到了1942年冬天日本在瓜达耳卡納耳島攻守中显然要失敗的时候，翼贊政治体制也开始动搖了。翼贊政治会虽仍然继續存在，但于同年10月，发生了該会所属議員二百六十名組成了一个旨在提高生产力、改編企业和整頓物資配售机构的“經济議員联盟”，新当选議員成立“清新俱乐部”等新的事态，以致第八十一次議会上出現了与以往的临时議会有所不同的情况。在議程終了时，众議院議长岡田忠彥致辞說：“关于今后的政治革新，首相及国务大臣坦率大胆地許下了种种諾言。然而这些諾言将来是否会兌現，还有待于議員的监督。所以，虽然議会进入休会时期，但我們的任务并未結束”。这虽然是一种口头上的表示，却值得注意。第八十一次議会通过了包括二百七十亿日元临时軍費在內的四百七十四亿日元的庞大預算和八十九項法案。这些法案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把行政权进一步集中到首相手里，和进一步加强了政府的权限。这些是企图利用加强独裁的办法来解决随着战局趋于

不利而日益尖銳化的国内和国际間的各种矛盾，但是，这种努力已經不可免地要遭到反抗。

首先，这次議会根据战时行政特例法大大地加强了首相的权限。这是一項和以敕令发布的“战时行政职权特例”互为表里的法令，它可以为了增加重要物資生产的目的排除現行法律的禁止事項或限制事項，并把領导生产的行政权集中到首相手里。值得注意的是东条首相在对該法进行审議时所作的答辯，他說：“現在出現了独裁政治这样一个名詞……东条个人仅仅是一个草莽之士而已。……只因我被賦与以总理大臣的重責，所以情况有所不同。只因仰承陛下的光輝我才有光彩。假如沒有陛下的光輝，我就等于一块頑石。这一点和被称为独裁者的欧洲諸公情况完全不同。”东条首相是想用天皇的信任和进行战爭的需要来为自己集中权力作辯护的。这种集中权力是以他个人作为天皇制官僚的地位为根据的，同时也是东条內閣在政治上陷于絕境时为避开反对势力而采取的措施。与此同时，还通过了設置东京都、修改市鎭村制度、成立工商經济会等法令，实行了地方制度和地方产业行政的中央集权化，加强了以上机构負責人員的官选制，从而縮小了市鎭村的权限。

其次，在这一次議会中成为問題的是对战时刑事特別法的修改。修改的內容是，把在前一年通常議会上成立的該法中“在战时，以攪乱国政为目的而杀人者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的規定加以扩大，从新規定了对于“以攪乱国政为目的，显著地妨害治安，或施加暴行、威胁、或参与以至煽动騷扰及其他妨害治安的罪行”的懲治条款。而且关于国政二字，政府在回答議員質詢时作了如下的解釋：这就是指“国家的基本政治机构，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現实的基本政治机构和这一机构所采取的基本政策”，具体說来，就是指內閣制度、現內閣、現內閣的基本政策而言。例如，如果

有人宣傳应廢弃与中华民国之間的基本条約，而向它宣战，即相当于“以攪乱国政为目的，显著地妨害治安”的条款。(2月22日—24日司法省刑事局长野田的答辯)对于这种加强独裁制度的作法，首先进行攻击的是东方会的中野正刚、三田村武夫和建国会的赤尾敏等右翼方面的人們，他們对“官僚政治”进行了尖銳的指責。委員会的空气傾向于否决或修正。由于翼政会干部要使这一法案原案通过，眞崎胜次(海軍中将，眞崎甚三郎之弟)等九名委員实行辞职。最后由于首相声明决不随便援用，这項法案才算勉强获得了原案通过。

翼贊会和翼政会合并問題

随着战局趋于絕望，东条內閣及其走狗翼贊会干部受到了越来越严厉的非难，这种非难的具体表現就是在第八十一次議会前后出現的翼政会和翼贊会合并的問題。翼政会对于自己沒有地方組織，只是一个空架子而缺乏政治力的情况感到不滿，因此表示要与翼贊会合并，以便取得基层組織。对此，政府方面虽然已經在議会召开前表示，把这两个組織加以合并，以便“发揮强大的政治力量的話，恐怕将要形成幕府式的政治，这种情况在我們日本是不能容許的”(«日本政治年报»第3輯)，而加以反对，但是对于政府这种态度的不滿，依然作为政治上的暗流而牢固地存在着。为了摆脫这个危机，东条內閣和贊政会的改革都是不可避免的了。

到了这个时期，以軍艦进行曲为前奏而播送出来的战果已經不足以振奋人心了。由于对战局的絕望，每当听到在每次新聞时間里都要大吹大擂地宣傳新几內亚、所罗門島方面的若干战果的广播时，人們总是不禁感到“老是这一套”。而在«国民經济周报»1943年3月6日的时評中有这样一段話：“最近，到地方去特别令人感到的是，群众看报的方式有了相当大的改变。……近来讀者不一定

为大字标题所吸引。仔細閱讀內容的傾向加强了。譬如，德軍在斯大林格勒的慘敗和从哈尔科夫、罗斯托夫撤退等消息，虽然用了小字标題，但大家总是聚精会神地仔細閱讀，一定要了解它的內容实质，认为这类消息是非常重要的。”由于对人民生活压力的加重，对于政府和軍部的不信也越来越严重了。随着这种形势的发展，以大政翼贊会为中心的起着对行政輔助作用的“国民組織”，逐漸失去了統制人民的机能。在这种社会矛盾的迅速尖銳化的情况下要想继續統制国民，只有两个办法：或者是进而实行赤裸裸的刺刀統治，或者是建立起鼓励国民在某种程度上实行自主从而引起統治阶級恐惧的組織。在对国民的統制方面，也必然要开始轉变了。

第四节 战爭經济矛盾的發展

战爭經济的进展

发动太平洋战爭以前日本战爭經济的基础是极其薄弱的。推行战爭經济所必需的重要物資貧乏、資本积累水平的低下——这些情况是不可能承担大規模的近代帝国主义战爭的。然而，正是因为这种脆弱性，日本的壟断資本和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統治者們，才企图通过战爭經济来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潤和扩大殖民地統治而挑起了太平洋战爭。日本統治者們的打算是；貯存一些重要物資，在战爭开始时采用“閃电式”襲击夺取南方各地区并确立自己的統治，从而早日結束战爭。

但是，在开战当时日本的庫存原料是极其少的。据美国战略轰炸調查团的調查，当时日本石油的貯存量是四千三百万桶，仅够使用一年左右；鉄矾土是二十五万四千七百四十吨，按 1941 年的耗用量計算，仅够使用九个月。鉄矿砂的庫存量在不断减少，仅有四个月的儲备；而碎鉄也同样减少到四百四十六万八千吨。因此，

炼鋼設备虽然有了扩大，但由于原料不足，其中的三分之一不得不停止生产。日本的統治者們就以这样貧乏的原料庫存以及为此所限的水平极低的生产力而发动了近代的大消耗战。統治者們唯一的希望就是及早在南方建立統治，利用来自那些地方的供应来建立“自給自足”体制。太平洋战爭从經济方面看来，也是从这种“投机”思想出发而掀起的战爭。

由于在战爭第一年里对南方地区軍事占領的扩大，使日本統治者們产生了认为这种“投机”已經投中的幻想。日本从南方运回原油是从1942年春季开始的，到同年年底为止运回的数量达到了六百二十一万三千桶。此外，还有九百三十五万九千桶原油和石油制品在南方各地区作为軍用被消耗掉了。其次，庫存量仅够九个月使用的鉄矾土，在1942年度的进口量达到了四十五万零一百三十四吨的最高紀录。这些重要原料的获得提供了“光明”的前景。但是，从“共荣圈”內获得的这些原料，远远低于当初估計的为确立战爭經济基础所需要的数量，而与迅速增加的軍事需要相比較，其数量是微不足道的。石油的情况是这样：日“滿”“华”三个地区的炼制能力一共是年产量三千五百万桶，这个数量大約相当于一年的必要消費量，与此相比，来自南方的六百二十一万桶原油供应量确实太少了。当时日“滿”“华”的原油及人造石油产量也不过五百万桶，这就显然无法解决战爭对石油的庞大需要，并造成庫存的逐步减少。鉄矾土的情况是：1941年12月开战前夕的庫存量是二十五万吨，尽管得到来自南方的供应，到次年（1942年）年底已經减少到二十万零九千四百二十七吨了。这种对“南方資源”利用情况之所以不佳，是由于战爭的破坏，和該地居民的反抗使恢复生产陷于停滞。

因此，作为战爭經济基础的重要基本工业的“划时代的发展”根本无从談起，生产情况反映出战爭經济的矛盾，出現了停滞以至

下降。开战头一年1942年度，除鋁的产量有了增加外，鋼鉄等的产量不过略有增加，煤的产量反而比前一年减少了。其中，鋼鉄产量低下，限制了战爭經济全面的发展。1941年和1942年分别用掉了庫存的鉄矿石一百二十万零七千吨和一百二十万零六千吨，因而，到1943年末庫存量仅余二百六十万零五千吨，即使消費不增加，也不敷二年的需要。太平洋战爭前的1940年日本进口了鉄矿石三百万吨，而在1942年中，仅由馬来亚和菲律宾运回了十五万吨而已。

重要原料的产量（单位：千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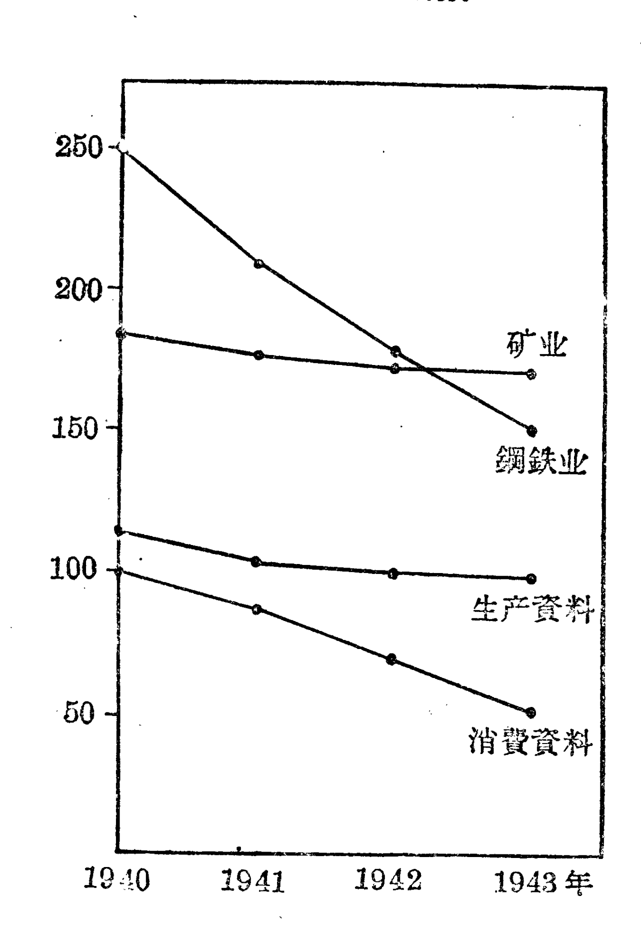
年度＼品目	煤	焦炭(1)	鉄矿石(2)	生鉄(3)	鋼錠	鋼材	矾土	鋁錠
1941	55,602	4,567	6,625	4,982	9,837	5,120	152	72
1942	54,178	4,773	7,669	5,184	7,099	5,166	226	103

(1)瓦斯及化学工业公司的制品除外；
(2)包括国产鉄砂、硫化矿渣及进口矿石；
(3)包括进口貨。

（摘自美国战略轰炸調査团报告书）

尽管基本工业生产出现了停滞和下降的趋势，但武器的生产，由1941年到1942年期間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特别显著的是船舶、大炮和飞机。然而，船舶和飞机的增产是因为前一年(1941)的生产水平太低，因此所能保証的軍需生产总量，还不能满足日本作战的需要。并且，同年对軍火工业工厂設备的投資，实质上是减少了。据美国战略轰炸調査团的报告书的估計，1942年日本对軍需工业的新投資，按1940年的价格計算，約为二十五亿日元，和前一年的二十八亿日元比較，减少了三亿日元。这是因为战时經济的矛盾，不仅使民用工业縮小，而且使軍需工业也随之縮小了。然而，上述軍需生产的增长，在重要基本資材生产停滞的情况下，只

能通过把非軍需生产轉向軍需生产、甚至限制重要基本工业并且愈益加深由此引起的矛盾这种“恶性循环”的途径。据上述調查团的报告书統計，1942 年日本非軍需工业投資，按照 1940 年价格計算为九亿日元，比1941年的十五亿日元銳减六亿日元。而在同一期間，广大群众消費总額由二百六十亿日元减至二百三十八亿日元。在破坏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和民用工业的基础上进行的日本經济的軍事动員，到这个时期竟至采取压迫基本工业，并吃掉庫存的办法来直接增加軍火的生产了。这样，为了摆脫战爭經济的崩潰和进一步攫取最大限度利潤而发动的太平洋战爭，在开战初期就已經踏上了經济崩潰的道路。尽管如此，日本的統治者，在开战初期的“乐观論”的支配之下，未能认識到这种战爭經济的危机，只是口头上空喊“划时期的增加生产”，并未认眞实行，譬如，从南方掠夺的石油、橡胶等物資，尽管庫存在减少，却无計划地发放給了私营企业。



（1935—1937年＝100，据国民經济研究会調查）

1942 年底日本在战局上遇到“难关”以后，內部矛盾便异常迅速地发展了。同年 8 月美軍在瓜达耳卡納耳島登陆，使战局发生了轉变，此后，由于战斗以及美方潜水艇的襲击，船舶的损失日趋严

重，被封鎖的危險急遽增长了。在10月和11月两个月里，船舶的損失达到四十八万二千吨，商船的保有量降低到开战当时的水平以下。由于飞机的損失越来越多和“制空面”的縮小，使各地越来越感到“战局逆轉”的危机。“划时期地增加飞机生产”，已經刻不容緩了。到1942年年底，不得不全面地修訂“物資动員計划”及其他各种經济計划，以生产飞机和船舶为重点，广泛地使民需工业轉向軍需工业或縮小生产，加强对資金、器材和劳动力的統制并把它集中到重点工业。民用生产甚至被减低到維持生活所必需的限度以下，不仅不許对民用生产設备加以修补，而且还把現有机器設备大規模地轉用于重点工业。但是，这一切努力却碰到了資金、器材和劳动力的不足、特别是重型机器的不足、建筑用鋼材的不足、熟练工人的不足等困难。于是，就不得不进一步加强“集中化”，强制

生活貧困化指数（1937年=100）

年度＼项目	实际工資(1)	主要生活物資每人每年平均消費指数(2)				衣料纖維制品
		食糖	肉类	蔬菜	紙	
1940	81	85.5	92.6	74.6	98.5	57.9
1941	84	76.9	66.9	76.9	97.2	62.3
1942	73	76.3	48.1	76.1	95.8	43.9
1943	74	58.6	51.9	78.2	76.3	36.3

(1)实际工資是根据总理府統計局調查、工厂工人每天平均工資和冲中恒幸所作现实物价指数算出的。
(2)主要物資消費量指数是根据經济安定本部調查。

各工业部門利潤率的变化

工业部門＼年度	1939年	1940年	1942年
紡織工业	10.6	12.1	16.1
机械制造工业	45.4	56.2	69.7
金属工业	—	—	24.5

（上杉正一郎調查，引自井上、宇佐美著《危机中的日本資本主义》）

調整企业，强制动員劳动力和彻底削减国民消費。其結果，1943年軍火工业的投資，从前一年的二十五亿日元增至四十五亿日元（据美国战略轰炸調查团調查，根据1940年的价格折合），其中百分之七十投于軍需品即飞机、船舶、大炮等的生产設备。因此，壟断資本便在直接軍需品工业部門进行了迅速的資金积累和攫取利潤的集中化。企业利潤总額不断增长，战前1937年是二亿一千万日元，1941年是四亿八千万日元，1942年是五亿三千万日元，1943年增至六亿三千万日元，这些利潤通过軍需工业集中于壟断資本的手中。与此同时，正如上表所示，实际工資降低了，消費物資的实际供应量減少了，貧富的差别也更为扩大了。

統制机构的改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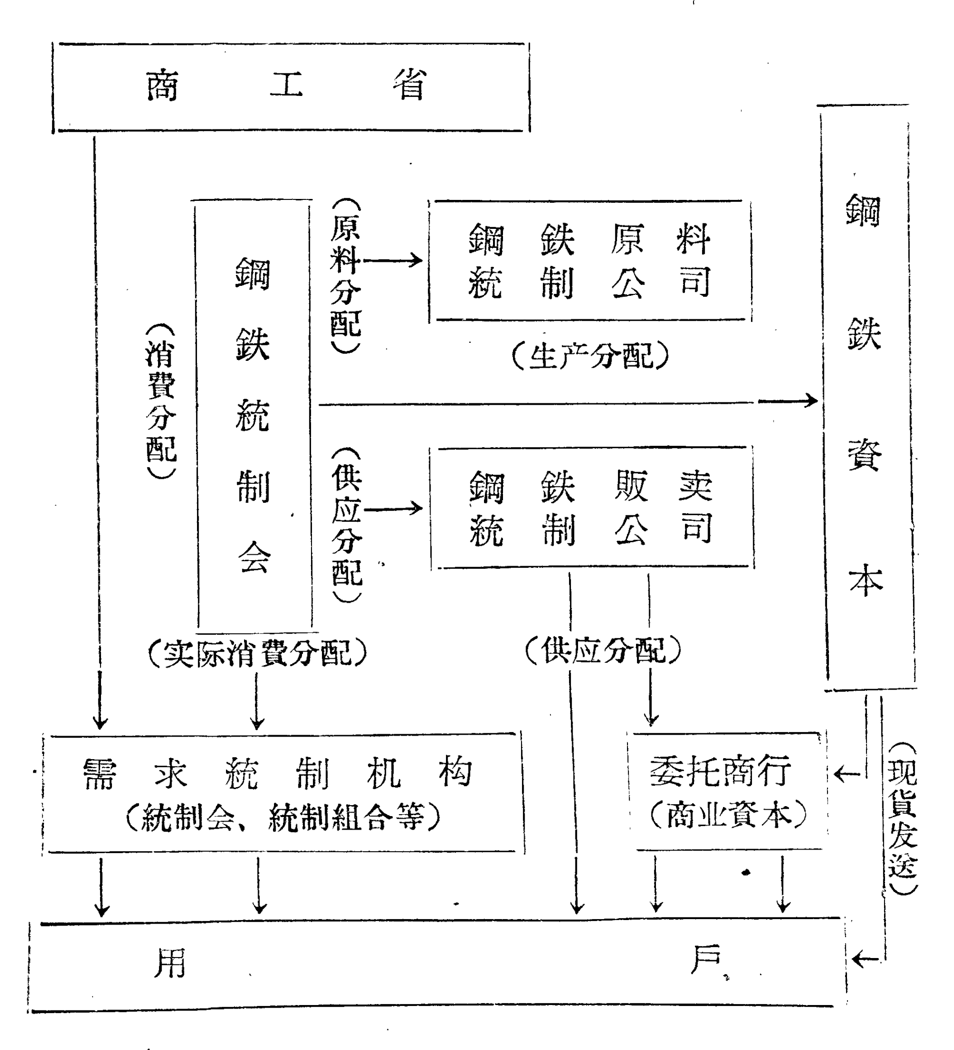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发展，作为壟断資本战时統治体制的“經济新体制”，也逐步加强了。“經济新体制”于1940年年底已經有了一份大綱即“經济新体制綱要”，但迟迟未曾实施。然而，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这个綱要得到迅速地、逐步地实施了。

首先，必須加强战争經济的資金动員体制，即战时財政和金融管理机构，以便能够一面应付不断发展的通貨膨脹，一面从国民生产总值中，用牺牲广大群众利益的办法筹集軍費和軍需生产資金。政府根据前一年7月的“財政金融对策綱要”逐步地加强了管理金融的战时体制。战时金融管理体制是以作为中央銀行的日本銀行为中心进行了調整和扩充。这就是說，将政府所属各金融机关及一般銀行統統組織到日本銀行的統一領导之下，以日本銀行的信貸为中心实現对战时金融的全面的組織化及其統制。这就是要通过这个机构来消化成为战費基础的公債，并适当地进行軍需資金的筹措和分配工作，也可以說是为了利用“有統制的通貨膨脹”进行上述工作的一次机构調整。政府在1942年2月24日

公布实施了“日本銀行法”，根据这項法令，日本銀行于5月1日进行了改組。这样一来，日本銀行不仅巩固了作为政府特殊机关和战时金融中心的地位，并通过最高发行限額制度的永久化建立了通貨管理制度，使通貨膨脹政策有了具体的制度作基础；同时还取得了作为“共荣圈”的中央銀行的地位，成为帝国主义統治的樞紐。4月18日又公布了“金融統制团体令”；5月23日，以日銀、营业别統制会、六特殊銀行、四金庫为会員，以日本銀行总裁結城为会长，設立了全国性的綜合統制机关金融統制会。这是以日本銀行为中心对全体金融机关实行統一管理的机构，是财政資本的战时統治体制。营业别統制会是按照普通、地方、儲蓄、信托等各种銀行、人寿保險、儲蓄、証券等各种公司、城市和地方信用合作社、劝农社等九种营业类型分别設立的。其目的在于把一切資金統統放在日本銀行統一管理下加以运用，把日本銀行的控制面扩大到所有金融机关。此外，同年4月又設立了战时金融金庫，其目的在于使一般銀行一面承担提供軍需資金时的危險，同时为軍需生产提供足够的資金。为了整理占領地区的軍票和建立殖民地的通貨制度，于3月30日設立了“南方开发金庫”。这是为了用“南方开发金庫券”回收以往为从占領地区筹集軍費和“开发”資金而发行的軍票，并为将来各地区設立中央銀行发行貨币券从而建立通貨制度准备条件，这样，旨在掠夺南方殖民地的金融机构建立起来了。

作为壟断資本战时統治体制的卡特尔的統制机关，也随着太平洋战爭的发展而有了迅速的发展。根据“重要产业团体令”所作关于成立第一批統制会的决定于1941年12月成立了矿山統制会（会长为日本矿业公司总經理伊藤文吉）、水泥統制会（会长为淺野水泥公司总經理淺野总一郎）、車辆統制会（会长为火車公司总經理长島要次郎）、汽車統制会（会长为内燃机汽車公司总經理鈴木重康），次年1月又成立了电器机械統制会（会长为安川电机公司

鋼鉄統制机构图（統制組織之一例）



鋼鉄統制协会是由日本国內鋼鉄企业三十七家、統制会二个、"滿洲"的鋼鉄企业六家、进出口商一家共同組成的。

总經理安川第五郎)、产业机械統制会（会长为理研会长大河內正敏)、精密机械統制会（会长为大阪机械工业公司总經理原清明)、金属工业統制会(会长为古河电气工业公司董事鈴木元)、貿易統制会(会长为日本棉花公司总經理南乡三郎)、造船統制会(会长为三菱重工业公司总經理斯波孝四郎）等。8月4日又根据第二次决定，棉花、人造棉、生絲、人造絲、毛紡、麻紡、化工、輕金属、油脂、皮革、橡胶、鉄軌等部門也分别成立了統制会，而由各該部門壟断資本的代表分别担任会长。这样，就在主要产业部門实行了由

壟断資本控制的卡特尔化，逐步充实了"統制"支配的机构。1942年2月18日又公布了"向統制会下放权限法"，根据这項法令，政府将对于各該产业部門原料分配和生产规划等广泛的統制权限下放給統制会。这項法令到1943年1月21日公布了施行規則以后才开始生效；根据这項法令，壟断資本确立了对"統制"的支配权，并在此基础之上，他們在战争經济的进展过程中越发加强了(1)資金、器材向壟断資本的集中，和(2)强制中小資本調整企业，从而資本和生产的集中，随着战争經济的进展越来越加剧了。同时，"統制"权向壟断資本的轉移，使得对战争經济矛盾的抵抗手段——"黑市交易"、"黑市利潤"以及隐匿这种利潤成为可能和容易了。"統制会"无論在外表上或內容实质上，都是专門从事扩大战争利潤的壟断資本的战时統治形式。同年10月，又把与陆軍有关的航空机企业者集中起来成立了陆軍航空工业会，由三菱重工业公司董事长乡古洁担任会长；同时，海軍方面也同样地設立了海軍航空工业会，以往接受陆海軍直接訂貨的直接武器生产部門，也实行了壟断資本的卡特尔化了。同年4月，作为对日益重要的海运的統制机关的"船舶运营会"也宣告成立，这些，一律都是为了在战争經济中确保最大限度的利潤。

与这种战时卡特尔的成立和加强同时，还設立了对此起輔助作用的国家机关。这是对于以推行战争經济为目的的壟断資本实行統治的輔助性机构，是战时国家壟断資本主义加强的具体表現。政府为了整頓企业，重点地加强軍需工业而回收閑置設备，于1941年12月設立了产业設备营团。当时，由于"扩大战时生产力"，重要产业有了急剧增长，但因为缺乏計划，以致因原材料不足而造成許多机器設备停止工作，同时由于一般企业向軍需生产的集中化，在非軍需生产部門也产生了許多閑置設备，据兴业銀行的調查，未开工的設备总值为八十五亿日元，閑置設备为二十四亿日

元。这些未开工設备和閑置設备必須有計划地集中地投入軍需工业;产业設备营团的任务就是收购这些閑置工厂設备、承包新軍需工厂的建設、对建造商船的撥款和收购商船等等。营团的資本为二亿日元,全部由政府出資,并被准許发行十倍于資本金的債券作为营业資金。这个机构的总裁是由壟断資本的代表藤原銀次郎充任,他的活动范圍包括:将紡織工厂改为軍需工厂,建造船只并将其廉价卖給輪船公司,建設制造碱、工业盐、碳黑、人造橡胶等化学工业及炼制鋁、鋼等工厂,在"滿洲"、华北,广泛地經营企业(1942年末投資約七亿日元),以及掌握和調換价值九亿日元的閑置設备等等,这些措施对推行壟断資本的战争經济,起了重要作用。这个营团的亏損达到二十亿日元,这笔款全部由政府补償,这就等于政府付給壟断資本一笔补助金。

其次,重要物資的儲存及其适当有效的利用,在推行壟断資本的战时經济上,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担当这項任务的是1942年2月設立的"重要物資管理营团",它的資本金为二千万日元,全部由政府出資。这个营团的設立目的是管理庫存品和对来自南方地区的重要物資进行統一的統制。它首先在1942年5月与各統制会合作,开始收购剩余庫存品,同年10月被賦与强制收购权以后,它便进一步为推行战时經济而把重要原料器材彻底向壟断資本加以集中了。

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的一年中,进行了这种在壟断資本控制下的战时卡特尔化的改組以及建立了作为它的輔助机构的国家机关。但由于1942年年底战局的轉变和由此产生的加强軍需生产重点化的必要,对于这些"統制机构"又一次实行了調整和加强。在1942年11月27日的內閣会議上,决定設立一个以总理大臣为主席,包括企划院总裁及其他有关閣僚与官僚的临时增产委員会,并命令各地方設立地方各机构联絡协議会作为这个机构的下級組

織，加强了中央和地方为一体的經济支配机构；此外，于1943年3月，还公布了賦予政府以强大“命令权”的“战时行政特例法”。这些措施是为了使生产力集中到鋼鉄、煤、輕金属、船舶、飞机等五个重点工业而把强大的“命令权”給予了首相和閣員，但事实上，这些“命令”是由壟断資本发出的。因此，东条首相聘任一批壟断資本的代表为內閣顾問，其中包括鋼鉄統制会会长丰田貞次郎、产业机械統制会会长大河內正敏、产业設备营团总裁藤原銀次郎、日本銀行总裁結城丰太郎、三菱重工业公司总經理乡古洁、船舶运营会会长山下龟三郎、輕金属統制会会长兼昭和电气工业公司总經理鈴木忠治，这些人都是重工业壟断資本的健将。由这批人制定的“命令”，通过加强了的国家权力发布实行了。这是壟断資本更加直接地控制和进一步加强国家机关以及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重大发展。这种趋向进一步发展的結果，于同年年底設立了軍需省。

征用和整編企业

对劳动力的統制动員和軍事奴役式的管理，是“經济新体制”的重要一面。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几年起，就逐步地建立了这种体制，职业介紹工作成了政府的工作，对劳动力的征用有了法律根据。并且，由于实行“勤劳手册制度”和“国民登記”的办法，工人完全被束縛于强制劳动之中。以往，政府采取了以家为对象限制劳动力移动的消极政策，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发展，进而采取了称为“劳务配置政策”的积极的强制劳动政策。1941年12月公布“劳务供求調整令”，重要产业工人的解顾退职等都必須經过国民职业介紹所所长的批准，甚至包括小学毕业生在內的一切劳动力都要根据指示加以配置。1942年2月又公布重要事业单位劳务管理令，廢除了重要产业部門有关劳动时間和工資的限制，可以由政府派遣的劳务官任意决定，这样，对劳动管理的加强就由通过法律

的間接統制变为直接統制了。統制劳动的最显著的表現——征用工人急剧增加，1939 年为八百五十人，1941 年为三十一万一千七百二十四人，到 1942 年竟然达到六十二万三千三百八十五人。这完全是对劳动的一种軍事奴役制。对被征者采用在宪兵和警官监視下的寄宿制度加以管理，利用刑罰和停止配售的威胁进行强迫劳动。这种不折不扣的軍事监牢式的强制劳动由于廢除了劳动时間和工資的限制，大大地加强了劳动强度，因而成了壟断資本家的战时利潤增长的巨大源泉。和这些征用工人一起被迫从事最殘酷的强制劳动的，还有殖民地人民和俘虏。他們主要是充当矿山工人；他們在宪兵和警察的关监閉和皮鞭的威胁和管理下，遭受着苛刻的劳动条件和加强劳动强度的折磨。随着走向太平洋战争，对殖民地工人的利用有了不断激增，朝鮮工人移往日本的人数，1941 年为五万三千四百九十二人，1942 年增加到十一万二千零七人，1943 年增加到十二万二千二百三十七人。战爭經济是壟断資本追求最大利潤的工具；可是对工人来說，却意味着不折不扣的軍事监獄。

如上所述，統制的加强又推动了壟断資本对于中小資本的侵夺。这种情况，在国民生产总値沒有多大增长而要迅速扩大軍需工业的日本，表現得更为突出。这种对小企业的整理和向壟断資本的集中化，把非軍需工业改为軍需工业的所謂“企业調整”，在走向太平洋战爭的过程中，为了扩大軍需生产的目的而逐步加强了。担当这項任务的是作为壟断資本的战时統治机构的上述“統制会”，而从事收购和銷售各种設备的則是产业設备营团。1942 年 5 月，政府根据总动員法公布了“企业調整令”，对于調整企业，具备了法律上的强制力。接着又公布了“企业調整合并施行規則”，把广泛的工业部門列为整理的对象。根据这項法令，在 1942 年实行企业合并的有四百一十件，資本金达二十九亿日元，1943 年有五百

七十件，資本金达七十八亿日元。其結果，油漆工厂由三百家减为六十家，水泥公司由二十家减为六家，玻璃工厂由八百家减为九十家，造船公司由二百三十四家减到十家，另外紡織工业由一千三百七十万紗錠被削减了百分之七十七，工厂数也减为十家了。其間，壟断資本則获得了資金和器材，将上述行业改为軍需生产和謀取战时利潤的場所，小資本的工厂被产业营团当作廢鉄来加以处理，企业者根据“征用制度”被送入了統制劳动的监獄。

公司合并件数的变化

行业＼年度	1940	1941	1942	1943
工业	90	185	204	289
纖維工业	13	51	36	31
金属工业	15	22	14	21
机械制造工业	19	52	55	114
化学工业	14	26	30	60
食品工业	5	6	15	12
窑业	4	6	5	7
杂品工业	20	22	49	44
矿业	9	14	11	6
其他	117	179	196	275
合計	216	378	411	570
（有限公司解散减資額单位百万日元）	(851)	(1,774)	(3,223)	(3,303)

（根据日本兴业銀行:《調查月报》）

战时生产的集中——按規模别工厂数目的变化

年度＼从业人数	五人以下	五人以上	十人以上	三十人以上	百人以上	五百人以上	千人以上	五人以上工厂总計
1939	569,827	75,147	44,888	13,181	3,698	473	380	137,767
1940	554,412	76,810	43,451	13,021	3,622	507	394	137,805
1941	550,619	76,358	43,412	12,407	3,451	452	377	136,457
1942	512,802	63,763	41,142	12,213	3,336	453	425	126,332

（根据《日本統計年鉴》）

其次，由于收买劳动力的必要，对于零售业者也强制地进行了整頓。1943 年前半期，仅东京一地就有一万一千家店舖被迫关門，从业員同样地被征去从事强制劳动。为了清理这些被“整理”的工商业者的資产和負債，設立了国民金融金庫。这个金庫在其为期一年半（1941 年 11 月—1943 年 6 月）的营业期間內，根据政府机关的指示，对于关閉企业的二十一万六千四百人发給了补償金总計一亿八千五百万日元，每个企业平均只得到大約八百日元而已。而且，他們領到的这种补償金的大部分，还要被迫儲蓄起来，从而变成为壟断資本的軍需工业資金。

財閥所属公司已繳資本按企业类别在全国資本中所占比率的变化

（只包括日本国內的公司）

	四大財閥在全国所占比率			九大財閥在全国所占比率		
	1937（%）	1941（%）	1946（%）	1937（%）	1941（%）	1946（%）
金融业	22.5	25.2	49.7	23.6	26.8	53.0
重工业	14.6	18.0	32.4	24.9	29.8	47.8
矿业	20.9	22.9	28.3	35.5	34.8	50.1
金属工业	9.2	12.3	25.8	14.7	22.8	41.1
机械制造	18.6	22.9	46.2	31.6	39.9	65.1
造船工业	—	1.7	5.0	9.5	1.7	47.8
化学工业	11.3	15.4	31.4	18.3	24.1	38.3
輕工业	7.0	7.5	10.7	13.5	13.3	16.3
其他	6.1	5.7	12.9	7.5	7.7	15.5
电力、煤气	3.0	4.3	0.5	3.6	7.3	0.5
陆运	5.4	2.4	4.9	6.4	4.0	5.6
海运	16.2	25.7	60.8	19.2	30.3	61.4
土地、建筑，仓庫各业	16.1	15.5	22.7	21.2	19.3	29.4
商业、貿易	5.3	2.7	13.6	6.4	3.5	20.2
合　　計	10.4	12.0	24.5	15.1	18.5	34.5

（四大財閥指三井、三菱、住友、安田；九大財閥指上述四大財閥加鮎川、浅野、古河、大仓，野村等財閥。摘自《日本財閥及其瓦解》）

在这样的企业整編过程中，非軍需部門的壟断資本，一方面对保留的非軍需生产实行了生产集中，同时还将殘余的資本轉入了軍需工业。紡織壟断資本大日本紡織公司、东洋紡織公司、钟淵紡織公司、富士瓦斯紡織公司、日清紡織公司等企业单位使一部分工厂继續生产，而把其余部分改成了制造飞机等重点工业。对于这种改变企业，政府采取了保护政策，不仅将其紡織机等机械作为廢金属而加以高价收购（官价每吨八十一日元，收购时价格为一千三百五十四到一千八百十八日元），而且保証提供信用貸款。企业整編意味着中小資本的破产；但另一方面，"财閥"壟断資本则利用这一措施将其非軍需生产部門改为軍需生产，并且充分地接受政府向軍需工业集中供应資金和資材、給予补貼及課稅上特别照顾等有利措施，力图利用战时条件来加速資本的积累和扩大利潤。总之，企业整編是壟断資本追求最大限度利潤的重要手段，壟断資本通过战时的統制机构——国家机关和战时卡特尔来实行这一整編，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和資本都迅速地向壟断資本集中了。

战时粮食政策的破产

发动了太平洋战爭的日本的农业，在粮食农产品方面根本就不具备自給自足的能力。在落后的农业关系上实行增产运动和配給統制的必然結果，就是依靠进口稻米。这种情况在战局恶化以后，更形成了战爭經济的致命伤。

开战头一年的稻米供給估計量，包括来自朝鮮、台灣的稻米（約九百万石）在内共七千三百三十六万七千石，比需要量（八千零八十四万九千石）相差七百五十万石。以后，不足部分由于需要量的增加和朝鮮米的停止輸入，增至約一千万石。粮食不足問題，从开战头一年起就是采取了大部分依靠进口稻米，其余不足的部分依靠提前吃新米的办法勉强解决的。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对稻谷的生产和流通的統制。根据"改正农会法"、"农地耕种統制規則"等已經开始的对生产的統制，由于"农业生产統制令"(1941 年 12 月 27 日公布，1942 年 1 月 10 日实行)而臻于完成。根据这項法令，从新規定农会会員以外的农戶也負有共同作业和共同利用农业机械和牲畜的义务；由农会訂立生产計划和統制农民轉业。流通部門根据由国家全面管理主要粮食及农产品的方針进行的統制，由于"粮食管理法"(1942 年 2 月 21 日公布，同年 7 月 1 日实行)的頒布而宣告完成，随着中央、地方粮食营团的成立，从新筑起了推行低米价政策的堡垒。其次，对于"农业生产統制令"还附加制定了"农业生产申請規則"，使农业經营者、农业工人、农业机械和牲畜的所有者負有就其所持有生产手段和劳动力等等进行呈报的义务。

在国家統制这样不断加强的同时，农业用器材及劳动力的供应状况却日益恶化了。农业机械用鉄的分配量，减少到平时的百分之三十六(日本劝业銀行:《战时和战后农村經济的变化》)，由于缺乏石油和胶輪，动力机械逐漸陷于停止使用，甚至一般小农具的供应也感到不足。1942 年化学肥料的消费量与 1937 年相比較，氮肥减为百分之七十一，磷肥减为百分之五十八，鉀肥則减少到百分之一点二的水平。(經济安定本部:《第一次經济白皮书》)1942 年 1 月底开始的"加倍堆肥生产运动"虽然部分地弥补了化学肥料供給的不足，但远远未能挽回施肥总量下降的趋势。

劳动力离乡的趋势，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枯竭、城市粮食供应情况的紧張化、实际工資的降低和劳动强度加强等原因，从 1941 年起虽逐漸有了緩和，但 1942 年仍有四十八万人流入城市，男子专业农民的人数比 1941 年减少了三十九万人，而且农业劳动力质量上的降低依然沒有停止。这种情况和軍事动員的进一步扩大(1944 年为三百九十八万人，柯恩:《日本經济的崩潰》)結合起

来，一方面加强了殘余劳动力特别是老人、妇女、儿童的劳动强度，一方面提高了农业劳动的工資，給农业經营加上了新的压力。特别是在新“工資統制令”規定范圍以外的农村雇农及日工的工資，在 1941 年 11 月，很多地方（北海道、东京横濱、东海道、京都大阪神戶、瀨戶內海沿岸、北九州等地区）已經超过了矿山工人的法定最高工資（二·五日元），有时竟高达十日元。（《日本經济年报》第 46 輯）为了对此进行統制，于 1942 年 2 月 3 日頒布厚生省次官通令，規定了农业工人的最高、最低和标准工資。

每反水稻施肥量（单位貫＝3.75 公斤）

肥料 \ 年度	氮肥			磷肥			鉀肥		
	购入肥料	自积肥料	合計	购入肥料	自积肥料	合計	购入肥料	自积肥料	合計
1938	1.628 (100)	1.326 (100)	2.954 (100)	1.021 (100)	0.576 (100)	1.597 (100)	0.903 (100)	1.177 (100)	2.080 (100)
1939	1.628 (100)	1.326 (100)	2.954 (100)	1.021 (100)	0.576 (100)	1.597 (100)	0.903 (100)	1.177 (100)	2.080 (100)
1940	1.542 (95)	1.423 (107)	2.955 (100)	1.026 (108)	0.620 (108)	1.646 (105)	0.289 (32)	1.266 (108)	1.555 (75)
1941	1.412 (87)	1.509 (114)	2.921 (94)	0.875 (85)	0.661 (115)	1.537 (99)	0.384 (43)	1.348 (114)	1.732 (82)
1942	1.376 (84)	1.623 (122)	2.999 (101)	0.501 (49)	0.720 (125)	1.221 (77)	0.078 (9)	1.458 (124)	1.536 (73)
1943	1.279 (79)	0.703 (53)	2.682 (84)	0.431 (42)	0.760 (132)	1.191 (75)	0.038 (4)	1.534 (130)	1.572 (77)
1944	1.146 (70)	1.861 (140)	3.007 (102)	0.222 (22)	0.843 (146)	1.065 (67)	0.035 (4)	1.632 (139)	1.723 (83)
1945	0.300 (18)	1.861 (140)	2.161 (73)	0.070 (7)	0.843 (146)	0.913 (57)	0.021 (2)	1.688 (143)	1.709 (82)

（摘自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日本农业年报》I）

对于生产方面的这种不利条件的积累，“农业生产統制令”并未能提供任何积极的解决办法，仍然是在利用原有的农业机构的基础上片面地加强农业劳动，因而使农业中的矛盾更加激化，反而

促使共同作业的粗放化以及老农和貧雇农发生脫离农业的傾向。这样，在科学方法上找不到出路的增产政策，就轉而求助于精神运动，結果，利用“农业报国联盟”、“内原訓练所”、“地方修练农場”来訓练“推进队”、“先导队”一类的办法以及奴役性的增产运动，比以前加强了。1942年11月，农林大臣井野在帝国农会全体会議上发表的演說中說：“在建設皇国农村上面，我想必須揚弃以往从經济观点进行領导的农业政策，改变施政方針，使它今后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精神运动的性质……。”（帝国农会：《农业年鉴》，1943年版）經过内原“农业增产报国推进队”訓练出来的人員，包括1942年3月到1943年1月的第三批在內共約四万人（石原治良：《利用农事訓练和团队組織的粮食增产》），这些人陆續分往各地方，成了推行精神运动的核心。

继續实行使矿工和休假士兵在农忙季节支援农村，特别是对学生儿童的勤劳动員，通过1942年10月1日以文部、农林两次官名义发布的通令，被进一步地加强了。而在最缺少劳动力的北海道，从这一年开始实行了农业学校学生的“义务劳动”制。

气象条件比較好的这一年（1942年），稻米实际收获量为六千六百七十七万五千石，与前五年平均产量比較，增加了約三百三十五万二千石。这个数量表示当时日本农业生产力的极限。然而，这个数量远远低于生产指标的七千一百六十三万九千石，当战况恶化因而被迫放弃依靠外米的时候，粮食危机已达到了一筹莫展的地步。因此，在同年11月26日召开的时局对策审議会粮食紧急委員会上再次决定了“粮食紧急对策事項”，内容包括：加强水田的复种、将种植旱稻、粟、玉蜀黍改种薯类和大豆、縮减果树园和茶园、增产自积肥料、裁并农业团体、加强共同作业等生产对策，以及降低碾米精度（只去一半糠麸）、提高小麦出粉率和米麦混合配售等消費政策。在对农业劳动的統制方面，实行对各种农业团体的中

央集权化，1943年3月，政府公布了“农业团体法”，把帝国农会、产业組合中央会、帝国畜产組合、全日本养蚕联合会、茶业組合中央会議所合并起来成立了中央农业会；改組全日本购买贩卖联合会、产业組合中央金庫成立了全国农业經济会和农林中央金庫。另一方面，为了征购1942年产稻米的运动，从次年2月中旬起以大政翼賛会为中心，在全国范圍內展开了一个运动，到3月底为止，摊派了四千一百万石的繳售任务。这样，对各个部門都加强了統制，然而粮食的供应情况却越来越恶化了。稻谷的加工精度一再降低，从去七成糠麸降低到去五成，又从五成降至二成（1943年1月），从1943年起实行了包括小麦片、馬鈴薯、面条、硬餅干等的主食的“綜合配給”，并奖励恢复利用野果、杂草的“乡土食品”。这样，进口外米愈趋困难的1943年以后的粮食供应，只好用吃一部分杂粮和提前吃新粮等項办法来勉强維持其最低的水平。

本来，統治日本农业的封建制度构成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性的一个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它同时又必然地造成了日本农业生产水平的低下和使日本依賴进口外米，从而构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五节　战时的思想和文化

彻底統制言論

为了建立战争体制和驅使国民走向战争，对思想、文化方面也采取了激烈的强力措施。1940年8月，內务省計划設立对各种出版业者統一的統制机关“日本出版文化协会”。表面理由是要克服书籍、杂志的配售机构的缺点，但实质上只是积极地通过分配紙張、干涉編輯出版內容等来建立为国策服务的統制原則，进而为合并或取消各种杂志創造了条件。日本出版文化协会的主要負

責人名单是这样：由內閣情报部長伊藤述史担任筹备委員長，民間方面以石川武美（主妇之友社）、赤尾好夫（欧文社）为中心，并包括金鋼石社（經济杂志社——譯者）、三省堂、有斐閣等十八家出版社的代表。妇女杂志在战爭中曾大量刊載了有关目的在于培养"后方的母亲"和"大陆的新娘子"的事迹，是和上述这批人物有关的。

在«鎮压言論史»（日本記者联盟編）一书的«昭和篇»里，把昭和初年至中日战爭爆发这一阶段作为前期，其后为后期，闡述了前后两期鎮压言論的特征。据此，后期的特征是不仅彈压更加凶暴和更加有組織，而且干涉的魔手已經伸到編輯过程和經营組織方面，同时这种干涉在进行"指导"的名义下已經經常化了。除当局的統制以外，业者本身也进行了以互相监督为內容的"自主的統制"，其結果，新聞、杂志等出版物走向规格品化了，禁止发售的件数虽較中日战爭爆发前为少，但統制范圍大大扩張，竟至把广告也包括在內了。例如，1940年大阪府警察部曾就彻底取締在各种商品、书籍、电影等的宣傳广告中使用过分夸張刺激色情和荒誕不經的詞句发出一項通告，并列举以下实例說明禁止的范圍，这就是："专門宣傳性病药品的广告，今后一概不許登載"；并且"关于妇女药品、性激素剂的广告，如果标題文字和治疗項目流于浮夸，文字設計不够妥当，即不許刊載"，从这种滑稽透頂的"淨化整肃"方針出发，甚至对广告登載的位置等細节都作了詳細的规定。

同年10月，情报部扩大为情报局，吸收了一部分原来归陆海軍及內务省、外务省所管事項，設立五个部十五个科，进一步加强了建立"国內新体制"的活动。由情报部改組为情报局以后，原来由情报部每月召开一至两次的各出版社編輯負責人的"杂志、出版恳談会"，在陆海軍軍官及各情报官参加下继續举行。在这里还进行"战况报告"，下达"禁止刊載事項"，并强迫刊登"官方稿件"，甚

至要求主要杂志事先提出編輯計划和預定执笔人名单(1941 年 5 月)。

不言而喻，对紙張的限制不仅因为物資不足，也是为了扼杀被认为对于进行战爭有害或不必要的报刊。同时，对紙張供給的限制是結合整理企业同时进行的。根据日本文学报国会所編《文艺年鉴》(1943 年版)有关杂志、出版界动态的記載，杂志的停刊、查封合并等現象是在逐年激增。这就是說，政府通过从内部直接干涉編輯内容、編輯人和执笔人，从外部限制用紙数量和整理企业的方式，实行了"統一言論"即鎮压言論的政策，当然，为了使这种干涉和鎮压"合理化"，政府也沒有忘記准备法律根据。具体例子是: 1941 年 1 月 10 日公布"新聞紙等刊載限制令"; 同年 2 月 27 日成立"国防保安法"; 同年 12 月 18 日公布"对言論、出版、集会、結社等的临时取締法"等等。在上述各項法令的条文中显明地表达了政府的意图，最直接的例子是太平洋战爭爆发的次日——1941 年 12 月 9 日，在情报局第二科召开的"恳談会"上由警保局图书課某事务官所宣讀的"禁止刊登事項"。兹将其中的一部分介紹如下:

对一般輿論的指导方針

一、强調这次对英美战爭是为了維护帝国的生存和权威迫不得已而发动的战爭。

二、論証敌国出于自私的目的企图独霸世界的野心是这次战爭爆发的真正原因。

三、强調世界新秩序是从"八紘一宇"的理想出发，而以使世界万国各得其所为目的。

具体的指导方針

一、鼓吹不仅战局向有利于我方发展;而且在战略上，我方也处于絕对优势(中略)。

二、特别需要在国民中間培养对英美的敌愾心。（中略）

三、培养进行持久战的决心。

当前需要严重警惕的事項

一、曲解帝国发动战爭的眞意，誹謗帝国公正态度的言論。

二、曲解开战的經过、誹謗政府及統帅府的措施的言論。

三、认为政府在开战时曾經期待德意援助的論調。

四、认为政府与軍部之間有过意見分歧的論調。

五、反映国民不服从政府的指示、輿論不統一的論調。

六、宣傳在"中国"、"滿洲"及其他国外地区存在动搖不稳情況的言論。

七、对于助长国民反战、厌战情緒的論調，必須格外注意。

八、有助长反軍情緒傾向的論調。

九、足以助长和平气氛、瓦解国民士气的言論。

十、足以扰乱后方治安的一切言論。

此外，在同一天里又根据同一精神公布了关于南方問題、对苏关系和对"軸心国"关系的禁止刊登事項。

只有通过了以上这些禁止刊登事項的罗网的消息，才能傳到国民的耳目。但是，政府之所以不得不这样极端限制刊登范圍，从另一方面說来也是表明当时在地下仍然有不肯向权力出卖灵魂的人們在进行活动。

为国策服务的文化运动

迎合政府的統制的文化运动就是"为国策服务"的文化运动。文艺家协会和到前綫从軍的"笔杆部队"相配合，广泛地开展了"后方文艺运动"。为了介紹这个运动的一斑，兹从《文艺年鉴》中摘引如下的一段：

"后方文艺运动北海道組于 8 月 23 日从上野車站出发，先后訪問了函

館、小樽、札幌、旭川、室兰等地。講演人及講題是：石川达三（«日本性格»）、片岡鉄兵（«精神侵略»）、白井乔二（«关于战时国民性問題»）、吉川英治（«談談思想准备»）、松井翠声（«时局漫談»）等五人。24日到达函館，会見全北海道新聞記者。当天夜晚，在新川小学举行講演，听众二千人。25日到达小樽，在寓所接見北方文化协会会員。这天晚上，在商工会議所举行講演会，听众七百人。26日到达札幌，白天全体人員出席北方文化协会的欢迎会，該晚在市公会堂举行講演，听众二千人。27日，出席札幌北海道时报社的欢迎午餐会，会后，即出席在鉄道局集会所举行的講演会，吉川英治以«科学文化与精神文化»为題发表演說，給鉄道从业員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天夜里，又出席了札幌鉄道局長吉松乔的欢迎晚餐会。28日到达旭川，下午到軍医院进行慰問，晚間在中央小学举行講演，听众二千人。29日到达室兰，当天夜里在女子小学举行講演，听众二千人。在登别溫泉逗留一夜，于31日全体人員安返东京。"

从以上的記載可以了解，这一运动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根据記載，参加这个运动的听众总数达到十万六千余人，从这里可以想見它給地方群众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农村文化学会也在全国农村开展了灌輸文化和复兴乡土艺术的运动。当然，这个运动不是为了农民的解放，而是把农民当作了有力的兵源，正如由这个协会作詞作曲并极力加以推广的"农民报国之歌"所清楚表明的那样。这个运动借助于国家的力量，采取巡廻放映电影、巡廻演劇的形式，将歌頌战爭的文化甚至带到了穷乡僻壤和孤島漁村。不論在城市或者乡村，对群众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浪曲"，就其性质說来，是最适用于宣傳国策的有力工具。1940年9月，內閣情报局曾出面动員"日本浪曲协会"和"浪曲亲交会"进行合作，——还得到了"經国文艺会"的主动参加，——使其担当了精神运动的一个方面，产生了所謂的"爱国浪曲"。同时还动員了菊池寛，久米正雄，佐藤春夫等作家根据內务省、陆海軍部及日本紅十字会等所提供的材料創作唱詞，使东西浪曲家进行竞賽演出。就这样，在各个部門都建立起了宣傳国策的机构。在此以

前，警視厅看到“新协剧团”和“新筑地剧团”的演剧运动的中心目标仍然是宣傳社会主义思想，对一般人民的影响很大，就在1940年8月勒令解散，而代之以提倡国民演剧，使剧团采用情报局所許可和推荐的御用脚本，为宣傳增加生产和普及軍国主义思想服务。

1940年正是“皇紀二千六百年”，因而被认为統制国民思想的絕好机会。已經成为御用新聞的各大报社，一律举行“建国二千六百年事业紀念”。它們除在橿原神宮修建建国会館、八紘寮、橿原文庫、野外讲堂、弓道場、大和历史館、相樸道場等以外，同时还为青少年进行鍛炼修建了“生駒山道場”（以上朝日新聞社）；或者征集二千六百年贊歌百人一首，献給橿原神宮（讀卖新聞社）；或者組織祭祀神武天皇的全国一百九十九个神社的升格运动和捐献劳軍“宣撫”用放映机运动（报知新聞社）；或者推举东久邇宮为总裁，举办了“光輝的技术博覽会”（以上大阪每日、东京日日新聞社）。另外，日本广播协会还募选了《庆祝紀元二千六百年歌》。

另一方面，以狂热的皇道主义者蓑田胸喜、三井甲之等的原理日本社为中心，进行了为“皇紀二千六百年”寻找理論根据的“学术研究”。这个团体的机关杂志《原理日本》（第15卷11期，1939年12月）的临时增刊号上刊載了題为：“庆祝‘皇紀二千六百年’前夕学术界空前的不幸事件！”“津田左右吉的大逆思想”的文章，企图抹杀津田左右吉在古代史研究上所取得的科学的成就。津田在《神代史研究》、《日本上古史研究》、《古事記及日本书紀研究》、《上古日本的社会及思想》（均由岩波书店出版）等著述中所作的实証的比較研究，是迄今日本历史学界的最高成就，而“原理日本”却指控它是亵瀆皇室尊严的大逆思想。自从美濃部博士的“天皇机关說事件”起一貫地走在檢查机关的前面为鎮压科学研究而卖力的《原理日本》的控訴，在津田的問題上也奏了效，次年—— 1940年

3月8日，东京地方検事局以違反出版法为理由，对出版者岩波茂雄和津田博士提起公訴。这一事件清楚地說明了随着中日战爭的发展，一切科学的、良心的学术研究逐步被剝夺合法地位的当时的情况。

为了适应新体制，詩坛的統一組織"日本詩人协会"、西洋画坛的統一組織"美术家团体联盟"、雕刻家的統一組織"雕刻家悬談会"等相继成立了。在文坛上，"經国文艺会"的佐藤春夫、国防文艺联盟的戶川貞雄、大陆开拓文艺悬談会的福田清人、"日本笔会"的中島健藏、农民文学悬談会的間宮茂輔、文学建設的海音寺潮五郎、文艺家协会的木木高太郎、幽默作家俱乐部的辰野九紫等联合起来組成"日本文艺中央会"，分别在各自領域內，开始了配合国策的准备工作，这是进而发展为文学报国会的前奏。

在这种气氛中，泛濫着上意下达、下意上达的濫調。在俳句界(俳句为日本的一种短詩——譯者)，原有以高濱虛子为領袖的傳統派，以荻原井泉水、中塚一碧楼为首的自由律派和新兴俳句派三个派别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在內閣情报部的动員下，以上各派結束了分立状态，成立了"日本俳句作家协会"。另外，对儿童文化团体也进行了合并，在政府的推动下，由島崎藤村、山本有三、百田宗治、坪田讓治、小川未明、城戶幡太郎等深切关怀儿童文化的作家、画家、教育家、玩具业者、出版业者等成立了"大日本儿童文化协会"。

不仅东京是如此，在地方上，翼贊会文化部也展开了工作，相继成立了：神奈川县翼贊文化联盟(由久米正雄領导)、九州文化学会(由火野葦平等領导)、山梨文化联盟、广島文化协会、山形县文化协会(由結城哀草果等領导)、八王子文化联盟(由瀧井孝作、太田水穗、小島善太郎領导)。这些团体的領导者并不限于艺术家，还有医生、教师、农村領袖等参加。

对于自然科学工作者，科学动員协会編制了全国科学工作者的"戶口册"，成立了为战爭服务的科学技术动員組織。其初步措施是分发給官、公、私立研究所等所属人員登記卡，調查他們的学历、研究范圍和专題及其他有关情况，根据全国科学工作者的研究系統，編成金字塔型的陣容，建立起随时可以承担軍部需要的体制。

由于太平洋战爭的爆发，使这个趋向有了更加迅速的发展。1941年12月24日召开"文学者爱国大会"，接着在次年6月18日在日比谷公会堂成立了社团法人日本文学报国会。在成立仪式上，在新近成为会員的文学工作者二千余人，以及友好团体、出版文化协会、东京各大学的文科学生等参加之下，推选德富猪一郎为会长，随后八个部会的代表卽小說部会(菊池寛)、短歌部会(太田水穗)、評論随笔部会(河上徹太郞)、俳句部会(深川正一郞)、外国文学部会(茅野蕭蕭)、本国文学部会(桥本进吉)、詩部会(尾崎喜八)、戏剧文学部会(武者小路实篤)分别宣了誓。之后，以此文学报国会为中心，从1942年11月3日起在东京召开了为期三天的"大东亚文学家大会"，文学家为战爭服务，达到了最高潮。这个大会的目的是使"东亚共荣圈"各地的文学工作者齐集一堂，交流思想，开怀暢叙，大会依次討論幷通过了："建立大东亚精神"、"大东亚精神的加强和普及"、"通过文学促使思想文化融合的方法"、"文学为完成大东亚战爭服务的方法"等項决議。

这个时期的电影，以战况新聞影片最为流行，这种影片大大地被当局用来鼓舞国民的士气。特别是拍攝了太平洋战爭开始后迅速进攻場面的鏡头，在把亲人送往战場幷关怀其安危的国民中間，受到了异常的期待与欢迎。"馬来亚战記"、"进攻的記录"、"昭南島(新加坡)的誕生"、"緬甸战記"、"东洋的凱歌"、"帝国海軍胜利的記录"等一連串的长篇战爭記录电影相继出現了。一般影片

方面有：文部省推荐的"元祿忠臣藏"、"母子草"、"父亲在时"、"将軍、参謀和士兵"、"南海的花束"、"独眼龙政宗"、"夏威夷、馬来亚海战記"、"英国的末日"等。这些影片不是以战爭为題材就是以后方家庭生活为題材，大都质量低劣；据說，"夏威夷、馬来亚海战記"因为是在太平洋战爭一周年的十二月开始放映，所以上演的成績是很大的。

获得1942年朝日文化奖的有：藤田嗣治的战爭画"新加坡的末日"、中村研一的战爭画"哥打巴魯"（日軍在馬来半島的登陸地点）、信时洁为《到海洋上》的作曲、岩田丰雄的小說《海軍》等作品。其中在《朝日新聞》上連載过的《海軍》是以参加进攻珍珠港的"九軍神"为主角的作品，在創作上受到海軍的援助，由于軍部和情报局的推荐获得了大量的讀者。

屹立在暴風雨中

在这种形势下，正宗白鳥曾說：以往閱讀杂志时，总认为現在不是讀小說的年月而根本不想看小說部分，只是翻閱有关政治、外交、經济的論文，以便了解国内外的眞实情况。但是在今天却使人感到"堂堂的政治評論好象空話一般地从脑子里烟消云散"；质量不高的小說反而能够仔細周詳地反映現实生活情况而引人入胜。（《杂記簿》，見《改造》杂志1940年9月号）这种說法本身就是对上述形势的一种抵抗。白鳥还談到言論不自由的問題，他說：即使在德川封建制度的殘酷压制言論的情况下，正如"人口难封"的諺語所表明，一般民众仍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吐露自己的感情，对社会进行了批評。可以想象，当时的历史家和剧作家也不会不去运用适当的手法来表达他們对于人生、对于社会的批評。他还說，"在現代，无疑也是如此，如同妇女們总是躲躲藏藏地喜好华美地裝飾打扮那样，不甘沉默的評論家、喜好自我表現的文学家，似乎也在

拐弯抹角地发表自己的意見。只看表面現象就认为万事大吉的看法，也許还是幼稚的。”因此，“那些檢查人員，要想从每个人的文章里看出作者的眞实思想活动，如果不是具有基督教所說的那种上帝的智慧，是不可能的。”这样，白鳥运用文字的表現技巧公然发表了反对鎭压言論的意見。他說：不但檢查人員不能理解作者的眞意，而且讀者也不能了解，其結果，就成了作者的自言自語，这种情况，对写文章的人而言，实在是难以忍受的。当然也有写文章留待后世評論的說法，但是沒有比今天更使人深切地感到这种說法是空虛的了。他接着說道：“人从幼小时起花了許多功夫学会了語言，总想加以利用。即使象英文之类經多年努力学会的外文，人們也都想使用。何况自己本国的語言，总想尽量把它加以利用，这应該說是人的常情吧。”

对言論的鎭压是严厉的。然而，正如白鳥所指出的，文化界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偽裝进行了抵抗。因为不准发展非法的抵抗組織，文化人士无从参加这类組織，从而他們的活动也就不能不局限于合法的范圍以內，于是，这种抵抗就不能成为有組織的运动而向前发展，以致沒有出現可以称为抵抗文学的文学作品。总之，这种抵抗只能以主观的抵抗而告終，并沒有形成客观的力量。战后出版的神山茂夫的《关于天皇制的理論問題》及其他一系列理論方面的研究成果，是在1939年至1940年期間写成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著作在地下党組織的保卫下，經过油印在人們中間互相傳閱。宮本百合子在其战后出版的选集的后記里写道：“《晨风》这部作品，因为作者无法将充滿胸中的思想感情自由地表达出来，簡直如同从被堵塞的口角流露出来的声音一样。也可以說这是只見嘴唇动但听不到声音的作品。在周圍有形无形的压迫下，也只能产生这种殘缺不全的作品。由于处在这种情况下而使作品受到歪曲的，不止我一个人而已。”她又說：“今天重讀我的文章，覺得随着日本战爭

的进行，我的文章越来越变为含糊不清的声音了。想說的意思，应該使用的語言，或者被模糊了，或者停留在暗示的程度”。但是，这位女作家从 1938 年 1 月至 1939 年初以及 1941 年以后先后遭到禁止执笔，因此，在战爭期間能够发表上述那样作品的时間，也不过是短短的一年半而已。尽管如此，宮本百合子在这个时期的文学活动是非常积极的。她出版了《向往明天的精神》、《文学的道路》、《我們的生活》等評論集；《朝风》、《三月的第四个星期天》等小說集。这些作品都是“战爭和法西斯主义的阴暗沉悶的日子里的理性和良心的火把”。（藏原惟人：《小林多喜二与宮本百合子》）在短篇小說《三月的第四个星期天》（1940 年 4 月出版）里，作者深入到表面上被称为产业战士而受到奉承的青年工人的生活內部，描繪了他們因为战爭的緣故而更加苦痛不堪的矛盾和不安。这与窪川（佐多）稻子在描写少年工人的自豪和美梦遭到无情摧殘的阴暗現实的作品《梦想的远景》，有着一脉相通之处。在不能公开反对战爭的情况下，能够眞实地描繪出这种現实的矛盾和黑暗，可以說是最有力的抵抗。在这个时代里，能够耐心細致地描写人們不理睬战爭、和战爭不发生关系那一方面的喜怒哀乐，特别是充滿苦难的大众生活的眞相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抵抗。在这个时代里，不为战爭服务，不把战爭理想化的，就被扣上“非协力者”的帽子而受到歧視；以“日本浪漫派”为主的傾向于贊美战爭的浪漫派占着統治地位，大肆鼓吹动員国民参加战爭的国民文学。高見順的《文学非力論》（1941年 6 月）就是对于这种傾向的一种抵抗，属于这种抵抗的，还有密切联系实际追求現实的散文精神的倡导者广津和郎的《市井的历史》（1941 年 1 月）以及野口富士男的《风的系譜》（1940 年 4 月）、織田作之助的《夫婦善哉》（1940 年 7 月）等一系列的小說。这些小說引人注意之点在于：各都以女性为主人公描繪出她們虽然一再遭到摧殘打击，但仍然从苦难的深淵里勇敢地站起来，

开辟着自己的前途那种坚韧的生活力。壶井荣的《日历》(1940年2月)也是这类作品之一,貫串于这个作品中的劳动人民健康的感情和明朗的性格,对于孤立在阴暗角落里进行抵抗的人們,是一种强有力的鼓舞。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則一貫沈湎于文学的世界里,探索內心的悲伤叹息和得不到健康生活的苦恼,并把自己独有的精神世界展示給讀者的堀辰雄的《菜穗子》(1941年3月)等作品,也应該看作一种文学的抵抗。与宮本百合子并肩前进、在这个时期合法的文化运动中进行了最积极抵抗的是高仓輝。他在太平洋战爭爆发前后至战爭末期以《青銅时代》、《日本語》等为題出版的一些作品和評論中,对于日本的封建制度、民族的神秘化、非理性主义等进行了毫不容情的批判。当然,为了进行这种批判,需要在文字上运用很大技巧。但是,他在这个时期所以能够进行这种批判,是因为从这样的观点出发的,这就是:并不反对战爭本身,而是为了进行战爭也必須合理地解决这些問題。这种作法,作为对战爭的一种反抗来說是后退了一步;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明确地指出了在战爭过程中战爭主持者中間的矛盾必然地尖銳化,以及尽管在战爭期間,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的規律仍然在起作用,这样的重要事实。这种动向,也可以从风早八十二、大河內一男等关于生产力的理論著述中明显地看到。为了进行战爭,需要扩大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建設高度的"国防"国家。为滿足这种需要,战爭主持者們首先是鎮压工人运动,并在"牺牲"和"服务"的美丽詞句掩盖下加强劳动强度。对此,大河內和风早主張,必須合理地保护产业劳动力,并且对劳动力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則,才能求得生产力的发展。

石本統吉的《雪国》(1939年)、今泉善珠的《火車头C57》(1940年)、《一个保姆的記录》(1941年)等文艺影片說明了,日本軍事生产所引起的生产力的增长是在如何苛刻地加强劳动强度和牺牲工

人的情况下实现的。

高仓輝描繪主張"尊王者必須为百姓而牺牲，不然就不成为尊王"的大原幽学的一生的《大原幽学》，是一部具有积极意义的文学作品。曾經中断了撰写《路旁之石》(他在这本小說中想描写一个受到福澤諭吉"天不生人上人，也不生人下人"的思想影响的、出身于赤貧家庭堅持要克服一切苦难勇敢地活下去的不知名人物战斗的一生)而另行发表了《折笔》一文的山本有三，也鮮明地采取了抵抗的态度。在这个时期，新起的評論家岩上順一的著作算是很突出的(著有《历史文学論》);窪川鶴次郎則力图埋头于文学理論工作(著有《再論現代文学》);中野重治的《讀斋藤茂吉笔記》，是在1940年至1941年的黑暗时代里傾注全部热情描写出追求眞实精神的作品。然而，1941年1月，政府禁止了左翼作家进行写作，其結果，德田秋声的自然主义文学的最后一部作品《縮影》(連載于《都新聞》)，被迫中断(1941年9月)，就連丹羽文雄的《中年》之类的作品也被禁止发售了。

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政府立即把进步的文化界人士加以逮捕拘押，施行了无法形容的暴行。这既不属于何者可談何者不可談的問題；也不属于仅仅用鎭压言論一詞所能表现的事件。当时，每个文化界人士心里虽然都怀有难以形容的憤怒，然而沒有能够作任何有組織的抵抗。开战的次年，就連中島健藏、三木清、清水几太郎等自由主义思想家也被政府征用派往前綫去了。不論任何人，如果不为战爭服务，則不仅不許发言，而且还要被强迫为战爭服务，如果还不表示願为战爭服务，就要受到有形无形的迫害。所以，在当时保持沉默就已經是最大的抵抗了。在已經看不到象样的文学作品的当时，只有中島敦的《光和风和梦》(1942年8月)、《李陵》(1943年7月)、谷崎潤一郎的《細雪》(連載于《妇女公論》)等少数作品，可說是从战爭中保护了文学。然而就連这部《細雪》

也仅仅連載了两次就被禁止刊載了。不久，由中央公論社出版的連載这部小説的《妇女公論》杂志也被禁止发售（1943年2月），为了《妇女公論》本身能够继續发行，杂志社也只好“自肃”地停止刊載这部作品。虽然如此，潤一郎仍继續撰写这部小說，而在1944年完成了上卷，作为私人印刷品印制了二百本分送給朋友閱讀。对此，有人认为这不是艺术的抵抗而是一种逃避（中村眞一郎：《艺术的抵抗派》），然而，这种作法也未尝不是企图从激烈的战爭中保卫文学的一种表现。这种看法也适用于永井荷风的情况：他也是被剝夺了发表作品的机会，受到种种迫害，被战火燒毀了住宅而不得不輾轉迁移，就在这种生活里，他仍然坚持創作了《浮沉》、《舞女》、《勛章》、《不問自答》等日本投降后立即发表的許多作品。

战爭主持者将写作活动（不管发表或未发表）和相互間的启发运动（朋友間的談話、通訊、不定期集会、书籍借貸等）都納入了治安維持法的适用范圍以內。这就表明，甚至在往年的无产阶級文化运动中只能算是微不足道的这类抵抗，現在也构成了犯罪；而从“犯罪者”方面来說，即使作这样的瑣事也必須考虑到被判处死刑的問題。荒正人曾說过：如果仅从表面上看問題而拿昭和初年的坚强抵抗和太平洋战爭中的无力抵抗进行比較的話，“就要被认为脫离历史的錯誤观点”；并主張“必須更深入到思想內部，从进行这种抵抗的主观方面来进行估价”。（《近代文学》，1948年2月）由大井广介、小熊秀雄、坂口安吾、杉山英树、平野謙、荒正人、佐佐木基一主办并且有小田切秀雄、本多秋五、岩上順一等人撰稿的《現代文学》杂志，以及由花田清輝、中野秀人、小野三郎等人办的《文化組織》杂志，由中村光夫、西村孝次、吉田健一、平野仁启、斋藤正直、伊藤信吉等主办的《批評》杂志，平田次三郎、波良健、石川道雄、內海伸平等人主办的《赤門文学》杂志等等，各都在困难的条件下对于非文学的气氛进行了抵抗。这些人就是战爭結束后立即在

創办《近代文学》并在其他方面开始了积极活动的所謂“三十几岁”的人們。荒正人說：“記得一直到战敗的一年以前，非法的小組还定期举行聚会，只要有一点点可能，就利用合法的机会組織启蒙活动。参加这个小組的文艺評論家一个时期到过将近十人。这难道不是对战爭的抵抗嗎？象这样的抵抗曾有无数个。”（荒正人：《近代文学》）当然，不能說这种抵抗直接对战爭发生了多大的影响，然而，值得重視的是，正是在这种努力的基础上才产生了他們在战后时期旺盛的文学活动。

比这些人稍后的一代，即黑暗时代已經到来以后才进入思想个性形成阶段的青年們，以及被强制地送到工厂或者战場的青年們，他們虽然几乎不具有系統的理論思想基础，但是，他們根据对这种黑暗的战爭的切身体驗，也表現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抵抗的情緒。从《陣亡学生的笔記》一书中可以看到：有的学生“在被派往前綫时偷偷地把托尔斯泰的《人生論》装进皮囊里；有的在工厂的宿舍里深夜翻閱康德的《实踐理性批判》；尽管报紙上大吹大擂地报道“学生上战場”的“雄壮”場面，但实际上他們絲毫也沒有感到兴奋，而只是在悲哀的气氛中带着阴郁的表情走上了战場。

編 后 記

本卷記述了从1940年中期至1943年初期，即第二次近卫內閣至东条內閣时期的历史，这是一段包括太平洋战争爆发，从战争初期的胜利走向不利局面的富于变化的历史；其中包括着因牵涉到发动战爭的責任問題及战敗責任問題而在审判东条当时和現在，在各种意义上成为爭論对象的問題。正因为如此和史料不足，在确定史实方面感到极大困难，但由于从国际、政治、經济等多方面进行了考察，大致取得了比較正确的看法。鉴于种种錯誤观点：說什么仅仅由东条个人或者軍部发动了战爭，其他統治者都是"和平主义者"；由于遭到美国的压迫，日本为了自卫才不得已而发动了战爭；日本在中途島海战中偶然的失算造成了战敗的原因等等，在今天仍有其广大市場，那么，本书中的研究成果，或許对了解当前形势会有一些帮助。

本卷执笔者如下：

政治：远山茂树、今井清一、荒井信一、川村善二郎、藤井松一、松本貞雄。

經济：宇佐美誠次郎、秋山穰、山本弘文。

文化：松島荣一、島田福子、伊豆利彦、紅野敏郎。

中国：野原四郎、小島晋治。

国际关系：江口朴郎、荒井信一、岡部广治。

另外，本卷中刊登的照片是由日本近代史研究会提供的（包括第二卷中的照片）。（均从略。——中譯本編者）

附录(一)　年表

（1940年7月—1943年2月）

年	月/日	日　本	月/日	东　方	月/日	西　方
1940（昭和15年）	7·6	社会大众党解散。	7·2	国民党举行七中全会（8日閉幕）。日本設立駐法属印度支那监視員办事机关。	7·1	法国政府迁往維希。
	7·7	近卫文麿表明对新体制的意见。东京交通工会解散。	7·7	中共中央发表抗战三周年紀念宣言。	7·5	法国維希政府宣布断絶对英邦交。
	7·8	日本劳动总同盟解散。	7·18	日英簽訂关于封鎖滇緬公路的协定。	7·10	法国决定废除第三共和国宪法。
	7·16	米内内閣总辞职。政友会正統派（久原派）解散。	8·7	中苏締結新条約（商約）。	7·11	貝当元帅就任总統兼总理。
	7·18	日本农会总同盟解散。	8·20	八路軍开始百团大战。	7·20	美国通过两洋艦队法。
	7·19	近卫文麿和将出任陆海外三相人选举行荻洼会談。	9·22	签訂日、法属印度支那軍事协定。	7·21	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維亚加入苏联。
	7·22	第二次近卫内閣成立。	9·23	日軍开始侵入法属印度支那。	7·25	美国对废鋼鉄、石油实行輸出許可制。
	7·25	永井柳太郎等取消派脱退民政党。	9·26	美国对华貸款二千五百万美元。	8·12	德空軍轰炸多維尔、朴次茅斯。
	7·26	政府决定基本国策綱要。国民同盟解散。	10	苏中民主政府成立。	8·13	英德海軍在英法海峡进行海战。
	7·27	联席会議决定針对世界形势演变处理时局綱要。破获路透社記者柯克斯等外国間諜网。	10·14	在江苏的蒋系軍攻击新四軍陈毅支队（苏北事件）。国民党調集二十余万軍队加强封鎖陕甘宁边区。	8·17	德国宣布对英实行完全封鎖。
	7·30	政友会革新派（中島派）解散。	10·18	滇緬公路重开。	8·24	英国同意美国租借百慕大岛。
	8·8	促进新体制同志会成立。	10·19	国民党軍事委員会命令新四軍移駐华	8·29	德空軍对倫敦实行二次大战中规模最大的轰炸。
					9·2	英意在东地中海上进行海战。
					9·3	美英发表就轉让驅

1940（昭和15年）

8·15 民政党解散。大日本农会解散。

8·22 向駐美大使堀内等在外外交官发出归国命令。

8·23 新协、新筑地两剧团解散。

8·25 在东京举行日法会談，签訂关于法属印度支那問題原則性协定。

8·26 三井合名、三井物产两公司合并，成立三井物产公司。

8·27 小林商相被任命为駐荷印特派大使（担任同荷印交涉）。

8·28 新体制筹备会召开首次全体会議。

8·29 基督教各派决定成立"純正"日本基督教会。

8·30 松岡、法国駐日大使安利换文。

9·1 东京禁止平日午前开放娛乐場所。

9·2 成立村会、街道居民組織等。

9·5 海相吉田辞职，及川古志郎继任。

9·7 德国公使斯塔瑪来日。

9·13 日荷会談开始。建川美次就任駐苏大使。

9·19 御前会議决定締結日德意軍事同盟条

北。

11·26 汪兆銘通电蔣介石劝告同日本媾和。

11·29 汪兆銘就任伪南京政府主席。

11 重庆政府停止发給八路軍、新四軍軍費。

12·1 美国对国民党政府提供一亿美元信用貸款。

12·8 泰国，法属印度支那两軍冲突。

12·10 英国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一千万鎊信用貸款。

12·23 日軍宣布加强对华中华南沿岸的封鎖。

逐艦問題举行談判。

9·7 德空軍大举轰炸倫敦。

9·12 意軍开始进攻埃及。

9·16 美国总統罗斯福发表国防宣言，通过征兵法。

9·23 英海軍进攻达喀尔。

9·26 美国发表对日禁运废鋼鉄。

9·27 日德意締結軍事同盟。

10·4 希特勒、墨索里尼在普倫納隘会談。

10·5 德軍侵入罗馬尼亚。

10·28 意軍侵入希腊。希腊对意宣战。

11·5 美国选举总統，罗斯福第三次当选。

11·12 莫洛托夫、希特勒会談。

11·20 匈牙利加入日德意三国同盟。

11·23 罗馬尼亚加入日德意三国同盟。

11·24 斯洛伐克加入日德意三国同盟。

12·2 英西軍事协定成立。

12·18 希特勒密令于1941年5月以前完成对苏作战准备。

12·29 美国总統罗斯福发

年	月/日	日　本	月/日	东　方	月/日	西　方
1940（昭和15年）		約。				表演説主张美国应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
	9·22	日、法属印度支那軍事协定签字。				
	9·23	日軍进駐法属印度支那北部。				
	9·27	日德意軍事同盟签字。就此，日皇頒布敕語。				
	9·28	小川乡太郎就任鉄道相，秋田清就任递信相，金光庸夫就任厚生相。				
	9·30	日本編輯者会成立。				
	10·1	創設总力战研究所。				
	10·3	参謀总长閑院宮辞职，杉山元继任。				
	10·8	天皇前往东京帝大。				
	10·12	大政翼賛会举行成立仪式。				
	10·14	日本文学家会成立。				
	10·19	公布公司財务統制令、銀行等資金运用令、工資統制令（10月20日施行）。				
	10·22	东方会解散。				
	10·23	政府和大政翼賛会决定禁止文化、思想团体的政治活动。				
	10·24	公布米谷管理规則。				

1940（昭和15年）	11・1 前往荷印的特派大使小林归国。 11・2 大日本产业报国会成立。 11・5 內閣会議通过日“滿”“华”經济建設綱要。 11・9 公布防止从业員移动令。 11・10 举行建国二千六百年紀念仪式。 11・13 御前会議通过处理“中国事变”綱要。 11・20 元老西园寺公望死去。 11・28 政府統帅部召开第一次联絡恳談会。 11・30 芳澤謙吉就任赴荷印特派大使。日“华”基本条約和日“滿”“华”共同宣言签字。 12・6 平沼騏一郎就任不管部大臣。成立內閣情报局。 12・7 內閣会議通过經济新体制綱要。 12・16 大政翼贊会召开临时中央协助政府会議(18日閉幕)。 12・21 內相富田、司法相风见辞职，平沼騏一郎、柳川平助继任。 12・23 日泰友好亲善条約签字。 12・24 日、荷印財政协定		

年	月/日	日本	月/日	东方	月/日	西方
		签字。				
1940	12·26	第七十六次議会开幕。				
	12·27	联席会議决定"帝国对泰国及法属印度支那措施"。				
1941（昭和16年）	1·8	陆軍下达《战陣訓》。	1·1	泰、法属印度支那两軍在国境綫发生冲突。	1·6	美国总統罗斯福发表关于"四項自由"的演說。
	1·11	公布新聞紙等刊載限制令。	1·4	新四軍开始向华北移动。	1·13	德軍侵入保加利亚。
	1·21	日苏漁业临时协定签字。	1·6	伪中国儲备銀行开业。	1·20	英軍进入北非的托卜魯克。
	1·24	泰、法属印度支那接受日本的停战調停。	1·7	国民党軍在安徽南部围攻新四軍（皖南事件）。	2·14	野村、罗斯福首次会见。
	1·30	联席会議决定"对法属印度支那、泰国措施綱要"。	1·17	国民党軍事委員会下令解散新四軍。	2·15	美英荷澳就太平洋防卫問題举行会談（在华盛頓）。
	2·1	施行耕地价格等管理令。	1·18	中共中央为皖南事件向国民党提出抗議。	3·1	保加利亚加入日德意三国同盟。
	2·6	駐美大使野村到达美国。	1·20	中共中央任命陈毅、张云逸、刘少奇为新四軍代理正副軍长及政治委員。	3·11	美国軍火租借法成立。
	2·7	在东京举行調停法属印度支那、泰国紛争的会談。	1·29	新四軍在苏北成立新軍部。	3·13	英空軍轰炸柏林。
	3·1	畑俊六被任命为日本侵华軍总司令官。	2·17	美国駐华北陆战队开始撤退。	3·25	南斯拉夫加入日德意三国同盟。
	3·3	修訂国家总动員法公布。	2·	苏联軍事顾問团离开重庆。	3·27	南斯拉夫发生反軸心派的武装政变。松岡会见希特勒。
	3·7	公布国防保安法。	3·2	畑俊六就任日本侵华軍总司令官。	4·1	松岡会见墨索里尼。
	3·10	修訂治安維持法公布。	3·11	泰国、法属印度支那和約签字。国民	4·3	軸心国軍在北非击敗英軍。
	3·11	对泰国、法属印度支那糾紛調解成			4·5	苏联、南斯拉夫互不侵犯条約签字。
					4·6	德軍侵入南斯拉夫

1941（昭和16年）

功。

3·12 松岡外相出发訪欧。

3·26 第七十六次議会开幕。

3·27 翼贊会事务总长有馬以下全体职員提出辞呈，翼贊会改組。

4·1 公布生活必需物資統制令。东京及其他六大都市实行粮食定量供应制。公布国民学校令。决定日本銀行最高发行額限度为四十七亿日元。

4·2 小仓正恒被任命为不管部大臣。

4·4 丰田貞次郎就任商相，鈴木貞一就任企划院总裁。

4·9 軍令部长伏见宮辞职，永野修身继任。

4·13 日苏中立条約签字。

4·26 鋼鉄統制会成立。

5·1 企划院改組。

5·6 日、法属印度支那經济协定簽字。

5·9 日法属印度支那、日泰两議定书签字。

5·13 設立农地开发营团。

5·15 設立預防拘禁所。

党中央密令破坏和逮捕中共各級委員会組織。

4·2 国民党八中全会闭幕，发表三年建設計划。

4·10 泰国、緬甸发表划定国境工作完成。

4·25 美国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五千万美元貸款。

5·1 中共公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綱領和实行三三制。

6·5 英国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五千万英鎊信用貸款。

6·22 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反法西斯国际統一战綫的决定。

7·2 国民党政府宣布和德意断絕邦交。

7·18 蔣介石的政治顾問拉鉄摩尔到达重庆。

7·26 菲律宾冻結日本資产。

7·28 荷印冻結日本資产，日本荷印石油协定停止施行。

8·8 国民党政府就建立中苏英美四国联合战綫发表声明。

8·12 法属印度支那宣布全面禁止輸出。

9·27 日軍占領长沙。

和希腊。

4·8 英、美、荷三国举行軍事会談（在馬尼拉）。

4·10 克罗地亚发表独立宣言。

4·13 日苏中立条約签字。

4·16 野村会见赫尔。赫尔要求日本政府就日美諒解方案表示意见。

4·18 南斯拉夫对德无条件投降。

4·23 希腊对德无条件投降。

5·6 斯大林就任部长会議主席。

5·10 納粹領袖赫斯飞往倫敦。

5·12 野村大使提出日方修正方案。

5·20 德伞兵进攻克里特島。

5·24 英德在格陵兰近海进行海战。

5·27 罗斯福发表非常时局宣言。

5月下旬 法国組成反德抵抗組織“国民陣綫”。

6·2 希特勒墨索里尼会談。

6·14 美国冻結德意在美資产。

6·15 克罗地亚加入日德意三国同盟。

6·21 美国針对日本修正

年	月/日	日本	月/日	东方	月/日	西方
1941（昭和16年）	6·6	大本营决定“对南方措施綱要”。	10·4	日軍占領郑州。		方案提出反建議。
	6·7	明倫会解散。	10·8	美、英、荷印公布对日禁运石油协定。	6·22	德軍侵入苏联領土，苏德战争开始。意、芬、罗馬尼亚也对苏宣战。
	6·11	日苏通商、貿易及支付协定签字。	10·10	美国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五千万美元貸款。	6·30	美总統顾問霍浦金斯会见斯大林。
	6·16	召开第一次中央协助会議。汪兆銘来日。	11·21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議会开幕。	7·1	德、意、罗馬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承认汪記政权。
	6·18	日荷会談决裂。	11·25	伪南京政府参加防共协定。	7·7	美軍在冰島登陆。
	6·28	向汪伪組織提供三亿日元貸款。	12·8	日軍开始侵入泰国。	7·12	英苏軍事协定签字。
	7·2	御前会議决定“适应形势演变帝国国策綱要”。	12·9	国民党政府向日德意宣战。	7·16	德軍占領諾佛果洛德、斯摩棱斯克。
	7·6	大日本兴亚同盟成立。	12·10	日英在馬来近海进行海战。	7·24	美国向日本提出法属印度支那中立化方案。
	7·16	第二次近卫内閣总辞职。	12·12	日軍占領关島。	7·26	美英冻結日本在外資产。
	7·18	第三次近卫内閣成立。	12·16	日軍在英属婆罗洲登陆。	8·1	美国禁止对日出口飞机用汽油。
	7·26	日、法属印度支那就共同防卫达成协議。	12·19	日軍在民答那峨島登陆。	8·4	美苏延长通商协定有效期間。
	7·28	日軍侵入法属印度支那南部。	12·23	日軍占領威克島。	8·9—12	罗斯福丘吉尔在大西洋上会談。通过大西洋宪章（14日公布）。
	7·29	日、法属印度支那共同防卫議定书签字。	12·25	日軍占領香港。	8·15	罗斯福、丘吉尔声明援助苏联。
	8·14	国务相平沼遇刺。	12·26	英国同国民党政府签訂軍事同盟。	8·25	苏英軍开进伊朗。
	8·21	时局共同融資团成立。			8·27	苏英和伊朗停战。
	8·26	近卫首相致书罗斯福总統。			8·29	希特勒墨索里尼会談，发表关于建設欧洲新秩序的共同
	8·30	公布重要产业团体令、金属类回收				

年份	日期	事件
1941（昭和16年）		令。
	8·	大批文艺作品遭到禁止发售。
	9·2	翼贊議員同盟成立。
	9·4	翼贊会决定翼贊壮年团基本綱要。
	9·6	御前会議决定"帝国国策貫彻綱要"（第一次）。
	9·15	农林省决定米谷管理綱要。
	10·1	实施国民劳动手册法。
	10·5	諾門坎边界协定签字。
	10·15	縮短大学、专門学校肄业年限。
	10·16	第三次近卫内閣总辞职。公布农田耕作統制规则。
	10·18	东条英机内閣成立。
	10·22	安藤紀三郎被任命为翼贊会副总裁。
	10·30	根据重要产业团体令，发表第一次决定。
	11·5	御前会議决定"帝国国策貫彻綱要"（第二次）。特派大使来栖赴美。
	11·16	第七十七次临时議会开幕（21日閉幕）。
	11·22	公布国民勤劳报国

日期	事件
	声明。
9·3	罗斯福提示对于近卫来信的答复。
9·4	美驅逐舰古里亚号和德国潜水艇交鋒。
9·7	英空軍大举轰炸柏林。
9·11	罗斯福主张在大西洋战争区域进行防卫。
9·20	德軍占領基輔。
9·24	德軍到达列宁格勒郊外。
9·25	戴高乐成立"自由法国全国委員会"。
9·27	駐美大使野村向美方提出日方第二次修正案。
9·29	美、英、苏就对苏租借武器問題举行会談（在莫斯科）。
10·2	美国提交对日方历次提案的备忘录。
10·3-4	英美举行軍事会談（在馬尼拉）。
10·6	德軍对莫斯科开始总攻。
10·13	美国同荷印举行軍事会談（在馬尼拉）。
10·15	苏联政府迁往古比雪夫。
10·16	德軍占領敖得薩。
10·19	莫斯科宣布戒严。
10·24	德軍占領哈尔科夫。

年	月/日	日本	月/日	东方	月/日	西方
1941（昭和16年）		协力令。			11·7	野村大使向美方提出第一方案。
	11·25	防共协定有效期間延长五年。			11·16	德軍对莫斯科开始第二次总攻。
	12·1	御前会議决定对美、英开战。			11·17	美国修改中立法，許可美国船向盟国輸送武器。
	12·8	日軍进攻珍珠港，在馬来半島登陆。对美英两国宣战，太平洋战爭爆发。日、法属印度支那軍事协定签字。			11·20	野村、来栖两大使向美国提出第二方案。
	12·11	日德意共同进行战爭协定签字。			11·22	德軍占領罗斯托夫。
	12·1[illegible]	第七十八次临时議会开幕（17日閉幕）。			11·26	国务卿赫尔将最后方案（赫尔备忘录）手交野村大使。
	12·16	加强国民征用令。			12·1	德軍从罗斯托夫撤退。英国对芬兰、匈牙利、罗馬尼亚宣战。
	12·19	公布言論、出版、結社取締令。			12·7	罗斯福向日皇拍发电报。
	12·21	日泰攻守同盟签字。			12·8	美英对日宣战。德軍进攻莫斯科失败，宣布东部战綫进入停頓状态。
	12·25	第七十九次議会开幕。			12·11	德意对美宣战。美国对德意宣战。
					12·23	丘吉尔、罗斯福开始就指导战爭举行会談。
1942（昭和17年）	1·1	废除汇率以英美貨币为基准的制度，实施以日元官价为基准的办法。	1·2	日軍占領馬尼拉。	1·1	盟国共同宣言签字（在华盛頓）。
			1·4	日軍再次占領长沙。	1·27	英美公布战时經济协定。
			1·11	日軍在西里伯斯島		

1942（昭和17年）

1·16 大日本翼贊壯年团成立。公布战时大幅度增稅方案。

1·18 日德意新軍事协定签字。

1·19 召开第一次重臣会議。

1·20 公布实行衣料票购制。

1·30 决定以日元为日本占領区的决算标准。

2·2 大日本妇女会成立。

2·5 成立日本新聞会。

2·18 决定貫彻翼贊选举基本方針。

2·20 公布南方开发金庫法、战时金融金庫法，自3月1日实施。

2·21 公布食粮管理法，自7月1日施行。

2·23 翼贊政治体制协議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議。

2·24 公布修訂日本銀行法，日本銀行經过改組从5月1日起从新开始工作。

3·7 联席会議决定战爭指导大綱。

3·20 日苏漁业临时协定签字。

3·25 第七十九次議会閉幕。

4·1 取消永久租地权制登陆。

1·19 日軍侵入緬甸。

1·23 日軍在新不列顛島登陆。

1·26 泰国对英、美宣战。

1·28 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抗日根据地的土地政策的决定。

2·1 毛澤东发表关于整頓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說。整风运动开始。

2·2 英国对国民党政府貸款五千万英鎊，美国貸款五亿美元。

2·4 日軍与英荷軍在爪哇近海进行海战。

2·5 中苏交换軍用品协定签字。

2·15 日軍占領新加坡。

2·20 日軍在的摩尔島登陆。

2·27 日軍同英荷軍在泗水近海海战。

3·1 日軍在爪哇登陆，在巴达維亚近海发生海战。

3·15 史迪威就任中苏美英联合参謀部参謀长。

3·21 美国向国民党政府貸款五亿美元协定签字。

3·31 停止用伪“中央儲备券”和旧法币等价兑换。

2·6 英美組成联合参謀本部。英德在多維尔近海进行海战。

2·19 英国内閣改組，工党領袖艾德礼入閣。

3·14 德意經济財政协定签字。

3·17 麦克阿瑟元帅到达澳大利亚。

3·18 土耳其发表中立声明。

4·1 中、美、英、加举行太平洋軍事会議（在华盛頓）。

4·8 軸心国軍在利比亚开始第二次进攻。

4·14 伊朗对日断絕邦交。

4·18 法国賴伐尔内閣成立。

5·12 德軍再次对苏展开攻势。

5·26 苏英互助条約签字。

5·29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到达华盛頓。

6·2 墨西哥对軸心国宣战。美国对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馬尼亚宣战。

6·11 罗斯福宣布美苏就开辟第二战場达成协議。

6·20 罗斯福、丘吉尔举行第二次战爭指导会談（华盛頓～26

年	月/日	日本	月/日	东方	月/日	西方
1942（昭和17年）		度。	4·9	英印会談，印度提出国民政府組織方案。		日）。
	4·6	翼贊政治体制协議会发表推荐候选人。	4·11	国民会議派拒絕英方修正方案，会談决裂。日軍攻下巴丹半島。	6·21	托卜鲁克陷落。
	4·16	全国产业团体联合会决定解散。	5·7	日軍占領柯勒吉多尔島，珊瑚海海战。	6·25	德軍侵入埃及。
	4·18	美机初次空袭东京、名古屋、神戸。	5·23	毛澤东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讲話。	7·1	德軍占領塞瓦斯托波尔，进入爱尔·阿拉眠。
	4·30	第21次大选（翼贊选举）举行。	5·31	中国政府回收旧法币，着手币制統一。	8·12	英首相丘吉尔到达莫斯科，英美苏三国軍事会談开始。
	5·2	日泰間日元与泰币等价交换协定成立。	6·5	中途島海战。	8·22	巴西对德意宣战。
	5·9	日本决定在朝鮮实行征兵制。	6·7	日軍进攻阿留申群島。	8·25	苏联开始将斯大林格勒的工厂向腹地轉移。
	5·15	企业整备令施行。	8·7	美軍在瓜达耳卡納耳島登陆，所罗門海战。	8·31	德軍冲入斯大林格勒。
	5·20	翼贊政治会成立，阿部信行任总裁。	8·8	印度国民会議派通过英国势力撤退方案，命令开始不服从运动。	9·21	斯大林格勒周围展开大巷战。
	5·26	日本文学报国会成立。	8·9	甘地、尼赫鲁、阿沙特等被捕。	9·23	美国特使威尔基和斯大林会談。
	5·27	第八十次临时議会开会（～29日）。	8·20	印度各地的交易所被封閉。	9·27	苏联承认戴高乐政权。美国承认戴高乐政权。
	6·1	陆軍設置空軍司令部。	10·6	“滿洲国”产业統制法公布施行。	11·4	英軍在阿拉眠获胜。
	6·9	翼贊会副总裁安藤入閣为国务相。各府县决定設立地方事务所。	10·8	印度发生反英騷动，死伤三千余人。	11·7	美英軍在北非登陆。
	6·10	翼贊会全面改組。	10·10	美英声明废除在华治外法权。	11·12	德軍进駐法国非占領区。
	6·18	对泰国供給二亿日元貸款。	10·26	第二次所罗門海战。	11·13	德意軍从托卜鲁克撤退。
	6·30	广田特使出发赴泰国（～7月29日）。			11·15	法国任命达尔朗·吉罗为北非法軍总司令。
	7·1	自本月起报紙改为一县一报制。			11·19	德意軍由本加济撤退。

1942（昭和17年）

7·11 大本营决定在南太平洋方面暂緩进攻。

7·18 日、法属印度支那經济协定签字。
确立企划院对編制預算的发言权。

7·21 三十六个思想团体获得批准。

7·25 通告德国維持日苏中立不变。

7·28 日本銀行向伪“中央儲备銀行”提供一亿日元貸款。根据重要产业統制令发表第二次决定。

8·5 翼贊会决定調整地方机构。

8·20 日美交換船“浅間”号、“康特維德”号进入横浜港。

9·1 內閣会議决定成立大东亚省。
东乡外务相辞职。

9·9 决定国民炼成綱要。

9·15 在鎮海、大湊分别設立鎮守府。

9·17 谷正之就任外务相，青木一男就任国务相。

9·26 决定陆軍防卫召集规則。

10·11 国营鉄道实行二十四小时营业制。

10·13 决定縮小百貨商店售貨場。

10·28 中苏美英在重庆召开东亚作战会議。

10· 晋西北临时参議会发表施政綱領。

10·28 发生第三次所罗門海战。

12·7 国民党政府公布物价統制法。

11·20 苏軍开始在斯大林格勒大举反攻。

12·24 法国达尔朗被暗杀。

年	月/日	日本	月/日	东方	月/日	西方
1942（昭和17年）	10·14	对重要物資实行强制收购。				
	10·15	設立兵器行政本部。				
	10·19	公布对空袭日本的美空軍人員的懲罰办法。				
	11·1	設立大东亚省任命青木一男为大东亚相。精簡行政机构。				
	11·3	召开第一次大东亚文学家大会。				
	11·7	决定四項增加生产对策綱要。				
	11·8	第八十一次議会开幕。				
	11·15	举行关門海底隧道通車仪式。				
	11·20	文学报国会公布爱国百人一首当选作品。				
	11·28	召开兴亚国民大会。				
	12·4	决定縮短肄业年限等。				
	12·5	公布朝鮮义务教育实施綱要。				
	12·10	成立中央食粮协力会議。				
	12·12	日皇参拜伊势神宫。				
	12·20	汪兆銘訪日。				
	12·21	御前会議决定“貫彻大东亚战爭对华根本方針”。				

1942 （昭和17年）	12·23 大日本言論报国会成立。 12·26 第八十一次議会重开。 12·28 三井銀行和第一銀行宣布合并。 第百銀行并入三菱銀行。		
1943 （昭和18年）	1· 3 斯塔瑪就任德国駐日大使。 1· 9 日本向中国归还租界和废除治外法权的协定签字。 1·13 禁止发售爵士乐唱片。 1·14 联席会議决定容許緬甸"独立"方針。 1·16 公布以間接税为中心的增税法案綱要。 1·19 提高衣料供应量。 1·20 分别签訂日德、日意經济协定。决定将庫頁島并入日本本国的措施綱要。 决定劳动紧急对策綱要。 1·27 海軍編成联合航空总队。实行对鋼鉄工厂的国家管理。 2·18 公布出版事业令。	1· 9 伪南京政府向美英宣战。 1·11 国民党政府和美英締結新条約。美英废除在华特权。日本和汪伪組織締結关于归还租界和废除治外法权的协定。 1·20 日本法属印度支那經济协定签字。 1·29 林奈尔島近海海战。 2·23 法国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归还租界。	1·14 罗斯福、丘吉尔就战爭指导方針举行第三次会談（在卡薩布兰卡，3月26日結束），决定迫使敌方无条件投降的方針。 1·16 伊朗对日德意宣战。 2· 3 斯大林格勒战綫的德軍投降。 2· 4 德国公布总动員令。 2·14 德軍撤出罗斯托夫。 2·16 德軍撤出哈尔科夫。

附录(二) 資料

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約①

(1940年9月27日訂于柏林,同日生效)

大日本帝国、德意志和意大利的政府认为世界一切国家各据有应有的空間是任何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决定在致力于大东亚以及欧洲各区域方面互相援助和合作,其首要目的为在各該区域建立幷維持事物的新秩序,旨在促进有关人民的共同繁荣与福利。

此外,三国政府願意对世界上其他区域內有意与三国朝着同样方向共同努力的国家給予合作,俾使三国对世界和平的最終願望得以实現。

为此,日本、德意志和意大利的政府同意如下:

第一条 日本承认幷尊重德意志和意大利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領导权。

第二条 德意志和意大利承认幷尊重日本在大东亜建立新秩序的領导权。

第三条 日本、德意志和意大利同意循着上述路綫努力合作。三国幷承允如果三締約国中之一受到目前不在欧洲战爭或中日冲突中的一国攻击时,应以一切政治、經济和軍事手段相援助。

第四条 为了实施本协定,由日本、德意志和意大利的政府各自指派委員組成的联合技术委員会将迅速开会。

第五条 日本、德意志和意大利声明上述各条款毫不影响三締約国各与苏俄間現存的政治地位。

第六条 本协定应于签字后立即生效,幷将从其生效日起继續有效十年。在上述期間届满以前适当时間,各締約国如經任何一国請求,应为本协定的延期举行談判。

---

① 参照《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約》,《国际条約集(1934—1944)》,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第278—279頁。——編者

中国事变处理綱要

（1940年11月13日，御前会議决定）

方　　針

对中国事变的处理，根据昭和15年(1940年) 7月通过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处理时局綱要”作如下决定:

（一） 除継續軍事行动外，应采取进一步断絕英美的援蔣行为及調整日苏邦交等一切政治和軍事手段，力求摧毁国民党政府的抗战意志，以迫使其早速屈服。

（二） 及时和积极地改善內外的部署，使其适应于进行大規模的持久战，并恢复和增强为建設大东亜新秩序所必需的帝国国防力量的机动性。

（三） 为此，应充分利用日德意三国同盟。

要　　領

（一） 为使国民党政府屈服并实現停战和平，应进行如下工作:

本工作务須在承认新中央政府以前收到实效。

(1) 和平工作由帝国政府負責进行，并由有关机关进行协助。

注: 以往由軍民各方面所进行的和平工作，应全部停止。在进行上述工作时，鉴于以往两国交涉的过程，应特别注意明确帝国的眞意和恪守信义。

(2) 和平条件以我国和新中央政府之間即将締結的基本条約(包括与此不可分割的关于駐扎海軍部队及开发海南島經济的秘密协定) 为依据，日本方面所要求的基本条件詳見附件。

(3) 上述和平交涉以汪蔣合作为前提，并以日华間直接进行交涉为原則; 但为使工作順利进行，可請求德国居中調停并利用对苏关系的改进。

中国方面謀求南京和重庆合作的工作，应本諸促进的方針給以側面援助。

(4) 同新中央政府締結条約工作，最迟在昭和15年(1940年)11月底以前完成。

（二） 至昭和15年(1940年)年底仍然不能和国民党政府之間实現和平时，則不論形勢如何，大体根据下列要領轉而采取長期策略，努力迫使国民

党政府屈服。

轉入長期战方針以后如果重庆政权屈服时，則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条件。

(1) 根据整个形势进行部署的同时，于适当时期轉入長期武力进攻。

長期武力进攻，在一般形势无大变化时，一面确保由“蒙疆”、华北的主要地区及汉口附近直至長江流域的主要地区和广东的一部分及华南沿海要地，經常保持用兵的机动性；另一方面彻底肃清占領地区确保治安并继續进行封鎖和空中进攻。

(2) 对于新中央政府，主要使其专事协助帝国为加强綜合战力而采取的各种必要措施的实現，特别是，指导其在我占領地区內发展政治力量。

对国民党政府，最后仍使其与新中央政府合流，但不要使新中央政府急于求成而采取急躁的措施。

(3) 在中国进行經济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一面配合日“滿”两国的情况彻底开发和取得国防資源，一面借此安定占領地区的民心。

(4) 为适应进行大規模持久战的新事态，应迅速地积极地改善国內的体制。

对帝国在华各机关坚决施行改进和裁并，以便加强方針措施的貫彻执行。

附　　件

日本方面要求的基本条件

(一)　中国承认“滿洲国”。

(实行本項的具体方式和时期，可另行考虑。)

(二)　中国放弃抗日政策，建立日华善邻友好关系，并适应世界新的形势，而与日本共同保卫东亞。

(三) 中国承认，为了共同保卫东亞，在必要时期內日本实行如下的駐兵：

(1) 在“蒙疆”及华北三省駐扎軍队。

(2) 在海南島及华南沿岸特定地点駐扎海軍部队。

(四) 中国承认日本在上述地区开发和利用国防上必要的資源。

(五) 中国承认日本在長江下游三角地带实行一定期間的保証性駐軍(本条根据情况可适当加以取舍)。

注：除上述条件以外，努力切实貫徹我方下列要求：

（1） 汪蔣两政权的合作問題，应在尊重日本立場的情況下，作为国內問題加以处理。

（2） 实施日华間紧密的經济合作。

对于經济合作的方式，不必坚持以往的方式，而应根据平等原则在形式上力求尊重中国方面的面子。

（3） 对于經济現状的調整，进行充分考慮，以免使日华双方发生混乱。

日汪基本关系条約①

（1940年11月30日签訂于南京）

大日本帝国政府及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希望两国互相尊重其本然之特质，于东亚建設以道义为基础的新秩序之共同理想下互为善邻，紧密提携，以确立东亚之永久和平，并希望以此为核心，而貢献于世界全体之和平。为此訂立基本原則，以律两国間之关系，协定如下：

第一条 两国政府为永久維持两国間善邻友好之关系，应互相尊重其主权及領土，并于政治、經济、文化等各方面，講求互助敦睦之手段。

两国政府相約，互相撤廢政治、外交、教育、宣傳、交易等事項足以破坏两国間友誼之措施及原因，且将来亦禁絕之。

第二条 两国政府关于文化之融和、創造及发展，应紧密协力。

第三条 两国政府相約，对于足以危害两国安宁及福祉之一切共产主义的破坏工作，共同防卫之。

两国政府为完成前項目的計，应各在其領域內剷除共产分子及其組織，并对防共有关之情报宣傳等，紧密协力。

日本国为实行两国共同防共計，在所要期間內，依据两国另行議定，駐屯所要之軍队于蒙疆及华北之一定地域。

第四条 两国政府相約，在派遣于中华民国之日本国軍队，依据別項所

① 参照《日汪基本关系条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侵华文件选輯》，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35—237頁。——編者

定，撤兵尚未完成之前，对共同治安之維持，緊密协力。

在必須維持共同治安之期間內，日本国軍队之駐屯地域等事項，两国另行协議決定之。

第五条　中华民国政府，承认日本国基于历来之慣例，及为确保两国之共同利益，在所要期間內，依据两国間另行議定，得駐留其艦船部队于中华民国領域內之特定地点。

第六条　两国政府，基于取長补短，有无相通之旨趣，并根据平等互惠之原則，应行两国間之緊密的經济提携。关于华北及蒙疆之特定資源，尤其国防上必要之埋藏資源，中华民国政府允諾两国緊密协力开发之，关于其他地区內国防上必要之特定資源之开发，中华民国政府应予日本国及日本国臣民以必要之便利。

关于前項資源之利用，考虑中华民国之需要，而中华民国政府积极的給予日本国及日本国臣民以充分之便利。

两国政府为振兴一般通商及使两国間之物資需給便利而合理計，应講求必要之措施。两国政府对于長江下游地域通商交易之增进，及日本国与华北蒙疆間物資需給之合理化，尤应緊密协力。

日本国政府对于中华民国之产业、金融、交通、通信等之复兴与发展，应依两国間之协議，对中华民国作必要之援助乃至协力。

第七条　随本条約所規定之中日新关系之发展，日本国政府应撤廢其在中华民国所享有之治外法权，并交还其租界，而中华民国則应开放其領域，使日本国臣民得以居住和营业。

第八条　两国政府关于为完成条約之目的所必要的具体事項，另行訂約。

第九条　本条約自签字之日起实施之。

下列签字人各奉其本国政府正式之委任，在本条約签字盖印，以昭信守。

昭和15年(1940年)11月30日
中华民国29年11月30日　訂于南京

以日文及中文各繕本条約二份

大日本帝国特命全权大使　阿部信行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長　汪兆銘

日"滿"华共同宣言①

（1940年11月30日）

大日本帝国政府

"滿洲帝国"政府及

中华民国政府

希望三国互相尊重其本然之特质，于东亞建設以道义为基础的新秩序之共同理想下，互为善邻，密切提携，以形成东亞之永久和平，并希望以此为核心，而貢献于世界全体和平。为此，发表如下宣言。

一、日本国、"滿洲国"及中华民国互相尊重主权及領土。

二、日本国、"滿洲国"及中华民国，講求各項必要之手段应以互惠为基础，俾三国間以互惠为基調之一般提携，尤其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經济提携得收实效。

三、日本国、"滿洲国"及中华民国，根据本宣言之旨趣，速行締結协定。

日苏中立条約

（1941年4月13日签字）

大日本帝国和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基于巩固两国間和平友好关系的願望，决定締結中立条約，协定如下：

第一条　締約双方保証維持两国間和平友好关系，并相互尊重締約另一方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第二条　如果締約一方成为第三者的一国或几国的战爭对象时，締約另一方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将保持中立。

第三条　本条約自締約双方批准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五年。如締約任何一方在期滿前一年未通知廢止本条約时，則本条約应視为自动延長五年。

第四条　本条約須經尽速批准，批准书也应迅速在东京互换。

---

① 参照《日"滿"华共同宣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侵华文件选輯》，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39頁。——編者

日美諒解方案

(1941年4月16日)

日本国政府及美国政府,为了就締結一項旨在恢复两国間傳統的友好关系的全面的协定进行交涉,茲願承担共同的責任。两国政府衷心希望不要就导致两国邦交近来疏远的原因进行爭論,共同防止使两国国民的友好感情趋于恶化的事件的重新发生,并制止其不測的发展。

两国政府殷切希望,通过两国的共同努力,在太平洋上建立起以道义为基础的和平,并迅速达成两国間亲密友好的諒解,以使消除将毁灭文明的可悲的混乱的威胁;如其不可能,則应迅速采取措施,以使上述威胁不致扩大。

鉴于对采取上述决定性的行动說来,長期交涉旣不适当而又緩不济事。为了签訂一項全面的协定,茲特建議写成文件作为从道义上約束两国政府的有效手段。

上述諒解应局限于紧急的重要問題,并交由会議审議,至于两国政府日后可能获致协議的附带事項,暫不包括在內。

如能就下列各点,加以澄清或改善,則两国政府之間的关系,将能获得显著的調整。

一　日美两国所抱的国际观念和国家观念

二　两国政府对于欧洲战爭的态度

三　围繞中日战爭两国政府的关系

四　关于太平洋海軍兵力和航空兵力以及海运的关系

五　关于两国通商和財政互助

六　关于西南太平洋方面的两国經济活动

七　关于安定太平洋政治的两国方針

由于上述情况,現已达成如下的諒解:

上述諒解經美国政府修改后,交由日本政府作最后和正式的决定。

一　日美两国所抱的国际观念和国家观念

日美两国互相承认为对等的独立国和互相比邻的太平洋强国。

两国政府将表明,在希望确立持久和平并开辟一个以互相尊重为基础的信任与合作的新时代問題上两国政策是一致的。

两国政府声明:两国政府的傳統信念是:各国和各民族互相联合形成四

海一家的局面，各自享有平等权利；他們的利益应共同采取和平方法加以調济；各自追求其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并加以維护，同时承认有責任不对这种利益加以破坏。

两国政府抱有坚定的决心，保持基于两国固有傳統的国家观念和社会秩序以及作为国家生活基础的道义原則；而不允許与此相反的外来思想的泛濫。

二　两国对于欧洲战爭的态度：

日本曾說明：軸心同盟的目的在于防御性，即在于阻止現在尙未牵入欧战的国家，发生軍事的扩大关系。日本又声明其并不企图規避現存条約的义务；至于对軸心同盟所負的軍事上的义务，只限在該同盟的締約国德国受到現在尙未参加欧战的国家积极的攻击时，日本始发动此种义务。美国政府声明：美国对欧洲战爭的态度不論現在及将来，决不援助一方而攻击他方，即决不受攻击同盟所約束。美国政府坚守嫌恶战爭，从而对于欧战的态度，无論現在或将来，除考虑本国的福利和安全之外，不作他想。

三　围繞中日战爭两国政府的关系：

美国总統承认下列条件，如果日本政府对此加以保証时，美国总統即进而对中国政府劝告和平。

1．　中华民国独立；

2．　根据日华成立的协定，日軍应自中国领土撤退；

3．　不兼并中国領土；

4．　不賠偿；

5．　恢复門戶开放方針，但关于其解釋及适用，将于适当时期由日美两国协議之；

6．　重庆政府与南京合一；

7．　日本应自行約束其对中国領土的大量或集体移民；

8．　承认“滿洲国”。

在中国政府接受美国总統的劝告时，日本政府应即同重新統一的中国政府及构成該政府的人員直接进行和平談判。

日本国政府在上述条件的范围內，根据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及經济合作的原則，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具体的和平条件。

四　关于太平洋海軍兵力和航空兵力及海运的关系：

1．　日美两国为維持太平洋和平起見，不得配备有相互威胁对方的海軍

兵力和航空兵力。关于其具体细目，由日美間另行协議之。

2. 日美会談达成协議时，两国互派艦队向对方作友好訪問，以庆祝和平来到太平洋。

3. 中日战事解决后，日本国政府同意美国政府的要求，迅速采取措施使現在服役中的本国船舶中可以复員的，根据同美国訂立的契約主要参加太平洋方面的航运，关于这类船只的吨位等，应由日美会談决定之。

五 关于两国通商及金融互助

在此項諒解成立并經两国政府批准时，日美两国需要对方国所有的物資时，应由对方国保証供应。另外，两国政府应采取适当的措施以恢复日美通商条約有效期間曾經存在的正常通商关系；而在两国政府欲締結新通商条約时；通过日美会談并依照通常慣例締結之。

为促进两国經济合作起見，美国願对日本提供足够的信用貸款，以資改善亚洲經济，发展其工商业，并实現日美經济合作。

六 关于西南太平洋方面的两国經济活动：

鉴于日本已提出保証不用武力而用和平手段来謀求其在西南太平洋方面的发展，美国願协助日本取得其所需要的这一地区的物資：石油、橡胶、錫，鎳等。

七 两国政府关于安定太平洋政治的方針

1. 日美两国政府不承认欧洲各国将来在亚洲和西南太平洋接受領土割让或合并現在的国家。

2. 日美两国政府共同保証菲律宾的独立，如其未經挑战而受到第三国攻击时，两国得考虑救援方法。

3. 对于日本向美国及西南太平洋的移民，予以友好考虑，并給予与其他国民同等待遇。

日美会談

1. 日美两国会談应在檀香山举行。美国代表罗斯福总統，日本代表近卫首相。代表人数双方均以五人为限，但不包括专家、秘书等在內。

2. 本会談不让第三国列席旁听。

3. 本会談，在两国間达成此次諒解后尽速召开之（本年五月）。

4. 本会談，不得再議此次諒解之各項。两国政府具体議題由两国政府間协議之。

附則：

本諒解事項应作为两国政府間的秘密备忘录。关于本諒解事項发表的范围、性质及时期，由两国政府协議之。

适应形势演变帝国国策綱要

（1941年7月2日，御前会議决定）

一 方針

（一） 不論世界形势如何轉变，帝国将坚持建設"大东亞共荣圈"，以利于确立世界和平的方針。

（二） 帝国依旧为处理中国事变而迈进，并为确立自立自卫的基础，继續向南方的扩展，同时，根据形势的演变解决北方問題。

（三） 帝国为达成上述目的，坚决排除一切障碍。

二 要領

（一） 为迫使蔣政权屈服，进一步由南方各地加强压力。根据形势的演变，在适当时期对重庆政府行使交战权，并接收在中国的敌对性租界。

（二） 帝国为了自立自卫，继續对南方各重要地区进行必要的外交工作，并推行其他各种对策。

为此，应作好对英美开战的准备，首先根据"对法属印度支那、泰国措施綱要"及"关于推行南方对策事項"貫徹对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的各种政策，以便加强向南方扩展的准备。

帝国为达成此項目的，不辟对英美一战。

（三） 对于德苏战争，虽然依据三国軸心的精神，但暂时不拟参加，而在秘密中进行对苏軍事准备，采取自主的立場。在此期間，当然要做好周密的准备进行外交工作。

如果德苏战争的发展对帝国有利时，即行使武力解决北方問題，确保北部边界的安定。

（四） 在实行前項决定时，尤其是决定行使武力时，应避免过份影响对英美作战的基本战略地位。

（五） 对于美国的参战，根据既定方針采用外交手段及其他一切方法极力加以阻止。万一美国实行参战时，帝国根据三国条約采取行动，但行使武

力的时机及方法，应作自主的决定。

（六） 迅速彻底地加强国内的战时体制，特别要努力加强国土的防卫。具体措施将另行規定。

大西洋宪章①

（1941年8月14日）

美利坚合众国总統罗斯福和联合王国国王陛下政府代表首相邱吉尔經过会晤，认为他們两国国策中某些共同原則应該予以宣布。他們对于世界所抱有的一个美好未来局面的希望是以此項政策为根据。

（一） 两国并不追求領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張。

（二）凡未經有关民族自由意志所同意的領土改变，两国不願其实現。

（三）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擇其所賴以生存的政府形式的权利。各民族中的主权和自治权有横遭剝夺者，两国俱欲設法予以恢复。

（四）两国在尊重它們的現有义务的同时，努力使一切国家，不論大小，胜敗，对于为了它們的經济繁荣所必需之世界貿易及原料的取得俱享受平等待遇。

（五）两国願意促成一切国家在經济方面最全面的合作，以便向大家保証改进劳动标准，經济进步与社会安全。

（六）待納粹暴政被最后毀灭后，两国希望可以重建和平，使各国俱能在其疆土以内安居乐业，并使全世界所有人类悉有自由生活无所恐惧，亦不虞匱乏的保証。

（七）这样一个自由，应使一切人类可以橫渡公海大洋，不受阻碍。

（八）两国相信世界所有各国，无論为实际上或精神上的原因，必須放弃使用武力。倘国际間仍有国家继續使用陆海空軍軍备，致在边境以外实施侵略威胁，或有此可能，則未来和平势难保持。两国相信，在广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建立之前，此等国家軍备的解除实属必要。同时，两国当贊助与鼓励其他一切实际可行的措施，以減輕爱好和平人民对于軍备的沉重負担。

弗兰克林·罗斯福

溫斯頓·邱吉尔

① 《国际条約集(1934—1944)》，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第337－338頁。——編者

美日协定基础概略(赫尔备忘录)

(1941年11月26日)

第一项　关于政策的共同宣言草案

美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表明：两国均希望太平洋的和平，国策均以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持久而广泛的和平为目的，两国对上述地区并无任何领土野心，亦无威胁其他国家或对邻近国家进行武装侵略的企图，而在国策上积极支持成为两国間及其同其他一切国家政府之間关系基础的以下各項根本原则，并实际予以适用。

(一) 关于一切国家領土完整及主权不可侵犯的原则；

(二) 关于不干涉其他国家內政的原则；

(三) 关于包括通商上机会均等和待遇平等的平等原则；

(四) 为了防止糾紛及进行和平解决，以及用和平方法和途径改善国际形势而遵循国际合作和国际調停的原则。

美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同意，为了根絕慢性的政治不安，防止频繁发生的經济危机及建立和平的基础，在两国間及其和其他国家民族間的經济关系上积极支持以下各項原则，并实际予以适用。

(一) 关于国际通商关系上互不歧視原则；

(二) 关于廢除表現在国际經济合作及对通商的过度限制上的极端国家主义的原则；

(三) 关于一切国家平等地获得原料物資的原则；

(四) 关于国际間商品协定的实施上充分保护消費国家及民众之利益的原则；

(五) 关于成立容許有利于一切国家的主要企业持續发展及符合一切国家福利的貿易手續的支付办法的国际金融机构和协定的原则。

第二项　美日两国政府应采取的措施

美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提議采取如下的措施：

(一) 美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应为締結有英帝国、中国、日本国、荷兰、苏联、泰国和美国参加的多边的互不侵犯条約进行努力。

(二) 两国政府应为締結这样一項协定而努力，在这項协定中美、英、中、日、荷、泰各国政府一致声明尊重法属印度支那的領土主权；一旦印度支那

的領土完整遭到威胁时，立即进行协議，以便針对这种威胁采取必要而适当的措施。

上述协定規定，美日将为保証作为协定締約国的各国政府在其同印度支那的貿易和經济关系上不要求或接受特惠待遇，为确保締約国在和法属印度支那的貿易通商上受到平等待遇，进行努力。

（三）日本国政府从中国及印度支那撤退其一切陆、海、空軍兵力和警察。

（四）美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不給予以重庆为临时首都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以外的中国任何其他政府或政权以軍事、政治和經济上的支持。

（五）两国政府放弃在中国的租界和居留地以及与此有关的各种权益，和包括1901年"拳匪"事件議定书中規定之各种权利在內的一切治外法权。

两国政府为了就放弃外国租界和居留地內各种权利以及包括1901年"拳匪"事件議定书中規定之各种权利在內的在华治外法权問題取得英国政府及其他各国政府的同意而进行努力。

（六）美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了根据美国方面关于提供互惠的最惠国待遇，降低通商障壁以及把生絲规定为自由貨品的建議，就締結美日通商协定开始談判。

（七）美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各自撤銷对存在各該国內的对方国資金的冻結。

（八）两国政府同意締結稳定日美元汇率的协定，并为这一目的設立一笔基金，由两国各出一半。

（九）两国政府同意，不使同两国的任何一方締結了任何协定的第三国对所締結的协定作違反本协定之根本目的即确立及保持太平洋地区的全面和平的解釋。

（十）两国政府应使用力量使其他国家政府遵守本协定所規定的基本政治和經济原則，并实际予以适用。

对美备忘录

（1941年12月8日）

一　帝国政府根据同美国政府达成友好諒解，通过两国的共同努力确保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以增进世界和平的眞摯願望，自本年4月以来誠心誠意地和美国政府之間，就調整和增进两国邦交，实現太平洋地区之安定問題，进

行了交涉。現在能够就过去八个月交涉过程中美国所坚持的主張以及最近美国和英国对于帝国所采取的措施率直地向美国政府陈述意見，这是引为光荣的。

二 帝国坚定不移的国策是确保东亜的安定，增进世界和平，以使万邦各得其所。以前，由于中华民国不了解帝国的眞意，不幸造成中国事变，但帝国始終一貫竭尽最大努力，一面寻求和平之途径，一面防止战禍扩大，去年九月帝国和德意两国締結同盟条約，其目的亦在于此。

然而，美国和英国不仅采取一切手段援助重庆政权，妨碍日华全面和平的实現，阻撓帝国为安定东亜而付出的建設性努力，而且控制荷属东印度，威胁法属印度支那，妨碍帝国与上述地区互相合作实現共荣理想之企图。尤其在帝国根据与法国締結的議定书而采取共同防卫法属印度支那的措施后，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把它曲解为对于自国領域的威胁，竟然一面拉攏荷兰共同頒布資产冻結令，断絕同帝国的經济关系，表示了明显的敌对态度，一面加强針对帝国的軍备，建立包围帝国的陣势，造成威胁帝国生存的局势。

尽管如此，帝国总理大臣仍然于本年8月建議，为了急速改善事态，同美国总統举行会談，以便討論存在于两国間的有关整个太平洋的重要問題。对此，美国政府虽表示原则上贊同，但坚持主張必須在两国就一重要問題取得一致意見以后才能付諸实行，而不肯让步。

三 于是，帝国政府于9月25日經过充分考虑美国政府一貫的主張以后，以美国方案为基础，加进帝国的主張制成方案，于9月25日提交美方，虽經过反复談論，双方意見总是难于达到一致。因此，日本政府就帝国关于以往交涉中成为难点的各項問題的主張，作了让步，提出修正方案，以求达成协議。但美国政府始終坚持最初的主張，缺乏协調态度，致使交涉陷于停滞。至11月20日，帝国政府为了避免两国邦交的破裂，为了竭尽最大努力就主要而紧急的問題达成公正的协議，特将上述提案加以精簡，提出包括下列內容的新提案，这就是：(一)两国政府約定，不向法属印度支那以外的东南亜及南太平洋地区实行武装扩展；(二)两国政府互相协助，使两国在荷属东印度获得必要物資上得到保証；(三)两国政府約定将两国通商关系恢复到資产冻結以前的状态，美国对日本提供必要的石油；(四)美国政府不采取可能妨碍日华两国实現和平的努力；(五)帝国政府准备，一旦日华間实現和平或在太平洋地区确立公正的和平，即撤退其現在派往法属印度支那的軍队；一旦本諒解宣告成立，即将現在駐扎于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地区的軍队撤到法属印度支

那北部。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表示同意美国总統所提出的对于中国問題美国充当日华和平的斡旋者的建議，但要求美国保証，日华两国开始直接交涉以后，美国不阻撓日华間实現和平。美国政府不仅表示不能接受上述建議，并表明其继續援蔣的意图。继之，美国政府还不顾前此的諾言竟宣布总統提出的斡旋日华間和平的时机尙未成熟，将其撤回。至11月26日，美国政府終于表示迫使帝国接受它一向坚持的原則的态度，提出了无視帝国主張的提案，这是帝国政府感到万分遺憾的。

四 自这次交涉开始以来，帝国政府始終完全以公正謙让的态度力求达成协議，一再隐忍，尽量让步，在这次交涉中的重要事項——中国問題上也表示协調态度；对于美国政府所提倡的遵守国际通商上平等待遇原則問題，則希望該原則能得到世界各国普遍实行，并表明願适应这一原則的实現，为使这一原則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內的太平洋地区进行努力。另外，帝国政府还表明并不排斥第三国在中国的进行正当的經济活动；而在由法属印度支那撤兵的問題上，則极力表現出妥协的精神，即为了緩和局势，如上所述主动提出立即由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撤兵等等，凡此种种，相信早为美国所理解。然而美国政府，一貫拘泥于理論，无視現实，坚持其不現实的原則，不作任何让步，徒使交涉迁延时日，这是帝国政府所难以理解的。因此，帝国政府不得不就下列各点促請美国政府注意。

（一）美国政府自称为了世界和平而主張有利于自己的諸原則，并迫使帝国政府接受。但世界和平，只有根据現实情况理解对方国的立場寻求彼此可以接受之途径，始能实現；那种无視現实，把一国所自以为是的主張强加于对方国的态度，并不能导致交涉的成功。此次美国政府作为日美协定的基础而提出的諸原則中，就其基本精神而言，也有可以得到帝国政府贊同的。然而美国政府要求立即采納这些原則，这种作法，在当前的世界情况下，不能不认为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至于由日、美、英、中、苏、荷、泰七国締結多边的互不侵犯条約的建議，这也是徒然追求陈旧的集体和平机构的想法的一种表現，不能不认为这是和亚洲的实际情况格格不入的。

（二）美国政府在这次建議中說："两国政府同意不使两国与第三国所締結之任何协定受到違反本协定之根本目的即确立及保持太平洋地区的全面和平的解釋，这种提法被认为出于这样的企图，即将来美国参加欧洲战争时，可以借此束縛帝国履行三国同盟条約所規定的义务，这是帝国政府所不能接

受的。

必須指出：美国政府由于一向受到自己的主張和观念的迷惑，而在企图扩大战争。美国政府一方面謀求太平洋地区之安定，巩固自己的后方，另方面援助英帝国，企图利用自卫权的名义积极地向为建設欧洲新秩序而奋斗的德意两国进行攻击。这种做法，是和用和平手段在太平洋地区建立安定基础的各項原則性的主張完全背道而馳。

（三）美国政府一面坚持反对用武力处理国际关系的主张，一面和英帝国等一道用經济力进行压迫。这种压迫，在某种情况下，比武力压迫更加不人道，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手段，是应該受到排斥的。

（四）美国政府的意图，只能认为是拉攏英帝国及其他国家維持并加强其一向对于中国及其他东亞各地的統治地位。亞洲各国在过去百余年中在英美帝国主义的剝削政策之下，被迫維持現状，不得不甘当两国繁荣之牺牲品。这种历史事实，是和帝国使万邦各得其所的根本国策，完全背道而馳，是帝国政府所絕对不能容許的。

美国政府此次提案中关于法属印度支那的規定，可以认为代表上述态度的典型例子。对于法属印度支那，撇开法国，而由日、美、英、荷、中、泰六国相約尊重該地区的領土主权和貿易通商上实行机会均等，这是企图将該地区置于六国政府共同保护之下，即使不問其完全无視法国的立場，也应該认为这是把使亞洲陷于糾紛的最大原因之一的九国公約式的体制进一步扩大到法属印度支那，这是帝国政府所不能容許的。

（五）美国政府就中国問題向帝国提出的要求，不論是要求帝国全面撤兵，或者无条件地适用通商均等原則，都是无視中国之現实，企图推翻帝国作为东亞安定势力的地位。美国政府在此次提案中要求不得給予重庆政权以外的任何其他政权以軍事、政治和經济上的支持，采取了否认南京政府的态度。这可說是从根本上破坏交涉的基础，和上述拒絕停止援蔣一样，証明美国政府有意阻撓日华間正常状态的恢复和东亞和平的恢复。

五　总之，美国政府此次建議中，如締結通商条約，相互解除資产冻結令，稳定日美元汇率等通商問題，以及廢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等問題虽然也包括某些本质上可以考虑的条款，但另方面，这个建議无視了帝国在持續四年余的中国事变中之牺牲，威胁帝国的生存，損伤帝国的权威，因此，整个說来，帝国政府无論如何不能把它作为交涉的基础而加以接受，这是十分遺憾的。

六　另外，帝国政府，由于希望交涉迅速成功，會經提議在日美两国达成

协議时，願和英帝国政府及其他有关国家同时签訂协定，并已获得美国政府大体同意。而美国政府似乎經过与英、澳、荷、重庆等多次商談的結果，尤其在中国問題上迎合重庆方面的意見而提出了上述各項建議，根据这种情况，帝国不能不认为上述各国与美国同样无視了帝国的立場。

七 想来，美国政府不仅要和英帝国等勾結起来妨碍帝国通过建設东亞新秩序以便确立和平的努力，而且要使日华两国互相搏斗，借以維护英美两国的利益。此种意图，通过此次交涉，已經暴露无遺。这就使得帝国政府調整日美国交、与美国政府共同維持和确立太平洋和平的希望終于落空了。

鉴于美国政府采取的态度，帝国政府不能不认为：即使今后继續进行交涉，也无法达到妥协。特此通告美国政府，并深表遺憾。

詔 书

（宣战詔書 1941 年 12 月 8 日）

仰承天佑、继承万世一系皇統之大日本帝国天皇昭示忠誠勇武之尔等众庶曰：

朕兹向美英两国宣战，陆海将兵奋其全力从事交战，百官有司，克勤职守，全国众庶各尽本分，务須亿兆一心，彻底发揮国家之总力，以达成征战之目的。

夫确保东亞之安定以利世界和平，实为列祖列宗之宏猷，朕所拳拳服膺无时或忘者也。而与各国敦睦邦交，同享万邦共荣之乐，亦帝国一貫之外交方針也。

今兹不幸与美英两国釁启兵端，洵非得已，岂朕本願哉。前者，中华民国不解帝国之眞意，妄自滋事，扰乱东亞之和平，終使帝国操戈而起，于兹四年有余矣。幸而国民政府有所更新，帝国与其結善邻之誼，互相提携，而重庆之殘存政权，恃美英之庇蔭，兄弟鬩墻，罔知悔改。美英两国則支援殘存政权，助長东亞之禍乱，假和平之美名，逞制霸东方之野心，并进而勾結与国，于帝国之周围增强武备，向我挑衅，并对帝国之和平通商横加阻碍，終于断絕經济关系，給予帝国生存以重大威胁。朕飭政府通过和平談判恢复事态，虽一再隐忍，而彼方毫无退让之精神，徒事推延时局之解决，近則日益加强其經济軍事威胁，企图使我屈从。長此以往，帝国多年来争取东亞安定之努力，势必化为泡影；而帝国之存在，亦将瀕于危殆。帝国势逼处此，为生存与自卫計，惟有

毅然奋起，粉碎一切障碍。皇祖皇宗之神灵在上，朕深信尔众庶之忠誠勇武，必能恢弘祖宗之遺业，鏟除禍根，确立东亞永远之和平，以保持帝国之荣誉，朕实有厚望焉。

御名御璽

昭和16年(1941年)12月8日

內部讀物

統一书号：11017·120
定　　价：1.20元